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贝·布托传

 **eBOOK**  
网络资源 非纸质

## 引 子

1988年10月4日，世界各大通讯社以第一时间，大报的头版以醒目的标题，覆盖全球的电视网送出的第一幅画面都播发了来自南亚国家巴基斯坦的一条重要消息。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里·布托的女儿，年仅35岁的贝娜齐尔·布托被任命为巴基斯坦的新总理，她是巴基斯坦也是伊斯兰教国家的第一位女总理。

人们感到惊讶，一位女性特别是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度的一位女性居然登上权力的宝座。

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使她登上权力的顶峰，道路一定坎坷不平。

确实，她付出了许许多多……

贝·布托传

## 一、名门闺秀

1953年6月21日，正好是夏至，巴基斯坦的海滨城市，当时的首都卡拉奇骄阳似火，连续几天温度高达40度左右，一阵阵热浪把人们赶到了海滩。但在卡拉奇平托医院里仍然忙忙碌碌，在产房外的走廊上，布托家族的人焦急不安地默默等待着，他们的眼睛都盯着妇产室的房门。过了一会，突然从产房里传来了清脆的啼哭声，布托家族的人顿时露出了笑容。这个家族又添了一个新成员。谁也没有想到这个长着一头美丽鬈曲的头发，玫瑰色面庞，纤纤小手的小宝贝会给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历史打上自己深深的烙印。父亲为了纪念他夭折的姐姐、给小宝贝取名“贝娜齐尔”，乌尔都语为“独一无二”。小名“萍姬”，意为“小不点”。

按照当地重男轻女的风俗习惯，要是谁家生了女孩，这个家庭就没有面子，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一般不告诉别人，并在家里贴上符咒，用线把一个环子拴在孩子的脖子上，这样可以不再生女孩，但布托小姐没有受到这样的待遇。她生在一个思想开明的家庭，祖籍在信德省的拉卡纳，古老的印度河从它旁边缓缓流过，孕育出了灿烂的莫多焦达罗文化。这里可谓山青水秀，人杰地灵。布托家族就是这块丰饶土地上的佼佼者。

据说这个家族是从被称为“伊斯兰大门”的信德省入侵并征服印度的阿拉人的后裔，在整个印度和巴基斯坦，有成千上万的人属于信德最大部落之一的布托部落，其成员从农民到地主都有。贝·布托家这一支是有名的布托部落头人多多汗的直系后代。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成为信德省最大的地主，并在政治上一直占统治地位。他们过着田园般的生活，在自己的领地上从容地狩猎，随心所欲地支使成群的仆人。

布托家族一直流传这样一则故事。当1843年，英国人把触角伸向信德并征服它的时候，一位名叫差利·纳皮尔的英国人坐车漫游信德省，总是不断地问司机，这是谁家的土地，司机总是用同样的回答，布托家的。当睡了一大觉醒来的时候又问司机，回答还是布托家的。确实，布托家的土地一望无际。

贝·布托的曾祖父米尔·吴拉姆·穆尔塔扎·布托是一位敢作敢为的人。年轻的时候长得一表人材，知识又渊博，令许多信德女子倾慕不已，连一个英国少妇也为之动了芳心。俩人很快难舍难分，订下了山盟海誓。在当时，一个英国人和一个穆斯林结婚是绝对不允许的，也是犯法的。此事惊动了当地一位名叫梅赫的英国上校，他马上派人把穆尔塔扎·布托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少校对他劈头盖脑地大肆训斥，“你真是胆大包天，居然敢勾引英国妇女，给我跪下，我得用鞭子好好教训你。”还没等少校把鞭子扬起来，穆尔塔扎·布托抢先一步夺过鞭子猛抽少校，直把少校打得大喊大叫，趴到桌子底下，才把鞭子扔到地上，不慌不忙地大步走出少校办公室。

自然，麻烦就来了。以前没有任何人敢这样教训英国人，英国人岂能丢掉自己的面子就此罢休，于是，马上派人捉拿穆尔塔扎·布托。家人和朋友只好劝他逃走，免遭杀身之祸。穆尔塔扎·布托只好带着几个朋友和他心爱的英国妇人趁夜色离开了拉卡纳。英国人很快紧随而来。为了摆脱英国人的追寻，他们决定分两路，一路跟穆尔塔扎·布托走，一路护驾英国妇女。显然，带着英国妇女的一组行动要缓慢一些，英国人渐渐追上来，要想甩掉英国人已是不可能了，于是他们匆匆忙忙拉了一个掩体，用树枝盖在上面，这

哪能躲过英国人的眼睛，他们很快被发现，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们杀死了英国妇女。因为在分手行动时，穆尔塔扎·布托就交待过，无论如何不能让英国人抓住她，这是一个尊严问题，最后，其他的人也自杀了。

英国人并没有放弃追杀穆尔塔扎·布托。他渡过印度河，往北边逃，到了巴哈瓦蒲尔士邦，得到土邦头头盛情款待。但英国人威胁帮主，如果藏匿穆尔塔扎·布托，就要派兵占领土邦，帮主没有办法，只好把情况跟穆尔塔扎·布托说了。他不得不翻山越岭来到阿富汗王国，寻找庇护。阿富汗王国也是英国的殖民地，国王虽然尽了很大的力，但还是无法保护他。穆尔塔扎·布托还是被英国人抓到了。家里的人只好变卖自己的家产，花了大量的钱才把穆尔塔扎·布托弄回来。但没有过多久，穆尔塔扎·布托因劳累过度，精神抑郁，水烟袋终日不离手，在 27 岁就离开了人世。这是多么的不公平啊！仅仅因为爱上一个英国女人，就付出了生命。

贝·布托没有见到她的曾祖父，这都是她父亲讲的。

到了她祖父沙阿·纳瓦兹这一代，生活的舞台扩大了，已不满足于拥有大量的土地，偏隅乡村，而是走出世代生活的地方，到城市去闯天下，呼吸从西方吹来的资本主义的新鲜空气。由于他的祖父为人诚实，头脑精明，又有学问，很快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孟买政府谋到了一个职位，而且工作干得非常出色，并且积极参加当时印度的政治活动。他对当时国大党有关伊斯兰问题的一些做法极为不满，从而获得了英国人的好感，英王还给他授了爵位，成为当地一位有影响的伊斯兰教人物。

孟买是当时印度的最大港口，也是受欧风美雨吹打最早的地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这里投资办厂，经济发展较快，生活方式也与内地有很大不同。贝·布托的祖父深深体会到国家的贫穷落后与教育息息相关，于是，很早就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学校念书。这在大多数的地主眼中是一件受鄙视的事情，遭到许多人的讥讽。许多封建地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自己拥有大量的土地，足以养活子女一生。儿子有可靠的收入，女儿嫁出去，也可继承土地，还有兄弟和丈夫照顾，根本不需要担心什么教育。这种传统对于虽出生于地主却受欧洲风雨洗礼的纳瓦兹来说已经陈腐过时了。给子女土地，只是给了一点财产，而让子女受教育，就是为他们进入上层社会架起了一座桥梁，提供了一把钥匙。

他不仅要送子女读书，而且还要把他们送到国外去受最好的教育。他要为信德省的地主树立一个榜样，开创一种学习知识的风气。他的儿子先被送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政治学，后入牛津大学，接受严格的西方教育。这种重教风气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布托家族的传统。

贝·布托的父亲佐·阿·布托在美国和英国学习期间，受到严格的西方大学教育，这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布托先是在美国加州大学学习政治学，耳濡目染了美国式的民主政治。1950 年又进牛津大学攻读法律，研究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毕业之后，又获得了伦敦林肯法学院的高级律师资格，曾被聘为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国际法讲师。回国后，在卡拉奇操律师业，后在信德省穆斯林法学院任教。

布托本可继承基业，经营管理信德的地主庄园，过着舒适的生活。但是他不愿去过那种安稳但没有活力的生活，而是把眼光盯着巴基斯坦的政治舞台，决心在充满巨大危险的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从政的执著信念加上横溢的才华和充沛的精力使他很快脱颖而出，成为政坛上的一颗耀眼明星。1957

年，布托出任巴基斯坦联合国代表团成员，1958年任巴基斯坦出席日内瓦海洋会议代表团团长，同年10月22日，以“而立”之年任阿尤布·汗政府的工商业部长至1960年，成为巴基斯坦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央政府内阁部长，1963年1月—1966年7月任外交部长。仕途一帆风顺。

贝·布托的母亲努斯拉特·布托是阿里·布托的第二个妻子。

阿里·布托的第一个妻子是他的表姐阿米尔。按照布托家族的风俗习惯，也是当地的风习，布托家族的人只能同本族的人通婚，在姨表或姑表之间嫁娶，这样可以使土地不致于转到另外的家族。因为伊斯兰教规定，妇女有权继承财产，所以，阿里·布托一出生时就在父母亲的包办下同姑表姐订了婚。到了12岁，这个乳臭未干还在学校念书的小家伙在他父亲的逼迫下，就跟比自己大10岁的表姐结了婚。他当时根本不知道结婚是什么，这时最迷恋的是板球而不是女人。他的父亲为了安抚他的怒气，给他买了两袋新板球。婚礼举行完毕，他就跑出去同伙伴们玩板球去了。有意思的是，这桩婚姻也还受到人们的羡慕。他的一个小伙伴在11岁就跟一个32岁的姨姐结了婚。这种婚姻习俗不知酿成了多少悲剧，他的第一个妻子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中的一个。她虽然名义上没有跟布托离婚，但实际上一直过着单身的生活。

布托和他的第二个妻子是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中相遇的。当时，阿里·布托从英国回来度假，在一次聚会上结识了努斯拉特。努斯拉特是一伊朗富商的女儿，也在英国学习。阿里·布托很快就被努斯拉特的高雅脱俗的言谈举止，和如花似玉的容貌所吸引，努斯拉特也被阿里·布托的英俊外表和非凡的才华所吸引，两人相见恨晚，一见钟情，堕入了甜蜜的爱河之中。

但两人的不同信仰给他们带来了一些麻烦。阿里·布托属于伊斯兰的逊尼派，努斯拉特属于什叶派。双方的父母都不同意他们的婚事，但两位年青人的执著爱情还是化解了前辈的矛盾，有情人终成眷属。

由于两人都在西方生活过，因而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有着浓重的西方味道。当布托家族的妇女们还戴着面纱生活在院墙内，外出经常裹着严严实实的罩袍时，努斯拉特早已脱下面纱，经常驾车在市内转来转去，出入大街小巷。就在巴基斯坦诞生后，她在妇女准军事军即国民卫队还当过女军官。这种生活对于传统的巴基斯坦女子来说是很少的，当时布托家族的妇女根本不可能像她那样抛头露面，仍然按照既定的生活轨迹过日子。阿里·布托也不像一般男人那样，他总是在妇女住的房子里同妻子呆在一起。在建造克里夫顿70号时，阿里·布托没有为女眷们专修的住房。

贝·布托生在这种文明而又开放的家庭，成为她以后走出家门，步入社会的天然沃土。

## 二、掌上明珠

贝·布托有弟妹四人。大弟米尔·穆尔塔扎 1954 年生、妹妹萨娜姆出生于 1957 年，小弟沙阿·纳瓦兹 1958 年来到人间。

在巴基斯坦，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什么事都是男人占先，在各个方面都首先考虑男性。在一个家庭里，男孩子要比女孩子处在更优越的地位。书是让男孩子先读，饭是让男孩子先吃，好衣服给男孩子先买。但在阿里·布托家，情况则大不一样。大女儿最受宠，凡事都是贝娜齐尔占先，家里的人都喜欢她。祖父经常把她抱在自己的膝上，给她讲故事。有一次，祖父正讲在兴头上，小孙女突然哇的一声哭起来，原来，贝娜齐尔栽在地上，磕掉了两颗牙齿，好在年龄尚小，长大后没有留下缝隙。

父母更是对她百般呵护，视她为掌上明珠。但他们从来不溺爱娇惯她，而是从小就培养她的自立能力。在她 4 岁左右的时候，她父亲已是官运亨通，成为巴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新星，主要从事对外活动。1960 年同苏联谈判财政和技术援助协定，1963 年又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签署了两国边界条约，并多次率团参加联合国大会。父亲在她小的时候跟她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因而，她对父亲的印象大多是从报纸上获得的，每次看到父亲出现在报纸的头版，总是高兴得不得了，经常幻想有一天也能像父亲一样该多有意思。朦胧的外部世界对幼小的贝娜齐尔充满了诱惑。

父母经常出国，每次出国前，父亲总是对她说：“你是老大，好好地照看弟弟妹妹”，一次，父母又要出去参加国际会议。母亲特地给她留下了购买食品和家庭生活开支的钱，要她和管家一起担负起管理家庭的重任。她当时只有 8 岁，尽管年龄还小，但对母亲交待的工作挺负责任，兴趣挺浓，每天晚上都要爬上凳子，在厨房里和忠诚老实的管家煞有介事地认真核查一天的帐目，至于数字是否符合，那就不关她的事了。不过父母从国外回来还是大大夸奖了她一番。当然，每次从国外回来都要给萍姬买一些零食和衣服。阿里·布托后来又把 10 岁的萍姬送到一所寄宿学校。这所学校条件很艰苦，很多事情都由学生自己做，整理床铺、擦鞋，打洗澡水，在走廊边的水龙头下刷牙等等。她父亲把她送到这里来也是为了锻炼小萍姬在各方面的能力。他知道，温室里的花朵是脆弱的，经不起风吹雨打。要想萍姬有所作为，从小就得让她有吃苦自立的能力。阿里·布托的眼光是深邃的，后来发生的事情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她的父亲继承了布托家族教育至上的传统，十分注意小孩的教育。3 岁的时候，小萍姬就被送到“詹宁斯女士幼儿园”，接受早期教育，进行智力开发，5 岁时，被送到卡拉奇的“基督和玛丽亚教会学校”，这所学校环境优美，设施先进，师资水平相当高，自然学费也非同一般，一般家庭的子女是不可能进来的，只有那些富足并且具有一定远见的人才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学校只收很少的伊斯兰教徒的孩子。课程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教会学校来设置，上课基本上用英语，这对贝·布托来说不成问题。家里说的就是英语，很少讲父母惯用的信德语和波斯语。她在学校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反应敏捷，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欢。

他的父亲不管在什么地方，即使再忙，也要抽空往家里打电话，亲自询问小孩的学业情况，对贝娜齐尔尤为关心。他早已看出了大女儿的潜在才能，他要把她塑造成一个可用之材，并且要成大器。布托常常对四个孩子说：“你

们随时都要准备好行李箱，说不定哪一天我就把你们带到机场送你们出国。萍姬出国时是一个脏小妞，回来时会出落成一个身穿纱丽的漂亮姑娘；沙阿·纳瓦兹会带很多的衣服，箱子都装不下，只好叫老爹来帮忙往里塞。”

对巴基斯坦很多人来说，伊斯兰教是他们生活的精神支柱，古兰经是必备的书藉。小孩子从小就受到伊斯兰教的熏陶。贝·布托也不例外。她出生时听到的第一声就是阿訇在她耳边说的第一句话“真主保佑”。进入教会学校后，每天放学和上完家庭辅导课，阿訇就到家里来指导她读《古兰经》，《古兰经》的思想博大精深，阿訇讲解起来绘声绘色，十分虔诚，“你们要孝顺父母，天堂就在母亲的脚下。”“世间的行为将决定死后的命运，你们都得越过火的峡谷，走过头发丝的桥梁。”“那些有罪孽的人将掉进火的地狱，而那些乐施善行的人则进入牛奶和蜂蜜四处流淌的天堂。”小萍姬总是两眼瞪得大大的，聚精会神地听阿訇念的每一句话，《古兰经》的思想从小就开始渗进她的血脉里。

她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无论她在世界的什么地方，每天都要按伊斯兰教规定，坚持晨礼，晌礼，晡礼，昏礼，宵礼五次礼拜。9岁时，她的母亲就带她一起祷告。虽然母女俩的教派不同，母亲同大多数伊朗人一样信仰穆斯林什叶派，女儿信仰逊尼派，但在布托家族却能相安无事，本来两派之间也只有小异。每天早晨，母女俩按照伊斯兰教的净礼仪式，把手脚洗得干干净净，衣服穿得整整齐齐，以纯洁的面目出现在真主面前，然后朝着圣地麦加的方向跪拜祈祷，“除了安拉之外，别无上帝，穆罕默德是他的最后一位先知。”除了祈祷之外，贝·布托还经常参加什叶派的重要宗教活动。什叶派在“哀痛月”悼念卡拉巴赫的仪式活动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萍姬渐渐长大，做母亲的开始考虑女儿的婚事，是按传统的风俗习惯在表兄妹之间结婚，还是另辟新路让女儿自己作主呢？母亲拿不定主意。做父亲的倒是态度坚决，“我不愿再让儿子们娶他们的表姐妹们并把她们禁锢在庭院之内，也不愿我的女儿们被活埋在亲戚家的庭院里，让他们先完成学业，然后再由他们自己选择生活的道路。”父亲的话顿时使在一旁默默不语的女儿如释重负。

按照巴基斯坦的风俗，女孩进入成年时就要穿上罩袍。这种罩袍把全身遮蔽起来，只留下一双眼睛。当她母亲第一次把罩袍套到她身上时，贝娜齐尔痛苦极了。罩袍就像一条绳索，捆住了自己的行动，就像一堵墙，把自己和快乐的世界隔离开来。在她的面前，世界的一切花草，树木，天空都变得无精打采，生活变得毫无意义。她多么希望挣脱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罩袍啊！她的父亲又帮她脱下了沉重的罩袍。布托对妻子说：“先知说过，最好的面纱是眼睛之后的面纱，对她的判断应该是她的人品和思想，而不是她的服装。”从此，贝娜齐尔再也不穿罩袍，成为布托家族第一个从终身不见阳光的生活中解放出来的女人。

父亲一心一意想把女儿培养成政治领袖人物。他给孩子们讲的故事的主角都是一些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如拿破仑，马志尼、华盛顿、毛泽东、纳赛尔等。布托外出开会或访问时常常把贝娜齐尔带在身边，以增长见识，接受政治和外交熏陶。

1963年11月20日，贝·布托和她的父亲在火车上的部长包厢里出外旅行。突然她的父亲把她从睡梦中推醒：“萍姬，出事了，美国总统肯尼迪死了。”睡得正香的贝娜齐尔打了一个哈欠，翻了一个身，又睡过去了，父亲



又一次推醒她，“快醒醒，你难道不知道肯尼迪是谁，他是美国总统，年轻的美国总统，是个自由派，他改变了他的国家。”贝娜齐尔当时只有10岁，虽然她还不能完全弄懂这件事情的含义，但政治的残酷却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烙印。

另外，一些外国代表团到巴基斯坦访问，布托也常常让贝娜齐尔作陪，其他的孩子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的。

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对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作为外交部长的布托全程陪同中国代表团，自从一年前，他代表巴基斯坦政府去北京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中巴边界协定，他便与中国领导人建立了友好的私人关系。在那次访问中，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她，并把一顶解放帽作为小礼品赠送给她，布托先生十分珍视这份礼物，特地把它挂在自己的更衣室里，并且经常在孩子面前称赞中国革命和它的领导人毛泽东。这次当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来访时，布托便邀请他们在家里做客。留着齐耳短发，特地穿了一身漂亮衣服的布托小姐见到了她父亲所说的“中国重要人物”。周总理和蔼可亲，她很快地喜欢上了这位中国总理，从此以后，她一直保持着对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的友好感情。

1965年，在巴基斯坦北部莫利山区一所寄宿学校学习的贝娜齐尔，亲身经历了第二次印巴战争。

第二次印巴战争和第一次印巴战争一样，都是围绕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而发生的。克什米尔全称查谟和克什米尔，位于喀喇昆仑山之南的喜马拉雅山区，地势险峻，是中亚细亚的心脏，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国接壤，具有极端重要的战略意义，面积21万平方公里，现有人口500万。

在英国人统治印巴次大陆时期，查谟和克什米尔是英属印度最大的土邦之一。1947年，英国推出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根据方案将英属印度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分别建立在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地区和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方案中明确规定了由英国人直接统治的11个省份的归属，但对于由印度王公统治而英国保有宗主权的土邦，则规定由他们自行决定加入印度，或是成为独立的国家。因此，土邦的归属成为印巴两国政府斗争的焦点。特别是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与印巴两国都接壤，战略地位险要，对印巴两国的国防都有重要的价值，因此它的归属问题成为印巴两国矛盾的焦点，两国都势在必得。

查谟和克什米尔居民中，77%是穆斯林，20%信奉印度教。但由于土邦的上层统治者信奉印度教，因而土邦内部穆斯林群众与上层的王公贵族之间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对归属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并导致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卷入冲突，于1947年10月发生了第一次印巴战争。

第一次印巴战争延续一年多，巴基斯坦控制地区约占克什米尔地区总面积的2/5，人口约占1/4。印度实际控制地区约占总面积的3/5，人口约占3/4。此后印巴两国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争端一直悬而未决，成为两国关系的隐患。

1965年，印巴两国围绕克什米尔问题关系又趋紧张。9月6日晨，印军越过边界，大举进攻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和锡亚尔科特地区，由克什米尔引发的第二次印巴战争全面爆发。

战争爆发后，9月7日至9日，印军进一步扩大战火，又先后进攻东巴的卡里干则和西巴的海德拉巴地区，双方军队展开激战。为配合地面战斗，

印巴双方还出动空军相互袭击对方的空军基地和重要城镇。

佐·阿·布托在另外一个战场也与印度展开了较量。他率领代表团在联合国讲坛上强烈谴责印度对巴基斯坦的侵略，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印度的侵略行径，并阐述了巴基斯坦政府对克什米尔问题的一贯原则立场：即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按照联合国以往的决议，通过公民投票让克什米尔人民充分享有自决权，自由决定其未来。

年仅 12 岁的贝娜齐尔也经受了战争的锻炼。她所在的莫利寄宿学校正好位于一条从克什米尔通往巴基斯坦内地的道路上，因此它遭受印军攻击的可能性极大。为了预防不测，学校作了充分的准备，建立了掩蔽所，实行灯火管制，由于这所学校有很多政府官员和高级军官的女儿，为了避免落入敌人手中暴露身份，每个学生都取了一个假名。学生们睡觉都不准脱鞋，随时作好应急的准备。这种紧张的日子持续了一个多星期，9 月 13 日，在联合国的停火要求下，两国结束了战争。

在苏联总理柯西金的斡旋下，巴基斯坦领导人阿尤布·汗和印度总理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于 1966 年 1 月 4 日至 10 日在苏联的塔什干举行谈判，签署了《塔什干宣言》。这份宣言丢掉了巴基斯坦在战场上获得的利益，因而遭到了外交部长布托的强烈反对，为此向总统递交了辞呈。

巴政坛上的矛盾也引起了国内政局动荡。在独立性很强的旁遮普和信德省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政府的游行示威，与军警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布托家族的政治生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1966 年，阿里·布托告别政府所在地拉瓦尔品第，贝·布托和父亲最后一次坐外交包厢回到拉卡纳。一路上，群众的激情达到了狂热的地步，高呼“布托万岁”，“亚洲的骄傲万岁”。当火车靠近拉合尔时，人们纷纷挤上前来要与布托握手。这时不知是哪一位突然喊道，布托先生的衬衫有血。贝娜齐尔心里一惊，只见父亲的脸上被划了一条小指痕，衬衫也被狂热的崇拜者撕破了，领带也不翼而飞，后来听说这条领带被人拍卖了几千卢比。贝娜齐尔第一次目睹这样盛大的场面。

阿里·布托似乎从群众的欢呼声中听到了自己的力量，他决定另起炉灶，独树一帜，建立属于自己政治力量的政党。1967 年，阿里·布托和他的追随者在拉合尔宣告成立人民党，提出了党的纲领，“信仰是伊斯兰教，经济是社会主义，政治是民主，一切权力归人民。”

人民党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把矛头对准了阿尤布·汗。为了壮大人民党的力量，布托及其追随者到全国各地不断地发表演说，宣传自己的主张。他们深入到农村贫困边远地区，用最通俗的语言，最朴实的话语来打动倾听者。“衣食住行是你们的最基本需要，可你们没有得到，我们的国家是富有的国家，有许多许多的资源，可你们还是陷入贫困，饥饿和疾病，真主的任何法律都没有说我们在巴基斯坦应该受穷”，“站起来，不要在别人面前乞怜，你们也是人，应该有自己的权利！争取民主，民主使最穷的人的选票与最富有的人的选票具有同样的分量。”

布托的演讲有如一股旋风，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到他的周围。他们中既有大企业的老板，也有农民和手工业者。他的声望在国内急剧上升，街头巷尾穷乡僻壤的人们纷纷谈论布托，谈论他的演讲。一时间，布托家的卡拉奇克里夫顿 70 号来访的人络绎不绝，他们纷纷要求加入人民党。贝娜齐尔和她的妹妹也报名交了 1/4 卢比的党费加入了人民党，成为最年轻的党员。

人民党的崛起对巴政治大厦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但要把阿尤布·汗拉下宝座谈何容易。阿尤布·汗老谋深算，驾驭权力的手段也很高明，有自己一套治国之道。从1959年起担任巴首席军法执行官已近10年，比起以前走马灯似的执政者来说，位置还是相当稳的。他在1965年的总统选举中虽然遭到以前总督和总理纳泽姆丁为首的穆斯林联盟，民族人民党，伊斯兰协会，人民同盟结成的联合反对党的攻击，而且反对党还把巴基斯坦的国父真纳的妹妹法蒂玛·真纳女士推举出来作为总统候选人，但阿尤布·汗还是获得了胜利。

不过，布托不是法蒂玛，无论从才干、经历、威望等方面，布托都远远胜过法蒂玛。阿尤布·汗也非常清楚布托的能量。他当然不会坐视布托对自己的权力挑战。

阿尤布·汗使用了历史上政治家对付政敌的惯用手法，软硬兼施。阿尤布·汗曾多次把布托请到家中，对布托说“你还年轻，又有才干，来日方长，与其同我们作对还不如我们合作，你和你的家庭会过很舒适的日子。”但布托对阿尤布·汗的优厚待遇不为所动，而是以更大的精力投入人民党的工作中，四处奔波发表演说，猛烈抨击阿尤布·汗的军法统治。阿尤布·汗软的一手不行，就来硬的。当布托在拉希姆亚尔汗、桑加尔等地发表演讲时，阿尤布·汗派来的杀手突然向他开枪射击，幸运的是没有击中，在桑加尔，只因布托的保镖反应及时，用身体挡住了射来的子弹，而使布托死里逃生。阿尤布·汗干脆逮捕了布托和人民党的其他领导人，把他们投进耗子成群，条件非常恶劣的监狱。但在三个月后，阿尤布·汗在反对党的压力下，迫不得已又释放了布托。当贝娜齐尔和她的母亲一道去接父亲时，看到爸爸平安地出来，眼泪顿时哗啦啦地流下来，她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里。在这三个月里，贝娜齐尔明白了很多，成熟了很多。在她的世界里，已不再仅仅是学校，游戏，海滩上的欢歌笑语，还有暴力，流血，监禁。她的生活中多了几分危险和恐怖。

尽管阿尤布·汗释放了布托，但他仍在找机会欲除之而后快。在拉卡纳的一次胜利大游行时，布托一家乘着敞篷车慢慢穿过拥挤的人群，人们高呼着“布托万岁”，“布托万岁”。就在这欢呼的人群中，布托突然发现一把罪恶的手枪正对着自己，他大喊一声“蹲下”，下意识地用手按住了女儿的头，真主保佑，瞄准布托的手枪不知怎么卡了壳，反应过来的群众迅速把愤怒倾泻到了刺客身上。贝娜齐尔从父亲的手下看到，一个男青年被人撕扯着，嘴里全是血。布托一边用手按着女儿的头，他不希望女儿看到这种可怕的场面，一边向群众高声喊道“留他一条性命”，接着继续发表他的演讲。布托的宽容行为充分展示了一个政治家的才能，他不仅救了自己，也救了别人，更重要的是赢得了拥护者的心。在贝娜齐尔的脑海里，这种场面总是萦绕着她，她似乎从中感悟到了某种政治诀窍。

阿尤布·汗的做法有如给自己政权的干薪上浇了一桶油，全国的反政府运动一浪高过一浪，阿尤布·汗只能靠军队来控制局势，宣布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从而引发了大学校园内学生与军警的流血冲突，在卡拉奇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和街头的武装冲突。同时在边境省份的分离主义的活动也活跃起来。东西巴的对立情绪更加炽烈。阿尤布·汗和军队的高级将领产生了不和。军界头面人物，空军元帅阿斯加尔汗公开宣布参加反阿尤布·汗政治活动。阿尤布·汗为了缓和局势，只好释放全部政治犯和结束紧急状态。

1969年3月23日，阿尤布·汗发表国庆贺词，呼吁人民保持镇定，与政府合作，但一切都为时已晚。他的呼吁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国内的局势继续朝着混乱的深渊滑去阿尤布·汗回天无术。军队又一次占据了巴政治舞台的中心。

1969年3月25日，阿尤布·汗总统带着失望、痛苦和依恋离开了总统办公室，无可奈何地把权力的钥匙交给了陆军总司令叶海亚·汗将军。

### 三、求学哈佛

正当倒阿尤布·汗的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时，贝娜齐尔却埋头于准备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入学考试和英国人命题的综合考试。赴美留学是她父亲精心培养她的整个计划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由于父亲深陷囹圄，母亲又常常带着弟妹到处奔波，抗议政府的可鄙做法，并不断向法院申诉，要求释放布托。这样，家里常常留下贝娜齐尔一人。她努力强迫自己不去过多地考虑父母亲的安全，使自己能静下来，集中精力埋头学习，准备考试。她知道，如果能通过了考试，那是对父母亲的极大安慰。

白天，她和家庭教师一起把考试课程复习了一遍又一遍，晚上便同她的朋友塔明妮、萨米亚一起到附近的信德俱乐部玩壁球，游泳，放松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这个俱乐部以前是英国人的领地，门前放着“巴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后来成为巴基斯坦小康人士的体育俱乐部。由于她的父亲进了监狱，和她一起玩的朋友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因为很多家长担心自己的小孩同布托家的女儿在一起会招来麻烦和危险，会引起阿尤布·汗的报复。不过，萨米亚还是照常跟她往来，俩人后来就成了亲密的朋友。

身处狱中的布托时时刻刻都在想念自己的女儿，念念不忘女儿的学业，经常从狱中写信鼓励女儿。1968年11月28日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我为你通过综合考试而祈祷。你在15岁时就参加这种考试，而我当年是在比你大三岁的时候参加的，我为有你这样聪颖的女儿感到骄傲，照此下去，你可以当上总统的。”后来又写信给女儿提了一些建议，“我知道你读了不少书，但你还应该多读一些文学和历史。你有所有必备的书籍，不妨读一读拿破仑·波拿巴，他是现代史上的完人，读一读美国革命史和亚伯拉罕·林肯，读一读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读一读俾斯麦，列宁，和毛泽东的书，读一读古印度史，而最重要的是读一读伊斯兰教史。”

每次接到父亲从狱中寄来的信，贝娜齐尔心中就充满着激动。她从一句句关怀的话语中仿佛看到了父亲的笔端流淌着对自己浓浓的爱，饱蘸着期望之情。她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

她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顺利通过了英国人命题的综合考试，而后又参加了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入学考试。

4月初的一天，布托小姐接到了一封来自美国拉德克利夫学院的信。她心里七上八下，倒不是害怕没有考好，考试对她来说不成问题而是担心自己的年龄是否符合录取的条件。因为在不久前，拉德克利夫学院写信给她父亲，说布托小姐刚到16岁，独自一人到美国还太年轻，建议推迟一年。但做父亲的却一心一意想让自己的女儿尽早过去。其实，当初贝娜齐尔并不想报考哈佛，想到她父亲曾经就读的加州伯克利分校，但父亲没有同意，他对女儿说了一句话，“加利福尼亚的气候太好了，只有马萨诸塞的冰雪可以迫使你用功学习。”布托认为早点过去，可以锻炼女儿的独立生活能力，能尽快使她成熟起来。他专门写信请求他的好友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前驻印度大使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做校方的工作。到底结果怎样呢？贝娜齐尔心中没底，她慢慢地撕掉信口，打开信封，仔细把信看了一遍，她高兴得跳了起来，急忙跑进房里告诉父母亲，她被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学院录取为1969年秋季入学的学生。她扑倒在父亲的怀里。父母亲听到消息，高兴极了，并向女儿

表示祝贺。

过了几个月，入学的时间越来越近，贝娜齐尔少了当初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的兴奋，心里多了几分担忧。十几年来，她一直围绕在父母身边，有着舒适的生活和学习环境。这里留下了她美好的时光，有她愉快的童年和亲密的伙伴，还有经常跟她在一起戏闹的弟弟和妹妹。如今要离开朝夕相处的父母，弟妹和朋友，离开那熟悉的一草一木，漂洋过海到异国。哈佛大学是什么样子呢，那儿的同学怎么待她呢，能适应那边的环境吗？还有可亲可爱的父亲，他一直处在暴力和恐怖的威胁之中，他会平安无事吗？布托小姐说不清是高兴还是忧伤，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入学的时候到了，布托小姐穿上了一件崭新鲜艳的巴基斯坦民族服装，红扑扑的脸蛋透着青春的光彩，两只明亮的眼睛还带着几分稚气。布托特地选了一本用贝壳镶嵌封面，装潢非常漂亮的《古兰经》送给女儿，作为分别礼物，并细心地叮嘱她，“在美国你将看到许多使你吃惊的东西，有的会吓坏你的，但我知道你有适应能力，一句话，你必须努力学习，在巴基斯坦有你这样机会的人寥寥无几，你必须珍惜它，绝不要忘记，送你出国花费的钱出自这块土地和这里辛勤劳动流汗流血的人民，你对他们是负有债的，这笔债只有在真主保佑下运用你受过的教育为他们造福来偿还。”贝娜齐尔看着父亲点了点头，双手接过父亲送给她的《古兰经》，亲吻了一下。她明亮的眼睛里噙着的泪水顿时流淌下来。

再见了，克里夫顿 70 号。再见了，亲人。贝娜齐尔扯起了风帆，开始了人生一段新航程。

一只雏鸟展翅起飞了，带着依恋和憧憬。

哈佛大学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是美国的学术重镇。从 1638 年，哈佛死时将他私有的四百册藏书及一半财富（800 镑）捐给当时刚诞生不久的穷学院，屈指走过了 300 多年的历史，学院在悠远的岁月中造就了许多风流人物。最脍炙人口的有诗坛四杰（爱默生、荷麦士、罗威尔和朗菲罗），哲界四名士（詹姆士、罗伊斯、桑塔耶那和派墨尔），还有五位美国总统，开国初期的亚当斯父子，叔侄关系的二位罗斯福，另一位是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肯尼迪。世界上的莘莘学子以进哈佛感到骄傲，一个人能进哈佛的门槛也是人生的幸事。贝·布托是幸运的。

贝娜齐尔刚到哈佛，一切对她都是陌生的、新鲜的。青青的绿茵草地，遮天蔽日的榆树，幽静的绿荫小径，还有掩映在树林中的一幢幢爬满常青藤的红砖老屋都令贝娜齐尔感到宁静和惬意。

美国的大学生性格开朗，坦率热情，能说会道，但也有点孤陋寡闻。贝娜齐尔在报名的时候，一些新同学就问她：“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在哪儿？”

贝娜齐尔在哈佛唯一认识的朋友就是彼得·加尔布雷斯。在她看来，这个蓄着长头发，不修边幅的小伙子根本不像是高级外交官的儿子，倒像是从印度带回来的流浪儿。然而，就是这位貌不惊人的嬉皮士在 15 年后为她帮了大忙。

尽管彼得在各个方面都很照顾她。但从小就养成了独立行事的贝娜齐尔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一切。她克服了刚来时的拘束感，大胆地向同学们询问各种各样的问题。自然，这位来自东方国度的漂亮姑娘也引起了同学们的好奇和兴趣。但同学们似乎对这位姑娘出生的国度都知之甚少，至于布托家族那更是一无所知了。布托小姐心中不免有一种寂寞之感，但又感到几分高兴

和轻松。因为在哈佛，一切都摆脱了家族的影响，她仅仅是哈佛的一名学生，门第和权力在这里隐退了。布托小姐在哈佛发现了一个真正的自我。

母亲走时给她留下的特制毛料民族服装没穿几次就塞进了皮箱。贝娜齐尔觉得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太引人注目，而且在雨雪中走路很不方便。于是跑到哈佛商店买来了运动衫和牛仔裤，把自己全身上下包装了一番，还留起了披肩发，显得活泼朝气。当她听到同学们夸她像电影明星琼·博格时，心里甜滋滋的。她和别的女孩一样，常吃零食，特别喜欢喝苹果汁，而且是成加仑地喝，对布里加姆店的薄荷冰淇淋更是情有独钟。另外还定期参加波士顿的摇滚音乐会和她的“哈佛监护人”加尔布雷斯和夫人举行的花园聚会。这里的一切都对布托小姐产生了吸引力。

在大学一年级，她就当上了艾略特学生宿舍的交际秘书，后来又当哈佛校报《深红色的校园》工作，并且还当“深红色钥匙协会”担任校园导游。在哈佛校园有一幢国际事务中心建筑，它的英文缩写是 CIA（Centre of Information Affairs），这恰好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缩写（Centre of Intelligence Agency），布托小姐作导游时，总是做着鬼脸把两座建筑物联系起来，引得旅游者哈哈大笑。

布托小姐原本想学心理学，但发现专业课程中有令她作呕的医学和动物解剖课程时，不得不另选专业，选了“比较政府”。这正好与她父亲的意图不谋而合。她父亲曾悄悄给拉德克利夫学院院长玛丽·邦廷写信，要她指导他的女儿选择政治专业。贝娜齐尔的选择后来证明是正确的。

在哈佛，贝娜齐尔学到了很多理论专业知识，并且经常用所学的理论来观察分析巴基斯坦的政治运作。许许多多原来在布托小姐脑海中纠缠不清的问题也得到了答案。为什么巴基斯坦国内出现无政府状态。因为他们是不合法的政府，他们行使的权力是自封的，而不是人民授予的，这就像交通警察指挥交通秩序一样。一名警察站在岗亭上喊停，大家就停下来，但是行人若举手喊停，没有人理会。这是由于警察有宪法和政府授予的执法权，而行人则没有这种权力。

六十年代末，美国被越南战争搞得焦头烂额。这块弹丸之地消耗了美国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尽管美国采取了除使用核武器之外的一切手段，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美国的超级大国形象在全世界受到了极大影响，也使美国在美苏战略争夺中处于被动地位。美国国内出现了强大的结束越战的呼声，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也出现了学生的反战运动，哈佛大学更是声势浩大。布托小姐在国内就反对越南战争，哈佛的气氛强烈地感染了她。她冒着如被发现参加政治集会将被驱逐的风险，胸前别着“让孩子们立即回国”的胸章，参加了从哈佛徒步游行到波士顿的反战罢课日集会，还到华盛顿白宫前请愿。在华盛顿接待她的是催泪弹，这是她第一次尝到催泪弹的滋味。

当时出现的女权主义运动也波及到美国的大学。在哈佛的书店充斥着形形色色有关女性问题的书籍和杂志。《性政治》和《女士》杂志成为当时学生们的必读刊物。芳心萌动的贝娜齐尔也常常和一些朋友们聚在一起，描绘心中理想白马王子的形象，设想将来的家庭生活，高谈阔论女性的社会地位。但在她的心目中，事业和爱情应该是比翼齐飞的。

贝娜齐尔虽然远在哈佛，但时时惦记着家人。每天早上梳洗完毕后，就对着圣地麦加的方向为他们的平安虔诚祈祷。国内的政局发展也牵动着她的心。她总是跑到图书馆阅览最新的巴基斯坦报纸和杂志。

叶海亚上台后的第二天，就发表了全国广播讲话，“国家必须回到正常的状态，在国家面临混乱的时候，军队不能是无所事事的旁观者，他们必须尽职，使国家免于灾难，因此，我采取了军管的步骤……。这是顺利将政权转给人民代表的先决条件。”同时在全国雷厉风行地惩治了一大批贪污腐化的官员，逮捕了大批的反对派，还在全国一些城市实行宵禁，全国的局势很快恢复了平静。这为全国大选铺平了道路。叶海亚按照他的许诺决定在12月7日举行全国大选。各政党马上活跃起来，纷纷打出自己的旗号，亮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最有影响，势力最大的是阿里·布托的人民党和拉赫曼的人民同盟。其它党派要么鉴貌辨色，看两党的脸色行事，要么依违两可，骑墙模棱。人民同盟的竞选口号是“胜利属于孟加拉”，拉赫曼大肆指责西巴少数当权者是“剥削者”、“殖民者”，许诺要消除剥削，呼吁东巴人投自己的票。布托则在选举中显得相当灵活，对不同的阶层作出不同的许诺。向工人、农民和社会下层人民许诺要通过社会主义为他们建立美好的生活天堂。另一方面，把地主、富人和阿尤布·汗时期的特权阶层作为党的候选人，同时，利用民族人民党内部群龙无首之机，用社会主义的口号争取他们的支持，又强调信仰伊斯兰教来消除伊斯兰教徒心中的恐惧。这种策略使布托在西巴获得了空前成功。

1970年12月7日，巴基斯坦第一次在成人公民权基础上的选举结果揭晓。人民同盟和人民党基本上囊括了国民议会中的议席。人民党在西巴取得了胜利，获得了82席，人民同盟则占据东巴半壁江山，获得160席，成为国民议会中的多数党。东巴人欣喜若狂，弹冠相庆。

布托和拉赫曼在巴基斯坦竞选正酣，贝娜齐尔在美国则焦急等待。她在哈佛整夜守在电话机旁，坐卧不安地等待6000多公里外传来的消息。大选结果刚一公布，布托小姐桌上的电话响了，从话筒里传来了母亲熟悉而激动的声音：“我们在西巴获胜了，我们在西巴获胜了。”布托小姐高兴得跳了起来，一个劲地说“祝贺爸爸”。第二天在校园里，很多人都纷纷向她祝贺。然而，贝娜齐尔高兴得太早了，一场悲剧正在上演。

叶海亚·汗想通过民主选举把巴基斯坦引上民主政治的大道，但偏偏走入了歧途。民主之芽并未破土而出。

按照选举法的规定，国民议会中的多数组织政府。叶海亚任命拉赫曼原订在1971年3月3日召开制宪会议，起草新宪法。但这一决定遭到了布托领导的人民党的坚决反对。两党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激烈冲突。尽管叶海亚曾努力让两党坐在一起共商新宪法，但两人的观点天壤之别，圆凿方枘，始终走不到一起。布托坚持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而拉赫曼则固守只给中央政府以外交、国防、发行货币的权力的立场，其余的各省自己掌握。双方你来我往僵持不下。一气之下，布托宣布他的党将不参加3月3日召开的国民议会。同时，布托积极争取军方对总统施加压力。叶海亚被迫宣布推迟举行国民议会。

这一举动犹如一颗炸弹投到了东巴，使本来就很紧张的局势更加恶化。数以万计的工人学生，专业人员举行示威，并第一次提出了“孟加拉国”独立的口号，社会秩序陷入瘫痪。

为了避免灾难的发生，叶海亚、布托、拉赫曼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在3月21日举行彻底秘密会谈，最后还是不欢而散，矛盾不可调和。

布托和拉赫曼的矛盾是两党不同利益的体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东西巴矛盾和冲突的种子早已埋下，在权力的金字塔上，处在高位的绝大部分是西巴人，西巴的文官、军官和地主组成了牢固的三角同盟，控制了中央和省府。东西巴之间的经济差距也相当悬殊。当时占人口 44% 的西巴人拥有 89% 的工业总产值，在赫赫有名 20 家大财团中找不出一家孟加拉人。而且西巴人不顾当时人口中大半讲孟加拉语的实际，把只有 13% 的人讲的乌尔都语作为国语，伤害了东巴人的感情。东巴人觉得自己是西巴的殖民地，是二等公民，不愿和西巴捆在一起，因而，曾经把相隔 2000 公里，中间横亘着一个印度的东巴和西巴联系起来的纽带——共同的伊斯兰宗教信仰——在利益的拉锯中，很快断裂了。

当圆桌旁的谈判，幕后的秘商走人死胡同后，使用武力就成了最后的办法。

191 年 3 月 26 日，以拉赫曼为首的人民联盟宣布东巴为自主独立的“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叶海亚·汗总统以东巴法律和秩序失去控制，人民联盟分裂国家的活动必须挫败为由，宣布人民联盟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并逮捕了拉赫曼为首的人民联盟领导人，派军队到东巴进行镇压。

巴基斯坦的内战一时间成为世界舆论瞩目的焦点。美国各大报迅速报道了现场记者发回的战争消息，刊登了醒目的令人心颤的图片：强奸妇女，杀戮元辜，飞机的狂轰滥炸，成批的难民逃离家乡。原来连巴基斯坦不知在世界何处的哈佛学生突然间似乎每个人都成了时事评论家，他们议论纷纷，“西巴简直是刽子手”，“他们是一群法西斯”，“西巴没有权力剥夺孟加拉人民的自决权”。

贝娜齐尔怎么也不相信巴基斯坦军队在东孟加拉对叛乱者所犯的罪行，如抢劫、强奸、绑架、暗杀。当她得知印度正在训练成千上万名孟加拉难民进行游击战，然后偷偷地把他们送回东孟加拉的消息后，她怒不可遏。面对指责，她反驳说：“巴基斯坦发生的事情就像你们国内战争一样，是维护巴基斯坦的统一。”

当她听到沃尔泽教授在公共讲座中，大声吼道：“巴基斯坦剥夺了孟加拉人民的自决权”时，布托小姐义愤填膺，不知是哪来的勇气和力量，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当着 200 名学生的面，激动他说道：“教授，这是完全错误的，1947 年孟加拉人民选择巴基斯坦就已行使了自决权。”但这些辩驳都无法说服她的同学和老师，其实，贝娜齐尔的心里也是痛苦万分，为什么东巴和西巴不能携手共建自己的祖国？为什么具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人们要互相厮杀呢？难道元辜者和平民，老人和儿童也要受到虐待吗？她不明白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一个 18 岁的女孩怎么能理解这一切呢？

兄弟阅墙，必有外患。巴基斯坦的邻居也是它的宿敌印度一直密切注视着巴内战的进程。自从 1947 年印巴分治后，印巴一直不和，曾发生过两次战争。照说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印度应该在战争中占据绝对优势，但两次战争，印度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形象大受损害。

内战给了印度一个天赐良机，它想乘此解除东西巴两翼对印度的潜在威胁，削弱巴基斯坦的国力，印度欲以“东巴难民问题”准备出兵，可出兵并非小事。以前印巴争斗都是因为克什米尔，这个地方的地位比较模糊，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不好多说，它毕竟是印巴分治时遗留下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东巴的地位很清楚，它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如果出兵的话，国际社会会作出什么反应呢？这正是印度女总理英迪拉·甘地和她的幕僚最拿不定的。

在 1964 年的印中战争中，印度被打得一败涂地，在国际社会大失脸面。中巴之间关系非同寻常，中国是否因印度出兵而帮助巴基斯坦。作为与苏联抗衡的美国是否因印度的行动导致南亚地区的动荡和力量失衡而出面干预。此时，印度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同美国进行霸权争夺的苏联了。苏联是印度手中一张重要的牌。这张牌如何打直接关系到印度行动的后果。

苏联在六七十年代之际，加紧了对外扩张的步伐，成为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主要竞争者。在向南亚扩张过程中，印度成为其南亚战略中的一粒重要棋子。苏印关系在印中战争后进入蜜月期。印度当然希望借助苏联来给自己撑腰。一则利用苏联牵制中国。二则利用苏联对抗美国。美国当时还陷入越南战争，急欲从越南战场脱身，尼克松不会为了南亚次大陆这块多灾多难的地方出兵而使自己再次陷入另一场战争。另外，美国在同苏联争夺全球霸权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美国正谋求同苏联搞缓和，不愿为印巴争斗而影响两国关系。因而苏联的态度对印度来说至关重要。

早在局势动荡之时，苏联就放出风声，要求叶海亚采取最紧急的措施以制止流血，停止对东巴人民的镇压并采取和平的解决办法。英迪拉·甘地当然清楚苏联的意图。她首先派外交部长辛格访问莫斯科，争取苏联的支持，随后，亲自出马，在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签订了带有军事性质的条款《和平友好合作条约》。苏联领导人表示、如果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战争，苏联将在军事上、外交上全面支持印度，并在中国北部边境增派兵力，牵制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援，此后，苏印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奔波于莫斯科和新德里之间，进行战争准备。到战争爆发前夕，印度从苏联获得了 250 辆坦克，100 辆装甲车，40 门 120 毫米火箭炮及萨姆型地对空导弹等大量新式装备。

1971 年 2 月以前，印度部署在东巴周围的兵力只有 3 个旅，到了 10 月份，印度的兵力逐渐增加到 7 个师，另外还部署了 12 个空军中队，约 211 架作战飞机，海军部署了 26 艘舰艇，舰载飞机 33 架，总兵力约 17 万人，在西巴边境，1971 年 8 月以后，印军由 9 个师增加到 13 个师，部署了 20 多个空军中队，作战飞机 300 余架，海军舰艇约 20 艘，印军总兵力达 30 万人。到战争前夕，印军的 4/5 的兵力推进到了印巴边境地带。

与此同时，印军还进行了以巴基斯坦为目标的军事演习，并把大量作战装备和物资运送到印巴边境。印度政府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动员，征召陆、海、空、后备役人员服役，取消了军人的休假，并征用民用车辆。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宣称同巴基斯坦发生战争是迫在眉睫和不可避免的，印度国防部长拉姆也声言同巴基斯坦发生的任何战争都将在它的土地上进行。印度的舆论也掀起了战争叫嚣。

面对印度的战争威胁，叶海亚·汗政府把希望寄托在大国出面干预上，既不做战争准备，也无明确的战略目标。战争爆发前，巴基斯坦在东巴的守军只有 4 个师共 13 个步兵旅和若干个炮兵旅，空军有 2 个中队，作战飞机 12 架，巴军总人数约 9 万人，在西巴基斯坦，巴军部署了 12 个师，20 个空军中队，200 余架作战飞机，70 余艘舰艇，总兵力约 25 万人。

1971 年 11 月 21 日，印军在苏联的支持下，大举进攻东巴基斯坦，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

当天，巴总统叶海亚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第二天，巴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控告印军对东巴的侵略，而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声称印军是为了自卫才进入东巴的。印度政府置国际舆论于不顾，继续扩大战争。

12月3日，印度对东巴发动了全面进攻。

远在美国的贝娜齐尔虽然未能目睹战争的残酷场面。但美国报纸对战争的报道使她心如刀绞，寝食不安，她真想回去参加战争，但她不能，她只能在学生宿舍的房间里大声尖叫着，诅咒印度的侵略。她的朋友萨米亚在信中向她描述了战争的情景。“这里每天都有空袭，我们不得不用黑纸将窗户挡严以防灯火外露，学校都停课了，我们每天除了担心之外无事可做。像往常一样，报纸事前没有报道任何消息，直到有人敲着我们的门喊叫‘战争开始了，战争开始了’，我们才知道印度军队已进入东巴，你不在这儿真是幸运，印度的飞机简直是擦着我们的房顶飞过，你连驾驶员都能看清，但我们的空军似乎没有进行反击，卡拉奇港的原油码头被导弹击中了，火至今还在燃烧……”

12月4日，印度军队又进入西巴，巴基斯坦面临着存亡的危险，战争的天平大幅度向印度倾斜。叶海亚一面命令军队进行抵抗，一面呼吁国际社会出面干预，要求联合国采取行动制止战争进一步扩大，并紧急派遣阿里·布托飞往联合国寻求支持，期望能拯救巴基斯坦。

阿里·布托出发前，给贝娜齐尔发了一封电报：“我将来联合国，12月9日到纽约皮埃尔饭店见我。”

布托小姐准时来到父亲下榻的房间。这是父女俩分别后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第一次见面，但他们没有亲人相逢的激动和喜悦，没有问长问短的话语。他们谈论的是战争的发展，国际社会的反应。

“你认为巴基斯坦在联合国会得到公正待遇吗？”布托问女儿。

“那当然，爸爸。”女儿肯定地答道，“没有人否认印度违反国际法准则，侵略并占领了别国。”

“那么说你认为安理会将谴责印度并要求它撤军了？”父亲带着怀疑的口气接着问。

“一个维护和平的国际组织，在数以千计的平民被屠杀，一个国家被肢解时熟视无睹是对其职权的嘲弄，他们怎么能不这样呢？”贝娜齐尔天真地回答。

“你也许是个国际法学得很好的学生，萍姬，我不愿同哈佛大学学生争论，但你对强权政治一窍不通。”布托的声音略显沉重。

12月12日，阿里·布托走上了联合国的讲坛。他已不是第一次在这个讲坛上发言，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多次在此慷慨陈辞，为巴基斯坦在国际社会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可是今天，他的心情显得很沉重和焦急，因为他清楚，联合国是不可能挽救巴基斯坦的。就在印度进攻东巴的第二天，联合国大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纷纷谴责印度的行径，但苏联的“不”先生葛罗米柯多次使用否决权，而使联合国无所作为。所以，布托的呼吁并没有使安理会通过有约束力的决议。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战争越来越激烈，形势对巴基斯坦更加不利。东巴已近奄奄一息，报纸电台不断传来东巴将领投降的消息。布托心急如焚，他在饭店拨通了总统府的电话，可话筒里传来了叶海亚军事副官的声音“总统在睡觉，不能打扰”，阿里·布托怒不可遏的大声喊道：“战争正在进行，叫醒总统，他必须开辟西部战场，我们必须减轻东线的压力，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讨价还价，我怎能去谈判一项对我们有利的解决办法。”说完就把电话扔到了地上。

然而，一切都晚了，没有等巴基斯坦开辟西线战场，印度的军队就在 12 月 13 日越过西巴边境。

皮埃尔饭店的电话铃响个不停，有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打来的，有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黄华打来的，也有阿拉伯国家的代表打来的。记者们也涌到皮埃尔饭店，他们都想在这里挖出一条轰动性的新闻。

贝娜齐尔从她父亲那儿学到了一门基本外交课程，就是要善于制造疑虑，不能把自己的意图向对手全盘托出。“如果苏联人在这里，你就打断会见，说中国人来电话找我，如果美国人在这里，你就来对我说苏联人或印度人来电话找我，对外不要告诉任何人谁在我这儿。”

不论外交手腕如何高超，没有强大的力量作后盾，就不可能扭转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巴基斯坦的军队在印度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达卡的军队已陷入包围之中。

12 月 15 日，阿里·布托在安理会上作了最后一次呼吁，贝娜齐尔还是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水灵灵的大眼睛注视着她的爸爸。也许是过于气愤和激动，阿里·布托指着投了弃权票的英、法的代表说，“根本不存在中立，你们得表明立场，你们或站在正义一边，或站在非正义一边，或站在侵略者一边，或站在被侵略者一边，根本没有中立可言。”他看着马蹄形桌子那边的印度外交官辛格说，“他的卓越表现在哪里呢，他的手沾满了鲜血，他的心充满了毒液。”又把头转向苏联副外长马立克，“你挺起胸来拍桌子的那副神气倒不错，你说起话来不像马立克同志，倒像是马立克沙皇。”最后他扫了一眼会场，接着说：“你们要你们的安理会吧，我要离开了，这并不是临阵脱逃，我认为对我本人和我的国家来说，在这里多呆一分钟都是耻辱，我们将回去战斗、我的国家在向我招手。”说完撕毁了手中的一束文件退出了会场，泪水从眼眶中流了出来。贝娜齐尔和其他的巴基斯坦成员也走出了会场。

其他的巴基斯坦成员先回到了驻地，布托小姐和她的父亲在纽约的大街上走着。父女俩谁也没有说话，任凭凛冽的寒风吹打着他们的脸。过了好久，父亲才对女儿说：“即使我们军事上在达卡投降，我们也不能成为政治上投降的一方，我要通过会场明确表明，尽管我们在物质上被摧毁了，但我们国家的意志和自尊却不能被毁掉。”女儿点了点头。

在皮埃尔饭店，巴基斯坦代表团度过了一个沉重难忘的不眠之夜。第二天早晨，布托带着失望回到了巴基斯坦，布托小姐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哈佛大学。

1971 年 12 月 16 日，印军攻陷了达卡，尼亚兹将军率领 9 万名东巴驻军无条件投降，成了印军的俘虏，东巴沦陷。同一天，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宣布西线印军将在 17 日 22 点 30 分停火。叶海亚接受了停火建议。第三次印巴战争结束。

战争改变了巴基斯坦、独立了近 25 年的巴基斯坦的政治地图一分为二，裂变成两个独立的国家，即现在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战争导致了 5000 平方英里的领土被占领。叶海亚在国民的压力下，被迫交出了手中的权力。深孚众望、才华横溢的人民党领导人阿里·布托走上了权力的宝座。

父亲的荣升为哈佛大学的贝娜齐尔带来了荣耀，人们不再知道她是来自巴基斯坦的贝娜齐尔，而只知道她是巴基斯坦总统的女儿。

1972 年 6 月，贝娜齐尔回国探亲休假，刚好遇上爸爸要去西姆拉与印度

总理英迪拉·甘地谈判，解决双边存在的问题。自然，布托不会让女儿留在家里，他对女儿说：“不管结果如何，这次会谈将是巴基斯坦历史的转折点，我希望你亲眼看到这次会谈。”

6月28日，布托飞赴西姆拉，在飞机上，他向女儿面授谈判技巧，提醒坐在身边的女儿，“人人都将搜索有关会谈进展情况的迹象，所以必须十分小心，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你绝不能笑，当我们的士兵仍在战俘营里的时候，不能让人觉得你挺愉快，但你也不能闷闷不乐，那样人们将认为是悲观的迹象，不能使他们有任何理由说：‘看她的脸色会谈显然失败了，巴基斯坦人已惊慌失措，他们没有成功的希望，他们将作出让步。’既不能显得悲观，也不能显得高兴。”这对于贝娜齐尔来说是一种考验，对她的父亲也是一场严峻考验，谈判的成败将直接影响他的威信。

布托和英迪拉·甘地都是新生代领导人。他们都受过很好的教育，都在牛津大学学习过，而且见过面，但彼此都没有给对方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在布托的眼里，英迪拉·甘地只是一个具有一般智慧的平庸的女人。在她身上没有什么伟大之处，根本不可能与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和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相提并论，要是没有尼赫鲁的影响，她的纱丽和她额头上的红点，她的微笑，都不会给人留下印象。如果巴基斯坦和印度组成联邦的话，他自信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甘地夫人从她的位置上请走，他不害怕在智慧上跟她较量，时间和地点任她安排。

甘地夫人则认为布托是一个摇摆不定、没有分寸的人，今天一种意见，明天又是一种意见，是一条变色龙。

谁高谁低，就要开始面对面的交锋。

6月28日上午10点，巴基斯坦代表团的飞机抵达“西姆拉机场”。

在机场，贝娜齐尔发现来迎接他们的甘地夫人并没有她想象的那样高大，实际上甘地夫人非常矮小，据说她结婚时，医生曾劝她不要孩子，怕怀孕有危险。

“阿斯拉姆，阿列库姆厂（乌尔都语“你好”之意）贝娜齐尔向甘地问候。

“娜玛斯台！（印地语“你好”之意）甘地夫人面带微笑回答。

这是贝娜齐尔首次见到印巴次大陆上的第一位女总理，当时她只是一个19岁的女大学生，富有戏剧性的是16年后，贝娜齐尔成为继英·甘地之后，印巴次大陆上的第二位女总理。

谈判是艰巨的，从一开始双方谈判条件并非同等。一个是败国之君，一个是胜国之主。布托手中没有制约对手的砝码，可谓赤手空拳，他只想尽量减少损失。而甘地夫人手中则有杀手锏：巴基斯坦战俘，5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她要挟战争之勇在谈判桌上多捞几分。

谈判紧张而又激烈。甘地夫人坚决要求根据分治协定将所属的克什米尔的领土划给印度，否则，其它的问题不谈，而布托则坚决要求每个问题应该分开，逐步解决。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情形起伏跌宕，头一天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第二天又陷入困境。双方就是在“拉锯战中你来我往，斗智斗勇”。

贝娜齐尔则轻松多了。在西姆拉，她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走在大道上，很多人会投来注视的目光，参观博物馆和工艺品中心，都有很多人跟着她，一些记者、专栏作家纷纷要求采访她，都想从她口中掏出点什么。她还被邀

请到全印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报纸的头版都刊登了她的大幅照片。她的服装发式也在街上流行起来。

7月2日，谈判进入第四天，依然没有进展。

“收拾行李，我们明天回家。”布托对女儿说。

“回家？没有达成协议？”女儿疑惑地问道。

“没有协议，我宁愿空手回到巴基斯坦，也不愿带回一个印度强加给我们的协议。印度人以为，我必须签订协议才能回去，因而会屈服他们的要求，我宁可让巴基斯坦人民对我大失所望，也不能签订一个出卖国家的协议。”

在巴基斯坦驻地西玛恰尔官，满脸疲惫的代表团成员个个默不作声，屋子里如死一般沉寂，只等着第二天上午布托向甘地夫人礼节性辞行和晚上代表团为印度人举行晚宴之后，就打道回府。

第二天上午，布托来到甘地夫人的住处。两人寒暄了一会。布托看到甘地夫人不像以前那样镇定，有点坐立不安，一只手不断地摆弄着她的小包。布托趁机阐述了谈判成败的利害。“如果谈判失败，各自的政敌都会借机攻击，但巴基斯坦政府的压力要小得多，如果谈判成功，则可给该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宁。成功抑或失败全在印度人的手中。作为战胜国应该为和平作出让步和妥协。”甘地夫人若无其事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心理上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对布托的话没有表示赞同或反对，拜会结束时，甘地夫人只是说晚上再作答复。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两国极有可能达成协定。

晚上，印度代表团来到巴基斯坦的驻地，出席对方的晚宴。表面上是谈判的尾声，实际上是谈判的高潮。在例行的祝酒、讲话和短暂的交谈后，两国代表团就摆开了谈判的桌子。甘地夫人和布托在一间小起居室会谈，其他的成员则在旁边的弹球室。大批的摄影师和记者也涌到这里，等待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起草，增补，修改，争论，妥协，请示，人们忙个不停。

午夜12时40分，房间里响起了“生了男孩，生了男孩”的喊声。这是巴基斯坦确定的信号，如果达成了协定，就是生了个男孩，如果达不成协定，就是“生了个女孩”。布托和甘地夫人两人站起来，脸上露出了疲惫和胜利的微笑。

喊叫声把贝娜齐尔从困倦中惊醒过来。她跑下楼，很想挤到父亲的身边，但房间里早已水泄不通，只看到闪光亮闪个不停，两位领导人面前挤满了话筒。

《西姆拉协定》规定：“印巴两国决心用和平方法，通过双边协商使用其他相互同意的和平手段解决它们的争端”。“两国将永远尊重彼此的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人权平等”，并“按照联合国宪章不进行威胁或使用武力反对对方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两国同意“逐步恢复两国关系和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在查谟和克什米尔，由于1971年12月17日的停火而造成的控制线应当受到双方的尊重，而不损害任何一方得到承认的立场”。根据《西姆拉协定》，印度归还巴基斯坦的5000平方英里的领土，但战俘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甘地夫人只同意在领土和战俘方面选择其一。这样可以随时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

布托当然想一揽于解决，但不可能，只好选择领土。历史告诉他，领土问题解决起来比起战俘的问题要难得多。他后来向女儿袒露了心迹，“战俘

问题是人的问题，当他们有 9.3 万人之多时，其重要性更大了。印度无限期拘留他们将是不入道的，况且为他们提供吃住是一个麻烦，相反领土不是人的问题，领土可以被吸收掉，战俘则不能。阿拉伯人至今未能收回 1967 年战争中失去的领土，但是被占领土不会像战俘那样引起国际上的重视。”

7 月 3 日，巴基斯坦代表团飞返伊斯兰堡。在飞机上，人人谈笑风生，个个心情舒畅，全然没有来时的忧虑阴霾。与布托走下舷梯时，早已等候在机场的成千上万的人高呼“布托万岁”，“布托万岁”，如同欢迎凯旋的英雄从战场上回来。布托向欢呼的人群发表了短暂的即兴演说。“今天是个伟大的日子，这既不是我的胜利，也不是付地夫人的胜利，这是巴基斯坦人民和印度人民的胜利，他们在打了三场战争之后终于赢得了和平。”

光阴如梭，布托小姐在哈佛大学的生活转眼接近尾声。

1973 年春天，美国政坛上的一件丑闻给她上了生动难忘的最后一课。尼克松总统为了连任，竟然派人在民主党的总部水门安装窃听器。这一事件被新闻媒体披露出来以后，成为美国也是世界的爆炸性新闻。一位美国总统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居然使用不道德，非法的手段，这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尼克松的信誉一落千丈，在国会的压力下，被迫放弃总统的职位。不过，权力的转移是在平稳。法制的轨道上进行的。布托小姐想到自己的祖国巴基斯坦每次权力变更总是伴随着鲜血。暴力，动荡，心情就格外沉重。她多么希望巴基斯坦能够在她父亲的领导下走上民主之路啊！

离毕业的时间越来越近。当初，布托小姐哭着离开家人来到哈佛，现在，她对哈佛产生了浓浓的季情，喜欢上了美国。尽管她考上了牛津大学，但她还想继续留在美国求学。她的父亲却不同意她的想法，坚决要求她到英国的牛津。父亲认为女儿在美国四年已经够了、到欧洲去进一步学习，开阔眼界，感受不同文化的熏陶，对她的成长会更有好处。

布托小姐最后还是接受了父亲的要求，也许她认为父亲的看法有其道理，他的教育经历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解。

她母亲特地从巴基斯坦赶来参加她的毕业典礼。布托小姐来时是母亲送来的，走时又是母亲把她接回去，她是多么地幸福啊！小弟弟也来帮她收拾东西，他们把家具还给了东家，打扫了房间。布托小姐看着这问生活了几年如今空荡荡的屋子，轻轻他说了声“再见，哈佛”。然后驱车直奔机场。

哈佛四载，贝娜齐尔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她从一个稚气天真的小姑娘出落成亮丽成熟的活泼女性，学到了许多高深新颖的政治理论，亲身感受到了西方思想文化的滋润和熏陶，美国文化的烙印深深刻在她内心的深处。

她在这里看到了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窘境，她在这里目睹了强权政治的把戏，她在这里瞧见了美国总统权力的限度。她在这里体验到了浓浓的政治氛围。

这里有她的朋友和同学。多情开放的才子们不断地向聪慧迷人的她献上自己的殷情，但都未打动她的芳心。她没有花前月下，却有纯真的友情。她和朋友们聊天，与朋友们逛商店，和朋友们旅游野炊。雅丝明和加尔布雷斯成为她最好的朋友，在她后来身处困境时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

哈佛赐予她很多很多，要说再见，难说再见。

她坐在飞机上，望着窗外的白云，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幅熟悉的图景。绿草如茵，树木参天的美丽校园，魏特纳图书馆浩瀚的藏书，查理士河的片片

风帆和对岸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仿佛又听到了树林中传来的清脆鸟  
一切渐渐地远去了，布托小姐微微闭起了双眼。



#### 四、负笈牛津

刚刚走出哈佛的校门，贝娜齐尔又迈进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殿堂——牛津大学，从新大陆来到了旧大陆。

位于伦敦西北泰晤士河上游的牛津城，从伦敦乘车只需1个半小时。牛津大学诞生于十二世纪下半叶，与剑桥并驾齐驱，被誉为学术界的至富双尊，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学府之一。它由一座座庞大的学院组成，如麦特兰学院，皇后学院，大学学院，三一学院，基督学院……，每个学院都有峥嵘宏伟的高门围墙。门墙外车水马龙，门墙内则寂静无声，好似中古世界，学院的门墙组成了一道社会和大学的隔离屏障。每个学院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并略具特色，如基督学院庞然大物的汤母塔及大教堂巍峨壮观，不可一世，展示了创建者红衣大主教瓦斯莱的雄心壮志，要建立一个最大的学院。耸立在爱西斯河畔的麦特兰学院的十五世纪的巨方钟楼，孤傲不群。当然牛津外表最迷人也是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他那一个个峻拔的塔尖，这是牛津景色的精华。牛津十九世纪的大诗人马修·阿诺德在赞美他的母校时唱道：“那座甜蜜的都城，她的无数如梦一样的塔尖！”确实，那一排排，一行行如石笋般挺拔的塔尖布满了牛津的天际，编织成一道道美丽的风景。

牛津不仅以其独特的风景和优美的建筑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好学之士，而且更以其雄厚的学术实力和魅力令莘莘学子倾倒。一所大学的名气绝不只看它有多少漂亮的建筑，最重要的是它培养出了多少杰出的人才。翻开牛津的史册，你可看到一串令人肃然起敬。如雷贯耳的名字，如霍布斯、洛克、雪莱，汤因比，亚当·斯密等。牛津大学具有孕育政治家的传统。英国的政治家很多出

自牛津，远的不论，近的可见麦克米伦。爱德礼·艾登。威尔逊、希恩。撒切尔夫人，为什么牛津盛产政治家，有人作了一妙解，牛津的爱西斯河可直通泰晤士河，所以一帆远扬，青云直上。

不仅英国的政治舞台由牛津人占主角，而且世界上很多政治家也在牛津大学深造过，得到它的哺育，如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斯里兰卡总统班达拉奈克，美国总统克林顿等都在牛津大学留下过他们的足迹。看来，进了牛津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政治的门槛。

阿里·布托当然希望他的女儿到这所殿堂念经，接受牛津高人的指点，修炼成一位女政治家。贝娜齐尔小时候，总是听她父亲绘声绘色地讲他在牛津的紧张学习和愉快的生活。

1973年秋，贝娜齐尔只身一人来到牛津。有了在美国四年的生活经历，她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在她的眼里，牛津和哈佛有一些不同之处。在牛津，她没有自己的套间，只在玛格丽特女生宿舍里有个单间，浴室是公用的，没有私人电话。英国学生不像美国学生那样开朗活泼，显得比较保守，不大自然容易交朋友。

阿里·布托看到女儿进了自己的母校，当然十分高兴。他在女儿刚入校时给女儿的信中这样写道：“当你踏着我22年前在牛津留下的足迹时，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你进入哈佛的拉德克利夫学院时，我也是高兴的，因为我在那里没读过书，无法想象那里的情景，而你进入牛津，就如同我自己又一次回到了它那幽静的校园。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水都是我熟悉的，你实现了我多年的心愿和理想。我为你祈祷，祝你成功，把理想变为宏伟的业绩，

服务于你的人民。”他还以校友的身份提醒女儿，牛津和哈佛相比，牛津的课程更重，学习更紧张，学术研究更严谨，每周都要写几篇论文，心理要有准备。父亲还专门为女儿捎来了一幅古代罗马的油画。这幅油画是阿里·布托 1950 年在牛津读书时挂在他宿舍里的一幅画，现在布托小姐又把它挂在墙上。每当她看到这幅画，就想起了慈爱伟大的父亲，想到了多难兴邦的祖国。这幅画把两代人紧紧地联在一起。

牛津大学实行的是导师制，每个学生进校后，都有一名教师指导，每周要写 2—3 篇小论文，主要是读书心得，写完后，交给导师审阅，然后与导师讨论切磋。牛津的考试很少，本科生在第一学年结束有一次考试，第三学年结束时才有毕业考试。其它的时间学生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牛津的校园活动特别丰富多采，社团组织很多，大约 150 多个。其中最著名的要数 1826 年成立的牛津协会即辩论会，学生只要缴纳会费即可参加。开学期间，辩论会每周星期三晚上辩论一次，题目以政治为主，但不限于此。参加辩论者，主要发言人事先有所安排，次要者即席发言，协会经常邀请名人到辩论社发言。题目一般事先拟定，发言人各择赞成或反对的一方，陈述自己的观点，驳斥对方的立场。辩论的方式按照英国下院的模式进行。辩论讲究论点严密，针锋相对，同时语调客气，幽默风趣，最后由观众表决，谁胜谁负。辩论的目的在于锻炼口才和反应能力。英国很多善辩议员，都是在辩论社锻炼出来的。辩论社成为英国政治家的摇篮。

贝娜齐尔当时并没有想当一名政治家，只是想在外交界做些工作。当然要从从事外交，没有口才是不可行的，这是打动别人的重要武器。特别在崇尚非暴力主义的南亚次大陆，口才更显得重要。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成千上万的人被圣雄甘地，尼赫鲁，真纳口若悬河，富有鼓动性的演讲深深打动。

贝娜齐尔交了一笔费用后加入了辩论社。在辩论社，她听到过许多著名人士的演讲，如英国前首相麦克米伦和希思等，常常为一些人的辩才所倾倒。她当然不愿仅仅当一名听众，也想跃跃欲试作为一个辩手出现在辩论社的讲坛。有一次，辩论社举行一场辩论，其内容是通过宪法途径而不是武装暴力推翻一个经过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这对贝娜齐尔来说可谓得心应手。因为她有对美国政治运作的亲身感受，目睹过水门事件的影响。当学生会主席宣布贝·布托小姐就“在座的要弹劾尼克松这个动议”发表即席演讲时，所有人的眼光都盯在这个东方学生的身上。她没有丝毫的胆怯，脸上充满了自信。她首先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真是南辕北辙，一个以法律和秩序为号召而竞选总统的人，他

自己却挖空心思地破坏法律，从而使这个国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陷入了混乱。”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请允许我讲一个乔治·华盛顿和他父亲的故事，当乔治还年轻时，有一天，他父亲发现一棵樱桃树被人砍倒后生气极了，一定要知道这是准干的，于是，年轻的乔治勇敢地站出来说：‘爸爸，我不能撒谎，这是我干的。’此后，美国才开始有了一位不会撒谎的总统，而现在美国却有

一位总统不能讲真话，他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竟使用不正当的违法的手段，在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器。尼克松的行为不仅违反了法律，而且丧失了在美国人心中的道德权威，也许过了百年之后，人们提起尼克松，只知道他和水门事件。这是尼克松的悲剧，也是美国的悲剧。尼克松应该遭到弹劾。”布托小姐的话音一落，辩论大厅里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这次动

议在牛津学生会表决时以 345 票对 2 票通过。布托小姐心里高兴极了，没想到第一次走上辩论台就获得了成功。这大大激发了她对辩论的兴趣，并把眼睛瞄准了学生会主席一职。

除了参加辩论社的活动外，布托小姐节假日常常和朋友们聚会。在牛津，她的朋友很多，不像哈佛，寥寥无几。在周末，有时驾驶她父亲送给她的黄色跑车和朋友们到伦敦观看莎士比亚的戏剧，参观名胜古迹，自然免不了要到冷饮店里好好享受她特别喜欢吃的美薄荷冰淇淋。在春光明媚的日子，约上几个朋友在碧波荡漾的丘韦尔河上泛舟，在天高云淡秋风送爽的时节，常常和同学们一起到布莱恩海姆宫的草坪上野炊。久负盛名一年一度的牛津剑桥划船比赛，布托小姐是牛津的拥

布托小姐也和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一样，遭到过别人的歧视。

那是 1974 年 2 月的一天，布托小姐探亲后兴致勃勃地返回英国，经过海关时，移民局官员把她留了下来，“你在英国打算住在哪儿？”一边看证件一边漫不经心地问。

“牛津大学，我是那里的留学生。”布托小姐很有礼貌地答道。

移民局官员打量着她，似乎不相信，“牛津大学？”口气中带着嘲讽。

布托小姐掏出自己的学生证，递给那位官员。

“贝娜齐尔·布托小姐，巴基斯坦卡拉奇人。”他以蔑视的口吻念道，“你的居留证呢？”

“在这里，”布托小姐拿出由警察局签发的新居留证，那位官员看了之后没有做声。

“你在牛津如何付学费呢？”他的表情好似关切，布托小姐觉得这话问的多余，真有点忍耐不住了，但还是克制地对他说：“我只带了几支铅笔和一个小杯子，至于学费，我父母亲会按时把钱汇到我在银行的帐户上，这是我的存折。”

移民局官员又把她的证件看了一遍，说了一句，“一个巴基斯坦人怎么能有钱进牛津大学？”这才让她走了。

这不是故意刁难吗？布托小姐走出机场，心中愤愤不平。对一个国家总理的女儿都这样刁难，可想而知，对巴基斯坦的平民百姓该是怎样了。

这是布托小姐首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以前只是听说过。她的爸爸在她入牛津前，就曾告诫她，“西方人心里完全明白，作为一名学生，你们不会永久地呆在他们的国家，他们接受你，是因为他们认为你不是移民，不是一个要依赖他们的有色人种，一旦他们知道你是一个又回到他们那个了不起的国家避难的巴基斯坦人或亚洲人，他们的态度就会完全改变，他们将开始蔑视你，他们将认为在通往成功的任何道路上，你竟然也来同他们竞争，那是不公平的。”

这件事深深刺痛了布托小姐的心，回到宿舍，心情一直不能平静。一个人独自躺在床上，脑海里浮现出刚才发生的一切，联想到爸爸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待遇，不觉间眼泪从白皙的脸庞落到枕头上。是啊，国家太穷了，国家太弱了，怎么不受人歧视呢？她在心中发誓要拼命学习，学成后要用自己的才智建设自己的国家。

与在哈佛一样，布托小姐在牛津期间经常在一些重要的外交场合出现。阿里·布托常常利用机会让女儿参加一些重要的外交活动，培养她的活动能力。1973 年冬，阿里·布托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主要是游说美国政府取消

在印巴战争中制定的武器禁运政策。恰巧布托小姐放假回国，于是，她跟随父亲到美国。就在欢迎阿里·布托的国宴上，布托小姐正好坐在大名鼎鼎的基辛格旁边。1971年，基辛格乔装打扮从巴基斯坦秘密飞往中国，从而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震惊了整个世界。布托小姐在哈佛读书时，尽管基辛格已离开了哈佛的教席，没有聆听到他的讲座，但他写的书，她倒是读过。现在她就坐在这外交大腕的旁边，但并不感到紧张，她见的世面够多的了。宾主们一边吃，一边聊，布托小姐自然不放过跟基辛格聊天的机会，两人从中东战争到中美关系，从哈佛大学的中坚主义到反战运动……谈到兴奋处，还不时发出一阵笑声，设想到这次闲聊给基辛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第二天的晚宴上，基辛格端着酒杯，走到布托面前，抓住布托当众大声说：“总理先生，你的女儿比你还要厉害。”布托哈哈大笑，他感到十分高兴。一个人能够得到美国国务卿的赞扬可不容易。在那次访问中，布托小姐还见到了被水门事件困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

在不久之后举行的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上，布托呼吁与会的38个国家在外交上承认孟加拉国，并获得成功。布托小姐在会议上认识了许多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沙特国王费萨尔，大大开阔了眼界。

1974年，法国总统蓬皮杜去世。就在一年前，巴基斯坦和法国曾非正式达成了一项有关核技术援助的协议。当时，法国答应向巴基斯坦提供一座后处理工厂。现在，蓬皮杜死了，他的继任人会不会履行协议呢？这是一个疑问。阿里·布托想利用出席葬礼的机会，除了表示哀悼外，更想了解法国对巴基斯坦的政策。

在马克西姆饭店，阿里·布托和其他的成员正在进餐，他把头转向坐在身边的女儿，“你看谁将出任法国下一届总统？”布托小姐稍作思考答道：“吉斯卡尔·德斯但。”后来，法国总统选举的结果果然如此。这使布托小姐兴奋万分。因为在1972年，贝娜齐尔姐弟四人利用暑假到中国访问时，周恩来曾问在哈佛读书的贝娜齐尔谁会成为美国下届总统。

“乔治·戈麦文。”贝娜齐尔非常肯定地回答，即使当周恩来说他有消息确认理查德·尼克松会接任总统后，她仍坚持己见。

“你回美国后给我来信谈谈你的看法。”周恩来和蔼可亲他说。

贝娜齐尔按照周恩来总理的话做了，但她仍坚持认为戈麦文会成为总统，但事实证明她错了。而这次，贝娜齐尔非常准确地预测到了德斯但会成为总统。这种政治敏感性和预见性正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牛津的日子过得真快，转眼到了1976年秋，布托小姐学完了牛津三年的基本课程，各科成绩都是优秀，第四年转入外交史专业的学习。她原准备提前一年回巴基斯坦工作，但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父亲要求她拿到牛津的学位才能回来，有哈佛和牛津两所世界顶尖大学的学位在手，到时回国安排工作时，不致于有“任人唯亲”之嫌。但最重要的是她想竞选牛津大学学生会主席，这是她一直梦寐以求的。竞选主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牛津人才济济，学子们的眼睛都长在额头上，再说，作为一个女生，要登上这一高位，在性别方面就存在障碍。因为在牛津大学学生会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女学生当过主席，在十年之前，还根本不允许女性竞选这一职位，在当时的学生会领导层中男女生比例为人7：1，要冲破男生所构筑的屏障并不容易。何况自己还来自贫穷的巴基斯坦。布托小姐是一个敢想敢于的人，她没有因为

种种不利条件就放弃自己的追求。她相信自己有能力胜任这一职务。在过去的三年里，她一直担任学生会常务委员，并兼任司库，比较熟悉学生会的运作方式。她的口才和气质早就博得了同学们的青睐，在经受了一次竞选挫折后心理更加成熟。1976年12月，经过紧张激烈的辩论后，布托小姐击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荣登牛津学生会主席的坐席，任期三个月，这在牛津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她的成功不仅令很多人惊讶，就连她的父亲也感到意外。她的父亲当时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也参加过辩论会，但只是一个热心的观众。没想到女儿比自己还有本事，居然当上了学生会的主席。

在此之前，她的父亲担心女儿竞选失败，曾来信谆谆告诫她，“在一场选举中，一方必然赢，而另一方必定要输，你应尽你最大的努力，但是对选举结果则必须高高兴兴接受。”

当女儿竞选获胜后，布托亲自给女儿发了一封电报：“对你当选牛津大学学生会主席感到非常高兴，你干得太出色了，对你取得的伟大成功表示衷心的祝贺。”布托小姐把父亲的电报看了一遍又一遍，心里高兴极了。

贝娜齐尔竞选胜利了，她父亲的竞选才拉开帷幕。

布托自1971年底取代叶海亚以来，在国内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1973年4月10日，在经过激烈地争论后，国民议会134名议员投票表决，125票赞成，通过了巴基斯坦第三部宪法。这部宪法深深地打上了布托个人的烙印。它规定巴基斯坦的国家政体是西方式议会制和总统制的结合。总统是国家元首，总理是政府首脑，权力集中在内阁。

随后，布托又对文官制度动手术。巴基斯坦的文官制度成立于1840年，它的前身是印度的文官制，而印度文官制则是支撑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建立的庞大而复杂的行政组织的钢筋骨架。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后，继承了这一体制。文官执掌权力，政治家并不干预日常事务，因而在巴基斯坦建国初期，都严重依赖文官制，后来，由于党派斗争错综复杂，政治领导人更加无暇顾及政府行政工作，文官一手遮天。阿尤布·汗初期曾一度限制文官的作用，但到后期，文官又受到重用，并且与军队合流，共同把持国家权力，国家还以法律的形式赋予文官一些特权。在布托当政初期，文官权力空前强大，在中央政府300多个高级职位中，古有225个，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权力网。他们目空一切，权力甚大。布托在站稳脚跟后，决定拿文官开刀。在1973年9月至11月间先后颁布了《1973年文官条例》、《1973年文官法令》等一系列法令，规定文官必须向行政首长负责，高级文官不得越权处理问题，强令1300名文官退休，代之以自己的亲信。其目的就是打击文官的势力，搬掉改革道路上的绊脚石，把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宪法规定了军队不得干预政治生活，但布托深知并非一纸宪法就能约束住军队。他想利用军队在人民心中威信下降之机，着手改组军队，分三步实施他的方案。第一步从领导层入手，调整领导结构，撤换不听话的将领，提拔亲信。第二步增加军费。从1971年—1972年度到1975—1976年度，巴基斯坦军费开支增长了89%。其目的的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国力，另一方面也有安抚军队使之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之意。第三步组建联邦治安防卫部队。布托上台不久，在一些地区出现了群众示威和学生运动，直接影响了政局的稳定。作为政治活动的高手，他深知工人和学生的能量，阿尤布·汗不就是被他们赶下台的吗？为了免蹈覆辙，他决定建立一支防卫部队。在一些地区出现骚乱时，能迅速作出反应，控制局势的发展，同时也可避免军队卷入，危及自

己的地位。

在经济上，布托采取非常激进的措施。1972年1月31日，布托宣布政府接管10种基础工业的31家大企业，包括钢铁；基本金属，重型机械等。1973年元月，布托又宣布私营银行国有化。国家掌握了全巴银行存款的94%，放款总额的89.4%。这样国家就控制了工业和金融命脉。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1972年3月11日，布托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家庭土地占有最高限额，灌溉地从1959年阿尤布·汗政府规定的500英亩降为150英亩，非灌溉地从1000英亩降为300英亩。这一政策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

教育落后一直是困扰巴基斯坦的大问题，各方面都对教育的状况很不满意。教师要求教育国有化，大学生要求参与学校的管理，中产阶级要求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而穷苦人则要求增加教育费用开办更多的小学和职业学校。布托上台后三个月就宣布教育国有化，并增加教育投资，分阶段实行学龄儿童的免费教育，大力发展初等和职业教育。

布托的改革基本上达到初步目标，实现了国家对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控制，但改革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对，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各方面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在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下，布托开始改变以前的一些做法。1974年10月，布托改组内阁，撤去了为布托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左派人物，三驾马车哈桑、拉希姆，卡尔，宣布“我就是人民党，他们都是仆从”。同时起用属于右翼的保守人物和高级职业文官，如哈尼佛。拉扎、卡兹等。

然而，布托的变革反而使自己陷入困境，引起了各个方面的不满。工业国有化特别是4000多家企业国有化严重损害了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文官改革剥夺了政府雇员的就业机会，威胁着他们的生活，劳工改革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使中高阶层的收入流入较低收入阶层。大批左派人物离开政府部门直接招致了他们的猛烈抨击，他们对布托的独断专行非常不满，很多人脱离人民党，这使布托失去了坚固的依托力量。在巴基斯坦影响甚大的宗教界人士利用群众的宗教情绪、指责布托在大街上当众饮酒，是穆斯林的叛徒，鼓动群众投入反布托运动。军队也对布托不满，因为布托上台改组了军队领导，撤换了大批将领，而且重用治安防卫部队，甚至接待外国国家元首时三军仪仗队用治安防卫部队而不是军队。但是当局势控制不住时又使用军队，这引起了军队的不满，也给军队重新进入政治舞台提供了机会。

布托的威望急剧下降，特别是在大城市。1972年布托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达13次之多，以后逐渐递减，1973年为6次，1974年只有1次，1975年和1976年，布托不得不到许多村庄和小城镇去访问，争取农村贫苦农民的支持。

为了摆脱困境，他决定通过大选，重新树立他的权威。他深信人民党是强大的，他能够取得大选的胜利。

1977年1月7日，布托经过慎重考虑后，宣布将于同年3月7日和10日举行国民议会和省议会的选举。

大选日期是布托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自己所处的地位后选择的“皇道吉日”。

布托认为1976年和1977年初国内经济和政治形势对自己有利：通货膨胀率从1972—1973年度的25%下降到1975年的6%，农业生产打破了几年的停滞局面。1976年春小麦大丰收，年产量达860万吨，农业丰收使国民生

产总值年增长率从 1971 年的 2% 上升为 1975 年的 4%。政治方面也比较稳定。军队镇压了俾路支省上层少数人煽起的叛乱，控制了局势，最高法院裁决取缔了从事分裂活动的民族人民党，旁遮普省内反布托的政治势力受挫，在家乡信德省，人民党占绝对主导地位。

国际上，政治气候也有利于布托。南亚次大陆两个有影响的国家印度和孟加拉国的政局出现了剧烈的动荡。1975 年 8 月 15 日，孟加拉的一批青年军官发动政变，杀死了穆吉布·拉赫曼总统，接着又发生了几次政变。印度英迪拉·甘地在 1975 年 6 月鉴于国内局势动荡，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这一切都使布托对大选充满信心，蝉联总理职位，但他也清楚此时的形势和 1970 年相比大不一样，那个时候国家面临存亡之际，他是众望所归的领导人，而现在，声望不可同日而语。他也明白自己的弱点和长处。他把竞选的重点放在农村，如果能争取到占全国人口 70% 的农村民众的支持，就能赢得选举的胜利。这与他在 1970 年大选中抓大城市工人。贫民的策略完全不同。

对他竞选构成威胁的是一些在野的反对党。布托在选举之前以为这些政党力量弱小，不可能对其地位构成挑战。但出乎他的意料，九个反对党抛弃前嫌，联手共同对付布托的人民党。这九个党是图费尔·穆罕默德的伊斯兰促进会，穆夫蒂·马哈茂德的伊斯兰神学者协会和阿默德·鲁拉因的巴基斯坦伊斯兰神学者协会。这三个宗教政党要求按照伊斯兰宗旨管理国家；空军元帅阿斯加尔·汗的独立运动党，皮尔·帕加洛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和纳斯鲁拉赫·汗的巴基斯坦民主党以及阿卡杜尔·加尧姆的克什米尔穆斯林会议，这四个政党是中间政党，主张恢复议会民主。马扎里的全国民主党和阿斯拉弗·汗的践民运动属左翼，主张中央权力分散。布托嘲讽巴联盟是“九条尾巴的一只猫”。

这样，在 1977 年的全国大选中，形成了以布托的人民党和巴基斯坦全国联盟的政治角逐态势。

人民党在竞选中以剑为标志，意在要用剑来同资本家作战，用剑来砍断套在穷人身上的枷锁，用剑来结束资本主义的统治。巴基斯坦全国联盟以犁为标志，要用犁来摧毁封建地主。

从宣布大选日期开始，这两大对手就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布托深入到农村发表演说，呼吁选民投自己的票，而反对党则在城市鼓动选民抛弃布托站到自己一边。两大派别都有大量的拥护者，虽在很多地方发生了流血冲突，给大选蒙上了阴影，但大选仍如期举行。

远在千里之外的贝娜齐尔紧张地注视着国内的大选。父母亲每周寄给她的巴基斯坦报纸，她都读了一遍又一遍，还经常打电话询问竞选情况。

在选举的那天晚上，贝娜齐尔来到基督学院对面大弟弟米尔的房间，同他一起焦急地等待国内的电话。米尔是 1976 年秋季进入牛津大学的。他估计人民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将获得 150 到 156 个议席。

电话铃响了，贝娜齐尔急切地抓起话筒。那边，传来了父亲沙哑的声音，他告诉他们人民党获得了国会 200 个议席中的 154 个。

“祝贺您，爸爸。我真为您高兴，”贝娜齐尔兴奋地附着话筒喊道。姐弟俩长长地呼了一口气，他们为父亲的胜利而高兴。

然而，一切才刚刚开始。“巴盟”怀疑在选举中有绎弊行为。他们不相信会败得惨不忍睹，因为在竞选前，两派力量差不多，布托略占上风，但绝

不会出现这样大的差距。于是就在选举结果公布的当天，“巴盟”宣布抵制省议会的选举，号召支持者上街游行示威，指责布托对国家犯下了选举欺骗罪，不承认选举结果，要求重新举行大选，但布托拒不答应重新选举，只同意纠正选举中少量出现的舞弊现象，双方陷入僵局。为了安抚反对派，3月中旬，布托提出取消自1971年印巴战争以来一直实行的紧急状态，放松新闻检查，释放狱中反对党领导人，想以此为条件，诱使反对派接受大选结果，但没有获得成功，反而使局势更加恶化，反对布托的呼声更加高涨。当布托4月9日到拉合尔访问时，他的治安防卫部队与示威群众发生了冲突，后来演变成两大派支持者之间的街头巷尾、寺庙院内的格斗，造成大量伤亡。在其它城市也出现了骚乱。

巴基斯坦国内的骚乱使远在英国的贝娜齐尔心急如焚。每天早晨，贝娜齐尔便匆忙冲进圣凯瑟琳学院的公共阅览室，抓上几张英国报纸，然后再去取回邮箱里的巴基斯坦报纸，仔细阅读有关巴基斯坦的各种报道，但她不相信报纸上渲染的种种报道。

发生在巴基斯坦的恐怖活动并没有忘记在牛津的贝娜齐尔。3月末的一个下午，当贝娜齐尔从图书馆出来时，发现一名伦敦警察厅的人在等她。

“我不希望惊动你，布托小姐，但有报告说你可能会遇到危险。”

从那天直到6月份布托小姐离开牛津，她一直小心翼翼地按照警察告诉她的方法行事。开车门前，先仔细查看车底下有没有爆炸物，认真检查房门锁是否完好无损，在时间安排上让人捉摸不定，如果在10点上课，可提前或推迟去。她后来收到母亲的一封信更使她感到事态的严重，她母亲在信中对她说“我已经给娜拉姆和米尔去了信，让他们今年夏天不要邀请任何朋友到家里来，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收到了我的信，因为有很多信下落不明，如你收到这封信，请转告他们，谨防万一。”

国内的骚乱几乎到了内战的边缘。4月20日，“巴盟”领导的“车轮转动运动”开始了，卡拉奇陷入瘫痪状态。4月21日，布托放弃了以前文官政府处理国内冲突不用军队干预的承诺，宣布对卡拉奇、拉合尔和海德拉巴三大城市实行军管，但局势仍未完全控制。6月，布托同反对派进行四天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妥协，布托答应撤回军队，释放被捕的“巴盟”领导人和其他人士，宣布10月份举行新的大选。巴国内的局势出现了一丝转机。

此时，布托小姐的牛津生涯也接近尾声。1977年6月21日，是布托小姐的24岁生日。这天阳光灿烂，天气晴朗，连续几天的阴雨天气已经过去。布托小姐心情非常愉快，她要好好地过一个热热闹闹的生日，因为再过几天，她就要结束自己的学生生活，回到自己的祖国。

早在几天前，她就给朋友们发了邀请信，订购点心和生日蛋糕。考虑到朋友很多，她特地把地点选在伊丽莎白女王大厅。生日那天，布托小姐特意打扮了一番，穿上了巴基斯坦民族服装，嘴唇上涂了一点淡淡的口红，脸上略施粉黛，在生日蜡烛的映衬下，显得光彩夺目。同学和朋友在晚上唱起了“happy birthday to You”的歌曲，祝愿她生日快乐。布托小姐完全沉浸在生日的喜悦之中，虽然身边没有父母，但牛津的同学和朋友使她感受到了浓浓的友情。她和朋友们一边聊天一边吃着点心。她心里充满着激动和伤感，因为她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可就要匆匆离别，谁知这一别，何日才能再相聚呢？

过完了生日，告别了朋友和老师，6月25日布托小姐和她的弟弟米尔乘



飞机离开了生活四载的牛津大学。

寒窗四载，她不仅仅获得了一个学位。她在这里看到了新旧大陆的差别，尝到了政治歧视的滋味，学到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最重要的是她发现了自己身上蕴藏的巨大领导潜能。她满怀信心地走向社会大天地。

在回来之前，她的父亲就为她制定好了工作计划，先在总理办公室工作一段时间，9月份，派她到联合国工作，接受锻炼，11月份回来参加12月份举行的外交部考试。一幅多么美丽的图景啊！美好的前程在向贝娜齐尔招手。

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还未等她大展宏图，一场灾难即将降临。它改变了布托一家的命运，也改变了贝娜齐尔的人生之路。

## 五、宫廷败变

巴基斯坦的夏天，白天骄阳似火，热浪滚滚，晚上余热难散，令人难以入眠。

1977年的夏天，巴基斯坦政坛上的权力争夺达到白热化，搅得人心神更加烦躁不定。

拉瓦尔品弟总理府的主人布托先生几个月来一直同反对党讲和，身心处在高度紧张状态。好在6月底，朝野双方出现了一丝和解的迹象，国内的危机似乎就要过去。布托绷得紧紧的神经稍微轻松了一些，家里的气氛也活跃起来，但这仅是昙花一现，一场灾难已迫在眉

睫。

1977年7月5日凌晨，布托小姐和弟妹还在梦乡，万籁俱静，布托和夫人劳累了一天也在休息。突然，听到外面有人敲门。布托夫人打开门一看，原来是神色紧张的工作人员乌尔斯，他说，一个警察告诉他，军队开始包围总理府要杀布托先生，叫布托先生赶快躲起来。布托夫人脸色苍白，望着丈夫。布托先生似乎心里早有了准备，听到这一消息时镇定自若地对乌尔斯说：“如如果军队要来杀我，他们将杀掉我，躲是没有用的。你们任何人反抗也没有用，让他们来吧。…”

布托夫人急急忙忙跑到孩子的房间，一边推着熟睡的孩子，一边喊道“快起来，穿上衣服，军队接管了，军队接管了。”

睡梦中的布托小姐朦朦胧胧听到军队二字，突然一惊，赶忙穿上衣服，跑到父母的房间，她看到父亲正在打电话，知道形势很紧张。布托首先拨通了教育部长的家，接电话的不是教育部长哈菲兹·皮尔扎达，而是她的女儿，她哭着在电话中说“军队打残了爸爸并把他带走了。”布托安慰了小姑娘几句，又把电话挂到西北边境省省督家，刚讲了几句，电话断了。他又拿起几部电话，但都打不出去。他急忙跑到萨娜姆的房间，幸运的是，这部萨娜姆平时跟朋友们聊天的电话没有被切断，他要通了陆军参谋长齐亚的电话。“我是布托，军队包围了总理府，怎么回事。”

齐亚听到布托的声音，先是一惊。他没想到布托这么快就知道了消息。接着马上说道“对不起，先生，我不得不这样做，我们不得不暂时对您进行保护性拘留，但是我将在90天内进行新的大选，您自然会重新当选总理，我也将再次向您致敬，先生。”电话断了。其它的电话都断了，布托失去了与外界的任何联系。

布托这才清楚发动政变的人是齐亚·哈克。这多少令他感到意外。

齐亚·哈克，个子不高，其貌不扬，油光的头发总是中分后梳，他性格内向，不善表现自己，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1924年8月12日生于印度北方邦，二战期间曾在英国军队中服役，转战于缅甸、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后入军事院校学习。1959年至1963年间，先后两次到美国接受装甲兵军官和参谋军官的训练，后得到布托的赏识和支持，从此青云直上。1972年升为少将，任装甲师师长。1975年4月升为中将，任陆军第二军军长，1976年3月升为上将，超过四位将军，任陆军参谋长。

布托没想到自己亲自提拔起用的人会反戈一击，打自己一巴掌。就在前几个月，布托宣布对卡拉奇，拉合尔和海德拉巴实行军管时，哈克还同海、空参谋长发表声明支持合法政府。在政变的前一天，布托还和齐亚一起参加

了美国大使馆举办的庆祝美国独立 201 周年的宴会。两人在宴会上频频碰杯，谈笑风生，齐亚还向布托保证军队不介入政治。

可仅仅几个小时，布托政府就成为军队的牺牲品。

屋子里的空气好像凝固了，谁也没有说话。这时米尔和沙阿纳瓦兹也匆匆忙忙跑进来。母亲把发生的一切都说了。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怎么办呢？起来反抗吗？反抗是徒劳的，因为没有自己的力量，反而会给对手留下杀人的借口，难道就等着军队来，结果会怎样呢？一个星期前，一家人好不容易聚到一起，却恰好遇到政变。布托小姐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齐亚此时发动政变是不是想把布托一家一网打尽，斩草除根。这并非不可能，两年前孟加拉国发生军事政变，穆吉布总统和在家的所有亲人不是都被杀害了吗？

也许历史上发生的政变使布托夫人感到了可怕的危险。她担心孩子们会受到无辜的伤害。急忙走出起居室，从保险箱拿出一叠钞票，交给了儿子米尔和纳瓦兹。“你们一早就离开这儿去卡拉奇，贝娜齐尔，萨娜姆和我在那儿同你们汇合，要是我们晚上还没到，你们就到国外去。”

房里的时钟已指向两点，外面没有任何动静。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一些。布托夫人打开收音机，想听听有没有特别消息，但什么也没有收到。布托也许是为了使家里的人心情轻松些，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习惯地坐到办公桌前审阅堆在桌上高高的卷宗，他对坐在沙发上的孩子们说道“我作为总理，做的第一件是签署批准执行死刑的文件，我做的最后一件事还是这个，我总是不愿阅读那些乞求饶命的上诉。”“现在我肩上的责任没有了，政府是一种职责，我一直忠于职守，这种负担已不再是我的事。”布托的话使孩子们紧张的心情稍微放松了一下。

时间又过去一个小时，齐亚·哈克的人还没来。等待是痛苦的事情。布托小姐心里非常不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是在电话里说 2 点半来接人吗。现在已经 3 点半了，屋子里又是一阵沉默，谁也没有说话。4 点多钟的时候，布托的军事秘书从陆军司令部回来了，神色有些紧张，把齐亚的意思告诉了布托。齐亚已改变了想法，布托不能去拉卡纳，他将被送到莫里山上的总理别墅，在那里待遇与总理一样，早晨 6 点出发。

“为什么齐亚改变主意？”萨娜姆迷惑不解地问道。

“一定是我的电话使他感到措手不及，他也许在怀疑我同他通话前是否已经通知了一些忠于我的军官进行反击。”

6 点钟到了，仍然没有人来，布托夫人走到沙阿·纳瓦兹和米尔旁边，摸了摸他们的头，眼里噙着泪花，“孩子，你们赶快离开这里，航班 7 点起飞。”

布托也走过来，对两个儿子说道“你们要记住布托家的传统，坚强些，爸爸不会有什么问题，回学校，要好好学习。”

沙阿和米尔点了点头，默默地走了。

屋子里只剩下四个人，谁也没有说话，只听到嘀哒嘀哒的钟声，过了一会还是父亲打破了沉默，“萍姬，你是学世界政府的，你认为齐亚会大选吗？”

“是的，爸爸，齐亚将通过亲自监督大选使反对党无法指责大选舞弊或借口煽动闹事。”布托小姐答道。

布托看了看女儿，平缓地说道“别傻了，萍姬，军队接管改政并不是为了放弃它，将军们的大背叛也不是为了举行大选和恢复民主政体。快去准备

你的行李吧！”

布托小姐依依不舍离开了父亲的房间，去收拾自己的行李，行李没有别的，主要是从牛津带回来的几箱书籍和衣服，她原准备抽时间把它们运到卡拉奇。父亲多次嘱咐她要有随时离开总理府的思想准备，但由于回来忙着工作，把这件事给拖下来了。她万万没有想到会在枪口的逼迫下离开总理府。

布托小姐哪有心事收拾行李，她担心父亲被带走而自己不知道。在房间收拾一会行李就往父亲的房间跑，看看父亲在不在然后再回到房间收拾东西。屋子里的波斯猫似乎也感到自己在这儿呆的时间不长了，不停围着布托小姐转个不停，叫个不停，生怕主人离开时忘了它。萨娜姆也在收拾行李。她把她的衣服，照片，唱片，还有些杂志全都塞在箱子里。

过了一会，母亲走了进来，对女儿说道：“现在8点钟了，军队还没有来，军事副官说他们还在莫里别墅准备，天晓得是怎么回事。感谢真主，你的两个弟弟总算安全离开了。”

天渐渐地亮了，根本没有看到军队的影子，也没有听到新的情况。布托小姐心里轻松了许多。她来到萨娜姆房间想安慰一下妹妹，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听到母亲

的叫喊声“萍姬，胜尼，快来，爸爸要走了。”站在门口的服务员也喊道，“快，先生要走了。”布托小姐的眼泪夺眶而出。萨娜姆的泪水在眼里打转，为了不使父亲看到哭泣悲痛的样子，她们赶紧在自己的眼睛里滴了几滴眼药水，一边沿着嵌有金色大板的白色走廊向大门口跑，一边挤眼药水，大声喊着爸爸的名字。

当她们穿过恸哭的人群跑到大门口时，看见父亲正准备上车，布托小姐和萨娜姆使劲地挥动着双臂，大声喊着“再见，爸爸！”布托听到女儿的叫喊声，转过头来，向女儿挥了挥手。脸上想笑但没有笑出来。黑色的奔驰牌轿车在一队军车的护送下，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姐妹两个在那儿望了好久。

按照事先的部署，布托随从参谋，他的私人医生和他的秘书处的部分成员被带到了莫里山，在这里接受齐亚·哈克的“保护性拘留”。莫里山对布托一家来说自然并不陌生，它曾经是布托一家避暑度假的地方。布托小姐小时候常常在这里读书，坐在绿色的草坪上听父亲讲故事，和弟妹们一起做游戏，度过很开心的一段时光。没想到如今莫里山却成为囚禁的牢笼，一家人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享受清风和煦了。布托的政府已兵不血刃地被推翻，民主试验结束了。因为反对党巴盟的全体领导人在45分钟内部被逮捕。从形式上看，巴基斯坦的权力只是转移了一小段距离，就是从前总理的住宅移到齐亚将军的官邸，相距不过两百码，但事实上这二百码却使巴基斯坦的政治进入了军法管制时期。

当布托被带到莫里山后，齐亚·哈克认为局势已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当天晚上发表广播讲话中宣布：“布托的政府已不复存在，已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取代了它，临时政府组成如下：乔杜里继续担任总统，重要的行政事务将由军事委员会处理。哈克本人将担任军法管首席执政官。解散中央和各省议会，中央政府各部长全部免职，各省省长全部免职，由各省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担任，省政府由省军法管制执行官领导。”

哈克还说“在布托同他的政敌进行的为时4个月的纷争期间，军队一直不愿介入，只是作为保卫国家安全的最后手段才采取了行动。唯一的目的是组织自由公正的选举。大选将在10月份举行。大选之后，政权将移交给选

民代表。”

7月10日，齐亚宣布了一系列军法法令，对一些行为作了严厉的规定。如第5号军法命令规定，任何未经首席军法执政官允许而组织或参加工会，学生或政党集会者，处以10次鞭笞和五年徒刑。第6号军法法令规定，任何人不得抢劫，违者砍手。

也许人们厌倦了长期的政治对抗和担心发生内战，人们对军管并没有产生多大反感。齐亚·哈克宣布接管政权24小时后，全国的局势比较平静，银行照常营业。

布托被软禁在莫里山，行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但他仍能跟家里通电话。他情绪非常乐观。一位记者曾问他，在莫里山怎么打发时光，他幽默他说，“我在这里读了很多关于拿破仑的书，由于我未能控制我的将军，于是我想知道他是怎样使他的将军服从他的。”

布托夫人和女儿回到了卡拉奇克里夫顿70号，和沙阿、米尔又会面了。这里是布托的寓所也是人民党的总部：，布托被捕后，这里成为人民党的活动中心。

每天，布托都打电话到家里，询问外面的情况，鼓励他们不要气馁，坚持斗争，对前途充满信心。

局势稳定后，齐亚·哈克在7月14日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宣布将于10月6日左右举行大选，军队将给人民党和全国联盟两派领导人以平等的选举条件，同时宣布释放军管时保护性拘留的政党领导人。7月15日，齐亚·哈克召见两党领导人布托和马哈茂德，表示要做一个公正的裁判。

有一位合众国记者曾问齐亚，如果布托在竞选中获得胜利，他对布托会怎样。他风趣他说：“他就当总理，我当陆军参谋长，我将比以前更衷心地向他敬礼。”

但此次的大选气氛明显地对布托不利，在一些报刊杂志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和流言蜚语，在布托小姐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提出一个问题。“据说为了提高布托先生的声望，布托先生和齐亚将军一起策划了这次政变，这是真的吗？”布托小姐斩钉截铁地回答，“这当然不是真的，这是军队故意散布的谣言，目的在于迷惑我们的支持者，缓解人们对军队管制政权的反对情绪。”还有一些信教者把自然灾害的发生也与布托联系起来，7月19日在拉合尔下了一场特大暴雨，冲垮了很多房屋，毁坏了很多庄稼，造成几十人伤亡。一些人说：“这是布托带来的，这是对他的报复。”

为了争取选民的支持和驳斥种种对布托的不实之词。布托小姐接受父亲到拉合尔去，同遭受暴风雨袭击的人民在一起的指示并在人民党党报《平等报》上公布了自己的日程。

这对于布托小姐来说无疑是一种考验，以前她从没有接受人民党的指示，单独完成一项任务。可现在在军法管制的统治下，却单枪匹马到拉合尔去宣传人民党的主张，担负起人民党和父亲给予的重任。自己能够完成使命吗？布托小姐和弟弟沙阿从卡拉奇乘飞机抵达拉合尔，当她走下舷梯时，早已等候在机场的几百名人民党的支持者不顾军法法令的规定，高喊着“布托万岁”的口号，在人们的簇拥下，布托小姐好不容易才上了车。在旁遮普省人民党妇女印卡柯瓦妮家里，布托小姐成为注目的中心。照相机的闪光灯闪个不停，屋子里挤满了人，很多人站在大街上。看到此情此景，布托小姐心情激动。还没有等她的心情平静下来，不知哪一位大声喊道，贝娜齐尔去接

电话，是布托总理来的，人们的情绪更加高涨。“你们好吗！”布托问女儿。当布托小姐把看到的情景告诉他时，布托非常高兴。

“请代我向他们致意”，布托对女儿说。

7月27日，齐亚·哈克宣布了各政党竞选条例。7月28日，齐亚释放布托等15名政治领导人。布托在释放后仍然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随着时间的流逝，你可以看出，不管怎样用不正当的手段对付我，人民是支持我的。解决民族危机的钥匙在我手里”。他对一名英国记者说。

布托乘火车回卡拉奇。在火车站，成千上万的人等待着布托的归来。有的人手中高举布托的画像，有人打着欢迎布托的标语，高喊着“布托万岁”的口号，布托满脸笑容，用食指和中指作“V”形挥动着，他无法走下火车。在三次下不了车之后，他让火车开到一英里外的一个车站，然后改乘公共汽车，后面跟了几百辆汽车。从火车站到家中的大路上，到处都挤满了欢迎人群，布托的汽车在人海中蜗牛般地向前移动，平时只需，半个小时就可到家，而这次到达克里夫顿70号却花了10个小时。他的汽车被人挤得伤痕累累。布托小姐和弟妹们害怕被挤倒，不敢到大门口去迎接父亲，他们只好爬到屋顶上迎接分别了三个星期的父亲。他们看到父亲被一层层的人群包围着，一只只手伸向他们的父亲，后面的人不断往前挤，拼命地靠拢他，都想一睹他的风采，房子外面12英尺高的院墙都被挤倒了。

三个星期后，布托又和家人见面了，一家人非常高兴，有说有笑。“齐亚不敢再逮捕您，爸爸，他已经看到了人们对您的支持。”布托小姐望着父亲说道。

“别说了。”布托打断了女儿的话，用手指在空中划了一圈，向女儿暗示说话要小心，防止屋里安了窃听器，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经过中央执委会的两天讨论后。8月3日，人民党宣布参加国民议会的选举，但要求是自由、公正，不偏不倚的选举。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全国联盟也宣布参加竞选。布托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竞选战，频繁地到城市、乡村发表竞选演说，每到一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在旁遮普的拉合尔，听布托演讲的竟有300万人左右，刮起了一阵强大的布托旋风，在拉瓦尔品弟，尽管齐亚担心出现大规模的集合，下达命令禁止政治家乘火车竞选。但布托刚一下飞机，他的汽车就被支持者包围了，这些支持者都是躲过了军队的封锁而来迎接布托的。

布托的竞选声势一浪高过一浪。面对布托的攻势，曾经联合起来推翻布托政府的九党联盟则显得软弱无力。齐亚以为通过选举，全国联盟毫无疑问将会取得胜利，这样可以打击布托的势力，名正言顺地进行军法统治。但事与愿违，没想到大选反而使布托的影响上升了，这当然对齐亚的军政府构成了威胁，因为一旦布托重新掌权。军队将退出政治舞台。

如何阻止布托的势头呢？可以使用两种办法。一是暗杀，二是以某种罪名将其逮捕。暗杀当然行不通，风险太大，把握不好会引火烧身，酿成全国的冲突，局势失控。以某种罪名将其逮捕则是上策。一般的罪名还不行，必须是重罪。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竞选战中，布托一直被不祥的乌云笼罩着。

从莫里山回到老家拉卡纳穆尔塔扎公馆时，布托就曾得到消息，当局正准备把他牵扯到一起谋杀案中。

在拉瓦尔品弟，一位支持人民党的记者也透露了同样的消息，“齐亚已

经决定以谋杀罪处死布托，布托再也不会重新掌权了。”

在军法当局把持的报刊杂志上充斥着对布托的形形色色指控、诽谤之辞。几乎天天都刊有这方面的消息。

面对朵朵不祥之云，布托很清楚眼前的威胁，但他已将这置之度外，改革本身就是充满着生命危险的实验。在军法统治下这种危险更大。出国对于他来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这恰恰正中对手的下怀。只有在竞选中取得胜利，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最令他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家人的安全，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政治活动连累家人的生命。

当在家乡拉卡纳听到自己可能被卷入到一场谋杀的消息时，布托感到事态的严重。他要夫人赶快准备让孩子们回国外的学校，把他们的所有证件和银行帐目都办好，手续一定齐全，而后又特地对布托小姐说“萍姬，你也应认真考虑暂时离开巴基斯坦。如你愿意的话，可以到国外读研究生，直到这里的形势好转为止。”布托小姐呆呆地望着父亲，她知道父亲是担心自己的安全，她从父亲的目光中似乎觉察到了留恋的眼神。但自己刚刚从国外回来，怎么能在父亲最危险的时候离开他呢？当初从牛津回来时，不是发誓要和父亲一起努力工作，实现自己的梦想吗？自己每天学习乌尔都语，将来不就是想在政治上为父亲助一臂之力吗？

布托小姐没有走，没有离开他的父亲，她比以前更勇敢，更多地出现在竞选集会上。自然她的行动也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在拉瓦尔品弟考卡尔家族中举行的一个茶会上，布托小姐在会上只讲了两分钟的话，就引来了一大批警察。当天晚上她就收到了齐亚的亲信阿里大将签发的一个通知，通知警告她不要沉迷于政治活动。这是军法管制一个半月以来布托小姐第一次接到军法当局的正式警告。布托小姐似乎不大在意，还拿着通知跑到父亲的房间，微笑地对父亲说，他们因为我参加了一次茶会便把我看成是对军法管制的威胁。做父亲的可不像女儿那样轻松，他提醒女儿要知道军法管制是非常危险的事，不是闹着玩的。

大选的日期日益逼近，选举战的硝烟正浓，各派之间的攻击更甚。军方对布托在大选中咄咄逼人的形势越来越不满。

9月1日，齐亚·哈克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如果一件刑事案件指控调查活动进展需要的话，他不会反对逮捕布托。

9月3日凌晨4时，在卡拉奇克里夫顿70号，布托小姐睡得正酣，忽然被一阵急促的上楼梯的脚步声惊醒，当时正好是在斋月，她以为是佣人给自己送黎明前的早饭来了，还没等她反应过来，五个身强力壮穿着白色服装留着平头的男子闯了进来。尽管穿着便服，布托小姐一眼就看出他们是陆军突击队的成员。他们端着冲锋枪对着她。

布托小姐从未看到男人如此鲁莽地闯入一个穆斯林妇女的房间。按照伊斯兰教的习俗，不经女主人的允许，男人是不准进入女人房间的。这六个人深更半夜闯进来必是来者不善。穿着睡衣，坐在床上的布托小姐看着这些端着冲锋枪的不速之客，心里不免感到惊恐，“你们要干什么？”布托小姐大声喊道，“别多嘴，如果你想活的话。”一个领头的走到她的床边，恶狠狠他说道。“你们是想杀我父亲吗？”“如果你知道怎样做对你有好处的话，就不要动。”到处乱窜的人挥着手枪对她说。

屋子被弄得一团糟，什么东西也没有翻到，突击队员只好砰地一声把门

关上，气冲冲地走了。

布托小姐急忙从地上随便捡了一件衣服套在自己身上。这时萨娜姆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对姐姐喊叫道：“别去，别去，你要到哪儿去，他们会把我们都杀死的。”“住嘴，我要到父亲那儿去。”布托小姐冲出房间，萨娜姆也跟出来了，只见走廊里到处都布满身穿白衣，端着冲锋枪的突击队员。她们被带到楼下的客厅，这里的突击队员还要多。布托小姐想到弟弟住的房间去，还没等她冲到门口就被突击队员围住了，只好坐到客厅的沙发上。

布托小姐的唯一念头就是要到父亲的房里去，父亲现在怎么样？夜深人静突击队员闯到家里来，是什么目的？7月5日发动政变也是在凌晨。他们是不是想对父亲下毒手？

每个门都被两名突击队员把守。怎么能到父亲的房间里去呢？布托小姐急中生智，突然用乌尔都语对把守着通往厨房门的两个突击队员喊道“你们是士兵吗？”然后转过脸对坐在旁边的妹妹故意大声说：“他们怎么会这么不知羞耻呢？当他们的将军把他们扔在印度的战俘营里不管时，是他们的总理布托把他们救了回来，而他们竟闯进布托的家，损害他的尊严，这就是他们对他的报答。”

布托小姐从眼睛的余光中发现两个士兵紧张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显然，她的话起了作用。他们手中的冲锋枪垂了下来，脸上带着羞愧的表情。布托小姐抓住机会，飞快地往爸爸房间里跑。两个突击队员没有拦阻。

推开爸爸的房门，布托小姐看见爸爸坐在床边，母亲靠在枕头上，床单一直拉到她的下颚，手里拿着一对耳塞。由于布托一般很晚才睡觉。为了免受干扰，布托夫人常常带着耳塞睡觉。几个高大的突击队员拿着枪对着父母亲。刚才把自己的卧室弄得乱七八糟的那个家伙又在这里翻箱倒柜。他看到墙上挂着一对供观赏的精美佩刀。这对佩刀是布托的父亲留给儿子的，是布托的心爱之物。那个家伙在佩刀面前注视了一会，想把它拿下来。布托从他那贪婪的眼神中看出了他的诡计，没等那家伙伸手，布托以平静的口气对他说：“你想干什么！”口气中透出的威严把他给吓住了。

布托看女儿站在门口做了一个手势，示意女儿坐到自己身边来。一个满脸恶相的肥胖家伙斜坐在布托夫人的精致的白蓝双色锦缎路易十四式的椅子上，整个身子都包在椅子上，只剩下两只脚翘在外面。“这个家伙是谁？”布托小姐低声问父亲，“萨克尔·安瓦尔，联邦调查局局长。”布托平静他说道，“你们没有逮捕证，那么以什么罪名把我带走呢？”布托两眼直视着椅子上的安瓦尔。“我们不需要逮捕证，我们奉齐亚将军的命令把你带往陆军司令部。”安瓦尔低着头回答。

听到齐亚的名字，布托很但然很平静。他知道齐亚会来这一手，但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他站起身来，说需要半个小时准备一下，并要他的贴身服务员乌尔斯来给他准备衣物。安瓦尔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在布托发怒时，他才做了个手势叫突击队员把院子里的乌尔斯带上来。

可怜的乌尔斯被突击队员抓着脖子和脚，拖到了楼上，在突击队员的枪口下，小心翼翼地布托收拾衣物。

半个小时后，布托穿着崭新的短袖衬衫，头发梳得光亮，精神饱满地走下楼来。要不是看到几个突击队员端着枪对着他，布托小姐还以为她父亲去参加会议。她从心里佩服父亲的沉着和冷静。

在两名突击队员的“陪同”下，布托朝一辆早已准备好了的汽车走去。



布托小姐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又被带走了，心里冰凉，她不知道父亲又被带向何方，更不知道她能不能再见到她的父亲。她呆呆地站着，默默地为父亲祈祷。

“萍姬”，布托小姐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喊自己，转过头一看，原来是弟弟沙阿，他被两个士兵看管着。不知是哪来的勇气和力量，布托小姐大声朝士兵喊道“放开他”，士兵果然放开了她弟弟。姐弟俩急忙跑到母亲的房间，只见母亲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萨娜姆正在为她按摩。她的低血压病又犯了。布托小姐想打电话请医生，但电话打不出去，亲自去请医生，门口的哨兵却不同意。不要说请医生，就是父亲布托被捕的情况也是在买通了一个信德士兵之后才传了出去。当布托夫人的私人医生阿巴西来到克里夫顿 70 号，士兵却不准他进来。最后在中午，经当局批准的医生才给布托夫人打了一针。

到了下午，一名陆军上校拿来了一张空白纸，要布托小姐和她的母亲在上面签字，说是首席军法执政官齐亚的命令。布托小姐断然拒绝在上面签字。因为一旦在空白纸上签字就承认了当局任意罗列的各种罪名。陆军上校气得发抖，眼睛显露出凶狠，小嘴巴噤着。“你真不知好歹，我会让你签的。”说完转身走了。

第二天清早，布托夫人找到布托的律师。律师告诉她布托先生被指控犯策划谋杀罪。

事情是这样的，1974 年，一位名叫卡苏里的政客，他曾是布托的跟随者，他的汽车在拉合尔附近遭到伏击，他死里逃生，他的父亲却命归黄泉，卡苏里后来加入到反对党并指控此事是布托幕后策划。但当时高级法院在审理时排除了布托同那次事件有任何联系，这事很快就过去了。

1977 年，布托下台后，卡苏里；日事重提，再次上诉最高法院。当然有其用意，意在大选前损害布托的形象，削弱他的力量，同时也给齐亚逮捕布托提供借口。

法院在审理了各项材料后，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和理由确认布托有罪。布托在被关押了 10 天后被释放出来。

然而，哈克对布托已越来越不满。9 月 7 日，军管当局下令冻结布托及其夫人的全部存款。9 月 8 日，哈克将军公开指责原先的领导人是“骗子”、“凶犯”。9 月 10 日，哈克明确表示不希望布托及其人民党再次掌权，尽管再次保证要实行公正选举。他曾对《纽约时报》记者说：“你听说过一个国家的总理被指控为凶手的事吗？道德何在，担任过我们这个国家的总理的那个人出卖了我们，他没留下任何道德遗产，我们会要这样的领导人吗？”

9 月 13 日，布托直接回到卡拉奇的家中，此时离竞选还有五天时间，竞选到了冲刺阶段。气氛越来越紧张。一家人都坐在父母的卧室谈论一些轻松的话题。叼着雪茄的布托突然一本正经他说道：“你看，努斯拉特！萍姬是不是该结婚了，我要给她找个丈夫。”布托小姐面颊顿时绯红，根本没想到父亲在大选前会说这事。她笔直地坐在沙发上，撅着小嘴，看着父亲，“我不想结婚，我才回国。”坐在一旁的萨娜姆和沙阿像小时候跟姐姐开玩笑一样，也在一旁附和。“你必须结婚，你必须结婚。”“我已经看中了一个男孩。”布托继续说，布托夫人微笑地看着女儿，没有说话，好像一切已经决定好了，就等举行婚礼了。布托小姐一个劲地大声抗议“我现在不想结婚，我不会同意跟他结婚的”。“你对爸爸不能说不同意，”布托不急不慢他说。其他的人也在旁边帮腔。布托小姐陷入窘境，好在晚餐的时间到了，这才解

了她的围。话题转到了国内的政治。

自然，这个话题决不轻松，说话得小心谨慎。布托一边吃一边说：“有人劝我到国外去，可我不能像老鼠一般逃窜，我要在这里面对哈克。”布托小姐接过话，大声他说道：“爸爸，您将在大选中获胜，并以叛国罪审判齐亚。”“住嘴，你在胡说些什么”，布托严厉他说道。布托小姐从未见过父亲对自己发这么大的脾气，她用眼睛直直地盯着父亲，然后愤怒委屈地哭着跑出了房间。

布托心里也很沉重，以前对女儿从来没有说过重话，可现在是在军法管制下，稍一不慎就会使你锒铛入狱，大选之前，这种危险性更大了。他不希望女儿落入齐亚的手掌。

第二天早晨，布托要到拉卡纳去发表竞选演说。在和家人离别之前，特地坐到女儿的旁边说：“我昨晚的话你别往心里去，我是不想让你受到伤害。”“爸爸，您别说了，我也应该向您道歉。”布托小姐轻轻地在父亲的脸上吻了一下，目送父亲又一次远去。她没想到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未失去自由的父亲。

1977年9月17日，又是凌晨，在拉卡纳的穆尔塔扎公馆，70名身穿黑色衣服的突击队员和警察在夜色的掩护下，轻轻地翻过公馆的院墙，直朝大门冲来，一阵敲门声惊醒了佣人，他们急急忙忙从床上爬起来，冲向大门，用身体死死地顶着大门。“你们是谁，想干什么。”“我们要抓布托，赶快开门。”留在穆尔塔扎公馆的米尔也听到了叫门声，他马上跑到父亲的房间，还没等他开口，他父亲若无其事他说道：“告诉他们没必要把门弄坏，让他们进来两个军官，我收拾一下。”其实，布托的手提箱和公文包早就收拾好了，他已估计到随时都会有人找上门来。过了10分钟后，布托又被带走了。

这一次被捕预示着他生命的火光即将熄灭。

## 六、拯救亲人

布托被捕后，起初被关在苏库尔监狱，后来转到卡拉奇，最后转到拉合尔，被囚在拉合尔的科特拉克帕特监狱。

1977年9月19日，布托小姐经过当局批准，前往监狱探视父亲。

科特拉克帕特监狱是拉合尔的一个较大的监狱。高大的砖墙上布满了带刺的铁丝网，几名警察守卫着高大的铁门。进了大门，又是一道钢墙，也由警察把守着。当然，监狱的条件自不必说，非常恶劣，这大概是世界上所有监狱的特点。这所监狱跟巴基斯坦的其它监狱差不多，囚犯的衣物、床具，盘碟甚至连饭菜也要由囚犯的家人送来。如果犯人家里没有这些“奢侈品”，他们就被关在C级监牢里，50人睡在拥挤的满是虱子的地席上，在墙角处有一小洞口，是犯人方便的地方。一天只供应两小碗扁豆汤，一片面包。

布托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条件稍为好些。在警察的“陪同”下，布托小姐和她的父亲在监狱长的办公室会面了。贝娜齐尔发现父亲的精神挺好，只是显得有点疲劳。布托深知齐亚这次是不会放过他的，他最担心的是孩子们的安全。“沙阿、米尔，萨娜姆必须马上出国，要抢在齐亚宣布不准出国之前，特别是沙阿和米尔，我要他们在24小时之内离开巴基斯坦。”父亲对女儿说。贝娜齐尔看着父亲，点了点头。

“萍姬，你已经完成了你的学业，但是，如果你想回伦敦过平安的生活，我会理解，你可以去，如果你选择留在这里，就应该明白我们将会遇上暴风骤雨。”

“爸爸，我留下来，帮您打这场官司。”布托小姐坚定地回答。她知道父亲的很多事情主要靠自己，因为弟妹年纪尚小，他们还在读书，母亲身体一直不好。布托听到女儿的回答感到很高兴，女儿没有辜负自己的精心培养和殷切期望。

短暂的会面时间很快到了，父女俩默默地看着对方，父亲慈祥的目光和女儿坚定的神情交汇在一起。

过了几天，米尔离开了巴基斯坦回到了伦敦，他再也没有见到他的父亲。沙阿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科特拉克帕特监狱，想跟父亲告别，但在大门处就被门警挡住，门警说他们没有接到准许他探视的通知，不能让他进去。沙阿则说他是得到许可来看望他父亲的，于是，沙阿和门警发生了争吵。儿子熟悉的声音被布托听到了，他正从钢墙旁边经过，准备去见他的律师，他站在不远处大声对站在门外的儿子喊道，“沙阿，你是我的儿子，不要乞求他们给你优待，还是去学习，努力奋斗吧，要让我为你感到骄傲。”听到父亲的喊声，沙阿真想冲进去，但森严的大门无法让他越雷池一步，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从钢墙旁走过，脑海里回荡着父亲洪亮的声音。这声音竟是儿子沙阿最后听到的父亲的绝唱。过了两天，沙阿返回瑞士的学校。

布托被捕后，布托夫人和贝娜齐尔勇敢地担当起了责任，投入到竞选中。为了父亲，为了人民党，布托小姐必须站在讲台上，去面对成千上万的听众。

1977年9月27日，布托小姐登上了费萨拉巴德的竞选讲台，开始了她人生的第一次竞选演说，当时她只有24岁。尽管为了这次演说曾作过充分的准备，母亲也不断地鼓励她不要急，要相信自己的能力。然而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和在牛津大学辩论社进行辩论迥然不同，辩论着重技巧，演说侧重情感和思想，而且气氛相差甚远。当布托小姐登上讲坛，看到台下人山人海。

有的爬到树上和电线杆上，有的站在公共汽车和卡车的车顶上，就是在家里的也都从窗口，屋顶和阳台上伸出脖子，千万双眼睛都盯着她，布托万岁的呼喊声排山倒海，一浪高过一浪。布托小姐开始还是有点紧张，这毕竟是她的第一次政治演讲。但很快她就镇定下来，她那富有魅力的演讲和个性征服了听众，听众情绪高昂，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她丢开讲演稿，看着台下的人群说：“我父亲在与英·甘地会谈时，拒绝睡床，而是睡在地板上，是因为他想到被俘的士兵在集中营里根本没有睡觉的地方，只能睡在地上。”这时，听众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响彻云霄。

她的第一次集会演讲获得了成功，但这种成功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在竞选旅行的第三站——萨希瓦尔，在她“下榻”的地方，当地的法官登门拜访，宣布她住的房间被定为临时监狱，而且被拘留 15 天。这是布托小姐第一次被捕，她初次尝到了失去自由的滋味。房子被警察围着，电话线也被切断，通向别处的道路全被封锁。

她在这间屋子里呆了三天，来回踱步，她不明白代表父亲竞选究竟犯了什么罪，齐亚不是答应继续举行大选吗？她既没有违反军法管制，也没犯法，为什么被关在这儿呢？当她从监狱里出来的第二天，也就是 10 月 1 日，齐亚宣布取消原定于 18 日的选举时，她才明白，法律已成为一纸空文，只要有军法执政官的一纸命令就可随时逮捕你。

三天的监禁仅仅是贝·布托通向权力顶峰征程上磨难煎熬的起点。

9 月 30 日，齐亚宣布取消选举。不久，布托小姐被解除拘留。

1977 年 10 月 24 日，法院开始审理布托被控谋杀案。贝娜齐尔和母亲及其人民党党员积极投身于为布托洗刷罪名的活动中，他们在旁遮普省省会拉合尔借用一间没有家庭设备的住房作为布托受审期间人民党的临时办公处和开会地点。他们每天派一人到法庭听审。

这次审理是很不公正的，人员组成及审理程序和以往大不相同。在一个半月之前，同意保释布托的法官已被撤销职务，改由布托的仇敌、齐亚的老乡和亲信马尔维·穆什塔克担任。审理程序也不是由在低一级的法院首先受理，而是由拉合尔高等法院审判，实际上就剥夺了布托向上诉讼的权利。政府还专门挑选了一个五人陪审团。

法庭设在英国 1866 年建造的一座典雅别致的房子里，天花板上镶嵌着木雕，地上铺着很厚的红地毯。审判的模式按照英国方式进行。当法官步入法庭时，所有人都肃然起立，走在最前面的先导身穿绿色长外套，头缠白头巾，手中拿着一根顶端装有银球的节杖。五位法官均着黑色长袍，头戴白假发，在高背椅上入座，座椅上蒙着带流苏的罩套。布托的律师穿着整洁的高领白衬衫，黑色短上衣，晨礼服裤，外面罩着一件黑色长丝袍，早已来到法庭，布托则坐在一把椅子上，旁边由两位警察看守着。布托小姐和旁听者坐在旁听席上。

法官宣布布托被控谋杀案开庭，首席法官问讯联邦保安部队总司令马苏德·穆罕默德：“是你派人谋杀卡苏里的吗？”“是的，我是奉布托之命派人谋杀卡苏里的。”马苏德答道，声音显得无力。布托小姐一开始就对审理抱着怀疑。因为法庭上没有目击现场证人的证词。联邦保安部队一名被告米尔·阿巴斯的证词也似乎证明这一点，“我们的证词是在施以酷刑的情况下提供的，而且被断章取义。”此后他再没有在法庭上露面，检察官的解释是说他生病了。她父亲的律师阿万中途退出，也进一步加深了布托小姐的怀疑

程度。

当贝娜齐尔亲耳听到首席法官与马苏德的司机审讯对话后，她完全相信这是在齐亚安排下走的过场。

“是你开车送马苏德·穆罕默德去见总理的吗？”首席法官问道。

“不是。”司机回答道。

“写上：‘我开车送马苏德·穆罕默德去见总理’。”首席法官大声命令速记员。

“我反对你这样做，首席法官。”辩护律师说。

“驳回！”大法官两眉紧锁，严厉说道。然后又平静地问证人，“你的意思是说你记不得了，但是你可能开车送马苏德去见过总理。”

“不是的。我没有开车送他。”司机回答说。

“写上：‘马苏德·穆罕默德自己开车去见总理。’”把脸转向速记员。

“我反对！”辩护律师再次表示抗议。

“坐下。”大法官向律师大声吼道，又问司机：“马苏德会不会自己开车去见总理？”

“不会，”司机有点颤抖。

“为什么不会！”大法官暴跳如雷。

“因为我拿着汽车的钥匙。”司机可能害怕，声音很小。

这分明是引诱和逼迫。英国的王室法律顾问约翰·马修斯后来旁听了布托一案的审判后，曾对一名英国记者这样说：“令我尤为关切的是当证人的证词有利于被告时，就被法官立即打断，法官把话接过来逼迫证人削弱和改变证词。”

美国前司法部拉姆奇·克拉克也旁听过案件的审理，他在《民族》杂志上撰文表达了他对审判的看法，“起诉完全基于几个证人的招供，他们在招供之前一直被拘留着，每次陈述时，他们都改变或增加新的证词，他们自我矛盾又相互矛盾，除了马苏德·穆罕默德外，他们重复别人说过的话，他们的证词形成了对所发生事件的四种不同说法，没有任何证人，也没有直接的证据或物证来确认他们的证词是否正确。”

面对审判的不公正，布托小姐和布托的律师努力寻找各种证据驳斥法庭对布托的指控。布托的律师得到了一本关于实际枪杀的枪击报告，发现其中有很多疑问之处，“行凶者”所说的开枪位置与汽车上的弹孔不相称。有四名行凶者而不是检察官所说的两名，使用的枪支与现场发现的弹壳不相称。当他们把报告在法庭公布于众时，大法官宣布休庭，他们自认为有充足的理由能够打赢官司，在休庭时，布托小姐急忙跑到由很多警察严密看守的小房间里，告诉父亲按照枪击报告，法庭会宣布我们胜诉的，布托小姐显得很兴奋，父亲却很冷静地对女儿说：“你不会明白，不会，他们决定杀掉我，不管你或者别人带来什么证据也没用，他们要借我不曾干过的谋杀这一案件来杀掉我。”

这一案件不仅仅是一桩刑事指控案，在其后有着浓重的政治斗争的色彩，它不过是政治对手通过刑事指控达到置对手于死地的借口。

听到“杀害”二字，布托小姐心里一凉，两眼茫然地看着父亲，她不相信也不愿相信父亲说的是真的，屋里其他的人也不相信。长期在政治舞台上摸爬滚打的布托非常清楚政治的味道，更知其中的危险。早在齐亚的士兵夜阑人静把他带走的时候，他就看到死亡的危险日益增大了，尽管其后有机会

远走异国，但他还是留下来坦然地面对死亡。他在法庭的茶点室对女儿说：“上帝什么时候召唤我，我就准备什么时候去见他，我问心无愧，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的名声，我的尊严和我在历史上的地位，我将为之斗争。”

除了在法庭上对布托进行指控外，在法庭外也掀起了指控布托的舆论潮。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指控布托滥用职权的文章，说他动用政府的资金为人民党的工作人员购买摩托车和自行车，为自己的房子安装空调，动用公款购买高档餐具和衣服……。

身处狱中的布托当然不可能对此进行反驳。法庭外的辩护责任自然就落到了布托小姐身上。

为了驳斥种种歪曲事实的报道，布托小姐翻出了他父亲在卡拉奇的文件，在这些文件中，有家庭的各种帐目，有布托1973年出访泰国时买了24美元布料的收据，1975年买了218美元的意大利产墙纸浆糊的收据，还有布托本人花钱购买的阅读文件用的放大镜等。当然，这些证据是不可能登报的，布托小姐和其他的人只能用油印机印发反驳材料，在人群中散发。后来还冒着风险专门编了一本名为《布托：诬陷与事实》的书。书中主要用一些事实和证据批驳了对布托的种种不实之词。

与此同时，齐亚在全国大规模地逮捕持不同政见的人士，主要是人民党党员，到1977年12月，大约有700人遭难，人民党的力量受到很大打击，很多人退党，领导层内部因布托入狱也出现了离心倾向。面对重重困难，布托小姐和她母亲并没有退缩，而是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斗争。

1977年12月16日，是巴基斯坦军队向印度投降的日子。布托小姐和她母亲买了两张在拉合尔的卡达菲体育场举行的板球比赛的门票，想缓和一下疲惫的身心。当她们通过唯一开着的大门进去的时候，马上就被观众认出来了，很多观众起立，鼓掌欢呼。她们微笑着向观众致意。等她们刚一坐下来，正准备看比赛时，突然一个笨重的东西在布托小姐面前一闪而过，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她就听到观众席上的大喊大叫声“催泪弹！催泪弹！”观众们惊慌失措，尖叫着朝出口处奔涌。布托小姐只觉四周弥漫着烟雾，胸口发闷，呼吸困难，眼睛直流泪，肺部烧得厉害，隐约感到肩膀上还挨了一棒。身体虚弱的布托夫人被熏得咳嗽不止，她趴在观台的铁栏杆上，一只手捂着头部，鲜血从她头上流到脸上，染红了衣服。布托小姐一边扶住母亲，一边大声喊着“送医院，必须把我母亲送往医院”。好不容易从人群中挤出来，上了一辆汽车，可布托夫人并没有上医院，而是叫司机把她们送到军法管制执政官家。

在军法执政官伊克巴尔家门前，穿着军装的伊克巴尔已站在门口，还有两个士兵站在旁边。布托夫人从车子里出来愤怒地走到伊克巴尔面前，质问他：“将军你还记得这一天吗！？6年前的这一天你们在达卡向印度军队投降，今天你又恬不知耻地让我们流血，将军，你真是不知羞耻。”说完，布托夫人转身而去上了汽车。伊克巴尔被布托夫人搞懵了，呆呆地站在门前，脸上涨得通红。但他决不会容忍一个娘们对自己这样。

当天下午，布托小姐和她的母亲分别在住地和医院被就地关起来。一个星期后，俩人被关到一起。布托小姐在狱中度过了返回巴基斯坦的第一个新年。她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回想起一年前，她休假从牛津大学回到穆尔塔扎，在父亲的生日宴会上听父亲谈他的现代化设想，谈他的改革蓝图，她是多么地兴奋啊！也正是在父亲的生日宴会上，她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面

对面地见到齐亚·哈克。当时，齐亚·哈克曾对自己说，能见到布托的女儿是多么的荣幸。可现在，父亲已被齐亚投到监狱，过着非人的生活，忍受着巨大的身心折磨，自己和母亲也遭到军法当局的关押，弟弟和妹妹远在海外，好久没有音讯，他们怎么样呢？不知道新的一年一家人的命运又会怎样。布托小姐默默地祈祷，愿真主保佑一家人平安。

1978年1月初，人民党想以布托的生日1月5日作为“民主日”，准备举行示威游行。但在“民主日”前三天，军队就封锁了抗议活动的中心木尔但纺织厂。工人们不顾危险，仍然上街游行，导致了上百人死亡。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数千名人民党的支持者被捕。当局对人们的管制也更加严厉。稍有不满或同情布托与人民党的人常常被施以笞刑。这是一种相当原始的刑罚。犯人的四肢被捆在刑具上，一般被抽打10至15下，施刑时还有医生在场，检查受刑者的脉搏，以避免把人打死，有时犯人昏过去后常常用闻盐的方法让他苏醒过来。在全国各地遭受这种刑罚的不计其数。

1月中旬，布托小姐和她的母亲在拉合尔被释放了，可很快又被拘留，于是，释放——拘留——释放——拘留，成为她生活的轨迹。

从拘留所刚出来，布托小姐就收到卡拉奇税务当局的传票，要她开列她祖父的资产和负债情况。布托小姐怎么会知道她祖父的资产情况呢？她四岁时，祖父就去世了，她又不是他的继承人，照说她无法律责任回答这一问题。可税务当局告诉她，如果她不去，他们就单方面作出裁定。没有办法，布托小姐只好乘飞机赶到卡拉奇克里夫顿70号。

可就在当天深夜2点，沉睡的布托小姐就被砰、砰的敲门声给惊醒了，佣人告诉她警察把房子已经包围了。她穿好衣服急忙走下楼来，一名警官走过来对她说：“我们给你买了一张早上7点飞往拉合尔的机票。你不能在信德省停留。”“为什么，不是你们税务当局叫我到这里来的吗？”布托小姐生气地回答。

“齐亚将军要陪同英国首相卡拉汉去看板球比赛。”警官接着说。

“那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还不知道有板球比赛呢。”布托小姐一时没反应过来。

“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不愿看到任何麻烦。你有可能去看板球比赛，所以我才命令你离开。”说完，警官走了。

布托小姐回到楼上房间，躺在床上，既感生气，这是在深更半夜，随便闯进布托的家门，也觉可笑，没想到一个人回到卡拉奇，会使军法当局如此紧张过敏，肯定是上次板球比赛给他们的印象太深了。

早晨6点钟，警察把她带到了飞往拉合尔的飞机上。

两天以后，布托小姐和她的朋友们在吃午餐，警察又把她拘留了五天，理由非常荒唐可笑。警察对她说：“现在是达塔长老逝世纪念日，你有可能去他的墓地。”布托小姐和她的母亲又关在一起了。

2月初，布托小姐获释，马上去科特拉克帕特监狱探视父亲。由于被拘留，她已错过了三次与父亲见面的宝贵机会。而对布托的审讯，已到了关键时刻。

“我要求你去信德，”布托对来探视的女儿说，“你和你妈妈大部分时间是在旁遮普度过的，让人民党活动分子安排一次信德旅行。”

临行前，她收到了母亲从拉合尔托人捎来的一封信，在信中特地叮嘱女儿，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指责和辱骂齐亚，以免给当局留下指控的借口，

主要宣传人民党的纲领。

2月14日，布托小姐带了一位讲话撰稿人，一名记者和一名《平等报》的摄影师，在信德省人民党妇女部主席的陪同下，乘车回到故乡信德省。一路上，布托小姐所到之处都挤满了人群。由于齐亚禁止在公共场所举行政治集会，她只能在四周有围墙的庭院发表演讲。她一次又一次地站在屋顶上，向拥挤的人群说道：“我尊敬的父老兄弟们，我带来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主席对你们的问候，他是无辜的，对他的犯罪就是对人民犯罪。”

布托小姐一行人的行动一直受到军管当局的监视。当她们离开桑格哈尔时，当局的军车前后夹击，拦住她们的车子，她们被带到一座房子里，在刺刀的看管下过了一夜。

“你们不能再继续前进。”区行政长官对她们说。

“你有命令吗？”布托小姐问道，“我要看命令原文。”

区行政长官哑口无言。

“他是当局派来威胁咱们的。”同行的人民党领导人说。“咱们继续前进吧。”

第二天，布托小姐一行到达纳瓦布沙阿市，在那里举行了旅途中的最大一次集会。但当汽车开到凯普尔市与纳瓦布沙阿的交接处，他们发现道路被安全部队封锁了。这次安全部队持有书面命令。

2月18日，保安部队不由分说，把布托小姐遣送到卡拉奇，并且禁止她离开该市。布托小姐又一次失去了两周一次同父亲见面的机会。

全国的气氛显得非常沉闷和可怕。

3月初，有3名犯人在拉合尔被公开处以死刑。报纸和电视对此作了广泛地报道，绞刑是在公共场所执行的，大约有20万人到现场目睹了这一令人可怕的情景。

在政府大楼和银行，电信局，电视台都部署了穿便衣的士兵，装甲车也在拉瓦尔品弟的大街上巡逻。军管当局的逮捕活动大规模地进行。在旁遮普，有8万人被捕，在西北边境省，有3万人被捕，信德省有6万人被捕。由于逮捕的人太多，监狱已是人满为患，当局只好在各地建立了临时拘留所。赛马场也改成了露天监狱，体育场也变成了牢笼，没有任何生活设施的旷野用铁丝网一围，几个士兵巡逻也就成了关押人的地方。

联想到1977年大选时，阿斯迪尔·汗曾说“将布托吊在阿塔科夫桥上呢，还是吊在电线杆上？”的话，布托小姐的脑海中闪过一丝不祥的念头，莫非是军管当局从心理上对人们处死父亲作准备。

布托小姐不敢多想，不愿多想，但现实是残酷的。3月18日，拉合尔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穆斯塔克·侯赛因宣布：布托犯有谋杀罪，判处绞刑，给予七天的上诉。

消息传来，布托小姐悲痛欲绝。她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她只觉热血直往上涌，心脏跳动得厉害。整个人好像要爆炸似的，她真想冲出去尽快见到被关押在拉合尔的母亲，她想尽快见到父亲，还有弟弟妹妹。她一个人无法承受这巨大的痛苦，但她没有办法出去，她在早晨四点半时就被警察看管起来。她只能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发疯似地踱来踱去，口里不断地念着，“真主啊，请保佑我们。”

令人奇怪的是在布托被判处死刑的那一天，好好的一只长鬃毛公狗突然死了，第二天，那只长鬃毛母狗也死了，布托小姐养的一只泰国猫也在第三



天死了。

在伊斯兰教徒中，有一种说法，当家里的主人遇到灾难时，动物有时就以死来为主人消灾。但猫狗的死并没有换来布托的生命。

布托被判死刑后，全国局势相当紧张，虽然齐亚政府已作了充分准备，但在全国不少地方还是发生了抗议活动。在拉合尔，有几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抗议法院的判决，要求释放布托，他们和警察发生了冲突，焚烧了四辆公共汽车，三辆小汽车和一辆救护车。在卡拉奇和白沙瓦也发生了游行示威活动。

拉合尔高等法院的判决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纷纷呼吁齐亚免除布托的死刑。

孟加拉国的人民联盟主席阿利姆·拉奇博士在一次声明中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和世界各国领导人阻止巴基斯坦政府对布托执行死刑，因为这样的处罚不容于文明人类的良心。

斯里兰卡前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以个人的名义和以斯里兰卡自由党主席的身份发给巴基斯坦总统乔杜里一份电报，对判处布托绞刑深感震惊，并希望取消布托的死刑。

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也致函乔杜里和齐亚，呼吁停止执行布托的判决，给予适当减刑。

英国政府利用巴基斯坦政府外交顾问夏希访问白厅时，曾向他表达英国政府反对将布托处死。

加拿大众议院通过一次提案要求巴基斯坦对布托采取宽恕的办法。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打电报给乔杜里，表示关心布托的命运，并呼吁从宽处理。

中国和巴基斯坦是两个友好邻邦，关系非常密切。布托与我国老一辈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毛泽东最后接见的一个外宾就是他。当我驻巴使馆把布托的情况报回国内时，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营救布托的外交行动。1979年3月21日，我驻巴大使陆维钊会见哈克，表示我国政府对此事的关注，同时声明，此事完全是巴基斯坦的内政。希望哈克利用他的权力和影响，给布托以宽大处理，以免在巴国内造成混乱。哈克在听取意见后，把此事推给法院，他说：“此案属法院管辖，我本人无权过问，拉合尔高等法院已经判决了，若布托不服，可以上诉。我相信法律的力量，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他现在既然落入法网，就应该也必须由法院来惩罚。”还说，“布托比你们的‘四人帮’还坏”。陆大使代表我国政府表示，“根据中国处理这类事件的经验，还是以宽大处理为好，供你们参考。”哈克表示：“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好意，但这件事是由法院判决的，我无权过问。”

3月30日，陆大使再次约见哈克，表示中巴友谊是经过考验的，布托是中国20多年的老朋友，他为发展中巴友谊做过贡献，如果我们对布托问题采取漠然的态度，不但巴基斯坦广大人民不能理解，世界各国人民也不能原谅。我们是从两国的友谊和道义出发，请你运用你的权力、行使赦免权力，宽大处理。哈克的态度仍然未变，“布托已经上诉了，他的问题将由最高法院决定是维持原判，还是减刑，在目前我和巴基斯坦总统是无权赦免的。”

1978年6月，耿飚副总理访问巴基斯坦出席中巴友谊公路竣工仪式时，也再次向哈克转达了我国领导人的日信，希望对布托从宽处理。

7月11日，布托夫人托秘书转达布托给华国锋主席的口信，说目前巴基斯坦形势非常危急，希望我国政府继续做工作。

1979年1月20日，李先念副总理访问巴基斯坦时，也向哈克表示，我们从巴基斯坦的稳定和全局出发，还是希望对布托给予宽大处理。哈克表示，活着的布托比死去的布托更危险。现在要最高法院按它的诉讼程序来办，在结案前讨论此事是无益的。实际上哈克把门封得更紧了。这是第4次交涉。

当2月6日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在布托上诉后宣布终审判决 维持原判时，2月10日，我国政府即以华国锋总理的名义致电哈克，请他从巴基斯坦的利益和稳定出发，施加他的最高权力和影响，给布托以宽大处理。这个电报是公开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播发了。

但国内外的压力都没有使铁腕人物齐亚·哈克的态度发生改变。他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这个案子不是政治案件，而是谋杀案件，他碰巧是巴基斯坦前总理，他碰巧是人民党的主席，但是他不能超脱于法律之上，依法办事是我的原则，最高法院的判决是最后的决定，至于一些国家元首和世界领导人发出的把前总理布托的死刑减刑的呼吁大部分是出于私人关系，有些呼吁只是一种形式，但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劝告，我们最好下

台。”

布托的生存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 七、走上绞架

布托开始关在科特拉克帕特监狱，后又转到拉瓦尔品弟中央监狱死刑牢房。

1978年6月21日，是贝娜齐尔25岁生日。她特地打扮了一番，穿上了一件干净整洁素雅的连衣裙，嘴上涂上了淡淡的口红，脸上擦了一点点胭脂，显得非常亮丽端庄。她是为了让父母看到感到高兴，因为她已经和母亲约好要去探视父亲。

布托小姐一个人坐在拉瓦尔品弟的弗莱希曼旅馆的一个单人房间里。她不时地看表，从9点到现在，已经等了3个小时，怎么还不见母亲来呢？她母亲将由警察从拉合尔的拘留处带到这里来。布托小姐在屋里坐立不安，隔不了一会，就走到窗子旁，看看外面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没有她母亲，但依然不见母亲的身影，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她为母亲担心，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血压很低，总是被头痛缠绕着，父亲在监狱近一年的时间已把母亲折磨得精疲力尽，青丝中夹杂着不少白发。她以前从拉合尔飞往拉瓦尔品弟看望父亲的途中，昏倒过

两次，难道这次……。她不愿多想。

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仍不见母亲。布托小姐等得有点不耐烦了。这种等待对她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这只不过是当局惯用的伎俩，他们总是拖延在外面等候的时间，这样可以减少会面的时间。监狱规定探监的人必须在日落之前离开。直到4点钟，母女俩才相见。她们急冲冲地赶到监狱，看守带着她们穿过一道道铁门和牢房，来到走廊深处的一间牢房前停了下来。看守打开牢房的铁门，布托小姐看到坐在床上的父亲，喊了一声“爸爸”，一头扑进他的怀抱，布托和夫人相视地笑了笑，摸着女儿的头说，“萍姬，你是一年中最长的一天出生的，这是你最大的幸运，就连当局也不能使生日这天的太阳早点落山。”

布托小姐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屋子，鼻子里酸酸的。牢房约有6英尺宽，9英尺长，昏暗潮湿，不见阳光，门的铁栅栏上没有装上纱网，空气污浊，苍蝇、蚊子到处飞，在墙角旁有一个小坑，就是犯人方便的地方，壁虎在墙上爬上爬下。父亲的背上布满了伤痕，到处都是被蚊虫叮咬的红印，人明显的消瘦了，眼睛里充满了血丝。

布托的情绪依然乐观。他要女儿去老家拉卡纳过开斋节，在祖先的墓前祈祷。布托小姐从来没有在开斋节到过祖先的墓地，也没有在墓地附近的房子里接待过左邻右舍。按伊斯兰教的规定，这样的事情都由家里的男性承担，但她家的男性都不可能完成这件事，父亲深陷囹圄，弟弟身悬海外，她只好接受了父亲的要求。

三个人在院子里说说笑笑1个小时后，看守走过来。布托小姐知道探视的时间到了，她多么希望能和父亲多呆一会，但她不能。她看着父亲蹒跚地向牢房走去，听到从走廊里传来的沉重的脚步声，布托小姐的心都冰凉了。

为了争取父亲的生命，布托小姐和父亲的律师利用7天上诉时间，积极准备辩护材料，并且在弗莱希曼旅馆专门找了一间办公室，以便跟踪事态的发展。布托小姐的一些朋友也都志愿跟她帮忙。他们拼命的工作，布托小姐和斯科菲尔德每天把律师从拉瓦尔品弟中央监狱带来的布托写的密密麻麻的手稿打印出来，然后律师急急忙忙地把打好的稿子交给布托，经他修改后再

带回来，晚上又把稿子送到地下报纸披露出来。同时，布托小姐还要会见人民党的工作人员，接受记者的采访。

当他们把辩护材料提交给最高法院时，形势已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在5月份庭审开始时，首席法官安瓦尔宣布上诉将尽快结束，但是，当他发现9名法官中有5名法官似乎倾向于推翻拉合尔高院的判决时，安瓦尔6月份突然宣布休庭，到雅加达参加会议。醉翁之意不在酒，安瓦尔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他是哈克的老乡和亲信，是哈克一手任命的，自然理应秉承哈克的旨意。他起初以为法官们会倾向维持原判，所以宣布要尽快了结，这样一箭双雕，既让人们感到法庭审判的公正，也可置布托于死地。但他感到形势不妙时，就采取拖延战术。

这种拖延战术果然达到了效果。一位法官在7月底退休了，还有一位法官在9月份由于眼底出血，身体虚弱也退出了庭审。这两位法官都是倾向于推翻原判的。尽管被告的律师一再要求允许他们继续出窿，但遭到了安瓦尔的拒绝，这样在法庭上形成了对被告不利的4比3的局面。

9月的一天，布托对前来探视的女儿说：“我想叫你去一趟西北边境省，我们要使人民保持高昂的士气，你去的时候带着那顶毛泽东主席赠送给我的帽子。它放在克里夫顿70号的衣帽间里，你讲话的时候把它戴上，然后摘下来放在地上，对大家说‘我父亲说，他的帽子应该始终放在人民的脚下’。”

女儿一边聆听着父亲的话，一边看着父亲。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牙床已变成深红色，有些已感染，经常发烧，人更消瘦了。告别时，父亲内疚地对女儿说：“萍姬，我真不愿让你再去冒任何风险。如果他们更加肆无忌惮的话，你可能还会被捕。我一开始就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又想到为了我们的事业而遭受鞭打和折磨的成千上万的其他人……”布托说不下去了。

布托小姐完全理解父亲的心情，她立刻说：“爸爸，别说了，我知道，作为父亲，您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可您不仅是我的父亲，而且也是我的政治领导人，就像您是那些正在受苦的人们的政治领导人一样。”

布托还是不放心，又叮嘱女儿：“萍姬，要当心。你要去的是部落地区，那里的人是很保守的，讲话的时候，你的头巾有时会从头上掉下来，记住要戴好。”

父亲的担心是多余的，布托小姐一行一到达西北边境省和部落地区，就受到当地头人的欢迎。“巴丹人以爱护尊严闻名，我父亲不仅为自己的尊严，也在为祖国的尊严进行战斗。”布托小姐用乌尔都语对巴丹人说。巴丹人表现出了博大的胸怀，在那些地区，对妇女约束极为严格，但对布托小姐，他们没有苛求。国家的痛苦，布托家庭的不幸和所有人的痛苦使大家超越了性别的禁锢，人们用普什图语向布托小姐发出欢呼：“欢迎，欢迎，欢迎贝娜齐尔！”

贝娜齐尔在西北边境省的活动影响很大，这引起了当局的恐慌。1978年10月4日，贝娜齐尔在木尔坦机场被军警逮捕，押回拉瓦尔品弟，她和母亲再一次被拘留。

远在异国他乡的米尔和沙阿为了搭救父亲，已经放弃了学业，在国外领导着反对军管当局的斗争。

米尔在英国积极活动，不时会见来访的外国政府人士，向他们介绍巴基斯坦国内的真实情况以及布托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审判。他还组织领导了旅居

英国的巴基斯坦人抗议判决布托死刑的示威游行。为了筹措活动经费，米尔卖掉了他姐姐在牛津大学时用的那辆小汽车，用卖车的钱去伦敦印制了布托的辩护词，通过各种渠道广为散布，为了使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巴基斯坦国内的政治迫害，米尔还亲赴美国，在纽约呼吁联合国对巴基斯坦当局施加压力。

布托对儿子在国外的活动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他们在政治上日渐成熟，不愧为布托家族的人，担心的是他们还年轻，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唯恐他们在政治斗争策略上出现失误。给对手以口实。所以叮嘱女儿给米尔写信说：“跟伟人有关系的人必须洁身自爱，个人生活要谨慎，不要上电影院，不要奢侈浪费，否则别人会说你只顾自己享受，忘了亲人在死牢受苦。”

1978年12月18日，在经过长期的法庭斗争后，布托终于有权为自己的权利辩护。这天法庭内外都挤满了人。警察在大街上设置了路障，数以千计的人在外面等候。进入法庭的人都必须有出入证，接受金属探测器的检查。法庭内早已坐无虚席，有的人坐在暖气片上，有的人挤在过道上，还有的人坐在律师席的出入位上。他们都渴望看到布托的风采。布托夫人，雅丝明，阿米娜，男仆乌尔斯也来到了法庭，布托小姐被拘留，未能亲眼目睹父亲的精彩辩护。

上午9点，布托在两名警察的“陪同”下走进法庭。他一边走，一边同过道旁的人握手致意。他身穿一套考究的西服，丝绸衬衫和领带，在上衣口袋里插着一块艳丽的手帕。一年前，这套非常合身的衣服现在却显得非常宽大。自从14个月以前被捕以来，他的体重已下降了10公斤，在死牢已经有90天未见阳光了，25天没喝淡水了。他的面色苍白疲倦，身体显得虚弱。当法官宣布申辩开始时，布托的精神突然振作起来，他的辩驳就像突然打开的闸门一泻千里。年轻时担任律师时练就的口才在申辩中得到了淋漓的展示。不同的是以前是为别人辩护，如今是为自己辩护。在六十五分钟的申辩中，面对原告的指控，他给予了有力的反驳，列举了拉合尔高级法院在审判期间的不公平做法以及“证人”口供的自相矛盾之处。他说：“凡是活着的人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不想为了活着而活着，但我要为正义的事业而活着，我要的是公正而不是怜悯。”“他们对待我是下作的，太下作了，我不是一个无根底的人，我没有做损害国家的事情，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一定要证实我是清白无辜的，现在的问题是原告及其律师必须对诉讼提出令人感到毫无疑问的，合乎情理的证据。”

布托的辩驳倾倒了在场的听众。虽然他们不能为他鼓掌喝彩，当局不允许，但当他离开法庭时，法庭里的人都站立起来，表达对前总理的尊敬。

这是布托生前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改变布托的命运。

1979年2月6日，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四名旁遮普法官维持原判，三名来自少数民族省份的法官投票否决原判。

布托小姐在拘留所听到这一消息时，顿觉眼前天昏地暗，整个身体瘫倒在床上，泪水不断地从脸上流淌下来。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她最后的希望，奇迹并没有发生。

就在最高法院宣判的这一天，军法当局加紧了对全国大中城市的控制，大批警察出现在街头和主要路口，大中小学关门停课，大中型工厂的大门紧锁着。全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但当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的消息传到世界其它地方时，却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美国总统卡特写信给齐亚，要求他否决最高法院维持对前总理死刑的判决。

英国首相卡拉汉呼吁巴总统齐亚·哈克保全布托的生命。

法国总统德斯坦致函齐亚·哈克，要求他用赦免权免除布托的死刑。

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建议布托在土耳其过流亡生活。

西德、瑞典、挪威、丹麦、澳大利亚、印度、南斯拉夫、叙利亚、苏丹、摩洛哥、卡塔尔、沙特等国领导人纷纷呼吁齐亚宽恕布托。

雪片般的信函飞到巴基斯坦外交部秘书长的桌子上，堆起来有几尺高，都是呼吁齐亚饶恕布托的。

然而，齐亚·哈克对世界的舆论仍然无动于衷。不过，齐亚表示，如果布托及其家人请求他宽恕，可以给他一个改为无期徒刑的面子，瘦骨嶙峋的布托已经在精神上作好了问心无愧地到麦加去的准备。他拒绝请求宽恕，也反对家人请求，他觉得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不能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请求宽恕。

布托一个人呆在死刑犯的牢房里，万念俱灰，他拒绝就医和吃饭，他没有其它的方式抗议当局对自己的虐待，只能以虐待自己的方式来抗议当局。他什么也不想，在死牢里的唯一活动就是诵古兰经和朝拜。

布托小姐和她的母亲也被当局拘留了。她们关在离布托不远的西哈拉警察训练营地。这里偏僻，不为人知，房子里什么也没有，没有毯子也没有食物，只能靠仆人跑很远的路给她送一点吃的东西，母女俩相依为命。

3月31日，当局规定的请求宽恕的期限到了，但布托没有向齐亚低头，这预示着布托的生命之旅快到尽头。各种各样的征兆越来越不吉利。在拉瓦尔品弟的中央监狱，布托死牢里的包括床在内的几件可怜家具被搬走了，他只能睡在地板上，看守把他的刮胡刀也拿走了。布托的脸上布满了胡须，脸色蜡黄，身体虚弱。

在西哈拉，当局又给了布托小姐一张拘留证，限制她15天的行动自由。理由很简单，当局认为她会采取煽动性的政治行动，要求释放她父亲，从而会对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布托小姐由于过度的劳累，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她白里透红的脸庞渐渐失去了血色，还长了一些斑疹和脓疮，两颊有点下陷，那双明亮的眼睛有了一些红肿，由于体重下降，皮肤显得紧皱。更令她难受的是，她因精神高度集中和紧张，晚上常常彻夜难眠，即使吃安眠药也无济无事。

4月2日清晨，布托小姐模模糊糊地躺在军用吊床上，突然布托夫人从院子里大步走进来，喊了一声“萍姬”。布托小姐听到母亲用一种异样的声调呼唤自己的小名，马上从军用吊床上翻下来，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母亲，“外面的许多军官都说，今天我们两个应该看你父亲，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母亲说。

布托小姐当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布托夫人也很清楚。两人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看着对方。她们的心怦怦直跳。按照每周探监一次的规定，由布托夫人和女儿轮流探视，现在当局要两个人一起去见布托，肯定是形势出现了变化，军管当局要对布托下手了。布托的生命进入倒计时。

布托小姐知道时间对父亲不多了，她唯一想做的就是弄清确切的消息，向国际社会和人民发出最后一次呼吁，作最后一次努力去挽救父亲的生命。她急忙对母亲说：“告诉他们我病了，如果是最后一次见面，那我当然得去，如果不是的话，我就第二天去。”布托夫人点了点头出去了，布托小

姐赶紧利用母亲与卫兵交涉之机，立即铺开信纸，在上面潦草地写了几句话，叫来可靠的仆人易卜拉希姆，要他马上把信送给雅丝明。把信带出去也不是容易的事，因为进出都要搜身，但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冒险了，忠诚的仆人看到布托夫人正在和卫兵们说话，看守的头头在用无线电向上司报告情况，他一个箭步跑到大门口，然后对守门的卫兵说，“我必须给贝娜齐尔马上弄点药来，救命要紧哪！”真是万幸，卫兵扫了他一眼，就让他走了。布托小姐松了一口气，但手还是不停地颤抖着，她不知道这封信是否能到达雅丝明手里，外国使团能否知道。她知道齐亚不会放过她的父亲，法院的判决已无法修改。但她还是希望奇迹能发生，这封信能够延长或改变父亲的生命。

好不容易等到晚上 8 点 15 分，布托夫人和女儿打开收音机，准时收听 BBC 英国广播公司的对亚洲广播节目。布托小姐几乎要把耳朵贴在收音机上，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神经绷得紧紧的。BBC 新闻先报道了欧、美、东亚的消息后，转到了南亚，布托小姐屏住呼吸，她听到播音员以平缓的声调报道了自己从监狱里写的一封信带出去了，信的内容主要是 4 月 3 日将是布托小姐同她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布托小姐松了一口气。但播音员接着说，这条消息还无法从监狱长那里得到证实，还引用布托政府中一名前部长的话说：“看来，她有点惊慌失措”。布托小姐低下了头，没有说话，连看母亲的勇气都没有了。她恨不得把收音机给砸掉，最后拯救父亲的一丝希望成为泡影。

她们仅仅为布托赢得了一天的时间，当局通知她们明天一起去探监。

4 月 3 日，布托夫人和小姐从西哈拉来到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监狱里戒备森严，俩人经过女看守搜身后被带到布托的死牢房间，这次没有和以前那样，让她们到房间里去，而是隔着牢门的栏杆会面。

死牢里灯光昏暗，布托小姐的脸贴住栏杆喊了一声“爸爸”，布托听到女儿的喊声，吃力地从席子上站起来，走到栏杆前，看到女儿和夫人站在外面，“你们两人怎么都来了，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吗？”布托夫人盯着丈夫，不忍心回答，女儿低声说：“我想是。”

布托把站在后面的监狱长叫过来，问道：“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吗？”

“是的。”监狱长回答。

“日子定了吗？”

“明天早上。”

“几点？”

“按照监狱的规定是 5 点。”

“你什么时候得到通知的？”

“昨天晚上。”

“我可以跟家属在一起多长时间？”

“半小时。”

“按照监狱的规定，我们是可以有 1 小时的。”

“半小时，这是我的命令。”

布托小姐听到和父亲在一起只有半个小时，手脚都在颤抖，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真想扑进父亲的怀里大哭一场，但她不能，她不愿让父亲看到自己的眼泪，增加新的痛苦。

布托显得非常平静坦然。“萍姬，把这些书都拿去吧，我不想让他们沾手。”他把自己的书和杂志交给了女儿，还把律师给他带来的几根雪茄也给

了布托小姐，只留下一根陪他度过最后一个晚上，就是那半瓶香水也交给了女儿。

布托小姐默默地接过这些东西，只觉得手里沉甸甸的。

布托深情地看着夫人，“把我的爱带给其他几个孩子吧，告诉米尔，沙阿，我曾努力做一个好爸爸，并且希望能够向他们说一声再见。”布托夫人硬咽着，点了点头。

布托接着说：“你们两人为我受了很多苦，今晚他们就要把我杀了，我想让你们也得到自由，如果你们愿意，在宪法终止军法管制的情况下，你们可以离开巴基斯坦，如果你们想得到思想上的安宁，你们也许要到欧洲去的，我允许你们，可以去。”

布托夫人拉着丈夫的手，摇着头说，“不，不！我们不会走，永远也不走，这些将军休想以为他们已经赢了，齐亚又规定大选日期了，虽然谁也不知道他是否有胆量举行，如果我们离开了，那就没有人来领导这个党了，这个党是你建立的。”

“你呢？萍姬。”布托看着女儿。

“我永远也不会走的，爸爸。”

布托笑了，笑得那样坦然，他可以放心地走了，女儿一定能完成自己的事业。他深情地对女儿说道：“你不知道我多么地爱你，一直多么地爱着你啊，你是我的宝贝，永远是我的宝贝。”

半个小时的时光是那样的短暂，那样的宝贵，布托和妻子女儿有说不完的话。监狱长走过来大声喊道：“到时间了，到时间了。”

布托小姐双手紧紧地抓住栏杆，她不断地向监狱长请求，要他把牢门打开，跟她父亲告别，作为他的女儿，这是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了。她要拥抱他。监狱长根本不理睬她的请求。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布托双手摸着女儿的头，泪水掉了下来，“我就要跟母亲、父亲在一起了，我就要回到我的先辈在拉卡纳的那个地方去，变成它的泥土，芳香和空气的一部分，我的周围将有歌声，我将成为它的传奇的一部分。”这成了布托最后的绝唱。

当局的人走过来拉开了布托小姐紧握栏杆的手，她声嘶力竭地喊着：“再见了，爸爸！”这喊声在走廊里回荡着，撕人心肺。布托小姐多么想回头再看一眼爸爸，但她不能，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伤心，泪水哗啦啦地掉下来。她不知道她是怎样走出长长的监狱走廊的，她的双脚像灌了铅一样一步一步地移动着，脑子里一片空白。

她们被狱吏带走了。她们离开了布托，永远地离开了。

在西哈拉的拘留所里，母女俩没有说话，坐在床上抽泣着。是啊，想到自己最亲的人马上就要离开人世，可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也没有其它的东西陪伴他，就只有留下来一支雪茄，怎么能不伤心呢。布托小姐的喉咙越来越紧，令她感到窒息。她不相信明天就再也见不到父亲了。按照巴基斯坦的法律，执行死刑时必须提前一个星期发出通知，而到现在却还没有来通知，也许齐亚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真主啊，让奇迹出现吧！显显圣吧！”布托小姐祈祷着。

齐亚没有发出通知，一是担心国内出现动荡，二是怕遭到国际上的压力，但手令早已签发了。

4月4日凌晨2时，布托洗了澡，刮了胡子，换上了自己的衣服，吃了



一顿饭，背诵了《古兰经》的一段经文后，随后被押往绞刑台。当他经过一个一个牢房时，其他的犯人都高声齐诵《古兰经》，为他的灵魂祈祷。他的双手反绑着，他没有任何反抗，也没有说一句话，甚至在绞架上也没有挣扎一下，苍白瘦弱的他吊了30分钟后，绳索才被砍断。

上午4点左右，一辆军用卡车在严密的保护下开进监狱，装上布托的尸体后，飞速开到附近的一个机场，布托的尸体又转到飞机上，直飞拉卡纳。

在位卡纳，早已作了埋葬布托的准备。就在早晨，布托村周围就布满了军车，军车封锁了村子的进出口。一位警官找到看管布托家土地的纳齐尔·穆罕默德，命令他告诉布托祖先的墓地，穆罕默德不愿意，他要求由他们自己来挖墓，警官只好同意，但只给他派8个帮手。按照传统，他们用没有烧过的砖来砌墓穴，砍了一些树枝盖在上面，然后诵了一段《古兰经》。

上午8点，两架直升飞机在村口降落，布托的尸体转到了一辆救护车上，车子直向墓地开来。警官强令把棺材放到墓地南边的一间屋子里。纳齐尔·穆罕默德把棺材打开，把遗体放到套绳上。在确证了死者淋过浴，看到未经缝制的裹尸布后，他把布托的脸转向西方，朝着麦加的方向，然后轻轻地合上棺材，这时，村民们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悲痛和愤怒，他们冲破军警的阻拦，挤到棺材旁，最后看上一眼自己尊敬的人。

在枪口的威胁下，村民们为死者做了最后的祈祷，举行了安魂仪式，然后把棺材放进了墓穴。人们的哭声和祷告声交织在一起，震天动地，他们再也见不到引以为自豪的人了。

布托带着遗憾走了，他曾对意大利的女记者法拉奇说：“我认为我比统治过巴基斯坦的其他任何人会持续得更长些，首先因为我很健康，精力充沛，其次因为我还年轻，我才刚刚四十四岁，比甘地夫人年轻十岁。”他没有比别人统治的时间更长，却比别人死得更惨。他在走向刑架时给妻子留下了一封遗书：

“我很不幸请了巴哈蒂亚尔和阿万这样的律师，他们与其说为我辩护，还不如说为检查当局辩护。巴哈蒂亚尔日复一日地拖长他的案子的辩护，结果是最高法院两位法官退休，他没有对这个案件进行应有的辩护，给了我一个错误的建议，要我抵制法院的审问。

努斯特拉，还有许多事情要靠你，你不能失去勇气，要像你过去一样，勇敢地面对局势。

就我的死而言，毫无疑问，我自己党内的人，包括一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关在西哈拉的布托夫人和布托小姐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已经入土了，她们还等着当局通知她们护送尸骨到祖先的墓地安葬。她们错了，她们没有想到军管当局竟然不顾教义传统，在没有亲人护送下就把布托下葬了。

布托小姐接过看守带来的父亲的遗物。她的手在抖动。遗物里有她父亲临终时穿的长衬衫，肥裤子，最后10天里绝食而留下来的15盒饭，水杯……。可没有见到他的戒指。在昨天见面时，布托想把戒指给女儿，只是布托夫人要他戴上才没有摘下来。

布托小姐两眼盯着看守，并狠狠地看了一眼他的口袋。看守低下了头，很不情愿地把手伸进口袋掏出戒指交给了她。

她捧着父亲的遗物，站在屋子里一动不动，她不相信父亲已经离开了自己，她也不敢相信，她只觉得浑身麻木，快要站不住了，两个仆人把她扶到

了床上。

她的泪水不断地流淌着，她再也听不到父亲爽朗的笑声，再也看不到父亲的高大身影。如同恶梦一般，她觉得生命在毁灭，一切仿佛不复存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为了拯救父亲的生命，她四处奔走，遭受了当局的种种折磨，但最终还是未能改变父亲的命运。

她感到孤单，她再也得不到父亲的呵护，她失去了政治上的指路人，心中的一座灯塔熄灭了，漫漫的长路怎么走呢？

布托的死有如一石击水，震撼了国内外。

4月4日，人民党总书记蒙塔兹·布托号召全体党员在全国各地举行40天的哀悼仪式。在拉瓦尔品弟，成千上万的人为布托举行祈祷大会，他们高喊着“齐亚下台，布托万岁”，还打出了人民党的旗帜。在卡拉奇，有6000多人涌向街头，焚烧公共汽车和小汽车，100多人被捕。在其它地方也出现了抗议活动。

国际社会迅速作出了反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卡特说：“我们曾经在好多场合表示希望基于人道主义立场保全布托先生的生命，显然，我们对这次处决深表遗憾。”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的发言人说：“使秘书长深感遗憾的是，巴基斯坦总统对他的几次呼吁和世界上许多领导人所发出的同样呼吁一概不予理会。”

英、法、荷、比、挪等国领导人也对此表示遗憾。

印度前总理英·甘地说：“齐亚总理不顾世界舆论绞死布托，显然布托成了巴基斯坦国内外一些既得利益者共谋的牺牲品。”

我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的名义表示：“巴基斯坦前总理布托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为促进中巴友谊做出过贡献。我国领导人曾多次呼吁赦免布托先生。我们对布托先生被处决深表遗憾。”

4月7日，经过再三要求，布托小姐和她母亲才被军管当局批准回老家为布托上坟。她们先被飞机送到加科达巴德，然后改乘汽车，为了防止出现不测事件，汽车没有走现代化公路，而是在凸凹不平的土路上颠簸，汽车的窗帘拉得非常严实，以免被人发现。

布托小姐和她母亲从汽车里走下未，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墓地的人口处走去。布托小姐听到后面有脚步声，转过头发现一名军官也跟随而来。她气愤极了，“你不能进来，你们谁也不能进来，这是我们的墓地，你们不属于这儿的人。”

“我们奉命不能让你们离开我们的视线。”军官回答。

“我不能让你们进来破坏这里的圣洁，我们要单独悼念我的父亲。”

军官还是没有后退之意，布托夫人恼火了，“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不到墓地了，把我带回去吧。”军官这才退回去，母女俩脱了鞋走进了四周有围墙的墓地。

墓地很大，非常安静。这里安葬着布托小姐的祖父沙阿·纳瓦兹·布托爵士和祖母库希德，还有布托家族其他的人。十多年前，当她第一次远离家门到哈佛求学时，她的父亲特地把她带到祖先的墓地，跟她说：“你要出门到美国去了，你会见到许多新奇的事情，到从未听说过名字的地方去，但是你要记住，无论你将来发生什么事，最终是要回到这儿来的，你的地方在这儿，根在这儿，你的骨子里有拉卡纳的火与土，你还将埋葬在这里。”父

亲的话语过去了十多年，但仿佛就在耳边，现在她再也听不到父亲的教诲了。

她流着泪水，走过一个一个墓碑，寻找自己的亲人。在丛生的杂草中发现一堆新土，她停下了脚步，看了看周围，只有这堆新土。她简直不相信这竟是她父亲的坟墓。新土上只有一些花瓣，没有墓碑，她几乎要昏过去了，她没有想到一个民选的总理的坟墓竟是这样，和平民百姓没有两样，甚至不如平民百姓。布托小姐躬下身去，亲吻了一把黄土，口中默默地说：“爸爸，如果我曾经使你不高兴的话，请你原谅我吧。”她现在终于意识到父亲已永远地离开了她，任何人都无法填补父亲在她心中的位置。她在心中诵着《古兰经》的一句话，“你们都将回到他那里。”

她慢慢地站起身来，擦掉脸上的泪水，伫立在墓旁，心中突然升腾起一股巨大的力量和勇气。她发誓要为父亲报仇，要推翻军法统治，要在巴基斯坦的上空飘扬起自由民主的旗帜。她知道前面的路会布满着死亡的陷阱和命运的深渊，但她决心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去接受命运的挑战。

她默默地离开了父亲的墓地。

## 八、挑战军法

1979年5月底，布托离开人世七个星期后，布托小姐和她母亲从西哈拉监狱获释，她们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卡拉奇的家——克里夫顿70号。

大门旁边挂着的“开业律师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的铜字标牌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布托小姐走进这两层楼的小洋房心潮起伏。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熟悉，1953年她出生不久，就和弟弟妹妹在这里学习和生活，这里是她的家。可现在她却感到那么陌生。屋子里显得空荡荡的，墙上的那张全家福照片还挂在原处。她仔细端详着，眼泪禁不住掉了下来，爸爸已经永远地走了，弟弟和妹妹也远走他乡。现在只有母亲在自己的身旁。家里再也没有欢歌和笑语，再也没有亲情和温馨，有的只是痛苦和悲伤。

每天来悼念布托的人络绎不绝，屋里屋外都挤满了。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丈夫去世后，妻子在服丧期间不能外出接待。布托小姐只得代替母亲担负起家里和人民党内的重任。

在卡拉奇住了几天，贝娜齐尔决定去拉卡纳祭奠她的父亲。当局得知她这一计划后就取消了飞往那里的班机，布托小姐只得坐火车，在沿途每一个车站，都挤满了来看望她的激动人群，在没有车站的地方，有的人就躺在铁轨上，迫使火车停下来。“报仇”“报仇”的怒吼声使布托小姐深受鼓舞，她用坚定的口气向她的拥护者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大选中击败哈克”。“人民党的力量并没有同布托一起被埋进了坟墓，你们的怒吼声就是最好的回答。”

布托小姐祭奠了父亲后，一回到卡拉奇，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她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9点每隔10分钟就会见一批人民党领导人和支持者，每隔几小时就要抽出时间到花园里接待前来悼念的人们。晚上，布托小姐全身心地处理政治和组织事务，整理政治迫害案件，还把一些重要的东西记录下来，以备大选使用。

齐亚·哈克在判处布托死刑前，为了稳定民心，曾许诺在1979年11月17日举行大选。他们以为布托死后，人民党内会群龙无首，不会掀起风浪。但出乎他的预料，在9月份的地方选举中，人民党大获全胜。

这一结果令齐亚·哈克非常吃惊，担心人民党卷土重来。于是在大选规则上做了手脚，颁布了比例代表制，以阻止大党占据优势，并且规定各政党在选举委员会登记和呈报帐目。

但任何企图都不能阻止人民党参加大选的决心。

“履行政党登记手续，否则休想参加选举。”当局又对人民党进行刁难和设置障碍。

“我们拒绝登记，我们以独立人士身份竞选。”

布托小姐深知以独立人士身份竞选在一个识字率不到8%的社会里所冒的风险，因为选票上将不会出现人民党的标志。

“独立竞选人必须获得51%的多数票。”当局又提出了要求。

“可以。”人民党答应了。

1979年10月15日，人民党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大选问题，但就是否参加大选，党内出现了分歧。

一些党的领导人在会议上强烈要求人民党主席布托夫人抵制大选。他们中一些人看不起年纪轻轻的贝娜齐尔，私下称她为“黄毛丫头”。但贝娜齐

尔在会上慷慨陈词。“不断改变选举规则已使齐亚失去了信誉，而我们必须言而有信。我们在地方选举中大胜，在大选中也会大胜。”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最后，贝娜齐尔的观点占了上风，人民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参加选举的决定。

可是1979年10月16日，齐亚·哈克发表电视讲话：“目前，少数政党由于各自的原因不参加竞选，我的同事和我研究了这种情况后得出结论是，这些政党害怕选举而又想把推迟选举的责任推给政府。”“为了使国家摆脱因选举而造成的不稳定局面，我宣布已经作出的某些重要的基本的决定：选举已无限期推迟。”

与此同时，齐亚又把军队派到了克里夫顿70号。“小姐，房屋被包围了。”第二天午夜，管家急急忙忙跑来告诉贝娜齐尔。布托小姐的第一反应就是把辛辛苦苦收集起来的所有政治文件——党的文件，党员名单，信件，狱中人员名单等，扔进浴池烧掉了。过了几分钟，一群士兵冲了进来，不由分说，就把布托小姐和她母亲押送到了老家拉卡纳穆尔塔扎，接受6个月的监禁。

这是军事政变后，布托夫人第9次，布托小姐第7次被关押。布托小姐不停地在穆尔塔扎公馆的走廊里踱步，她心里非常愤怒。穆尔塔扎是布托家族的世袭之地，也是祖祖辈辈一直生活的地方，回到这里应该是最自由，最安全的。可现在，穆尔塔扎公馆却成了布托小姐和她母亲的牢笼，屋里的电话也被切断，母女俩只能在公馆内活动，当局只允许萨娜姆来看望她们。墙内墙外都由西北边境省部落人充当的准军事部队士兵把守。

齐亚当局也加紧了对舆论的控制。人民党党报《平等报》被查封，印刷设备被没收。其它的报纸也受到种种限制。任何文章的发排都需要经军方新闻检查人员审查，如果有对人民党同情的文章，就立即抽出。这样报纸上常常出现天窗。至于布托小姐和她母亲的照片更不允许出现。其目的是消除人们对布托家族和人民党的记忆。

在囚禁的第一个月，布托小姐无事可做。直到第二个月，她才找到了一件打发时光的事情——修剪花园。这个花园以前需要10个佣人照管，可现在只有3名花匠。花园里的很多花都是父亲从异域带回来的。其中布托先生最爱的玫瑰花就有好几种。布托小姐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在花园里的玫瑰丛中和果树的绿荫下度过的。

看着这些姹紫嫣红的美丽的花朵在烈日中渐渐枯萎，布托小姐也做起了花工的工作。

每天早晨七点钟，布托小姐便冒着灼热的阳光帮助花匠们把沉沉的帆布水龙带从一个花圃拖到另一个花圃。过去佣人们只需三天就可以浇一遍的园子，现在却需要八天，所以，当他们浇完最后一株玫瑰时，第一株又开始枯萎了。

干了几天，布托小姐的两只胳膊酸疼得抬不起来，两手红肿，手掌上还起了血泡。布托夫人看到女儿这个样子，心痛地问：“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呢？”，“这使我有事情可做，而且全身酸痛，就不会胡思乱想了。”布托小姐答道。

布托小姐还挖了一个新花圃，插上了剪下的玫瑰枝，但都没有成活。而母亲种的美人指，辣椒和薄荷却茁壮成长。傍晚，布托小姐就逗家里驯养的仙鹤，向它们吹一声哨子，它们就会扇动翅膀朝她飞来，衔走一块面包又轻轻地飞走。她从中寻找快乐和满足。

不在园子里干活时，布托小姐就看看她祖父留下来的一些园艺方面的书籍。一台彩色电视机总是休息，除了齐亚的讲话、会见外，几乎没有别的节目可看。唯一了解时局的渠道就是一台收音机，每天晚上8点15分，布托小姐和母亲准时收听BBC的乌尔都语广播。很多重要的消息都是从这里得到的。1979年12月27日，BBC播送了一则重要消息，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当母女俩听到这一消息时，彼此看了对方一眼，她们清楚这事件的分量。苏联的行动直接威胁到了巴基斯坦的安全，也使美苏两国在南亚的争夺更趋激烈，巴基斯坦成为大国争夺的旋风日。外部的威胁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国内人民对齐亚的不满，也缓解了国际社会对齐亚的政治压力，这对人民党来说是不利的。

1980年1月，布托小姐的耳疾又犯了，耳膜内不断出现嗡嗡叫的声音，搅得她无法安宁。她要求当局把1978年在卡拉奇为她做手术的医生请来，可当局没有满足她的需求，给她安排了一个陌生的医生。

“请放松点，你耳朵承受的压力太大。”医生一边检查一边安慰布托小姐。

“哎哟！”布托小姐大声叫道，“你把我弄痛了。”

“那是你乱想，我只是在你耳朵里轻轻动了一下。”

第二天早晨醒来，布托小姐发现枕头上有三滴血，当她把这告诉医生时，医生却说是她的发卡给戳的，还给她开了两种药。布托小姐遵照医嘱吃了药后根本未见好转，还引起了强烈的副作用，瞌睡很多，无精打采，卧床不起，吃饭、刷牙都需要母亲的照料，她母亲赶紧把药给扔了。这到底是军管当局派来的医生故意把她的耳膜弄破了呢？还是医生误诊？布托小姐自问道。

在穆尔塔扎关了5个月后，萨娜姆终于获准来看望母亲和姐姐。自然，后面跟着当局的人。布托夫人由于慢性低血压病犯了，躺在床上。布托小姐要求由女看守陪她们到母亲的卧室。当她们向母亲的卧室走去时，后面传来重重的脚步声，布托小姐转过头一看，跟来的不是女看守，而是陆军上尉伊夫蒂哈尔。按照伊斯兰教的习惯，除了亲属外，任何男人都不准进入女性的住处，这分明是一种侮辱。

布托小姐两眼直视着上尉，提醒他“甚至连监狱都有规定，只有女警官才能进入女犯人的房间”。

“我非进不可。”上尉蛮不讲理他说。

“那我们就不进行这次会面了，我叫妹妹出来。”

萨娜姆已经进了母亲的房间，布托小姐迅速追了进去，想对母亲和妹妹说见面推迟了，可上尉还是跟着。

“你要去哪儿？不能到这里来，”布托小姐很气愤。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是巴基斯坦陆军上尉，我想到哪儿就可到哪儿。”上尉洋洋得意他说。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是把你们在达卡灰溜溜地投降之后接回国的那个人的女儿。”布托小姐以牙还牙。

这句话刺伤了伊夫蒂哈尔的痛处，他气得想动手打人。

布托小姐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你竟敢在紧靠我父亲坟墓的房子里动手打人，你是个元耻的家伙！你和你的部队向印度将军屈膝投降，是我父亲恢复了你们的名誉，救了你们。而你却动手打他的女儿？”

上尉放下了手，脸涨得通红，“等着瞧吧！”了一口唾沫转身走了。

萨娜姆探望母亲的安排也被取消了。

1980年4月中旬，布托夫人和女儿被关押了6个月后获得释放。他们又自由了，但她们心里明白她们随时都会被抓进监狱。

她们乘飞机先到了拉瓦尔品弟，想了解6个月来政治风云的变幻。但一下飞机，布托小姐的耳朵就疼痛不已。朋友们只好把她送到医院。

“你很侥幸，”大夫给她清洗了耳朵后说，“飞机上的气压引起外部感染，如果是内部感染，问题就严重多了。”大夫建议她回卡拉奇后每两周检查一次。

布托小姐回到克里夫顿70号，布托夫人急忙催促女儿写信给当局要求去国外彻底检查，你的健康与政治无关。布托小姐照办了，接连写了几封信但都石沉大海。

炎症稍微好转后，贝娜齐尔又回到老家拉卡纳，母亲要她回来清理一下庄园的财务。布托小姐翻着一本本陈旧的帐簿，眼前仿佛浮现出孩童时的情景：那是8岁

时，爸爸妈妈到国外访问，她在厨房里吃力地同巴布管家一起煞有介事地核对家务帐本。可这一切都已远去。

每天早晨，贝娜齐尔赶在火辣辣的太阳出来之前驾驶着吉普车来往于石榴园，稻田和甘蔗田之间，听管家介绍汲井和水渠的分布情况，安排夏季水稻和棉花的栽种，回来还翻阅甘蔗种植的有关资料。

乡村的生活少了城市的喧闹和雕饰，多了一份宁静和自然。布托小姐感到非常愉快和轻松，她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暂时停止无休止的思想活动。

但乡下的保守传统也让她感到有点别扭。农村妇女十分守旧，外出时很少不穿罩袍，更不用说开车了。布托小姐却别无选择，父亲死了，弟弟们流落他乡，家里没有一位男性。她不得不每天早晨和男人们一样在田地里奔波，也顾不上传统了。

在人们的眼里，布托小姐是布托家的“长者”，村子里的很多事情都请她解决。

“40年前，我的儿子被这个人的堂兄弟杀死了。”一位满口无牙的老者向布托小姐诉说：“当初你的叔祖父作出的裁决是：他家生下的第一个女儿必须嫁给我。他现在有了女儿，可他现在不答应。”

布托小姐转过脸看见一个只有8岁的小女孩吓得躲在她父亲身后。

“我女儿出生的时候，他只字不提。”女孩的父亲争论道，“我以为他已经原谅了我们若干年前对他家犯下的罪过，如果我早知道他要我的女儿，我早就把她当成他家的人来养了。现在我们已经答应同别人家结亲，怎么能自食其言呢？”

布托小姐看着把父亲的衣服抓得紧紧的小女孩，鼻子酸酸的，农村女孩的命运是多么悲惨啊！她们中间很少有人能够自主的生活，也没人过问她们的疾苦。这个小女孩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布托小姐的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怜悯，她要用自己的力量改变这个小女孩的命运。

“你不能得到小姑娘，但可以给你一头牛和两万卢比作为补偿。这就是我的判决，你应该在她许配人之前就提出你的要求。”老者听到判决，非常生气，骂骂咧咧地走了。

然而，布托小姐在处理另一件事情时却带来了一场灾难。

“我的妻子被绑架了。”一个男人向布托小姐哭诉道。他的岳父也祈求

道：“可不得了啦，我们完了。我的外孙们成天吵着要妈妈，你必须帮我们把她找回来。”

“你们怀疑是谁干的？”布托小姐派人到村里与长者谈判，很快，那个被劫持的妇女被送回来了，可妇女却满脸怒气地对布托小姐说：“我不愿同丈夫一起生活，我爱上了别的人，这已经是我第三次逃跑后又被送回来，我想，你也是女人，应该理解和同情我。”

布托小姐感到愕然，没想到自己的做法断送了那个女人的幸福。后来，那个女人再也没有逃走。

当布托小姐在拉卡纳裁决各种纠纷时，齐亚也在每个省设了特别军事法庭，颁布种种严酷的军法令，很多人被逮捕。严厉的军管虽然使政治局势表面显得比较平静，但一股试图推翻齐亚的潜流却在积蓄涌动着。

1980年秋，人民党的老对手“巴基斯坦全国联盟”提出了与人民党联合反对齐亚的建议。

1977年大选揭晓时，巴基斯坦全国联盟指责布托“舞弊”，最后导致齐亚·哈克发动政变，在全国实行了第三次军管。齐亚·哈克刚上台时，“巴盟”一直支持他，一些代表人物还进入了齐亚的政府。布托被处死后，巴国内的政治力量发生了分化。独立运动党，巴基斯坦伊斯兰教神学者协会，巴基斯坦民主党决定退出“巴盟”和政府：留在“巴盟”中的政党也于4月15日宣布退出齐亚·哈克的政府，准备参加1979年11月的全国大选。但齐亚在8月30日修改了“政党法”，企图控制和操纵11月份大选。10月16日，又宣布取消大选。随后，又建立了至高无上的军事法庭。齐亚的一系列做法，彻底击碎了巴盟执掌权力的希望。

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巴基斯坦国内各政党在反对齐亚·哈克政府，结束军法管制，举行全国大选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人民党和巴盟这两个昔日的对手走到了一起。

“我们必须在齐亚摆布我们之前想办法对付他”，9月间，布托夫人获悉齐亚·哈克通过许愿贾托伊担任总理诱使她脱离人民党时对女儿说，“虽然不情愿，但还得对巴基斯坦全国联盟伸出的触角作出积极反应，我们不能把反对党往齐亚那边推。”

布托小姐一时想不通，“这将在政党领导人中间引起混乱，我们怎能忘记，正是这个全巴联盟第一个攻击人民党选举舞弊，是他们为军队政变铺平了道路，他们后来成了齐亚政府的部长。”

“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母亲耐心地跟女儿解释，“今天是贾托伊，明天将是别的人。当理想的条件不具备的时候，你就得面对丑恶的现实。”

布托夫人马上在克里夫顿70号召开了一次有30名委员参加的秘密会议。会上围绕是否与巴盟合作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巴盟是杀人犯，如果我们同他们搞在一起，那么今后又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与齐亚将军直接往来呢？”信德省的一位委员说。

“但是，日本侵略中国时，毛泽东曾经同蒋介石合作，他们能够为民族利益而合作，我认为我们能够同巴基斯坦全国联盟合作”，人民党的评论家谢赫·拉希德反驳道。

两派的交锋你来我往，难分伯仲，争论到了白热化阶段。这时布托小姐从座位上站起来，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同意称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是自我利益的追求者，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么坐失良机，要么吞下全巴联盟



给的苦果从而使我们掌握主动权。我建议我们妥协且在不放弃我党独立性的前提下同他们结成联盟。”

经过7个小时的争论，同意合作的一派终于占了上风。

布托小姐虽然理智上赞成联合，但在感情上接受父亲的敌人为盟友非常痛苦。积怨太深的两党携起手来并非易事，从1980年10月到1981年2月，经过4个月的谈判，人民党和巴盟才定出一个协议草案，组成了“恢复民主运动”，向齐亚·哈克提出了挑战。

1981年2月5日晚，在人民党的大本营——克里夫顿70号，各党领导人和代表终于坐到了一起。戴着红色土耳其帽的巴基斯坦民族党领导人纳斯努拉·汗坐在布托夫人的右手，团结运动党的代表，肥头大耳的克苏里坐在布托小姐的对面。宗教政党伊斯兰贤哲会的几个大胡子领导人坐在房间的一头，工人党党魁法塔赫亚布坐在另一头。总共约20人，大部分是巴盟的成员。

看着这些昔日的对手，这些曾经把父亲送上绞架的人，在屋里吞云吐雾，喝着咖啡，个个怡然自得，布托小姐心里难受极了。但为了推翻齐亚，只得与他们握手言和。

1981年2月6日，“恢复民主运动”正式成立。它由人民党，穆斯林联盟，民族民主党，民族解放阵线，民主党，工人党，独立运动党，伊斯兰神学者协会，自由查谟和克什米尔穆斯林大会共九个政党组成，目标是要求齐亚·哈克下台；取消军管；举行大选。

“恢复民主运动”成立的消息一传出，在全国掀起了巨大的政治波澜，在木尔坦，巴哈瓦浦尔，谢赫浦拉，奎达等地爆发了学生示威活动。在卡拉奇，拉合尔也出现了工人罢工。

“连肉铺也准备响应‘恢复民主运动’的号召起来罢工。”厨师告诉布托小姐。

2月21日，齐亚·哈克迅速作出反应，逮捕了大多数运动的领导人，形势非常紧张。

为了保存力量，布托夫人坚决要求女儿在当前的情况下暂时不要进行任何政治活动，以免两人同时被抓进监狱。

不出所料，布托夫人在参加拉合尔秘密会议时被捕，被赶回卡拉奇。“恢复民主运动”向当局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在三个月内结束军法统治并举行选举。同时在拉合尔发表声明：“我们要求齐亚立即辞职。不然军法政权就将被不可抗拒的人民意志推翻。”“恢复民主运动”还决定3月23日为全国罢工日。

过了几天布托小姐也被捕了，原因是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被劫持了。

“你现在能谈一下对这次事件的看法吗？”路透社驻卡拉奇记者易卜拉欣·汗电话采访布托小姐。

“一切劫持活动都是不好的，无论是劫持一架飞机还是劫持一个国家。”布托小姐不加思索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布托小姐根本不知道是谁劫的飞机，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劫机。当局以此为借口，在全国进行大逮捕，据“大赦国际”估计，在1981年3月遭逮捕的人数就有6000多。

“我母亲在哪儿？”布托小姐质问警察。

“卡拉奇中央监狱。”警察回答。

“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布托小姐继续问道。

“跟你妈妈在一起。”

布托小姐被带到中央监狱，但她母亲根本不在那里。她在中央监狱呆了五天，没有换洗的衣服，没有梳子、牙刷和牙膏，任何生活用具都没有。恶劣的环境，疲惫的身心使布托小姐患了妇科病，但得不到治疗。因为没有药品和医生。

3月12日晚，监狱长慌慌张张地告诉布托小姐：“今天夜两点半把你送走，你先作好准备。”

“把我带到哪里去？”监狱长没有回答。

“我母亲在哪里？”依然没有回答。

顿时，一阵恐惧袭上心头，她曾听说过，监狱当局有时把不易处置的犯人弄到荒野上，趁黑夜干掉，掩埋好尸体后才通知犯人家属，说该犯逃跑时被打死。想到这，她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唯一的希望就看给信德省高等法院写的申诉信是否送到了。她在心中不断地祈祷。

凌晨两点半，一辆满载女警的囚车把布托小姐带走了。后面还跟着坐满士兵和警察的押送车。汽车在空无一人的街上飞驰，布托小姐一直想着他们会把自己带到哪儿去呢？突然，汽车猛然刹住。“把她放在跑道上”，布托小姐听见有人指挥说。她舒了一口气，原来自己被送到了机场。

早晨6点钟，布托小姐被押上了飞机，五个女警紧随左右。

“我们去哪儿？”小姐问空姐。

“你已经被逮捕，不能和任何人讲话。”女警严厉地说道。

空姐递给布托小姐一张报纸，报纸上没有关于“恢复民主运动”的消息，几乎整版都是关于劫持飞机的报道。报纸上说劫持者要求释放在巴基斯坦监狱里的55名政治犯，劫机者自称是一个叫做“佐勒菲卡尔”抵抗组织的成员。其总部设在喀布尔，消息称，该组织的领导人是布托小姐的弟弟米尔·穆尔塔扎。

在苏库尔监狱，每天过着单调重复的生活。这里除了看守外，看不到任何别的人，整个监狱空荡荡的，完全把她和外部隔绝开来了。牢房前的一条臭水沟发出的阵阵臭气令人窒息。3月底4月初，报上的消息越来越搅得布托小姐心神不宁，劫机事件和对米尔的指控仍占据大小报的头版位置。一篇报道称，米尔在接受采访时承认对劫机负有责任，另一篇报道又说他否认与劫机有关。甚至有人捕风捉影说“佐勒菲卡尔组织是人民党的武装组织”。

布托小姐气愤至极，这完全是无中生有，人民党是以政治手段和合法斗争谋求变革。当局舆论宣传只不过是镇压“恢复民主运动”的借口。

“他们正在用刑讯逼供迫使一些人说出与‘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有牵连。”监狱监察长在巡视苏库尔监狱时告诉贝娜齐尔。

“可我是无辜的，他们无法给我罗织罪名。”

监察长同情地摇了摇头，走了。

“把你的东西收拾好，你将被转移到卡拉奇。”4月16日清早，也就是布托小姐被关进苏库尔监狱五周之后，女看守对她说。

“为什么？”

“你的健康状况在恶化，我们送你去卡拉奇，把你送回家。”

听说要回到卡拉奇的家，布托小姐精神一振。在克里夫顿70号，清凉的水将取代监狱的浊水，舒适的睡床将取代监狱绳编小床，四面结实的墙将取

代监狱的铁窗。想到这些怎么能不兴奋呢？可她又受骗了。

女警把布托小姐送到一个从未到过的房子里。

“我们想让医生为你检查身体，然后送你回家。”女警跟她说。

这时，一位陌生但脸色和善的女医生给她检查后，告诉布托小姐，怀疑她得了癌症，需要进一步确诊。然后，警察又把她带到卡拉奇中心监狱，说是去看布托夫人。

“妈妈！妈妈！”布托小姐边喊边冲向监狱招待室，“妈妈，我是萍姬，我来了。”

但屋内没有回音，没有看到妈妈的影子。

第二天，警察把布托小姐送到大医院。在没有家人和亲友的陪伴下给她做完了手术。布托小姐不知道自己几乎被谋杀在手术台上。直到几年以后，布托小姐才从在伦敦过政治流亡生活的前人民党政府部长贾姆·萨奇·阿里那里得知，当布托小姐被送进医院时，他接到一个从巴基斯坦打来的电话。

“想点办法吧。”对方在电话里说，“他们打算在手术台上把她除掉。”阿里立即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说布托小姐的生命受到威胁，抢先把当局的阴谋公布于众。布托小姐这才幸免一死。

劫机事件成为舆论的热点。1981年4月28日，米尔被列为巴基斯坦“缉拿要犯”名单，这时军法管制副执行官突然来监狱中察看。

“为什么要拘押我？”布托小姐质问他。

“因为佐勒菲卡尔组织。”他回答。

“我与这个组织毫无关系。”

“我们在你的房间里找到了‘佐勒菲卡尔’组织的蓝网，上面写有他们的详细计划。”布托小姐不知他在讲什么。

“在劫持飞机事件之前，我连听都没有听说什么‘佐勒菲卡尔组织’。”

“你与‘佐勒菲卡尔’组织的联系，体育场爆炸事件以及拉拉·阿萨德的关系将由法院裁定。”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无辜者受迫害，犯罪者却一手遮天，这是什么世道。”布托小姐在日记中气愤地写道。

两天后，骇人听闻的流言纷至沓来。《战斗报》头版头条刊登消息称：“材料证明，布托妻女知晓该事件的来龙去脉。”

“我们好像在做恶梦”，布托小姐在日记中写道，“首先是‘佐勒菲卡尔’组织和米尔的消息令人震惊，现在当局又决定对我们进行栽赃陷害。看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他们对我父亲采用了这一手，现在又对我故技重演，全世界都知道这是骗局，齐亚无法在政治上战胜我们，但要从肉体上消灭我们。”

## 九、狱中岁月

1981年5月，苏库尔已是烈日炎炎，监狱如同一座火炉，温度高达华氏110至120度。热浪一阵一阵地向牢房袭来，裹挟着沙砾和尘土。汗水，沙上粘满了布托小姐全身，她的皮肤干裂，手上大块大块地脱皮，脸上长满了疖子。蚱蜢，蚊子，蟑螂在屋里横冲直撞，在她身上留下了累累伤痕。为了躲避蚊虫的叮咬，布托小姐只好用被单盖住全身，可又热得透不过气来，更难受的是无法喝到清凉的水。监狱里喝的水都是浅棕色或黄色的，发出的臭味令人作呕。

5月23日，布托夫人从卡拉奇中央监狱写信给女儿说：“我最亲爱的萍姬，为了抵挡酷热，我每天往身上冲凉水好几次，你不妨试试，先低下头，用水杯盛水从后脖子往身上浇，然后从头顶上往下冲水，最后全身浇个透，其作用妙不可言，我极力向你推荐，……爱着你的妈妈。”

布托小姐按照母亲的方法，每天上午都用一整桶水往头上倒，让外面的热风吹干她的衣服，使自己暂时感到轻松舒服。可是，冲凉使水流进她的耳朵里，耳炎又加重了。

为了填补单独关在牢房里而造成的寂寞和孤独，布托小姐把精力转到刺绣上来，并且坚持每天原地跑250米，弯腰40下，不断地伸展手臂，做深呼吸20次，就这样慢慢地消磨时间，另外，每天强迫自己写1小时的日记。她的生活渐渐有了规律。她在6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自从入狱以后，我觉得1小时是那样的漫长，现在已不像以前那样度日如年了。‘调整’不是恰当的字眼，我不能在憎恨的环境中作出调整，调整就是自暴自弃。应该说我已经适应了，每个时刻都不易度过，但我毕竟度过了。身处逆境只有真主能帮助我；没有真主，恐怕我早完蛋了。”

布托小姐的关押期将在6月12日结束。但她不知道是将被释放，还是继续拘留，或者面临死刑判决。“死神终于来了，但我无所畏惧”，她在日记中写道：“当局的野兽们只能消灭人的肉体，但是消灭不了他们的思想，民主的思想将会永世长存，民主必然胜利，我们将得到水生，现在至少我将离开那间孤独，单调，非人居住的牢房了。”

6月11日上午11时，军法副执政官的命令下达了。布托小姐将被继续监禁到9月12日。但布托小姐的待遇提高了，升为“甲级”犯人，可以有权得到一架收音机，一台电视机，一个电冰箱和一个空调机。晚间可以在监狱院子里散步。

但是当局一刻也没有减轻对她的压力，并采取新的手段在精神上打击她。一次监狱长走到布托小姐的牢房说道：“你们党的官员正在背弃你，他们都纷纷离你而去，你为什么还要在这儿浪费你的青春？如果你放弃政治，你的麻烦就会从此了结。”

布托小姐对他的话不屑一顾，斩钉截铁他说道，“哪怕是只剩下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对付残暴的当局，我也在所不辞。我不相信你的谎言。即使别的人都屈膝投降了，我也不会屈服。”

她想获得自由，做梦都想获得，可她不愿背叛自己的信仰去换取廉价的自由。

她为了驱散心中的寂寞与痛苦，在牢房里默默地回忆着以前的美好时光。想到了在英国和朋友们一起在牛津的索本餐馆吃着香喷喷的蘑菇烧排

骨，想到了新英格兰的新鲜苹果酒和布里加姆的美味薄荷冰淇淋，还想到一个个天各一方的同窗挚友。苗条漂亮的室友约兰达·科德雅斯基，听说她在马萨诸塞州从事战略学研究工作。不修边幅的彼得·加尔布雷斯，他在华盛顿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工作……

岁月悠悠，往事历历在目，何日朋友同窗能相会。

在苏库尔被拘留的第四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三，布托小姐被允许去卡拉奇看望母亲。布托夫人咳嗽得相当厉害，医生估计她患了肺病，这使布托小姐对母亲的健康日益担心。“真主不朽！”布托小姐回狱后祈祷着。8月的第四个星期三，她的牢门打开了。

“你可以出去了。”女看守冰冷冷地说。

布托小姐一边收拾东西，一边祈祷，愿真主把我带回到克里夫顿70号。

布托小姐的祈祷没有显灵，军警车队并没有把她送回克里夫顿70号，而是把她押到了卡拉奇中央监狱，关进了关过她母亲的那间牢房。

这间牢房说是甲级牢房，但却没有甲级牢房的待遇。牢房左右两个房间通常是用来做起居室和厨房的，但都上了锁。牢房又小又脏。马桶不能抽水，爬满了蟑螂和苍蝇，屋子里臭气熏天，经常停电，电扇常常不起作用。晚上，外面灯火通明，布托小姐的牢房却一片黑暗。一个人呆在这里真感到害怕。

在卡拉奇中央监狱第二周，她的母亲前来看她。看到母亲还活着，布托小姐松了一口气。但母亲的变化使她大吃一惊，母亲走路摇摇晃晃，脸色苍白，面容憔悴，头发已白了很多，额头上又多了一层皱纹。往日的风采和美丽的容颜已无影无踪了。母亲看到女儿被关在自己曾呆过的牢房里，顿时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布托夫人走到女儿身边，轻声地告诉女儿她在监狱中咳嗽得很厉害。开始以为是灰尘引起的，但后来咳出血来，经过几次检查，狱医和当局对她说可能得了肺结核，而她自己的医生认为情况还要糟糕，她身体虚弱，不能做支气管切开手术来最后确诊，但医生说不排除她患上肺癌的可能性。肺癌！布托小姐听到这两个字感到震惊，她把母亲抱得紧紧的，好像母亲马上就要离开似的。

“也许不会是肺癌，等做完手术再说。”女儿安慰母亲。

“医生认为如果得到及时治疗，我的病是可以治好的，”布托夫人说，“如有可能，可到国外去治疗。”

“你应该尽快去。”

“亲爱的，你可怎么办？我怎能把你一个人留下呢？”

母亲走后，她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什么也不想做，甚至连饭都不想吃。她只觉得心里难受透了。父亲已经离开人世，母亲就要出去治病，自己仿佛被遗弃了。听到母亲告诉她妹妹萨娜姆9月份结婚的喜事时，这种被遗弃的感觉愈发强烈。父亲被囚禁时，告诫她们不要让自己显得还很快活。现在亲人们对她长期监禁似乎无动于衷，他们跟往常一样过日子，还要举行婚礼，好像她根本不存在似的。

报纸上对布托夫人和女儿的攻击比以前少多了，不再提及他们与“佐勒菲卡尔”组织的联系，拘押期也快到了，一位女看守曾悄悄地告诉布托小姐，她听说释放了一些政治犯。这消息使布托小姐感到振奋，但只是昙花一现。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卡特政府怀疑巴基斯坦发展自己的核力量，影响了南亚的局势，因而停止了对巴的援助，并以“人权”、“民

主”对巴施加政治压力。里根上台后，对苏联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政策，在全球各个角落同苏联展开了争夺。自然，苏联入侵阿富汗南下印度洋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利益。这样巴基斯坦就成为美国与苏联争夺的前沿阵地，是美国抵挡苏联南下的一道强有力的屏障。美国对自己安全战略的关心已超过了对民主和人权问题的关心。里根政府提出了向巴基斯坦提供2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计划。这一援助给齐亚政权起了输血打气的作用，加固了齐亚的统治。当然，美国的行为令布托小姐感到失望，使她与齐亚的斗争更艰难了。

9月初，当局允许布托小姐参加她妹妹的婚礼。

当警车在克里夫顿70号停下来时，布托小姐6个月来绷得紧紧的神经略有缓解。她曾以为再也见不到这所房子了，不是被当局没收，就是自己在监狱被悄悄处死，再也回不来了。闪闪发光的写着“沙阿·纳瓦兹·汗·布托先生”和“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开业律师”的两块熟悉的铜牌告诉她又回到了自己的家。她现在就站在家门口。

她走进大门，一股清新喜庆的和风向她吹来。她看到佣人们都聚集在门廊前、敲着手鼓跳着民族舞蹈，手臂随着鼓点的节奏上下摆动，一个个尽情地跳着唱着，好一派浓浓的婚礼气氛呀！

人们发现了布托小姐，纷纷向她跑来，将一串串美丽的花环挂在她脖子上，花环快要盖住她的耳朵了。布托小姐急忙说“留着给客人戴吧。”他们却说：“不，不。这些花都是为你准备的，你回来我们真高兴。”

亲戚朋友从雕花的前门鱼贯而出，迎接布托小姐的归来，空气中荡漾着欢乐的笑声。他们大都是从国外回来的。布托小姐一个一个和他们相互拥抱，尽情地笑呀，哭呀。布托小姐没有想到还能见到他们，他们也没有想到会见到她。

布托小姐舒舒服服地洗了一个热水澡，晚上同新婚的萨娜姆说个没完。白天，又同母亲和亲戚海阔天空地谈笑。是啊，她有很多的话要跟她们说，有许多的感受要向她们倾诉，她觉得和她们呆不够，她心里清楚，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相见。

当婚礼正在进行时，一个佣人跌跌撞撞地进来说：“警察在门口。”屋里的节日气氛骤然凝固，整个房间顿时死一般寂静。布托小姐以为是冲自己来的，可管家说是找布托夫人，客人们都屏住了呼吸。

“让他们进来，我不想让警察在客人面前破门而入。”布托夫人镇静他说。

“你们找我干什么？”警察一进门，布托夫人便问。

警察知道这个时候登门是有背传统习惯的，与这里的气氛也不相称。他们局促不安地递给布托夫人一张军法管制令。那不是逮捕令，仅是禁止布托夫人去旁遮普省。布托小姐和客人们这才松了一口气。其实，当局知道她母亲根本没有去旁遮普的计划，只是故意骚扰，破坏喜庆气氛。

在婚礼中，律师穆吉布告诉贝娜齐尔，他明天早晨去见内政部秘书，要求政府当局允许她在克里夫顿70号度过剩下的时间，因为对她的拘留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布托小姐对此不抱太大的希望。在妹妹的婚礼举行完毕，客人们走后，她便收集了一些报纸杂志及擦手纸和杀虫剂，等到警察来时偷偷地带回监狱去。第二天早上6点，大家都在熟睡时，布托小姐就起床了。她要给哈佛和牛津的老朋友彼得·加尔布雷斯写信，好久没有联系了。她母亲告诉她，彼

得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管南亚事务，不久前到巴基斯坦考察美国安全利益问题。她曾要求到卡拉奇中央监狱看望布托小姐，但他的要求未得到当局的答复。

“你就在这儿吧，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听听穆吉布律师带来的消息。”当布托小姐给母亲送茶时，布托夫人对女儿说。过了一会，穆吉布回来了。他告诉布托小姐，内务秘书拒绝了他的请求，对他说除非她签字保证不违反政治禁令，否则还得去监狱。

上午 10 点，亲朋和佣人们聚集在院子里，目送着布托小姐被带走，大声地祈祷着，“真主保佑”、“真主保佑。”警车在车辆稀少的街道上飞奔，掠过伊朗领事馆，克里夫顿公园，苏联领事馆，利比亚领事馆，意大利领事馆，一直把布托小姐送到监狱。

9 月 13 日，也是布托小姐回狱的第三天，一位看守给她带来了令人沮丧，但又是意料之中的消息。地区军法执政官命令布托小姐在卡拉奇监狱的监禁延长 3 个月。

在监狱里，布托小姐每天做一次祈祷，希望祈祷能帮助她走出监狱。她把希望寄托在 9 月 30 日，但落空了。她又把希望寄托在 10 月初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巴基斯坦的日子。

布托小姐和撒切尔夫人有过两面之交。第一次是撒切尔夫人作为反对党领袖访问巴基斯坦时，布托小姐和她的父亲在拉瓦尔品弟总理府接待过她。第二次是布托小姐在牛津大学担任学生会主席期间曾在英国下院撒切尔夫人的办公室里见到过她。

但是一场意外的事发生了，使形势变得更趋紧张。

1981 年 9 月 25 日，齐亚·哈克的一名部长乔德里·扎胡·伊拉希的车子遭到伏击，当场被人打死。他曾接受齐亚用来签署布托死刑令的钢笔作为礼物。同车的前拉合尔首席法官毛尔维·穆斯塔克·侯赛因受了伤，他曾宣判布托的死刑。

当布托小姐从报上获知这一消息时，她认为这是真主的报应。这回他的妻子、女儿也尝到了悲痛的滋味。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并不感到高兴，一个穆斯林不会因为别人死去而感到高兴。生死在天，但是看到坏人并非总是免受惩罚还是令我欣慰的。”

暗杀发生的第二天，布托小姐的弟弟米尔在接受 BBC 记者采访时声称，事件是“佐勒菲卡尔组织”干的。于是，在巴基斯坦报纸上充斥着恐怖主义分子、谋杀犯、政治谋杀犯等醒目的标题。当局再次大规模逮捕政治犯。人民党的一个又一个主要领导人被捕。据报道，仅哈里浦尔监狱就关押了 103 名年轻人，附近的另一个监狱关了 200 人。

在这股新的镇压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时，撒切尔夫人访问了巴基斯坦。她在参观了设在巴基斯坦边界的阿富汗难民营后，给齐亚·哈克颁发了证书，称赞他是“自由世界的最后堡垒。”

布托小姐在报上看到这一消息时，感到震惊和愤怒。与此同时，美国里根政府的决策人士也把战略安全利益放在首位，加大了对巴的援助。不过，布托小姐的朋友彼得·加尔布雷斯在考察了巴基斯坦回到华盛顿后，就积极活动，呼吁当局注意巴基斯坦的人权问题。参议院每次开会涉及到巴基斯坦的问题时，他和佩尔都将人权问题和布托小姐被拘禁的案件提出来。他们希望这种压力能够使齐亚·哈克最终释放布托小姐。

“看来齐亚总统正在对被处死，或者说被谋杀的前总理布托的遗孀和女儿掀起仇恨运动，我不知道当局是否已就布托家人被监禁和虐待的问题同巴基斯坦政府进行交涉。”佩尔参议员质问助理国务卿。他还劝说同事们附加一条援助修正案：“在批准对巴基斯坦援助之时，国会希望巴基斯坦迅速恢复充分的公民自由权和建立代议制政府。”这种压力确实产生了作用。12月25日，副监狱长突然来到布托小姐的牢房，对她说：“收拾一下东西，明天早晨5点45分，警方将送你到拉卡纳。”

翌日天刚亮，警察就来了。她看了一眼阴暗潮湿、令人可怕的牢房。不知道怎么回事，居然对这里产生了感情，心里还感到难过。几年的监禁生活使她惧怕陌生的环境，她的心理似乎有点变形。

1981年12月27日，布托小姐又一次回到老家拉卡纳的穆尔塔扎。尽管院墙内驻有军事部队，但毕竟回到了熟悉、舒适的老家。军管当局规定：每天可以允许几个佣人到公馆里干活，也可使用电话机，每两个星期可以会见三位客人。这对于单独关押了10个月的布托小姐来说，好像住进了五星级宾馆。可实际上，电话机经常出毛病，和人交谈不准涉及政治。能够看她的只有布托夫人，萨拉姆和姑姑穆娜三人。

每过三个月，当局便照例宣读一次对布托小姐延长拘留的命令。布托小姐对那句话不知听了多少遍，“鉴于副军法执政官的意见，为防止布托小姐从事军法当局认为的有害于巴基斯坦安全、公众秩序和利益或妨害军法当局有效地执行公务，因此宣布对布托小姐继续实行拘留……”她在这里度过了一年多的软禁生活。

母亲的身体令她越来越担心。自从布托夫人在卡拉奇中央监狱看望女儿时说她的医生怀疑她的左肺患了癌症，已经过去四个多月了。由于国内医疗条件有限，布托夫人要求当局允许她出国治疗，但当局不予理睬。据说，当时内政部对这一要求无能为力，因为齐亚·哈克把布托夫人的档案材料带出国了，当时他正在中国访问。

一个月过去了，当局仍不允许布托夫人到国外去，又一个月过去，还是没有回音。布托夫人的医生只好对她进行化疗。在布托夫人把消息告诉女儿时，布托小姐心里非常难过。怎么能不难过呢？作为女儿，不能在母亲重病需要照顾的时候守候在身旁。

布托夫人的病也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萨米亚在电话

中告诉布托小姐，“巴基斯坦人民没有忘记你母亲，全国有很多人打电话来询问她的病情，在外交场合，公共汽车站和电影院也有人谈论你母亲的健康状况。”

在国际上，布托夫人的病情也引起了强烈的关注。

在英国，布托小姐的一些老同学和老朋友发起了一个“拯救布托夫人”的运动。他们游说议会对巴基斯坦

当局施加压力。下院议员朱安·莱斯特和乔纳森·艾特肯立即响应，在下院提出了一个“为布托夫人提供医疗便利”的动议案。

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也向巴当局发出呼吁，11月8

日，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约翰·格兰参议员致函巴驻美大使阿齐姆：“亲爱的大使先生，两个月前，已故总理布托的遗孀努斯拉特·布托夫人请求到国外治疗肺癌……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我愿意请求巴基斯坦政府尽快同意布托夫人的要求，让她出国治疗。巴基斯坦政府的行为被看作是对



病人的同情，并有助于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

面对国内外的压力，11月11日，出访东南亚的齐亚·哈克在吉隆坡说：“布托夫人没什么病。如果她想去国外度假观光，她可以申请出国，我会考虑的。”他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由自己的亲信负责的联邦医疗委员会，由它决定布托夫人的去留。没有想到联邦医疗委员会的成员竟会忤逆齐亚的意旨，在一张声明上签名，允许布托夫人出国治疗。

当布托小姐获悉这一消息时，心中无比高兴，立即向当局提出了看望母亲的申请。在空中直升飞机的监视和地面一队人马的“陪同”下回到克里夫顿70号。看到苍白和虚弱的母亲躺在床上，女儿的心又一次碎了。作为女儿，布托小姐当然希望母亲能尽快出国治疗，病魔已把她折磨得不成样子。可是，想到母亲出国后只剩下自己孤孤单单一人时，心里又觉得孤独和害怕。

11月20日夜里，布托小姐交给母亲几条项链，其中两条上各挂有一个鸡心小盒，里面装有她父亲坟墓上的泥土，专门送给国外的两个弟弟，有的则雕刻着《古兰经》的经文，送给侄女的，保佑他们平安快乐。然后母女两人抱头大哭，这样一走，谁知道今后会是什么命运呢？“你自己要多加保重。”布托夫人对女儿说。她们一起走出克里夫顿70号的大门。13年前，布托小姐就是从这里到哈佛求学，母亲把《古兰经》举在她头顶上为她送行。今天，自己却站在大门前，为母亲送行。看着母亲远去的背影，消失在茫茫的人群中，布托小姐的眼睛模糊了。

离开巴基斯坦时，布托夫人发表了饱蘸感情的告别声明，她说：“我现在是迫于医疗上的需要，怀着沉重的心情暂时向我的国家和人民告别。但是，我的思想将永远同你们在一起，你们是受压迫，受剥削，受饥饿，受歧视和正在争取生存的劳苦大众。我将同大家一起为建立一个繁荣进步的巴基斯坦而共同奋斗……”同时她对人民党的领导班作了安排，组成了由贝娜齐尔·布托小姐为首的十二人委员会来领导人民党的日常工作。布托小姐出任人民党代理主席。

布托夫人在西德得到了精心治疗，她的癌症基本上被控制了。而布托小姐继续被拘留在克里夫顿70号。院内有11名看守，院外岗哨密布，每隔两英尺就有一名哨兵。特工人员密切注视着前店门内外的动静。布托小姐在这样的环境中熬过了14个月的软禁生活。

在这里，布托小姐看了一本雅各博·蒂默曼写的《没有名字的囚犯，没有号码的牢房》的自传。书中记叙了这位报刊出版人在阿根廷被作为政治犯关押了两年半的经历，激起了布托小姐的强烈共鸣。她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们心灵的共鸣，当他提到电椅的酷刑时，那些字便跃然出现在我眼前。蒂默曼写道，身体似乎被撕裂，然而，奇怪的是身上没有疤痕。政治犯在被用刑之后被抛在一边，稍有恢复，便又对他施以酷刑。他写的是发生在阿根廷的故事。在巴基斯坦军法当局又是怎样在监狱里审讯犯人的呢？”

布托小姐并未经历过残酷的刑法，但她听到的许多刑罚令她不寒而栗。据说军事当局给犯人戴重镣铐，压大冰块，灌辣椒水，甚至连妇女也不放过。人民党总书记的妻子绍卡特受到电刑折磨，被连续审讯达23天，甚至不准她睡觉。

1982年12月，齐亚·哈克到美国访问，里根总统大肆赞扬。但在与美国参议员外交委员会的会谈中，齐亚·哈克受到一连串的批评。据那些当时在场的人回忆说，“这位将军的表情是冷淡和自信的，直到佩尔参议员向他

递交了一封言件，表示委员会对一批巴基斯坦政治犯的命运深为关切为止。”《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在委员会所列的政治犯的名单上，第一个便是贝娜齐尔·布托。”

佩尔参议员继续就布托小姐一案对齐亚施加压力时，齐亚恼火了，他怒气冲冲他说：“我可以告诉你，参议员先生，她住的房子比你们任何一位参议员的房子都好。她可以见亲戚朋友，甚至可以随便打电话。”

听了齐亚的这番话，彼得·加尔布雷斯拿起电话拨通了克里夫顿 70 号，但回答他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彼得要同布托小姐讲话。

“你不能跟她通话，她被关在监狱里。”那个男人说。

“我是美国参议院，你们的总统刚刚在这儿，他告诉我们布托小姐可以使用电话。”

“你不能同她通话，这是禁止的。”砰地一声电话挂断了。

彼得和佩尔相互看了一眼，知道自己被齐亚骗了。

布托小姐一个人在拘留中迎来了 1983 年。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晚上睡觉，开始磨牙，早晨醒来后发现关节疼痛，有时候难以伸开。老毛病耳疾又犯了。当局对她的检查也是敷衍了事。

1983 年 3 月，布托小姐接到法院的一份通知书要她为共产主义分子贾姆·萨奇出庭作证。布托小姐从未见到过萨奇，只是听说过他曾反对过父亲，其他的事她一无所知。她不清楚当局是何意图，但她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法庭能够给她提供两年来第一次公开发表政治观点的讲话。

3 月 28 日，警察封锁了克里夫顿至克什米尔大街的主要路口，有些地方架设了铁丝网，大街上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站满了警察。街道上行人稀少。布托小姐被带到了军事法庭。偌大的法庭空荡荡的，萨奇的几位亲戚和至交静静地坐在大厅里，几位律师也坐在那儿。布托小姐突然眼睛一亮，发现萨米亚，法克里，撒尔玛也来到了法庭。她暗暗感到高兴，终于有了机会阐明自己的观点。

原定布托小姐作证一天，但布托小姐对贾姆·萨奇提出的问题回答得很长，因而作证用了两天时间。

“伊斯兰教包括任何军法问题吗？”贾姆·萨奇问道。

布托小姐口若悬河，猛烈地抨击军法管制。她说“在搞清楚伊斯兰教里是否包括军法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军法的概念和伊斯兰教的概念。伊斯兰教是服从安拉的意志，而军法是服从军法指挥官的意志。一个穆斯林只能屈从于安拉的意志。”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军法这个词是俾斯麦和普鲁士帝国时期沿用下来的。为统一被征服的领土，俾斯麦按照自己的意志制订出了一套法律，代替原来的法律，并用枪杆子强迫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军法是指占领军颁布的法令，也就是占领军司令的意志代替原有的法律。”

“在殖民主义时代，土著民族被视为二等公民，被剥夺了选择政府的权利，被剥夺了根据自己的愿望和经济利益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人民的觉醒，一些殖民国家不得不撤退了。这样，一大批新国家诞生了。新独立的国家的人民暂时享受了一段时间的自由和独立生活。这时期，涌现了一批民族主义领导人，如纳赛尔、恩克鲁玛、尼赫鲁和苏加诺，他们曾致力于争取人民的社会平等和正义。但是一些老殖民主义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又通过各种形式改头换面地回来了。他们支持一些军人、

宗教头头执政。这些军人和宗教头头窃取了自己国家人民的胜利果实。加上苏联和美国之间相互竞争，使国际形势进一步复杂化了。”

“现在，许多新独立的国家或多或少是由军人执政的。不过，一个基于武力而不是以一致意见组成的政府同伊斯兰教的主要原则是不一致的。因为伊斯兰教强调一致性。其次，军人政权总是通过枪杆子或通过使用武力来实行统治，而伊斯兰教是不存在篡权的概念的，所以我们认为伊斯兰教里不存在军法的问题。”

布托小姐的证言是抨击当局的檄文。尽管法庭不允许新闻界人士列席，她的犀利言词还是被影印传发到报界，律师协会，甚至政治犯的牢房。英国《卫报》的一名记者撰文高度赞扬布托小姐：“她看上去很镇定自若，身体不错。她的雄辩和才智丝毫不比以前逊色。”

布托小姐的身体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好，齐亚的政策使人民党的处境更加艰难。一些人民党的党员在齐亚的拉拢和高压下背叛了组织。这使她忧心忡忡，更加重了她的病情。

4月的一天晚上，她正在克里夫顿70号走廊里散步，突然觉得天旋地转，她赶紧抓住沙发扶手，眼前一片黑暗、接着昏倒在沙发上。

“快，快，赶紧给小姐请医生！”家仆急忙跑去对看守说。

不到一小时医生就来了，检查完耳朵后，医生对她说：“你的情况很危险，需要请一个耳科专家。”

耳科医生来了，“你的耳膜已经穿孔”这位三年前为布托小姐动过手术的耳科专家告诉她。“穿孔引起了中耳炎。你必须到国外去动一次显微手术，我们国内没有这种技术，如果一定要做的话，我将不得不锯开你的颅骨，这是十分危险的，为了你的安全，你必须尽快出国治疗。”布托小姐对医生的话将信将疑。他是不是有意把这种手术说得过于危险，暗示自己出国，离开国内的政治舞台。但医生的坦诚马上打消了她的疑虑。“我能在这里给你做手术，但我担心他们会给我施加压力，要我在你麻醉后做手脚，即便是我拒绝，他们也会找别人来干这种事的。无论如何，你去国外治疗要好得多。”布托小姐深深地感激他为自己的健康和安全的努力。

布托小姐遵照医生的意见，向当局申请出国治病，但没有回音。她的病情更加严重，左面颊逐渐失去知觉，头脑昏昏沉沉，耳内的杂音使她几乎听不到外面的声音。医生每星期来克里夫顿70号一次，为她消炎止痛。后来医生也遭到当局的刁难。

“你经常开车到卡拉奇去，是吗？”一天，一位警长问医生，“你看过电影《死欲》吗？”第二天，医生就收到一盘匿名录像带，接着就不断接到匿名恐吓电话。但这位医生仍一如既往，这使布托小姐十分感激。

1983年6月21日是布托小姐30岁的生日，亲戚朋友获准来为她祝贺生日。

“感谢真主，这块生日蛋糕是完整的！他们检查得很仔细，我们担心他们会在你切蛋糕之前切开检查。”萨米亚、萨娜姆和帕丽一边向布托小姐祝贺生日一边说。“布托小姐心情非常高兴，她切开蛋糕一边吃一边聊，让大家一起分享她的生日快乐。”

英国的朋友们也没有忘记她。布托小姐后来得知，6月21日牛津辩论社宣布为在监狱中过生日的布托小姐默哀一分钟，这一殊荣一般只有前学生会主席或者一个人死后才能享受。

当局也对她表示了“关切”之情。上午，一位看守要布托小姐去见军法执政官，但遭到拒绝。晚上，信德省军法管制执政官阿巴希将军突然来到克里夫顿 70 号，这出乎布托小姐的意料。以前人们习惯于被傲慢的军人统治者传唤和指挥，却没有听说过他们去拜会一个反对党领导人。今天这位满头银发、穿着卡其布军装的将军屈尊到此居心何在意欲何为呢？

“我知道你病了”，阿巴希将军说，“我是名军人，但并不意味着我对你不关心。别忘了，我们两家相识已经有好几代了。你要能去国外治病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但考虑到政治上的原因，我不能作出决定，我付不起这个代价。”

布托小姐当时并不知道齐亚·哈克政府正面临着西方、尤其是美国在人权上的压力。她把阿巴希将军的来访看作是将军想观察一下她的精神面貌。试探一下，如果她获准出国，将会干些什么事。因而布托小姐装着急于去国外治疗，然后立即回国。由于一直被关在克里夫顿 70 号，布托小姐对外面的形势不清。

随着 8 月 14 日巴基斯坦独立日的临近，“恢复民主运动”发动了第二次群众运动。布托小姐在克里夫顿 70 号密切注视着运动进展情况，每天阅读报纸，收听 BBC 的新闻广播，冒着巨大的风险同人民党领导人在中东医院附近的秘密联络点保持联系。

与以往不同，当局这次在运动刚开始时没有马上干涉。布托小姐秘密写信给人民党的干部，告诉他们如何同外交使团和新闻界取得联系，应该把什么样的信息告诉他们。要他们控制运动势头，不要让当局抓到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借口。她深知信件落入当局之手，出国治病就没有希望，而且有可能再次被投进监狱。为了消除看守们的怀疑，她假装十分虚弱，有意识地将眼睛盯看地毯，使他们相信她真的病得不轻，她不会考虑其它的事情。

告诉贝娜齐尔，用我的名义发表一项声明，布托夫人请人转告女儿。布托小姐打下了她母亲的声明：“我英勇爱国的同胞们，光荣的兄弟姐妹们，勇敢的儿女们……我们运动的目标是国民不服从当局。六年来，我们遭受迫害和压迫，我们要求恢复民主的呼声却没人理睬。我们党的工作者被投入监狱，被判处死刑，我们的苦楚是诉不完的。现在，我们向全体公共汽车司机，火车司机和铁路工人们呼吁：把你们的车子停下来，举行总罢工。我们也呼吁警察们，你们应该向达杜的警察兄弟们看齐，不要向无辜的人民群众开枪，因为他们是你们的兄弟！不要害怕目前这场运动，它是为我们的人民、为我们的穷人、为我们的孩子们过上好日子而进行的斗争，是为了使大家不再生活在穷困和疾病之中。我们必须进行斗争，争取有我们自己的议会，自己的宪法，自己的政府，这样，我们就能当家作主，我们的命运也就不会再握在军人政变集团和他们的代理人手中……。”

反抗运动如火如荼，形成了一股反对齐亚的浪潮，成百上千的人在运动中失去了生命，齐亚本人也差点被谋杀。10 月的第二周，军队开始实行镇压。据估计，800 多人被杀，不少妇女还遭到军队的侮辱。

布托小姐的病情每况愈下，头脑里嗡嗡作响，眼前时常黑一阵亮一阵，全身乏力，听力下降了 40 分贝。

“如果病人们在监狱中接受治疗，我不能对她的健康负责。”医生 8 月通知国务部秘书说。鉴于此，当局批准了布托小姐住院治疗，但布托小姐更愿意到国外接受治疗，她似乎对当局的每一种做法都抱着怀疑的态度。

12月底，当局终于将布托小姐和萨娜姆的护照，签证表格和外汇表格拿了去，并对她们说“预订机票吧”！

1986年1月9日晚11时30分。当局派人来到克里夫顿70号，通知她们：“你们今晚离开，还有一点时间收拾行李。”

尽管布托小姐对出国治疗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心里仍然非常矛盾，她想数千名政治犯被关在全国各地的监狱中，他们的处境难以言状，其中许多人正面临被判死刑的危险，当我也被监禁的时候，这对广大难友来说是一种鼓舞和安慰，我在同他们同甘共苦，一起向当局进行斗争，他们为我坐牢，我也是为了他们而被监禁，如果我离开他们出国治疗，那他们会不会感到孤独，产生被抛弃的感觉呢？

没有时间多想了，她匆匆忙忙地打下一份告人民书：“勇敢的党的工作者和亲爱的同胞们，由于健康原因，我不得不离开你们，我请求你们为我祈祷，为我祝福，我向你们请假……”

凌晨2点半，布托小姐和萨娜姆登上了一架瑞士航空公司的班机，在夜色中离开了克里夫顿70号，离开了巴基斯坦，但她没有放弃同齐亚斗争的目标。离开是暂时的，是为了将来回来时与齐亚一决高下。

七年梦魇般的生活暂时划上了一个句号，布托小姐在异国的土地可以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了。

## 十、流亡海外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飞行，瑞士航空公司的客机平稳地降落在日内瓦机场。布托小姐走出机场，看见母亲正等在出口向她挥手，布托小姐一边喊一边向母亲跑去，母女俩相互拥抱，“萍姬！你自由了，我是多么盼望这一天的到来啊！”激动的泪水顺着布托夫人的脸颊掉了下来。布托小姐几乎不相信自己自由了。昨天，不，就是今天凌晨2点半钟以前，她还是一个囚犯，而现在，她却自由了。

“对，对，她已经到了。”布托夫人在电话里对米尔和沙阿说，“你们听到的BBC关于她获释的报道是正确的。”

布托小姐接过话筒，贴在她的耳朵上，对着话筒喊道，“你们好吗？”

“谢天谢地，你还活着。”米尔喊道：“明天我去看你。”小弟沙阿接着说：“等我一个礼拜，我也去看你。”布托小姐遗憾地跟他说：“沙阿，我不能呆在这儿，我得到伦敦去看病。”不过，姐弟俩约好尽早见面。

布托夫人的亲朋好友从洛杉矶、伦敦和巴黎不断地打来电话，纷纷向布托小姐祝贺。晚上母女三人围坐在一起，自由自在地彻夜畅谈。

第二天早晨，大弟弟米尔突然出现在母亲的寓所里。这是姐弟俩1977年分别以来的第一次团聚，欢笑声把耳朵都震聋了，米尔抱起一岁半的金发女儿，递给姐姐，“认识你的侄女！”她在侄女的脸上亲吻了几下，弟弟站在旁边，黑黑的眼睛一闪一闪，显得十分温和。

布托小姐获释的消息迅速在欧洲各地的巴基斯坦流亡者们中传播，居住在伦敦的30万巴基斯坦人无人不晓。当布托小姐和妹妹一行飞抵伦敦时，希思罗机场盛况空前。布托小姐的朋友雅丝明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简直想象不到机场上有多少人，还有那么多的英国记者，全都你推我搡，争着一睹贝娜齐尔的风采。就好像她刚刚复活似的。没有人会想到这辈子还能再见到她。当一位警官和他的同事在拼命地维持秩序时，他问我：“她是谁？是电影明星还是什么人物？”我告诉她：“她是我们的政治领袖。”这位警察颇感惊奇地说：“她是一位政治家？”

当她最后穿过机场大门时，有记者问她：“你是不是打算过流亡生活？”她的回答对当时聚集在机场上的巴基斯坦人来说真是莫大的鼓舞，也是莫大的宽慰。“流亡？我为什么要流亡？”她答道：“我这次到伦敦只是为了看病。我生在巴基斯坦，我也要死在巴基斯坦。那里有我祖先的遗骨，我的父亲也安葬在那儿，我绝不离开我的祖国！”“我不会抛弃你们，我将和你们并肩战斗至最后一息。布托一家人不违背诺言。”

布托小姐向她的崇拜者们不断挥手致意，然后乘车直驱位于伦敦奈次希里奇区的贝佳特姨妈的寓所。她和妹妹暂时住在这里。这里比较幽静，但不清静，新闻记者、牛津大学的朋友，人民党的领导干部都要求见她，不断打电话要求见她。

虽然布托小姐获得了自由，但心理上似乎还未调整过来。多年的铁窗生活，使她对伦敦马路上拥挤的人群也感到害怕，对那儿的人、说话声和噪音都非常敏感，每次出门都担心是否有人跟随。

几天以后，姨妈告诉布托小姐，彼得·加尔布雷斯想和她见面，他刚从卡拉奇来。布托小姐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彼得是她哈佛、牛津的老同学，俩人七年未见面了。按照约定的地点布托小姐乘坐出租车来到了彼得下榻的里兹旅馆。

彼得发现布托小姐像在大学时一样、依然那样迷人，并多了几分成熟和自信。布托小姐觉得彼得仍然那么随和幽默，但多了几分修饰。两人一边进餐一边交谈。出于朋友的担心，彼得极力主张布托小姐放弃危险的政治生活，“在巴基斯坦，你有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为什么不到美国去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或许你还能在哈佛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搞研究工作呢！”

“我很想能有机会读读有关布托执政时期和实行军法管制时期的书，这样就能了解别人的观点。”布托小姐说，“但我的首要义务是要为党工作。这里巴基斯坦侨民较多，不太分散，从政治上来说，我呆在这里更有意义。”彼得打量了一下这位不同一般的女同学，眼睛里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1月底布托小姐做了显微手术。手术效果很好，但医生告诉她，在几个月至一年的时间内，她可能要做第二次手术。但她不愿多呆，她要早日返回祖国。

“暂时不要从政了，休息一下，和我一起住一段时间。下次你回去，齐亚将会再次把你投入监狱，或许你再也不能活着出来了。”母亲劝说女儿。

在亲友和医生的劝说下，布托小姐勉强答应下来。但她没有休息，她决定好好利用这几个月的时间，在国际上揭露齐亚·哈克政府的暴行，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在身体稍为好转后，布托小姐根据自己狱中笔记和从巴基斯坦捎来的情况，开始整理一份反映政府迫害案件的材料。她要把这些材料交给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她的努力引起了反应。在三月份《民族》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了全世界违犯人权的状况，其中报道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拉合尔的拉扎·卡齐姆最近失踪，是一个令人恐慌的案件，每年给巴基斯坦5.25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的美国对这个案件麻木不仁……显然，国务卿已经忘了美国关于管理对外援助分配法律的精神。”这项法律有一部分写道：“……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一旦侵犯国际上公认的人权，包括严刑拷问，不经审讯而长期监禁，或者公开剥夺人们的生存、自由和安全的权利，都不能向其政府提供援助。”

1984年3月，布托小姐应邀到华盛顿的国际和平捐赠会发表讲话。这是一次斗争的好机会，她带着政治犯的材料飞往美国。

她又一次走在国会大厦长长的走廊里。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曾和同学们为抗议美国侵略越南来到这里，如今，她又来到这里抗议齐亚的军法统治。在读书时，因害怕作为从事政治活动的外国人而被驱逐出境，未能大胆讲话，现在，则可以大声讲了。

在美国的两个多星期里，布托小姐频繁和美国政界要人接触，向记者呼吁他们注意巴基斯坦的人权问题。

当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珀西问布托小姐是否支持因核问题修正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时，布托小姐一时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是美巴关系的敏感点。1981年参议院通过援助巴基斯坦的基础并不在于巴基斯坦是否应拥有核弹，而在于是否进行核试验。1984年，参议员约翰·格伦和艾·克兰斯顿联合提出了一次修正案堵住了这个漏洞。这项修正案说，除非美国总

统写出书面证明，证实巴基斯坦既没有“核炸弹装置”，也没有用原料来制造或发射这种装置，否则将取消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布托小姐并不想就核问题进行辩论，但犹豫了一会后，还是谈了自己的看法。“参议员，取消援助只会使我们两国之间造成误解，如果援助能用来在巴基斯坦恢复民主和人权，那么，这对我们两国都有好处。”

《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位记者的专访：“……她操着模糊不清的英国口音，语序井然，但说得太快。而且一说就是好几句，好像要弥补那失去的时光，说话时，她的双手不时上下挥动，常拢拢额头和头发。”

在捐赠会演讲的那天晚上，布托小姐心里特别紧张。“要镇静，权当在牛津学生会演讲吧！”她走向讲台时，不断地告诫自己，但她的心仍在怦怦直跳。她的听众大多是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国会议员，前驻外大使和新闻记者，西方舆论一直把齐亚·哈克称为“仁慈的独裁者”，称他给巴基斯坦带来了“稳定”。现在，她却要揭露齐亚违反人权的行径。她很清楚，她在这里讲的每一句话的分量，关系到成千上万名政治犯的生命和国家的政治前途。

布托小姐扫了一眼台下的听众，大声说道：“我们对齐亚·哈克的非法政府所得到的援助感到迷惑不解和失望，我们确实欣赏你们从战略上所作的考虑，但请你们不要忽视巴基斯坦的人民。”

演讲进行到一半时，布托小姐抬头看看台下的听众，个个神情专注，大厅里鸦雀无声，当她把目光收回时，她突然忘了自己不知讲到了哪儿，好在她相当冷静，马上找到了停顿的地方，继续讲了下去。布托小姐讲完后要求政府官员谈谈美国的援助和人权之间的关系，随后，又回答听众提出的各种问题。布托小姐的演讲和答问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她对自己的成功感到高兴。

布托小姐还应邀到纽约的《时代》和《生活》大楼，拜会《时代》杂志社的高级编辑们，布托小姐对他们说：“巴基斯坦很多人把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看作是对齐亚的援助。你们可以把新闻界的注意力集中在人权问题上。这样，你们大家便有助于消除误解。对巴基斯坦的政治犯来说，宣传事情真相，关系到他们的生命安全。”

布托小姐的美国之行达到了目的，为布托小姐在公众中赢得了声誉。

回到伦敦后，布托小姐在圣保罗教堂附近的巴比坎公寓租了一套房子。这儿比较安全，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巴比坎很快成为巴基斯坦人民党指挥在英巴侨民和海外组织的中心。很快房间里便堆满了有关巴基斯坦

人民党在许多国家所设支部的文件。一批志愿者也迅速聚集在布托小姐的周围，组成了一个高效的工作班子。

他们将政治犯的照片、案件材料和大量信件寄给联合国秘书长，美国人权事务助理国务卿、各国外长、国际律师组织和国际贸易组织，拜会美国国会议员，大赦国际组织的人员，呼吁他们注意巴基斯坦的人权，向齐亚施加压力，拯救在国内的成千上万的政治犯的生命，但他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对齐亚产生影响。三名年轻人因被指控谋杀一名警察而于8月被绞死，布托小姐痛心疾首地大声呼吁：“如果北美和欧洲的政界和新闻界人士对他们的命运和成千上万在押犯人的命运表示关切的话，这三位青年人本来是有可能免于一死的，西方各国应施加



影响出来说话，以拯救那些即将被押上断头台的政治犯……请响应这真诚的呼吁，并采取迅速而有效的行动。”

国内的政治形势驱使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不断地向外发寄信函，揭露齐亚·哈克的所作所为，希望以此唤醒世人的良知以拯救犯人的生命。布托小姐还克服重重困难，建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组，收集犯人的情况，以便及时通报给国际人权组织和政界要人。

布托小姐每天早晨7点起床，匆匆吃完早饭后便投入紧张的工作。他们创办了自己的乌尔都语杂志《阿迈勒》、英文是行动的意思。每月都要送几份给国际组织，外国使馆和流亡组织。以便让他们及时了解巴基斯坦的政治动向。他们偷偷地把杂志运进巴基斯坦，由进步分

子打印其中的一些文章，再分发给人民党的支持者。让他们知道：人们并没有忘记政治犯，布托小姐在国外依然在战斗。

1984年11月5日，卡拉奇军事法庭宣判纳赛尔·巴卢奇和其他几人绞刑。布托小姐的班子紧急行动起来，他们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个又一个呼吁，并在《阿迈勒》上公布得到的秘密文件。这份文件上有齐亚10月26日在一次军法管制首席法官的信笺上批准上述几人死刑时的亲笔签字。而法庭的判决是在此之后几天才公布的，很显然，判决全是齐亚的旨意。

在艾夫伯里勋爵的帮助下，布托小姐在英国议会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披露了事实的真相，在英国激起了义愤。诺丁汉工会组织劳伦斯—帕拉特在给《工会与政府纪事》的读者来信中写道：“当我们在这个国家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工会权利受到威胁时，同样，我们也必须注意其他国家的兄弟姐妹们所进行的斗争。可能还有时间去挽救正等着死刑的劳工领袖纳赛尔·巴卢奇及其三个同案被告，必须向巴基斯坦政府及其驻英使馆提出抗议。”一批英国著名律师联合发表声明：“这四个人是按巴基斯坦军事管制法成立起来的，特别军事法庭审理和宣判的。这些法庭是由未受过法律训练的军官操纵的，而且审判是秘密进行的。他们自己最有权证明自己是清白的。我们要求巴基斯坦停止此类审判。”

在国内外压力下，齐亚决定在1985年3月举行大选。在大选前，于12月20日举行全国公民投票。选票上写着“你是否赞成由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齐亚·哈克将军所倡导的旨在使巴基斯坦的法律与神圣的《古兰经》和圣训保持一致所采取的政策？”很显然，在一个90%的人口是穆斯林的家里，人们不可能投反对票，这不过是齐亚在为大选制造虚假的民意。

“抵制选举！”人民党在《阿迈勒》杂志上，接受采访和公开演讲中向人民大声呼吁，国内的恢复民主运动也发出了抵制的号召。但在齐亚官方的督促下，选民们参加了投票选举，投票率为62.2%。齐亚获得97.7%的赞成票，当选为巴基斯坦总统，任期五年。《泰晤士报》就此发表评论：“如果齐亚将军去掉宗教的幌子，让自己坦率而又勇敢地接受考验的话，他肯定会落选。”

布托小姐离开巴基斯坦时，就声明一定会回来的，现在齐亚·哈克宣布举行全国大选，回还是不回摆在了布托小姐和人民党的面前，在人民党领导人会议上，有的人认为现在到了向哈克提出抗议的时候了，这次公民投票使得齐亚在整個世界上都不得人心。另一部分人则认为长期以来，人民的思想

已经僵化，全国人民不一定会响应。双方争得面红耳赤、僵持不下。一位元老打破了僵局，他把目光转向布托小姐：“我知道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把贝娜齐尔·布托小姐派回去，这样将能激起人民对齐亚的痛恨。”

“好吧，”布托小姐同意了，“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我回国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应制定一个计划，让我们大家都回去，我们为什么不能错开回国时间，每隔一天或十天左右回去一位而逐渐走到高潮呢？”

房间里顿时鸦雀无声，接着便是一片反对声“回去？我们不能回去”。

这令布托小姐大吃一惊，他们都表示愿意跟她回去，但轮到自己时却找种种借口。

“要么我们好好安排一下，要么我们干脆就不要这么做。”布托小姐气愤地说。

1985年1月12日，齐亚·哈克宣布国民议会和省议会选举将在2月25日至28日举行，大选将在非政党的基础上进行。这是从1977年政变以来齐亚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大选。人民党是否应该参加呢？

布托小姐一时拿不定主意。离开巴基斯坦快一年了，国内的局势到底怎样呢？恢复民主运动的领导人态度如何，她不清楚。她急切地想知道。她没有心思呆在欧洲。

“我想我该回国了。我需要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谈谈选举问题。我们需要决定用哪种方式才能最有把握在政治上取胜——是抵制还是参加选举？”布托小姐对母亲说。

布托夫人想了一会儿，便同意了。“你是对的，是到了与在国内的党的领导人商量这件事的时候了。”

母女俩轮流给国内的人民党的副主席打电话，一直未能联系上。布托小姐要通了她的表妹法克里的电话，“告诉工作人员打开克里夫顿70号的大门，我将在三四天内回去。”

过了一会，电话铃响了，是尼亚兹大夫打来的，“克里夫顿70号被军队包围了，我刚接到来自卡拉奇的消息，已经对你和你母亲发出了拘捕令。全国的机场都已布置了警戒线，每个来自英国和法国身穿穆斯林服装的妇女都要接受检查。”

回去无异于自投罗网，何况“恢复民主运动”已经作出了抵制选举的决定。回去用处不大。在欧洲，布托小姐还能打打电话。于是，布托小姐用信德语和乌尔都语录了一盘磁带，号召人民抵制选举，磁带被偷偷带进巴基斯坦。

2月25日，布托小姐坐在电视机前，聚精会神地观看关于国民议会和省议会选举的报道。选举结果令布托小姐深感失望。“抵制选举”并没有成功。参加投票的人数和所占的比例比较高，达53%，并组成了以穆罕默德·汗·居内久为总理的文官政府。军事管制照常进行。

布托小姐发誓只要军法管制实行一天，她就要和它对抗到底，只要齐亚还在台上，她就要不惜代价地把他拉下来。

## 十一、弟死之谜

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和国内不断传来的噩耗使布托小姐身心疲惫，她迫切需要休息。

1985年7月17日清晨，布托小姐清理好衣物提着手提箱，匆匆向机场奔去，飞往法国戛纳，米尔、沙阿、萨拉姆和母亲正等着她的到来。

布托小姐走下飞机，在机场内四处张望着，但没有发现母亲和弟弟，她们说好来接她，莫非她们忘了。布托小姐嘀咕着。

“奇怪了吧！”弟弟沙阿·纳瓦兹突然从一根圆柱子后面钻了出来，抱住了姐姐，姐姐看到弟弟那调皮的神色开心地笑了。

坐在汽车上，沙阿一路说个不停，布托小姐一边听一边看着弟弟。在几个弟妹中，她最喜欢他。他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联系。和上次相比，沙阿胖了一些，两眼炯炯有神，头发如金色波浪一般，雪白的衬衫和裤子显得人格外精神。

“你给我们带什么品种的芒果来了？”弟弟对着反光镜大声说，“我们盼望了两个星期了。”

“信德的。”布托小姐说，“不过，我倒喜欢乔叟芒果，小而甜。”

“一个信德人不喜欢信德芒果？”弟弟装着吃惊的样子。“小姐，你肯定你是信德人吗？你是不是经常坦白这种叛逆行为？”

布托小姐大笑起来。同沙阿在一起，总是轻松愉快。看着无忧无虑的弟弟，布托小姐的思绪又回到了从前。她亲眼目睹弟弟一步步长大成人。他生下来时，父亲刚当上部长，母亲忙于陪父亲参加各种活动，而祖父已经去世了，家里没有人娇惯他，自然，做姐姐的就多了一份对小弟弟的照顾。她们经常打网球，爬山，长大后，父亲把他送到了哈桑·阿布达尔军官学校学习，培养他的自律精神。后来又转到伊斯兰堡的国际学校。他在政治上经常出头露面，跟随父亲参加集会，对政治非常敏感，能体察人民的思想，把握人民的情感和脉搏。在姐姐眼里，沙阿具有政治方面的天才，就像有的人在音乐、芭蕾等艺术方面一样。

沙阿对政治的关心不仅限于巴基斯坦。自从被迫离开巴基斯坦后，他在好几个中东国家住过，他对黎巴嫩、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复杂的政治也有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和米尔四处奔波，投身拯救父亲的活动。他们怀着对齐亚的满腔仇恨又投入到危险而又笼罩着阴影的“佐勒菲卡尔运动”。沙阿在喀布尔的一个秘密地点，负责训练志愿加入佐勒菲卡尔组织的人员。他对此项工作充满着热情。一天晚上，喀布尔正处在苏军戒严之中，整个城市死一般地寂静，街上见不到一个行人，沙阿没有跟米尔打招呼，一个人悄悄地溜过喀布尔的大街去跟他的“部队”共进早餐。米尔早晨发现不见沙阿时担心极了。当他被带回来时，他却对满脸气得通红的米尔笑着说：“别担心，要不然我怎么教人躲避战术呢？”沙阿的笑脸使米尔的气顿时消了。

兄弟两人在过去的六年里，领导和指挥“佐勒菲卡尔组织”在巴基斯坦从事过多次恐怖活动，他们想以此推翻齐亚的统治。而在国内，身陷囚禁的布托小姐一无所知。她反对通过恐怖手段夺取政权。在1981年3月8日，一位路透社记者采访她对一架巴航飞机被劫时的看法时，她鲜明地表达了反对的态度。

当布托小姐到欧洲后，一家人在戛纳团聚时，布托小姐和弟弟米尔在围

绕推翻齐亚的方式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齐亚把巴基斯坦变为一个武装恐怖的国家。”米尔固执地认为“暴力只能用暴力来回答。”

“暴力只能产生新的暴力，任何这种形式的斗争都不可能给人民带来持久的解决办法，永久的政变只能是在政治上通过选举的方式和平地获得，由人民来裁决。”布托小姐反驳说。

“什么选举！齐亚是绝不会放权力的，只能通过武装斗争来推翻他。”米尔针锋相对。

“军队的武器总是比游击队的多，国家机器的力量也总是强大于任何持不同政见者组织。武装斗争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是破坏性的。”布托小姐坚持自己的看法。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谁也没有说服谁。沙阿不愿加入到任何一方，一个人离得远远的，去游泳，去咖啡馆，去任何见不着她们的地方。

第一次聚会一家人不欢而散。

这次一家人第二次相聚，可以痛快地玩一玩。在来戛纳之前，布托小姐和米尔达成协议不谈政治。

“你准备在戛纳住多久？”沙阿问布托小姐。

“到7月30日。”

“不行，不行！”沙阿反对说，“你们必须多住几天。米尔也想30号走，我不会放你们走的。你们至少要在我这里住一个星期。”

“我必须到澳大利亚去。”

“哪儿也别去，就跟我在一起。”

布托小姐知道她不可能呆那么久，但为了不伤沙阿的心，她还是答应了沙阿。想到去年和沙阿在巴黎的日子，她更是无法拒绝。当时为了急切见到刚刚来欧洲的姐姐，沙阿未跟姐姐打招呼独自一人就来到巴黎找她。当时布托小姐有许多事要处理。沙阿几次打电话给她，都未和姐姐联系上。布托小姐回来时，接待员告诉她。一位《红星报》的主编几次打电话要采访你。布托小姐感到奇怪，《红星报》自己从未听说过，不过布托小姐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主编是谁呢？当《红星报》主编第三次打电话来时，她拿起了话筒，电话里传来了熟悉的笑声，原来是弟弟沙阿打来的。布托小姐不禁喊了一声，“沙阿，是你啊！”沙阿一边笑一边说：“与国家元首联系都要比你容易，给贝鲁特的德鲁兹民兵总部的琼布拉特打电话也比给贝娜齐尔·布托小姐打电话容易些。”

在巴黎，每天早晨六点沙阿就到姐姐房间里来。总是故作惊讶地说：“还在睡吗？起来，我们一起去吃早饭吧。”她们谈论最多的是巴基斯坦的政治问题，当然，沙阿也少不了讲一些传奇故事，让姐姐开心。

汽车在一幢公寓前停下了，沙阿帮姐姐打开车门对姐姐说：“这是母亲为你准备的，你和母亲就住在这里，我晚上七点钟来接你们，先看看我的新房子，然后我们一起到海边去烤肉吃，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你们要做的只是尽情享受。”

“雷哈娜来吗？”布托小姐望着弟弟。“来！”沙阿大声他说。自从在巴黎姐弟分离后，布托小姐一直为她们的家庭幸福而祈祷。

晚上，布托家族包括布托夫人，布托小姐、米尔及其妻子法蒂亚和女儿、沙阿和妻子雷哈娜和女儿萨希、萨拉姆及其丈夫纳赛尔，还有贝佳特姨妈和

卡里姆姨父欢聚一起。

夏夜的仲夏之夜是迷人的，天空中繁星点点，海面上吹来一阵阵沁人心脾的和风，一家人在海滩上尽情地享受着美好的夜晚。大人们有说有笑，小孩子们嬉戏追逐。烤鸡的香味逗得人嘴馋。

“我第一次感到这个世界真可爱！”沙阿走过来对姐姐说，“对我来说，一切都很美满。”姐姐点了点头，心情非常愉快。今天的气氛仿佛把她带回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带回到孩童时光。小时候一家人在卡拉奇海滨欢声笑语，无忧无虑，围在爸爸身边听他讲动听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是多么惬意啊！

一家人一直玩到深夜，这才回家休息。

布托小姐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突然一阵门铃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她以为是沙阿接她一起去为母亲买皮箱，因为昨天就约好第二天为母亲买生日礼物。可是急匆匆进来的是妹妹萨娜姆，她脸色苍白。

“快！我们得快”，边说边把孩子交给布托小姐。

“出了什么事？”布托小姐急忙问，她衣服才穿了一半。

“雷哈娜说戈基吃了什么东西。”

布托小姐的双腿有点发抖，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

“是他病了吗？严重不严重？”她向妹妹大声喊道。

“我们也不知道，现在去看看。”妹妹说完就和母亲一起冲出了屋子。

布托小姐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赶快叫警察，她急忙从抽屉里翻出电话号码簿，拨了附近警察局的号码，可听到的却是录好音的法语回答，她又拨医院的号码。这时，她母亲和妹妹又匆匆忙忙跑回来，她们在街上叫不到出租车。

“妈，你法语比较好，如果我们找不到警察就找医院吧。”

“为什么我们不先去看看？也许他没事。”

“妈，不行，还是保险点好。”布托小姐的脑海里冒出一个叫托妮女孩的身影，这个女孩由于用药过量，送医院太晚，没抢救过来。她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布托夫人接连打了几家医院，但都未联系好。这时，米尔进来了。

他神情沮丧，脸色刹白，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布托小姐摇着弟弟：“戈基，怎么哪？他怎么哪？”她听见米尔说了一句“他死了。”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然而，这声音有如晴天霹雳。

“不！不！”布托小姐拼命地喊着，她不相信这是真的。

电话筒从布托夫人的手中掉了下来，她睁大两只眼睛看着米尔，一时说不出话来。

米尔悲痛地说：“妈，这是真的，我看见，沙阿的身体都冰凉了。”

布托夫人号陶大哭。

“叫救护车！”布托小姐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说：“看在真主的份上，快给医院打电话吧，也许他还能治，还能抢救过来的。”

他们急急忙忙地赶到沙阿的住处，只见沙阿躺在卧室里茶几旁的地毯上。身上穿着头天晚上的白裤子。他的那双漂亮棕色的手伸得直直的，脸庞有一点青，鼻子白得像粉笔。布托小姐跪在弟弟身旁，大声喊叫着：“戈基，戈基”，她像要把他从睡梦中叫醒过来。可是她再也叫不醒了，她最亲爱的弟弟永远睡着了。

一家人放声大哭着。

过了好久，布托小姐才慢慢地站起来，她环视一下房间。看见茶几斜放着。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碟白色的液体。花瓶掉在地上，靠垫放在长沙发的沿上。文件掉在台阶上，夹子开着。她转眼看了看雷哈娜。雷哈娜穿得非常整齐，镶着白边的上衣一点皱褶都没有，头发梳得一根不乱，看上去她一点也不像刚死了丈夫的人。她的眼睛里一滴眼泪都没有，只是嘴唇在动，但听不见说什么。她的姐姐法蒂娅走过来对布托小姐说：“他服毒死的。”

布托小姐根本不相信，弟弟为什么要自杀呢，前天，还和我们高高兴兴地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谈了今后的打算。他怎么会自杀呢，要知道几年来他不知躲过多少次死亡的追杀。在喀布尔，法蒂娅和雷哈娜的一个家仆曾企图毒死他，幸运的是家里的一条狗吃了食物中毒死了，救了他一命。还有一次，弟兄两人开车外出，都坐在前排。沙阿的一件东西掉在座位底下，他们两人弯下身子去找，突然一颗子弹穿透汽车打到他俩头部的位置上，又是死里逃生。目标可能是针对沙阿的。他俩在喀布尔时，一个帕坦部落的人从巴基斯坦告诉米尔：“齐亚·哈克首先要沙阿·纳瓦兹的脑袋，他的命令是先杀沙阿，然后再杀米尔。”这很可能是真的。米尔曾经对布托小姐解释说：“我更多地是搞政治，沙阿把全部时间用于训练游击队，他有军事专业知识，因而也就面临着更直接的威胁。”

现在，最危险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了，一家人都欢聚在这里，沙阿不可能选择自杀。布托小姐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弟弟会自杀。一定是有人做了手脚，极有可能是齐亚的人干的，可这毕竟是怀疑。

警察把沙阿的尸体抬走了，说要对他进行尸体解剖检查。这时布托一家更是悲痛难忍，按照穆斯林习俗，沙阿的尸体应在24小时内埋葬，可他们不得不痛苦地等待着检验的结果。想到沙阿的尸体一次又一次的解剖，她们的心有如刀绞。一家人不知道干什么好，只是悲伤地哭泣或茫然地坐着。一切都似乎失去了意义。

“我来送沙阿的尸体回巴基斯坦老家去安葬。”一天下午，布托小姐对家里人说。

母亲不顾一切地反对，哭着说：“萍姬，你不能回去，你不能回去，我已经失去了儿子，不能再失去女儿了。”是啊！女儿好不容易逃出虎穴，现在回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吗？布托夫人不能经受住再一次打击了。

布托小姐安慰母亲说：“沙阿生前对我有求必应，却从来不要我为他做点什么。他盼望着回拉卡纳。他经常问爸爸到底埋在哪里，以便可以拍些照片。我必须把他送回家。”弟弟客死他乡，姐姐怎能不答应弟弟的要求呢。她要亲自把他送到父亲的身旁。

“米尔、告诉她不能回去。”母亲又要儿子劝说女儿。

“如果你回去的话，那我也回去。”米尔对姐姐说。他想吓住她不回去。因为米尔跟着回去，齐亚肯定不会放过他。布托小姐当然不愿这样。

“你们都别去，我去。”贝佳特姨妈说。

萨娜姆和纳赛尔也表示回去。

“那好，我们一起去。不过，我得先去。我不能让沙阿就由几个人悄悄地埋葬，而是要有他当之无愧的尊严和荣誉。”布托小姐说。

在回国前，布托小姐飞回伦敦，处理了一下巴比坎那边的事情。来这里悼念的人络绎不绝，有人告诉布托小姐，尽管齐亚当局散布种种谣言，但在

巴基斯坦对沙阿的悼念活动范围很广，全国各地都为沙阿的灵魂祈祷，到克里夫顿 70 号去的则有数千人。炎热的天气并不能阻挡人们对沙阿的崇敬，人们像潮水般地涌向拉卡纳。

1985 年 8 月 21 日，布托小姐带着弟弟回到了巴基斯坦，回到了生他养他阔别了八年之久的故乡。可他再也看不到克里夫顿 70 号熠熠生辉的字牌，也看不到那一望无际的田野，他的身躯和灵魂将跟他爸爸在一起。

军法当局起初并不同意沙阿安葬在拉卡纳，但他们考虑到上次安葬布托时未能按照伊斯兰习俗曾激起人们的愤怒和不满，这次如果拒绝布托家的要求，很可能招致骚乱，引起局势动荡，同时也有背国内的伊斯兰化政策，最后还是勉强答应了布托家的要求。不过，当局对葬礼采取严密的措施，尽量缩小其影响。军队在通往信德省的所有道路上都设置了障碍，所有过往的车辆都得停下来检查。警察 24 小时在大街上巡逻。人民党的领袖被软禁在家。同时，为了安抚人民，避免发生流血冲突，政府宣布 12 月 30 日取消军管。

布托小姐护送弟弟的灵柩在卡拉奇作短暂停留后直接飞抵布托家族的发源地拉卡纳。

“到拉卡纳去，到拉卡纳去！难道你们不知道沙阿·纳瓦兹的遗体今天运回来？沙阿是佐勒菲卡尔·布托的儿子；沙阿是一位勇士；沙阿为了你和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来吧，快来吧，我们今天要迎接这位英雄。”人们唱着这首赞歌迎接英雄回到他们身边。

英雄的崇拜者从四面八方，纷纷涌向拉卡纳，他们冒着炎炎的烈日向心目中的英雄作最后告别。在灵车的后面，跟着各种不同大小的车辆 2000 多辆，形成了 10 英里长的车队，在莫亨焦达罗至穆尔塔扎公馆 28 公里的路上，两旁的人们不断地向灵车撒着五颜六色的玫瑰花瓣，表达惜别之情，心里默默地为英雄祈祷：“真主啊，我们属于你并将回到你那里去。”还有许多男人头上戴上了刺绣的帽子或包着他们部落的裹头以示敬意。

布托小姐在布托家族的墓地的最右侧为弟弟找到了一块墓地，它离布托的墓有一段距离，以便日后在空地上为他们两人修建一座纪念堂。

当沙阿的灵柩移到祖父的房间里去时，阿訇为他净身时，人们悲痛的情绪达到了极点，他们再也控制不住

自己的感情，妇女们将头向棺材上撞去，鲜血从她们的头上流淌下来。

酷热的天气不允许灵柩放得太久，在亲戚们做完祈祷后，沙阿的遗体放到了救护车上，灵车缓缓地向墓地开去。

布托小姐大声地哭喊着，“戈基，你别走啊，跟我在一起吧。”她多么想拉住灵车，把小弟弟拉回来啊，可他永远地走了，走向他的长眠之地。

布托小姐木然地站在大门口，望着远去的灵车。身后突然传来了一位妇女的哀唱，仿佛是卡拉巴赫的再现。

“看看贝娜齐尔吧，她带着弟弟回来了，他是多么年轻，多么漂亮，却又多么无辜啊！他是被独裁者亲手杀害的。他感到了姐姐的忧伤。记住圣人正在走向叶基德的大院。记住圣人，她看到叶基德正在玩弄着她弟弟的头颅。”

“想想看吧，布托夫人多么心酸啊！这个孩子是她生的，孩提时逗着他玩，亲眼看着他学步，看着他长大。这位母亲以拳拳之心抚育他成长，想想她吧。”

“想想穆尔塔扎吧！他已失去了右臂，也就失去了自己的一半。他再也

不会与原来一样……”园内的 500 多名妇女也一起唱着，为沙阿祈祷。

按照伊斯兰的习俗，死者人葬后的第 3 天和第 40 天是忌日。布托小姐担心在这 40 天内有可能失去自由的危险。在经过与宗教领导人的激烈辩论后，他们决定将 40 天从沙阿 7 月在法国遇害时算起，这样两个忌日就差不多在一起。

第三天，布托小姐手捧一束鲜花，脸色苍白，两眼红肿来到弟弟的坟前，她把鲜花轻轻地撒在坟上，然后跪在弟弟的坟前，捧起一把新土和几百人在烈日下祈祷着：“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命。”

当天晚上，布托小姐和萨娜姆、法克里一起回到卡拉奇。几千人在卡拉奇机场迎接她们，整个道路挤得水泄不通，人民党党员手挽手地把她们围在中间，才给布托小姐挤出一条通道来。机场外面也是人山人海，花了几个小时，她们才回到克里夫顿 70 号。很多人开着吉普车和摩托车伴随着她们。向她们伸出胜利的手势。

克里夫顿 70 号早已挤满了人，看着这些志同道合熟悉的面孔，布托小姐站在汽车上激动地说：“无论我们是否赞同我弟弟的方式，但他是一个反对独裁的人。他的觉悟不允许他在巴基斯坦遭受苦难时保持沉默。”

齐亚当局从布托小姐踏上巴基斯坦的第一天起，就一直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声势浩大的悼念活动充分显示了人民党的力量和影响，虽然布托小姐一家流亡海外，但布托家族的号召力仍然是巨大的。齐亚当初以为布托小姐远走他乡，人民党会群龙无首，可沙阿的死在国内掀起的悼念浪潮使当局强烈地感到一股强大的冲击波，齐亚看到了布托小姐对自己的威胁。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当然他不会在人们情绪最激烈的时候对布托小姐下手。他要等待时机。

8 月 27 日清晨，警察包围了克里夫顿 70 号，这里再次成为一座非正式监狱。布托小姐收到了一张 90 天的拘留证，她被指责违反了当局不允许她去敏感地区“走访恐怖分子”的警告。

布托小姐又一次失去了自由，一个人在屋子里度日如年。她竭力使自己从沙阿的死亡悲伤中恢复过来。于是翻来复去看家里的旧杂志，收听 BBC 的新闻节目，写日记。然而，沙阿的身影总是缠绕着她，眼前总是浮现出弟弟那张英俊的脸庞和匀称健壮的身材，还有他最喜欢穿的洁白的衣服，耳边经常回响起弟弟清脆的笑声。沙阿走了，但走的不明不白，布托小姐怀疑是齐亚的人干的，因为她听说，沙阿被害前一个月，有个人到卡拉奇的好几家报馆去，问有没有沙阿最近的照片，莫非有人想找他的照片以便下手？

10 月 22 日，布托小姐在 BBC 新闻广播中心听到了一则消息，法国警方在戛纳逮捕了沙阿的妻子雷哈娜。她被指控“未能援助处于危险境地的人”。但没有进一步报道细节。

几天后，从当地的报纸上看到，说她收到了要参加沙阿死因调查的传讯，但她拒绝前往。看到这无中生有的造谣，布托小姐气愤极了。她马上给内政部写了一封信：“我很想参加，但这掌握在你们手中，而不是我。请告诉法国法庭，我想参加，但你们不让。”

11 月 3 日，警察告诉她可以出国参加法庭调查。布托小姐深情地望着克里夫顿 70 号的大门，久久不愿离去。多少心事又涌上心头。即将过去的一年对她来说是不幸的一年，她在国外设法拯救她的战友的生命，但未能做到，她又一次遭受失去亲人的沉重打击，然而她的精神并没有摧垮。她把巨大的



悲痛化作巨大的力量去迎接更加残酷的挑战。

临走时，布托小姐向人民党党员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今天，我就要踏上艰难悲伤的旅程。我将在异国的法庭上参加对我所钟爱的弟弟沙阿·纳瓦兹的死因调查……我决心尽快回来，按照真主的意愿，无论结果如何，我希望能在三个月内回来。”

经过两年的法庭调查，1988年6月，法庭作出裁决，雷哈娜因未能援助一个处境危险的人而将面临审讯，布托小姐等人提出的沙阿·纳瓦兹被人谋杀的指控证据不足，不能成立。不过法庭排除了沙阿自杀的可能性。沙阿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至今仍是一个谜。

## 十二、东方女儿

1985年12月30日，齐亚宣布废除了长达12年之久的军法管制。当时，布托小姐正在欧洲，是在一家旅馆得知这一消息的。但在布托小姐看来，取消军法管制只不过是当局对西方进行的舆论欺骗，并不意味着实行真正的文官治理。齐亚的位置并没有任何变化，他仍然保留着总统的职位和有实权的陆军参谋长之职。军队仍牢牢地掌握在齐亚的手中，他可随时使用手中的这张牌去对付反对派。

同时，齐亚还保留了宪法，齐亚还让橡皮图章的国民议会通过了宪法第八条修正案，这条修正案规定对政府官员在军管时期的行为不加追究，而且对他们今后三个月的行为也加以保护。总统有权解散总理和议会。齐亚在全国大力推行“伊斯兰化”政策，从精神上钳制人们的思想，使齐亚的所作所为披上一层宗教的外衣。宗教法庭颁布的“限度法令”就是最好的注解。这个法令充满了对妇女的歧视。该法令规定对偷盗、通奸和强奸者严格按宗教法律惩罚。如果一名妇女指控某个男人强奸了她，须有四名穆斯林男人作证，如找不出四个男性的证人——这是绝对办不到的，遭强奸的妇女反被指控犯有通奸罪。一位名叫萨菲娅·碧碧的姑娘就是这项法令的牺牲品。她双目失明，给人家当佣人，遭到她的主人父子强奸生了孩子，由于那两个男人拒不承认，而萨菲娅又找不列四个证人——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于是两位男人被判无罪，而萨菲娅反被判以鞭打和三年监禁。萨菲娅只是千千万万个受害妇女中的一个。妇女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受到排斥，在一些正式场合总把男女分开，甚至连一些身居高位的妇女也不能和她的同事一起出现在电视上。女广播员必须蒙上纱巾，否则被解雇。

齐亚虽然解除了军管，但并没有放松对人民的控制，大权仍然独揽。

远在欧洲的布托小姐密切注视着国内的政治气候，出国的时候她说过在三个月内一定要回来。现在她觉得回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了。齐亚不是宣布取消军管吗？回国可以考验他关于恢复自由的声明。如果我回国后，齐亚把我抓起来，那他的民主把戏就被彻底戳穿，如果他不抓我，我就可以九年来第一次自由地把人民党的信息带给巴基斯坦人民，另外从心理的角度来说，此时回国是有利的。

1986年1月初，布托小姐从法国巴黎回到伦敦的住所后，对人民党的骨干说：“我在考虑回家”，在场的人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用期待的眼光看着她。“我或许先回拉合尔，也可能先去白沙瓦。”顿时人们的眼睛一亮。人民党的骨干纷纷表示同布托小姐一起回去。

可是与齐亚正面交锋的步骤包含着巨大的风险，万一布托小姐回去后出了什么事，人民党的命运就很难预料。再说布托小姐的考虑需中央执委会最后拍板。于是布托小姐召开了一次中央执委会会议讨论她的意见。会议上布托小姐阐明了自己的态度，“我认为，现在该是回去的时刻了，但这由你们决定，我回去很可能有所作为，但被捕的可能性也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党将怎么办？是抓住这个时机向齐亚施加压力，迫使他全面恢复民主化，还是我应该推迟回国，你们大家决定吧。”

“你必须现在回去，我们和你站在一起。”党的领导成员一致表示，“如果齐亚采取行动反对你，那他也将采取行动反对我们大家。”

布托小姐非常高兴，他们围坐在餐桌周围商量回国的路线，是先回旁遮

普，还是西北边境省呢，他们决定把拉合尔作为回国的第一站，因为拉合尔是旁遮普省会，军人大多是从该省招募的，旁遮普在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影响最大，如果头炮打响，对后来的行程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另外，拉合尔也是人民党支持者的堡垒。与以前一样，人民党采取的战略是搞政治斗争，不搞暴力；开展合法斗争削弱当局，但不给当局以任何逮捕的借口；在全国各地组织大规模的政治示威，持续它一段时间，增强人民战胜齐亚的信心，解除齐亚的暴力在人们心理上造成的恐惧。

布托小姐向外界宣布了回国的决定，但没有透露回国的具体日期，这样就可以使齐亚当局无法作充分的准备，同时也可以保持国人的关注。这一招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时，整个巴基斯坦开始了一场猜谜游戏：有人说：“布托小姐将在3月23日回国，因为这一天是巴基斯坦日。”另一些则认为：“她将在4月4日回国，因为这一天是她父亲的忌日。”

齐亚最担心莫过于他的强劲对手回国，上次，沙阿死后，布托小姐回来时国内出现了大规模悼念活动，令齐亚心惊。如今的布托小姐已不是以前的黄毛丫头，人民党的力量在经历了挫折后已强大起来。以前齐亚把布托小姐关在监狱，不让她出去，现在他则竭力阻止她返回巴基斯坦。于是威胁和恐吓一齐向布托小姐袭来。布托小姐的私人电话整日响个不停，她听到的常常是警告和威胁。有人对她说：“一个从政的女人比你了解的更容易受攻击，不要回来。”有时拿起话筒却听不到有人讲话。

布托小姐不知道当局到底是什么意图，是想干掉自己呢，还是仅仅想阻止她回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国内的形势比以前更紧张。她父亲使用时间最长也最受信赖的男仆努尔·穆罕默德一月份在卡拉奇被人杀害，后来，他的女儿、11岁的沙娜兹也被人用刀捅死了。

但一切都改变不了布托小姐回国的决心。在回国前，她作了充分的准备。

为了引起西方尤其是美国对自己回国的关注，布托小姐飞抵华盛顿，拜会了佩尔参议员，肯尼迪参议员等高级官员，要求他们对齐亚施加压力，举行大选，恢复人权，注视她回国后的巴基斯坦局势。布托小姐深知美国的态度与齐亚的行为息息相关。如果回国能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关注，无疑会为自己增加一份安全系数，同时也使齐亚的行为有所收敛。

布托小姐的美国之行也成为新闻界的热点。一些新闻记者把她同菲律宾的科·阿基诺相提并论。他们似乎预料到布托小姐也会成为巴基斯坦的“阿基诺夫人”。确实她们有颇多相似之处。她们都是女性，都在美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都出身于有名望的地主家庭，而且在反对政治对手中失去了亲人，科·阿基诺失去了丈夫，布托小姐失去了父亲和弟弟，都主张用和平的手段推翻统治者。但她们两人又有各自不同的经历，布托小姐所面临的处境要艰难得多。在菲律宾，科·阿基诺推翻马科斯的行行为得到军队和教会的支持，而在巴基斯坦，将军们是反对布托小姐的，占主导地位的原教旨主义者是憎恨她的。更重要的是，美国曾向马科斯发出过警告，甚至为他一家人逃离菲律宾提供了交通工具。可是里根政府却把巴基斯坦当作抵御苏联渗透的一张盾牌，大力支持齐亚。

当她回到伦敦的住所时，她发现地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记着阿基诺”。

阿基诺是菲律宾反抗马科斯的独裁统治的一位民主斗士，当他结束在国外的流亡生活，刚踏上菲律宾的国土时，在机场就被刺客杀害了。

布托小姐对这种赤裸裸的威吓根本不屑一顾，她已把生死交给了真主。

在从华盛顿返回伦敦稍事停留后，在朋友的陪伴下，她立即飞往穆斯林的圣地麦加，参加乌姆拉的穆斯林朝觐仪式。按照《古兰经》的规定，每一个有能力的人，都要去麦加朝觐一次。布托小姐曾在与父亲告别时向他保证过，即以他的名义去麦加朝觐，可后来发生的一切都使她的愿望迟迟未能实现。这次到麦加终于了却了自己的一份心愿。布托小姐也把这当作是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谁知道回国后命运又将如何呢？

在麦加，她们穿上未加缝制的白色罩袍，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在大清真寺的入口处“和平之门”用阿拉伯语朗诵《古兰经》，然后又围着一座 50 英尺高，35 英尺长的被称为卡巴的黑色建筑转了七圈。每当转到“卡巴”东南角的先知曾吻过的黑色石头时，就朗诵一次“真主是伟大的”。她为父亲祈祷，为在军法统治下死难的人们祈祷，为弟弟沙阿·纳瓦兹祈祷，也为至今仍被关在监牢里的男男女女祈祷。每一次祈祷，都使布托小姐感到振奋，得到了一次精神上的洗礼。一切痛苦和恐惧都不复存在。她从灵魂的深处作好了与齐亚较量的准备。

1986 年 3 月 25 日，人民党向外界透露：布托小姐定于 4 月 10 日返回巴基斯坦。敏锐的记者迅集伦敦。他们一直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披着纱巾的布托小姐从容自如，落落大方地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种种问题。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六十分钟》节目为她拍了一部电视片；《名利场》杂志刊登了斯诺顿伯爵画的她的侧面像；伦敦的早间电视节目也对布托小姐作了报道，并通过卫星传递到纽约；BBC 的对外广播分别用英语和乌尔都语播放了采访的内容。此外，美联社、合众国际社、独立第四频道也对布托小姐进行了报道。记者们都知道，巴基斯坦的政治舞台上将有一场战斗打响。双方的主将一个是老谋深算、拥有军权、坐在总统交椅上的 62 岁的齐亚·哈克，另一位则是端庄美丽、意志坚强、担任人民党主席的年仅 33 岁的布托小姐。一刚一柔好似中国武林中的少林与太极。谁胜谁负，殊难预料，但可以想象对抗将是激烈的。

不过舆论似乎认为人民党向齐亚挑战会取得成功。但布托小姐对回国后遇到的情况却一直忐忑不安。《没有名字的囚犯和没有号码的牢房》的作者雅利希·迪默曼把受压迫者的行为归纳为三个阶段，先是愤怒，接着是害怕，而后是麻木不仁。现在，巴基斯坦人民在遭受了多年高压统治后，他们会响应人民党的号召吗？再说年轻的一代在军法管制下，根本不懂得什么是自己的基本权利，他们想获得他们从未享受过的权利吗？

“到底会有多少人在拉合尔欢迎我们？”布托小姐问旁遮普的人民党主席巴迪尔。

“50 万人。”他回答说。

“你估计得太高了。”布托小姐有点不相信。

“至少是 50 万，我们已得到消息，人们已经开始向拉合尔集中。”

布托小姐很深情地说，“可我们还没有把握，如果新闻界问起你，你就说预计有 10 万人，不要说 50 万人，这样，如果届时大约有 47 万人，他们就不会说比我们预料的数字少。”

4 月 9 日，在伦敦的希斯国际机场，布托小姐和她的随行人员和新闻记者登上一架早已等候的飞机，机场内挤满了欢送的人群，他们争相目睹这位不屈的女性，祝愿她一路平安。布托小姐在机场对记者说：“我希望成为菲

律宾科·阿基诺总统那样的人。”语气中充满着坚定和自信。

1984年1月，当布托小姐获准出国治病抵达伦敦时，就发表声明“人民党争取民主的目标没有变，我们将比人们预料的要早地返回巴基斯坦。”

今天，她的诺言终于兑现了。她站在舷梯上微笑着向人们挥手致意，并伸出代表胜利的“V”形手势，去迎接国内的战斗。

国内的支持者也作好了迎接英雄回来的准备。在布托小姐抵达拉合尔的前一天，整个城市沉浸在盛大的狂欢气氛中。

一位参加者描述当时的情景：“到处是新搭的帐篷，备有食品和饮料。沿机场路两侧，摆满了食品小摊。整个拉合尔掌握在人民手中。装满学生的大篷车穿行在大街上，学生们用旁遮普语高唱歌颂布托的歌曲。人们纷纷向城里涌来，有乘小汽车或大轿车的，有坐卡车或牛车的，还有步行的。在遭受多年的镇压、羞辱和压抑之后，人们第一次打开了感情的闸门，倾泻着自己的激动。

另一位这样写道：“简直像开斋节一样，饭菜和水果免费发给大家。人们到处唱啊、跳啊，鼓乐声和喝彩声回荡在天空中。录音机里播放着布托、人民党和贝娜齐尔的歌曲，歌词通俗易懂，配以著名曲调，人人能随声相合。人民党的党旗飘扬在楼房的阳台和路灯柱上。人们搜集了许多绿色、红色和黑色的彩带，准备在贝娜齐尔抵达时向她挥舞致意。连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促进会的成员也在街头出售横幅标语和贝娜齐尔的画像，趁机赚钱。”

4月10日清晨7点钟，飞机上的扩音器里传来了机长的声音：“我们开始下降，进入拉合尔上空。我们欢迎贝娜齐尔·布托小姐回到巴基斯坦。”

一位空姐走到布托小姐的面前，兴奋地说道：“机长刚收到地面报告，该机场上有100万人在等候你。”布托小姐心里非常激动。

飞机缓缓地下降，然后平稳地停在跑道上。在一群支持者的簇拥下，布托小姐走下舷梯。她又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巴基斯坦。她又回到了熟悉的拉合尔。在这里，她曾度过愉快的时光也流下过伤心的泪水，她的父亲就是在拉合尔被齐业判死刑的。今天，她要从这里开始与齐亚决一死战。

“这么多人，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出去！”萨米亚看着黑鸦鸦的人群，一边说一边把一串玫瑰花环套在布托小姐的脖颈上。

“我们坐卡车走。”护着布托小姐的巴迪尔说。

她走向卡车，扶着摇摇晃晃的梯子，登上了预先搭在卡车顶上的演讲台。在伦敦时，她就决定采用这种方式去巴基斯坦独立塔广场，这座塔是她父亲为纪念巴基斯坦独立宣言而修建的。当机场的大门敞开时，数以万计的彩色气球腾空而起。玫瑰花瓣如雨点般朝布托小姐撒来，花环夹带着纱巾在空中飞舞，代表人民党的红、绿、黑成了拉合尔唯一的色彩。无数面人民党党旗在微风中飘扬，几乎遮天蔽日。人们穿的衣服戴的帽子的颜色都是红、绿、黑色。就是毛驴和水牛的头部和尾巴上，也系上了人民党颜色的彩带。

人们高举着布托一家人的画像，高喊着“布托万岁！布托万岁！”“贝娜齐尔，我们的姐妹，贝娜齐尔，我们的姐妹。”“贝娜齐尔回来了，革命开始了。”欢呼声此起彼伏，响彻拉合尔的上空。

从机场到独立塔只有8英里远，平时只需15分钟，可在1986年的4月10日，布托小姐却花了10个小时才抵达独立塔。一路上人山人海，街道两旁的楼房的阳台和顶部都挤满了人。在树上和路灯柱上都爬满了人。布托小姐一直站在演讲台上，不断地向群众挥手，他们也向她致意。攒动的人头好

似一望无际的滚滚波涛。欢迎的人群从 100 万增加到 200 万，当她们到达独立塔时，达到 300 万。欢迎的人群压倒了一切，警察和军队都退到了兵营的大门里。

布托小姐好不容易才登上广场上的演讲台，当她眺望广场时，她从未见过如此盛大的场面。马路对面用红砂石建造的巴德夏希清真寺，在夕阳余辉的衬托下，如同一团圣火，右边历史悠久的拉合尔城堡显得肃穆庄重。广场的四面八方，各个角落，都挤满了欢迎的群众，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布托小姐努力抑制住激动的心情，她拿起麦克风，用乌尔都语向支持者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说：“有人劝我退出政治舞台，他们警告我说，我可能重演我父亲和我弟弟的悲剧，还有人说，巴基斯坦的政治舞台，不是为女人准备的。我对这些人的回答是，我们党的成员将保护我免遭危险。我愿走艰难之路，并准备跳进死亡之谷。”

广场响起雷鸣般的呼喊声。布托小姐在空中做了一个安静的手势，整个广场顿时鸦雀无声，成千上万双眼睛注视着她。她接着大声说，“此时此地，我想公开宣布，我愿意作出一切牺牲保护人民权利。你们要自由吗？你们要民主吗？你们要革命吗？”她每问一句，300 万人就用同一个声音回答“要”！

“我之所以回来，是因为我想为人民效劳，并不是为了报仇，我现在结束报仇，我心里没有任何报仇的情感。我要建设巴基斯坦，但是我必须请你们进行一次公民投票，你们要齐亚继续统治下去吗？”“不要！”喊声惊天动地，“你们要齐亚下台吗？”“要！”怒吼声震撼着大地。

从早到晚，那天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局袖手旁观。48 小时后，一位陆军少校突然闯入艾哈默德家，搜查了他家的房子，要佣人们告诉布托小姐的住处。好在人民早对布托小姐的安全作出了周密的安排，为她准备了多处地方，才使少校扑了空。但这显然是一个不样的预兆。

“拉合尔的欢迎场面是独一无二的，贝娜齐尔·布托在其它城市里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欢迎场面了，”官方的舆论宣传说，但他们又一次错了。

布托小姐一行 4 月 12 日中午离开拉合尔。计划 5 点钟抵达古季兰瓦拉出席群众大会。但途中聚集了大批欢迎的群众，卡车被团团围住，使他们难行，直到第二天早晨 5 点钟才到达。他们以为会场上不会有什么人了，但出乎他们的意料，会场依然是人山人海，人们为了迎接布托小姐等了一夜。

从古季兰瓦拉去费萨拉巴德的路上也遇到同样的情况，16 个小时只前进了 8 公里。汽车和人前呼后拥，把正常行驶的车辆全都挤到了边上。数千名狂热的支持者跟随布托小姐的卡车步行了一夜，边走边唱：“在路上撒满珍珠和鲜花，贝娜齐尔已经到达。”“啊！真主！让从前的光景重新回来吧，让受苦难的人民再过上好日子吧！”

布托小姐一行比预定的时间晚了半天到达费萨巴德市的体育场。九年前，她曾心情紧张地在这里发表了第一次演讲。今天，面对成千上万人爆发出的“贝娜齐尔，贝娜齐尔”的欢呼声，她的心里只有激动和喜悦，这里的群众仍然热烈地拥抱她。

贝娜齐尔一行马不停蹄地又到萨戈达、杰卢姆和拉瓦尔品弟等城市，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她们按照计划随即向白沙瓦进军。白沙瓦是西北边境省的省会，是一座古老的贸易城市，居住着少数民族普什图人，他们相当保守，而且一直要求

摆脱巴基斯坦而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儿离开伯尔山口和阿富汗仅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当时约有 300 万阿富汗难民中的绝大多数住在这里，并得到齐亚的支持。

当布托小姐一行抵达白沙瓦时，恰在晚上，当局关掉了路灯，试图不让市民看到布托小姐，但这并没有难住他们。欢迎的人群用火把和家用摄像机照亮街道。尽管有人传言齐亚想借阿富汗圣战之手暗害布托小姐，但她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站在车顶上，看到集会中绝大多数都是男人，她大声说道：“有人认为我是软弱的，因为我是女人，但我是一名穆斯林妇女，而穆斯林妇女有着值得骄傲的传统。我具有先知的妻子碧碧·哈迪德的耐性，我具有伊玛姆·侯赛因的妹妹碧·齐纳布的不屈精神，我也具有先知的爱妻碧碧·爱莎的勇敢精神，爱莎曾骑着自已的骆驼率领穆斯林冲锋陷阵，我是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烈士的女儿，也是你们的姐妹，我要向我的对手挑战，在民主选举中决一雌雄。”这时，会场上的掌声变成了欢呼声。

“齐亚，下台！”布托小姐用普什图语高喊。

台下的人齐声呼应：“齐亚，下台！”

布托小姐不顾劳累，又驱车来到贫穷落后的俾路支省，她站在旋转的讲台上向欢迎的群众讲道：“巴基斯坦人民党认为、国家的昌盛是建立在广大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上的，如果人民有了就业的保障，如果他们有了良好的卫生保健，如果他们的子女有了上学读书的条件，那么，国家就会兴旺起来，真主并没有规定我们一定要过穷日子。我们民族的命运不应该是贫困，如果我们有权力，有效地利用目前的资源去改变目前的贫穷状态，那我们一定会这样做。”这些质朴、亲切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听众，他们热烈鼓掌，高呼：“贝娜齐尔万岁！”

布托小姐每到一处都盛况空前，掀起了一阵政治旋风，极大地鼓舞了人民与齐亚作斗争的信心，实现了她回国的第一阶段战略目标。

她没有停顿，迅速把斗争引入第二阶段，迫使齐亚早日举行大选。

1986年7月5日是政变9周年，人民党把这一天称为“黑日”。计划在全国各地同时举行公众集会。

“黑日”那天，15万人民党的支持者走上卡拉奇的街头，20多万人在拉合尔参加了示威游行。示威活动遍及全国60多个城镇。

8月14日是巴基斯坦的独立日。为了防止人民党再次举行游行示威，政府总理居内久急忙宣布穆斯林联盟将于8月14日在拉合尔的广场上集会。人民党针锋相对，也宣布在同一天在拉合尔举行集会。“恢复民主运动”也参加到反对当局的行动中来。九党联盟宣布人民党和其他各反对党也将在卡拉奇和拉合尔举行集会，要求齐亚于9月20日宣布选举。

居内久发现形势不妙，8月12日在电视上临时发表讲话宣布，为避免穆斯林联盟的支持者同人民党的支持者发生“冲突”，决定取消穆斯林联盟原定独立日在拉合尔的群众集会，并呼吁反对派也取消集会。

听到这个消息，当时正在开会的布托小姐兴奋极了，她对身边的记者和工作人员说，“这是我们的一大胜利，居内久称他自己是民主的总理，可是又有谁支持他呢？他取消自己的集会是因为他害怕自己被人民党揭穿，当局是在临阵脱逃。”

“我们现在没有必要举行8月14日的示威了。”一位工作人员说，“因为我们已经赢了。”

“不。我们还要搞。”另一个表示异议，“为什么不能在15日召开群众大会呢？”

“15日是印度的独立日。”

“那就16日召开。”

布托小姐对他们说：“明天我要去费萨拉巴德参加人民党会议，我们那时再决定吧。”

在“恢复民主运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会议气氛不对头。各政党领导人对布托小姐很恼火。他们对贝娜齐尔说：“你根本不懂政治，我们必须按原计划在独立日举行示威，不能失掉机会，我们现在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布托小姐不赞同这种意见。她认为现在还没到与齐亚摊牌的时候。刚刚举行了“黑日”示威活动，再在短时间内组织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相当困难。而且人民党的策略不是同当局直接对抗，而是一步一步蚕食侵蚀当局的力量。如果现在就同当局直接正面较量，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党的领导人可能被捕，运动势头将会遭受挫折。恰如布托小姐后来所说：“我明白我是在走钢丝，我完全清楚，一旦出现混乱局面，产生的后果不是举行选举，而是重新实行军事管制。”

似乎是受到了前一阶段形势的鼓舞，布托小姐的意见并没有改变“恢复民主运动”各党领导人的看法，他们固执己见，坚持继续按原计划行动。

布托小姐左右为难，最后只好默认了他们的意见。

“那好吧，我们按原计划行动，不过，看在真主的面上，不要今晚就宣布这个决定，至少要等到明天。”布托小姐想争取时间，即使是几个小时的时间通知党的领导人转入地下也好，以免遭到逮捕，打乱人民党秋天的行动计划。可是，“恢复民主运动”还是迫不及待地宣布了这一决定。

8月13日，布托小姐依原定计划前往机场准备乘机去费萨拉巴德参加党的会议。但在机场门口，警察拦住了她。“我们奉上级命令，不准你到旁遮普去，如果你坚持要去的话，也可以。”布托小姐知道这是当局采用的新的策略，意在惹起她的愤怒，把制造事端的罪名强加到自己身上。她当然不会钻入他们的圈套。她马上返回了克里夫顿70号，她原以为警察会在那里“恭候”，但这一次她错了。那里见不到警察的人影。印度电台也错播了她被捕的消息。一时间，克里夫顿的电话接连不断，群众与警察发生冲突的消息不断传来。新闻记者纷纷来到克里夫顿70号。他们不断地向布托小姐发问，“人民党的一些领导人和‘恢复民主运动’的领导人被捕了，可当局没有抓你，这作何解释？”布托小姐回答说：“这是当局想在不对我采取行动的情况下使人民党陷入瘫痪，用这样的策略来逃避世界舆论，特别是来自美国的谴责，因为美国国会将在秋天就一项资助巴基斯坦的计划进行辩论。”

第二天是巴基斯坦的独立日，一清早，在克里夫顿70号的院墙外聚集了众多的支持者，呼喊“布托万岁！”“贝娜齐尔，我们的姐妹！”他们准备陪同布托小姐去参加集会。当局没有对他们采取任何行动，据说是当局担心在克里夫顿70号引起群众骚乱，危及这里的外国领事机构。这一地区是外国领事馆集中的地区。

“你们什么时候去会场？”一位恢复民主运动的代表打来电话问道。

“我们准备下午两点钟出发。”布托小姐告诉他。但布托小姐下午一点便出发了，因为她获悉警察在2点钟来抓她。



当他们到达中东医院时，警察突然发射催泪弹，人群顿时乱作一团。警车朝布托小姐的车子直奔而来，机敏的司机开足马力朝会场方向急驶，但前面的道路设置了障碍，他们不得不调转头来，朝真纳大街方向奔去，东弯西拐在路上和警察玩起了捉迷藏。在群众的帮助下，他们的车子终于甩掉了尾巴，到达了会场，聚集在会场的上万群众顿时沸腾了。布托小姐在台上只讲了几分钟，警察就包围了会场。

“快低下头，躲开！”有人大声喊着并把布托小姐拉进车里，一颗催泪弹正好在她的头顶呼啸而过。支持的群众并没有被催泪弹驱散，他们紧紧地护卫在布托小姐周围，大声喊着：“挡住警察，挡住警察。”布托小姐在人们的掩护下驶离了会场，在路上巧妙地躲过了警察的追踪，回到了克里夫顿70号。

她立即举行了新闻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她痛斥了齐亚当局的卑鄙行为，再次重申人民党的出路是“和平革命”，在记者招待会中途，三名警察闯了进来，向她下达了30天的拘留令，罪名是非法举行集会。布托小姐收拾了几件衣服和牙刷，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带走了。

布托小姐的被捕在国内引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酿成了自1983年以来最严重的骚乱。信德省的一些警察局，政府机构，和汽车被愤怒的群众烧毁。在卡拉奇的雷亚利，人民党的支持者与警察对峙了一个多星期，30多人死于非命，在拉合尔有6人被打死。

与此同时，布托小姐的被捕消息迅速传到国外，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强烈反应。英国和联邦德国发表声明不赞成当局的残酷镇压，美国参议员肯尼迪和佩尔也深表关注，敦促美国政府对齐亚施加压力，美国国会负责亚太事务的主席索拉兹警告说：“如果巴基斯坦政府继续拘留反对派领导人和拒不允许举行和平集会的话，那么它的朋友将在今后几个月为争取国会批准美国对巴援助问题上受到巨大压力。”

在国外压力下，布托小姐在9月10日晚上9点30分被当局释放了。

她的获释是对人民的巨大鼓舞，在大好形势下，人民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头脑发热。在决定下一步行动计划的会议上，他们情绪激昂，要求把运动继续推向前进，为被当局杀害的人们报仇，但布托小姐显得非常清醒，她冷静地分析当时的局势，要求人们克制，她说：“我们党曾经许诺，要通过政治斗争实现和平变革，但是当局诉诸于武力，我们继续抵抗只能意味着流更多的血，引起更大的骚乱，甚至会使极端分子有机可乘，让我们把8月份看作道义上的胜利，继续遵守我们对和平斗争所作的保证。”在不久后的全国旅行后，她把采取谨慎行动的要旨传给了人们。

1986年的日历即将翻过，这一年可以说是布托小姐与齐亚斗争转折的一年。经过了最艰难的岁月，时隔三年后，她第一次获得自由。人民党在遭到了多年压制之后已成为巴基斯坦舞台上不可摧毁的一支力量，这支力量迅速壮大，成为巴最大的党派。她的回国所掀起的排山倒海的和平抗议浪潮有力地冲击了齐亚的权力基础，充分展示了她的巨大魅力。巴基斯坦的民主之火比以往烧得更亮。布托小姐对前途更加充满信心，她相信民主之梦变成现实不会太远，尽管路上布满荆棘和险阻。

### 十三、世纪之婚

在事业出现重大转折时，布托小姐迎来了生活的春天。

人们常说，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在巴基斯坦这个文盲众多，思想保守，传统力量强大的国家，更是如此。要想在事业上有所作为，你就不得不作出巨大的牺牲。

曾几何时，布托小姐和所有的妙龄少女一样对爱情有过美好的憧憬。

在哈佛的拉德克利夫学院读书时，她就是校园中一朵芬芳的花朵。姣好的身材曾引来不知多少人的目光，东方女性的高雅端庄的气质不知令多少人倾倒。横溢的才华，叫同学们深深折服，名门之女的光环更是让人目眩。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多情俊男曾向她频送秋波。可当时的她一心理头于学习，不愿过早地坠入爱河。她最朴实的想法是满意的职业，满意的婚姻，满意的家庭。她的白马王子应该跟她一样是有事业心和崇高理想的俊才。

也许是布托小姐太幸运了，1977年7月5日那恶梦般的晚上把她的美梦击碎了。突如其来的军事政变改变了布托小姐的人生轨迹。虽然在军管初期，上门求婚的人很多，可那时她的父亲被关在监牢，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她一直为拯救父亲而四处奔波，怎么有心情考虑自己的事情呢。

父亲惨遭杀害后，她的婚姻变得十分遥远了。

按照传统，当布托家族中有一位年长或声望很高的人去世时，一年之内家里是不能有人结婚的。父亲的死给布托小姐的打击太大了，当母亲第二年提及她的婚事时，她拒绝了。

接踵而来的监禁、释放、监禁的生活使她无暇顾及个人的事情，也不可能考虑。她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去，她曾多次表示：“对于我，结婚的时候过去了，我已经和政治结下了姻缘。”

1984年，她流亡英国时，母亲又一次向她提起婚事，而这时，布托小姐刚从监狱里放出来，身心极度疲惫，哪有精力和热情去谈情说爱呢？她只好婉转地对母亲说：“妈妈，我需要平静，需要时间恢复健康，在恢复了健康以后再谈结婚吧！”

在英国的第二年，布托小姐的心情和身体大为好转。上门求婚的人络绎不绝。家里人和亲戚朋友忙乎起来，为布托小姐物色意中人，希望她早日过上幸福的家庭生活。

1985年7月，全家人在戛纳度假时，布托夫人和穆娜姑妈在布托小姐面前提到了扎尔达里家的儿子阿西夫。穆娜姑妈是阿西夫家的老朋友，在此之前，她对阿西夫作了周密的调查，包括阿西夫的学历、职业、爱好，甚至是否喜欢读书都打听过，觉得各方面都挺满意才决定飞到英国向她们提起此事。

然而，沙阿·纳瓦兹的遇害又一次使布托小姐把婚事搁在一旁。她告诉母亲和姑妈，一两年内不考虑婚事了。可姑妈并没放弃她的努力，利用一切机会向布托小姐吹风。

1986年布托小姐结束流亡生活返回巴基斯坦时，姑妈再次登门向她推荐阿西夫。“阿西夫是一个拥有10万人的扎尔达里部族的首领的后裔。这个部落最早居住在伊朗的俾路支斯坦，几个世纪前，迁移到信德的纳瓦普沙地区重新定居。阿西夫现在在那里管理着他家的农庄。他人好，和你的年龄相仿。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在政治上也有影响。父亲是人民民族党的副主席。拉瓦

尔和白河瓦的一些商人家庭也要我为他们提亲，但我认为他们对你不适合。同一个信德人结婚更好一些，因为他懂得地方的风俗习惯……”姑妈唠叨不停，布托小姐却提不起一丝兴趣，她笑着对姑妈说：“您让我先享受一下自由的乐趣吧。”

姑妈看来是一个称职的红娘。不把阿西夫和布托小姐牵到一起，她不会罢休。

1986年11月，在一次聚会上，姑妈趁布托小姐身边没人时，急忙把身材魁梧，一身西装革履的阿西夫介绍给她。当她听到阿西夫的名字时，脸上没有异样的反应，倒是阿西夫显得有点拘谨。她们寒暄了几句后，就点头告别了。

这次会面没有给布托小姐留下特别的印象，但还是在感情的溪流中泛起了小小的浪花。拨动了她沉睡已久的爱的心弦。

她渴望幸福和爱情，但担心事业和家庭发生冲突。一个女人开政治会议开到深更半夜，大部分时间离家外出，到全国各地旅行，不是在家中等待丈夫，哪位男人能够打破传统，支持理解她呢？

那些大批的崇拜者对自己的结婚会是什么反应呢？布托小姐年轻漂亮，多次投进监狱，生活中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她被人们看作是他们心中的圣徒。布托小姐失去了父亲的呵护，失去了兄弟的保护，他们把她看作是自己家人。一旦结了婚，她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会受到影响吗？他们会不会认为自己不需要他们了呢？

但布托小姐十分清楚，在巴基斯坦这个大男子主义统治的社会里，一个单身男子会得到精心的照料，可一个单身女子却不可能获得人们的信任。在人们的眼中，一个女人保持单身总是和犯了某种错误联系在一起，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怀疑。要么这位单身女子太神经质，不能领导国家，要么是太逞强或是太胆怯等等。虽然这是典型的偏见，布托小姐简直不能容忍。但她不得不在这根深蒂固的偏见面前低头。她明白，在穆斯林社会结婚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对于她这个把一切都献于政治的女子来说，结婚已成为她政治生活中的一部分，已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这可能是很多杰出的政治女强人所付出的代价。

布托小姐内心充满着矛盾。可有谁能理解她呢？家里人和亲戚们不断向她施加压力。姑妈可谓锲而不舍。

1987年2月，布托小姐去伦敦参加一个关于阿富汗问题的辩论会时，穆娜姑妈又向她提起婚事。

“他见过你，你就是他要追求的人。他是真心真意想和你结婚。”姨妈也在一边敲边鼓：“阿西夫非常和善，非常慷慨，非常礼貌，你就见见他吧。”

母亲也劝女儿：“我们了解他的家庭，他34岁，和你同岁，信德人。懂得我们的风俗和礼节。他不像都市里那种没有根基的人，那些人会打起行李到任何地方去。而他是农村里的人，对他的家庭和部族都负有义务。所以他会理解你的义务的。”

布托小姐没有完全拒绝。她只是说要等到6月份。她需要时间去真正了解阿西夫，她不能完全听她们的。

布托小姐心里似乎也意识到生活里缺少一点东西。每当她一个人忙完了一天的工作，独自呆在克里夫顿70号时，面对着这座布托家族几代人完成的建筑，孤独和寂寞时常袭上心头，这种感觉在夜幕降临，坐在台灯下看窗外

茫茫的苍穹时显得更加强烈。她的心被搅动了，她不能对婚事再无动于衷了。她需要一个人驱赶她心中的寂寞和孤独。

多少个夜晚她在床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也许是亲朋好友的压力，也许是对成家的渴望，也许是政治的需要，也许是阿西夫的锲而不舍的精神，布托小姐终于迈出婚姻的第一步，决定与阿西夫见面。

她原准备在六月份在英国同阿西夫见面的，但由于同议会反对派会晤耽误了行期。当从伊斯兰回到卡拉奇时，她接到了一张手写的请柬，是阿西夫的继母写来的，说要见她。

虽然面对政治对手的种种折磨，毫无畏惧，可要去见未来的婆婆，就像一位考生去见主考官一样，心里却感到紧张。布托小姐拿着请柬不知如何是好。

“法克里，法克里，我该怎么办呢？”布托小姐打电话给她的表妹，要她给自己出主意。

“要见她”，表妹鼓励她：“只要你愿意，我去陪你，此外，你在我面前谈过的那些疑虑，都可以当面问问她。”

布托小姐鼓起了勇气，在克里夫顿 70 号客厅同阿西夫的继母见了面。她们打量了一下对方，落座寒暄一阵后，阿西夫的继母就把话题转到了婚事上。

“如果你考虑阿西夫的话，那将使我们感到非常荣幸，结婚会为你开辟一个新的天地。”

可布托小姐并不认为一个男人同自己结婚是一件使人荣耀的事情，也许是一场恶梦。她对阿西夫的继母说。

“我的政治生活跟普通人不一样，我不可能静静地等待五年一次的大选，我的政治生活就是为自由而斗争，这是我生命的全部意义所在。一个男人，当他知道自己的妻子的一生不能围着他转的时候，他会是什么感觉呢？”

“我亲爱的，阿西夫是个充满信心的小伙子，他理解你是为了什么。”阿西夫的继母回答。

“我必须经常外出旅行，我不能总带着自己的丈夫一起去。”布托小姐疑虑地说。

“阿西夫有他自己的事业，我亲爱的，他也不是总能同你一起出去的。”阿西夫的继母接过话。

“听说他很喜欢外出参加聚会和社交活动，而我更喜欢在仅有的一点私人时间里同几个朋友呆在家里。”布托小姐继续说道。

“那不会成为问题的，当一个男人要是闲下来以后，他会喜欢同自己的妻子和家人呆在家里的。”她非常肯定地回答。

布托小姐深受鼓舞，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提出了一个条件，“不管风俗习惯如何，我不能同公婆住在一起，白天晚上都有工作人员在家开会，要占用客厅和餐厅。我需要有自己的房子。”说完看了一眼阿西夫的继母一眼。

“我同意，阿西夫也同意。阿西夫的母亲和姐妹们也需要清静。”

布托小姐没有想到阿西夫的继母回答得如此爽快，看来他们是作了充分的准备的，对婚事是慎重的，阿西夫确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男人。

1987 年 7 月 22 日晚上，在长辈们的精心安排下，布托小姐在堂姐塔丽格的公寓同阿西夫会面了。

虽然布托小姐担任过牛津辩论会主席，在群众集会上表现得镇定自若，可她想到自己将同阿西夫见面时却感到不安。当阿西夫和他的继母按照商定的时间敲响公寓的门铃时，布托小姐在一把扶手椅上尽量表现出轻松的样子，但当阿西夫走近她时，她的心好像跳到了嗓子眼上，端庄美丽的脸变得绯红，她连抬头看他的勇气都没有，只用羞怯的目光瞥了他一眼，那天晚上，她没有单独同阿西夫说过一句话，双方的家人朋友也都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

“你觉得怎样？萍姬。”第二天一清早，布托小姐刚一起床，布托夫人，贝佳特姨妈和穆娜姑妈就急切地问她。

“我还没有拿定主意。”布托小姐回答。

布托小姐不是那种一见钟情的浪漫女性。她的年龄，身份和经历都不能使她对感情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想法。作为人民党的领导人，她不能冒解除婚约和离婚这种败坏名声的风险。她要选择的是能够与她风雨同舟，携手到老的伴侣，人生大事怎么能在两三天内确定下来呢，那样它不是太轻率了，她需要时间和机缘。

“如果你娶了布托小姐，你就成为一个为公众所注视的人物了，”布托小姐的堂姐塔丽格进一步考察了阿西夫说，“你所要做的最细小的事情，甚至你同朋友在外面呆得太晚，也会对她产生影响，”但阿西夫回答说：“我希望同她结婚已经有好几年了，我确实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

布托小姐也私下作了一番调查，了解到阿西夫是一个待人非常大方，意志坚强，绝对忠诚的人，而这正合布托小姐的心意。她的许多朋友也都对阿西夫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觉得他是一个富有魅力，才貌双全的男人，极力撮合他们。

红线没有把他们拉在一起，一只蜜蜂却使两颗心发生了碰撞。

见面后的第四天，布托小姐和法蒂到威索尔公园观看阿西夫的一场马球比赛。突然，她感到一阵疼痛，一只大蜜蜂蛰了布托小姐的手。晚饭前，她的手肿了起来。第二天手肿得更厉害了。

“我带你上医院。”阿西夫不顾布托小姐的反对叫了车，请了医生，并按医生开的处方买来了药。

布托小姐躺在床上成了被照顾的对象，这种体验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莫非这就是最神圣的爱情。

第二天晚上，一家人准备到一家巴基斯坦餐馆吃饭，但怎么也找不到这家餐馆，车子里的人很着急。可阿西夫却不停他讲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的机敏和幽默进一步博得了布托小姐的好感。

“到底怎么样，萍姬。”布托夫人问女儿。

“就这样吧，妈妈。”布托小姐在同阿西夫见面七天后终于同意了，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随后，她向新闻界宣读了一份声明，“考虑到我的宗教义务和我对家庭的责任。我高兴地接受我母亲努斯拉特·布托女士对我的婚姻的建议。即将举行的正式婚礼，将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我在政治上承担的义务……巴基斯坦人民一定会获得美好的未来，我将同他们一起为此而奋斗。”

如果是一位普通的女子，其婚姻会平静得如一潭清水。可布托小姐是一位政坛上的新星，是反对党的领导者，是圣洁和美丽的代名词。她在伦敦订婚的消息传到巴基斯坦后，如巨石激浪，引起了强烈的反应。种种流言蜚语

随之而起，说布托小姐已经放弃了政治，去当家庭主妇了，一些人在马路上拦截汽车，扯下大街上的人民党的广告，他们说，由于布托小姐订婚了，现在什么意义都没有了。一些人嘲笑人民党党员，“你们还挂什么人民党党旗，贝娜齐尔已经抛弃了你们”。然而，更多的人为布托小姐过上更正常的生活而高兴。一些城市的糖果被抢购一空，人们说：“在悲伤了10年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欢笑了。”

布托小姐回国后，也一再向人民重申：她是他们的姐妹，永远是他们的姐妹，婚事将不影响她的政治生活。

阿西夫也公开表示，他不会像许多穆斯林男子那样，把妻子用面纱遮起来关在家里，他坚定地支持她的事业。

1987年12月初，俩人宣布将于18日举行婚礼。

为了给其他人树立一个榜样，他们打破了一些传统风习，把婚事办得隆重而简朴。布托小姐拒绝了男方家的巨额彩礼，也只带了很少的陪嫁之物。按照穆斯林传统，新娘在婚礼这天要整天戴着面纱，而且只能在新郎面前露面。可布托小姐和阿西夫却出席了人们为她举行的欢庆会。她说：“我是个领袖，我必须为人民树立榜样。”她也不打算改变自己的姓名。

她的婚礼仪式也与众不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家里按照传统仪式进行，另一部分是在人民党堡垒卡拉奇最穷的地区雷亚利举行，让支持者们分享他们的快乐。

18日下午6时，结婚仪式开始。婚仪既随伊斯兰教义也随伊朗风俗进行，因为她母亲祖籍伊朗。

数十名衣着艳丽的姑娘给布托小姐作了传统式的化妆，并在她的手脚上涂抹了花膏。身着绿色礼服，略施淡妆的新娘与新郎端坐在新人席上，恭听阿訇吟诵《古兰经》，身材修长、面容清瘦、眉宇间稍稍露出刚毅和勇气、曾在万人集会上慷慨激昂地演讲，有“铁蝴蝶”之称的贝娜齐尔，不时对来宾微笑致意，丝毫没有一般穆斯林新娘的羞怯。

诵经完毕后，新娘和新郎及两位证婚人在婚约上签字，随后新娘的婶婶又根据风习将新婚夫妇的头轻轻相碰，象征着他们美满结合。这时，花园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宾客们衷心祝愿他们白头偕老，生活幸福。布托小姐微笑的脸庞在五彩缤纷的灯光下显得楚楚动人。

婚礼的高潮是在雷亚利的运动场。当新娘和新郎前往运动场时，一路上挤满了祝福的人群，街上吉普车播放着庆贺婚礼的歌曲，建筑物上飘扬着人民党的党旗。进入广场时，欢呼声震耳欲聋，偌大的广场上挤着密密麻麻的人，足有20多万，广场上20台大屏幕电视机播送着婚礼的盛况。五颜六色的服装把整个运动场装扮成了一个缤纷的世界。人们伴随着音乐跳啊唱啊，挥着人民党的旗帜。志愿人员好不容易才为新郎新娘打开一条通道。新郎新娘兴奋地走上为他们搭好的舞台。突然，耀眼的礼花和彩色气球腾空而起，欢呼声直冲云霄，构成了一幅美丽生动的图画。新郎和新娘不断地向人们挥手致意，人们也向他们挥手欢呼。

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盛大场面，难怪有的外国记者把它形容为南亚次大陆的“世纪之婚”。

布托小姐把她的婚礼变成了一个盛大的节日。她看到了人民对人民党的支持，人民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婚事而离开她，依然保持着对她的强大支持。她感到了一股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她同齐亚较量的最大资本。

就在举行婚礼的那天，贝娜齐尔发表了一个书面声明，表达了她继续自己事业的决心。“今天，在这个对我个人来说是如此庄严的时刻，我向巴基斯坦人民重申我的保证和我的誓言：我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每个公民的幸福事业，为使我们伟大的民族摆脱独裁统治和恢复自由而奋斗，和过去一样，我将不惜作出任何牺牲。我将同巴基斯坦人民——我的兄弟姐妹们肩并肩地为建立一个没有专制，没有腐败，没有暴力的自由平等的社会而奋斗。这是我过去的目标，是我和你们今天的理想，也是我们将来永不动摇的信念。”

## 十四、天田昆机

1988年5月29日下午5点半，巴基斯坦总理居内久的波音747专机缓缓地降落在伊斯兰堡机场，他刚刚访问了中国。南朝鲜、菲律宾等国后风尘仆仆归来。他在机场举行了简短的记者招待会，但神色似乎有点紧张。他第一次没有按惯例向记者们问候，在招待会上只回答了...二位亲政府记者的提问后就走了，驱车回到了总理府。记者们则赶往“军人之家”。因为在此之前他们被告之总统将要举行记者招待会，一般认为，总统将就他明天早晨访问中国向记者吹吹风而已，不会有重大新闻。

记者们在“军人之家”稍稍等了一下，大约6点钟，总统从后门进来，亲自带着文件，行动异乎寻常。在一般情况下，文件是由他的副官拿着的。记者们的眼睛突然睁大了盯着总统，齐亚进来后跟记者们招呼道“新闻老板们/他的意思当然是：“新闻老板们，你们好”坐下问道：“你们今天...定相当忙吧”一位记者说：“先生，今天我们可以说是连跑带颠了。”总统看着他，又说道：“你现在还得跑呢，我要告诉你一条特大新闻。”

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记者们屏住呼吸等待着一条特大新闻。齐亚简短地说了几句开场白，然后面色严峻地宣读了一份由他本人签署的命令。命令说：“有鉴于国民议会未能完成其被选举时确定的目标和使命，有鉴于国家的法律和秩序恶化到惊人的地步，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有鉴于巴基斯坦公民的生命、财产、尊严和安全没有保障，巴基斯坦的完整和意识形态遭到了严重的危害，有鉴于公共道德下降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有鉴于我认为已出现政府不能依据宪法规定继续工作的局面，必须向选民呼吁，因此，我，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齐亚·哈克将军行使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58条第二款第B节赋予我的权力，解散国民议会并立即生效，由于国民议会已被解散，联邦内阁也立即解散。”

宣读完后，就把命令交给了他的私人参谋长拉法格特将军，让他复印并把复印件分发给记者。然后，总统像以前一样请记者喝茶、吃甜食球和炸饺，回答了记者提出的一些问题，做了昏礼后，回到总统府。

而在总理府，居内久洗尘之后坐在书房里喝着浓茶提神。但他的脸上却布满了愁容，好像在苦苦地思考着什么。这时，他的英俊的副官萨希布扎达叩门要求进去，居内久像往常一样，以微笑的方式答道：“请进来，没事吧？”

“先生，出事啦！”副官神色紧张吞吞吐吐地说。

“怎么，出什么事啦？”

“总统已解散了国民议会和省议会，您的政府职务已被免去。”

“你在说什么？”

“先生，您现在不再是总理了。”

“这一次是谁说的？难道实行军管了？”

“先生，这可不知道。一位朋友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一切，我现在告诉您，详细情况还没能了解到。”

“伊萨尼在哪里？请叫他来，其他人全都好吗？”

“是的，先生。外面一切正常。没有实行军管，只是总统依照权力解散了议会，参议院仍存在。”

过了一会儿，总统秘书伊萨尼走进来，他证实了这个消息。

这时总理府门口已加强了警卫，里面全部办公室被封。



居内久似乎对此也有预感，在他出访前夕，一位前国民议会议员萨里姆·干·哈利曾请他考虑省督可享受退休金的问题，即使某人哪怕只担任一天省督，也有权终身享受退休金和在公共场合使用贵宾室，居内久回答说：“先生，请注意，连议会都危在旦夕，随时都有可能被关掉，我的个人建议是，你们不要养成享受个人优待和特权的习惯，相反，你们最好不要使用贵宾室，就在普通室进出吧，以便一旦明天出了什么事，你们无法面对困难。”但他没有想到刚一回来，自己就被解职了。

其实，齐亚早在三个多星期前，就已在酝酿这一行动，其导火线是奥杰里军火库爆炸事件。

1988年4月10日上午10时15分，在拉瓦尔品第，一阵巨大的爆炸声震动了整个城市，位于城中心的奥杰里军火库上空火光冲天，从军火库中飞起来的火箭残体碎片落入街道，胡同和居民点。在灾难之神从四面八方袭来的情况下，人们从家中跑出，在混乱中各奔他乡，逃难中。母亲忘掉自己的孩子，年轻姑娘也顾不得自己的体面了，火箭足足在空中飞射了半个小时，其情景犹如季节交换时大雁一队队、一群群飞往遥远的地方，许多人被炸成一段段一块块的破碎尸体。

居内久总理在出事时正在信德省视察，他立即返回伊斯兰堡。哈克总统正在访问科威特，也结束访问，起程回国。但是这场尘埃和鲜血汇成的风暴已把这两位领导人之间业已存在的分歧和裂痕变成了深深的鸿沟。

哈克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在各国的生活中，这类事件是时常发生的，做大事业的人也要犯错误，我们国家在过去10年中一直支持伊斯兰圣战，因此早应受惩罚。

居内久却采取了较为不同的立场，他一从卡拉奇回到首都就任命一个由本地区驻军军长伊姆兰中将领导的调查组，责成调查组就奥杰里军火库事件提出报告，他还设立了一个由5名联邦部长组成的委员会，对调查组提交的报告进行审查，向总理提出委员会的意见。然后，总理把委员会的意见提交给国民议会。

经过一周时间的调查，以哈塔克为首的调查委员会提交了第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认为，考虑到在阿富汗当前局势中巴基斯坦政府所作出的牺牲和继续为进行阿富汗圣战所发挥的作用，军火库失火这类事件应被看作是巴基斯坦军人拿头颅所做的奉献，因此对于奥杰里军火库的大嚷大叫实无必要，只需对三四名玩忽职守的低级军官处理就行了。

后来，调查委员会的几名成员又起草了一份与哈塔克意见不大相同的报告。报告认为，奥杰里军火库的设立和管理，过去和现在完全由三军情报局长负责，因此建议处理前三军情报局局长拉赫曼将军和现任局长哈米德将军。

居内久收到两份报告后，即出访南朝鲜等地，他打算在回国后采取行动。他对自己的民选地位和作为总理所拥有的权力十分自豪和自信。在出访前夕，他把两份报告亲自交给了总统。

在居内久出国后，齐亚总统仔细研究了两份报告，他觉得事情不妙，明确地认识到两点。

第一，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居内久都将公布报告，还将努力执行报告所提出的建议。而即使只公布报告，有关军官的前途也肯定会受到影响。

第二，大选已临近。在大选前，居内久不但想使他失去最亲近的心腹拉

赫曼将军，而且想削弱总统本人在自己的真正选区即军队中的地位。

总统再三思虑，感到居内久为他布下了他难以挣脱的罗网。齐亚在他 11 年的统治期间，他的最强大的部门就是三军情报局。情报局在每个时期和各种情况下都向自己提供最好的向导和最佳的情报。

在这种情况下，破坏三军情报局这样有胆识的强大机构的名誉是总统绝对不愿意的。拉赫曼将军是他的最亲近的同事和在阿富汗问题上的股肱。惩罚他也是总统绝对不能忍受的。

于是，就出现了记者招待会上的一幕。

三年前，居内久在齐亚·哈克总统组织的大选中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而后又被哈克任命为政府总理，组织文官内阁，成为仅次于齐亚·哈克的第二号人物。

现在，齐亚一脚把他踢开，军火库爆炸事件只是一个引子。真正的原因是两人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难以弥合的深刻裂痕，而导致了白热化的权力之争。

居内久作为一位文官，主张在巴基斯坦实行具有西方色彩的议会制度，恢复政党政治。他本人于 1986 年在国民议会成立了以他为首的穆斯林联盟，积极敦促参议院和国民议会通过了恢复政党活动的修正法案。

齐亚·哈克作为一位军人政治家，以军人为本。对议会民主和政党政治不感兴趣，主张建立一种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制度。他说：“我国的条件与西方国家不同，我们不能热衷于西方议会民主制。美国和英国所需要的东西同我们需要的完全不同，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民主制度同西方民主制度大相径庭，而他们的制度照样运行得令人满意。”这种说法只不过是齐亚用军队维护自己统治的借口和辩解。

在经济上，居内久执政后，巴基斯坦的财政赤字一直居高不下。1986—1987 年赤字高达 520 亿卢比，1987—1988 年上升到 600 亿卢比，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9% 以上。齐亚对此极为不满。当居内久政府准备在财政预算中大幅度削减军费时，却又招致了军方的强烈不满和巨大压力，这也是齐亚不愿看到的。

随着居内久的羽翼渐渐丰满，这位起初小心谨慎，被人认为是傀儡的总理也对齐亚不那么言听计从了，他想从齐亚那儿分享更多的权力。1988 年 2 月，居内久曾对齐亚·哈克说：“你作为总统是我的上司，而作为陆军参谋长，我又是你的上司。”当时居内久是国防部长，意在齐亚·哈克辞去陆军参谋长之职。这无异于抽掉齐亚的权柄，威胁他的宝座。齐亚自然不会答应，他在国民议会中曾警告居内久说，“巴基斯坦所有的事情不能由我说了算，同样，任何人也不能设想把我变成他的主人的喉舌。”

权力的较量靠实力，居内久当然不是齐亚的对手，一纸之令他就成了千头百姓。有人说他是“莽莽撞撞地走上历史舞台又匆匆忙忙退了下来。”

齐亚剪除一个反对者，但遇到了一个更为强劲的挑战者，这就是一直与他进行斗争的布托小姐。

当齐亚宣布解散议会、罢免总理时，布托小姐已在克里夫顿 70 号同拉卡纳的党员开会。有人在电话里把这个消息告诉她时，布托小姐还不相信，她在电话里说：“你们肯定是搞错了，齐亚将军最怕大选，他根本不会举行大选。”直到各种消息不断传来，记者拥到时，她这才相信发生的一切是真的。

按宪法规定，总统在解散议会后必须在 90 天内举行大选，这时布托小姐

领导的人民党来说是一个机会。很多人认为在这场大选中，人民党的力量势不可挡必将获胜。但布托小姐则显得很谨慎，她对新闻界说：“如果90天内能在政党基础上举行公正自由的选举，我们将表示欢迎。”

确实，要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人民党获胜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在过去的几年里，人民党的力量迅速壮大，人心已倾向布托小姐。齐亚·哈克遇到国内外的压力，而且高层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裂痕，齐亚·哈克的地位受到动摇。

但齐亚怎会轻易交出手中的权力，他更不愿将手中的权力交给布托小姐。在10年前他就说过，他不会把权力交还给他所推翻的人。布托小姐深知，齐亚同自己亲自挑选的总理都难以合作，他又怎能接受按照他的命令处死的那个人的女儿当总理呢？齐亚是不会允许人民党控制议会的。她也估计齐亚会像以往一样在大选前设置种种障碍，玩弄各种花招，使出各种法宝把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

果然不出所料，齐亚首先亮出了第一招。

6月15日，齐亚宣布伊斯兰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从精神上控制人民。但在电视讲话中他没有为伊斯兰法下明确的定义，这就留下了一系列疑问。是要收回印有国父真纳头像的钞票吗？因为在某些伊斯兰教派看来画人物肖像是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是意味要把政府发行的债券宣布为高利剥削吗？因为债券上印着认购者应得的利息。齐亚把解释权留给了法院，只要法官认为其它法律与伊斯兰相违背，其它法律就无效。

齐亚此时宣布实行伊斯兰法，显然是针对贝娜齐尔的。他想利用一些阿訇对伊斯兰教义的解释来竭力阻止她——一位女性参加选举，或者取消她成为议会中多数党领袖的资格。

不过，齐亚这一招并不就能得逞，因为经国内各宗教政党同意的1973年宪法已经宣布妇女可以成为政府首脑。而且，1985年经齐亚·哈克修改的宪法也写明妇女可以成为政府首脑。

齐亚亮出的第二手是坚持1985年颁布的“选举人登记”条款。该条款规定，所有政党都必须向当局注册，凡希望参加选举的所有政党，都必须向当局指定的选举专员提出报告和领导成员的名单，而后选举专员就可以根据提供的材料宣布任何一个政党不得参加大选。选举专员有权剥夺任何政党的成员14年的参选权利，甚至可以判处他们7年的有期徒刑。

很显然，这部法律旨在把人民党排除在大选之外，它不仅侵犯了公民的最基本的自由权利，而且给了齐亚所任命的人一种权利，由他们决定哪个政党符合条件。

1986年2月，贝娜齐尔曾向最高法院对选举人登记条款提出上诉。最高法院不顾齐亚的压力在6月20日一致裁决：齐亚·哈克的登记条款“全部无效”。法官们认为，“议会政府是由政党组成的政府，政党政府是代议制政府的一个根本原则，选举最起码是统治得以合法化的手段，政党制度使选举的结果转变为政府。”“以个人身份选入立法机构的人并不重要，只有在他们联合一起成为政党时，他们才能通过自己的活动形成一股有某种影响的力量。只有当他们成为政党成员而不是立法机构的单个成员时，他们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法院的判决是对齐亚的一次重大打击，也是人民党在法律和道义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政坛高手的齐亚一招不成，又出一招。

7月20日，贝娜齐尔在克里夫顿70号同澳大利亚大使共进早餐时，有人告诉她，齐亚刚刚宣布，大选要在11月16日举行。

齐亚承认根据宪法，大选应该在解散国民议会后90天内举行。但他说，考虑到雨季到来和即将来临的穆斯林哀悼节及朝觐月，他决定推迟大选，因为哀悼节内气氛紧张，到麦加朝拜的人达9万多，不适合选举。

这已经不是齐亚第一次推迟选举了，以前曾两次推迟选举，现在故伎重演，是经过精心考虑和选择的。

齐亚解散了议会和总理后，发现自己几乎成了一个孤家寡人。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人民党，他任命了原居内久内阁中的九名成员作为他临时看守政府的成员，甚至公开向他们道歉，指责他们腐败和行为不端“伤了他们的感情”。齐亚需要时间来稳定内部。

另外，国内盛传贝娜齐尔已经怀孕，而且产期是在11月份。就连齐亚的三军情报局也这样认为。齐亚把选举安排在11月份，身怀六甲的贝娜齐尔就不可能到处发表演说，这样将大大降低她的影响。齐亚真可谓用心良苦。生儿育女这样一件很平常的事，如今变成了巴基斯坦政治斗争的敏感问题。贝娜齐尔及其家人也将计就计对产期严格保密，让当局摸不着头脑。

7月21日，齐亚·哈克挥出了重拳，又宣布大选将在非政党基础上进行，候选人不准以政党的名义进行选举，在政党基础上的选举是违反伊斯兰精神的。因为政党的决定往往会影响个人的良心。这只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真正的原因是他害怕人民党在选举中获胜。就在宣布决定前，他还密召4个省的首席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举行秘密会议，商讨选举是否应在政党基础上进行。会上绝大多数人认为，由于穆斯林联盟发生内江，贝娜齐尔将会很轻松地赢得多数席位，成为唯一的多数党。所以齐亚不惜冒违宪的风险使出他的杀手锏，想致贝娜齐尔于死地。

然而，齐亚还没有在大选中与贝娜齐尔较量，一个偶然的差错改变了巴基斯坦的历史进程。

1988年8月17日凌晨，一阵电话铃响起。哈克拿起话筒，原来大清早打来这异乎寻常电话的，是他以前的军事秘书马赫姆·杜拉尼少将，他现在是装甲兵司令。他请求总统今天无论如何要去巴哈瓦尔普尔，观看美国最近提供的艾布拉姆新型坦克在沙漠中的作战表演。他听到总统回答很勉强，又补充说，届时整个陆军司令部的人全在那儿，话中之意是如果总统不出席，那会被认为是对他们的一种轻慢。哈克只好答应了。

上午，哈克总统来到伊斯兰堡机场，一架美国制造的C—130四引擎大型运输机已准备妥当。在机场等候他的已有巴基斯坦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总统未来的接班人阿科塔·阿卜杜拉·拉赫曼上将。他和总统一样，原来也不愿去观看这次表演，但头天下午他的部下向他汇报了一个重要情报，阿科塔随即向总统挂电话，总统告诉他，第二天随机向他汇报就行，就这样，他也来到机场。在机场等候的还有总统的新闻秘书沙利克和军队的几位高级将领、政府的几位高级官员以及总统的两位朋友：美国大使阿诺德·拉斐尔，美军驻巴军援团团团长赫伯特·沃森将军。

飞机很准点地降落在巴哈瓦尔普尔军用机场。总统冒着酷热，穿着军服，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坦克的表演。但遗憾的是表演失败，总统对参加演习的将士们发表了讲话。中午，总统一行在军官食堂同高级军官们一起用了餐。尽

管坦克表演不尽人意，但总统还是高兴地与大家边吃着冰淇淋，边开着玩笑。回到跑道后，他面朝麦加方向跪下。登机前，他同当地军官热烈地拥抱告别。

下午，哈克总统准备去拉瓦尔顺便视察一支部队，然后返回首都伊斯兰堡。

3点30分，总统一行登上了被称为“空中一号”的C—130飞机。飞机上装有一个“气密小座舱”（类似集装箱的活动房子）。密室内前后设有3排条椅至少可容纳12人。前排为高级的舒适座位，后两排为普通座位，它与驾驶舱相连，用一扇门和三级台阶相隔，平时可从飞机上卸下保存，需要时再安装在飞机上。前边的高级座位坐着哈克总统，阿科特上将以及两位美国朋友。8位巴基斯坦将军分坐在气密小座舱的后两排长凳上。陆军副参谋长米尔扎·阿斯拉姆·贝格中将回程没有同行，他谢绝了总统在起飞前一分钟的邀请，他说，在回去的路上要参加一个会议。等巴基斯坦一号座机升空后，他立即坐上一架等候起飞的小型涡轮喷气机。

这时，天空中出现了一架保安飞机，它结束了对基地周围地区的最后一次检查。这种例行检查是因6年前恐怖分子向“空中一号”发射一枚导弹而采取的一项安全措施。它检查后向飞行控制塔发出了总统专机可以起飞的信号。

3点46分，机场周围天空晴朗，万里无云。“空中一号”开始升空。片刻，在控制塔上的机场负责人萨欣·费兹尔询问“空中一号”驾驶员迈斯胡德飞机现在的准确位置？驾驶员用无线电回答：“空中一号”准备发信号，但地面迟迟没有接到信号，再次呼叫仍然没有回答。这时地面人员开始惊慌起来，费兹尔立即请刚从查克提拉基地调来的“空中二号”追上“空中一号”，想在空中取得联系。“空中二号”追上“空中一号”后不停地呼叫，不一会儿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声音，“向我靠拢！向我靠拢！”，这是“空中一号”副驾驶员萨金的声音。后来“空中二号”与另一架准备起飞的飞机又收听到哈克总统的助手那吉·阿罕默德微弱的声音，他又喊道：“迈斯胡德，迈斯胡德，你要干吗？”这是总统座机上传出的最后一句话。

飞机起飞大约两分钟，地面目击者看到“空中一号”飞机上下剧烈颠簸。几分钟后，同时起飞的两架护

航飞机上的驾驶员突然向地面报告：“总统座机冒出烟雾和火花！”报告话音刚落紧接着又传来护航飞机驾驶员惊慌失措的呼叫声，“总统座机起火爆炸！”

3点55分，在离机场8英里处，座机在空中盘旋了两圈后，以65度方向快速下坠，一头扎进沙漠里，随着一声巨响，机身粉碎，燃起大火。事后，据现场调查，大部分残骸散落在一个直径不到40公尺的地带，可以辨认的最大部分是一个机翼，另一个机翼炸落在离失事中心1公里的地方。总统和机上其余29人全部遇难。经过大火焚烧，尸体已无法辨认，有的是仅靠他们身上佩带的残存勋章才鉴别出来。

飞机失事后，陆军副参谋长贝格将军乘坐的飞机在燃烧着的总统座机残骸上空盘旋了一会儿向伊斯兰堡飞

去。在空中，他用无线电通知在伊斯兰堡的陆军高级将领，要他们在他降落时赶去报到。由于总统和主要高级将领遇难了，他作为陆军最高指挥官，

当然下令部队迅速控制政府各要害部门和其他战略要地。

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总统座机怎么会失事呢？

8月18日，由空军司令员率领的一个调查小组先期赶往现场，经紧急协商，美国政府也派了8名技术专家协助，其中有C—130飞机制造厂洛克希德飞机公司

的专家。他们对500名目击者，其中包括空军保安人员，地勤人员及行李理货员等进行了询问，并在座机坠落地点6公里范围内进行了搜索，收集了座机的残存部件。

专家们认为，一般发生空难的原因主要有五种：气候因素，机械故障，技术错误，两机相撞和人为破坏。

出事当天下午，巴哈瓦尔普尔地区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能见度很好，气象台的记录就是最好的证据，气候因素首先被排除。

飞机引擎没有毛病，飞机坠地时发动机在叶片变形前仍在高速旋转。坠机后被扣押的加油车取油样化验。证明燃料未受到污染。飞机的电力系统一直在工作，因为机上的两只电钟停在飞机擦地一刹那的时间上，调查人员将控制系统的位置同液压阀的结构和机尾稳定器进行比较后，确定飞机在坠落时控制系统是正常的。专家认为，即使发生机械故障，飞行员也完全来得及报告地面，设法在附近机场降落，不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出现机毁人亡的恶性灾难。因此，机械故障的原因完全可以排除。

驾驶员是经过严格挑选的，起飞前身体状况良好，没有出现疲劳紧张的情绪，机长迈斯胡德空军中校是巴基斯坦数一数二的老牌飞行员，他技艺高超，荣获过多枚功勋章。况且这驾总统专机是双倍建制，机组共有13人之多，而且飞机失事又不在起降的关键时刻。因此，出现技术错误不成立。

出事当天，所有空军基地都采取了常规安全措施。其中包括飞行控制和地面指挥，附近也没有发现其他飞机，因此不存在两机相撞的可能。

上述原因排除后，唯一可能就是人为破坏，巴基斯坦官兵普遍怀疑，总统座机爆炸是有人故意破坏。

1988年10月，巴政府公布了由巴基斯坦空军技术委员会在美国专家协助下，经过两个月调查后提出的哈克总统空难事故技术调查报告。这份长达350页的报告认为：专机坠毁事件不是飞机机械故障和驾驶员操作失误，也不是遇外界的武器袭击，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人为破坏，调查中发现，座机货舱后门处有中度破坏的爆炸裂痕，残片上有超常量的磷、锌、硫化学成份，经过化验分析，这些化学药品能成功地制造一个低度的雷管，这种雷管足以引爆炸药和其他爆炸物。在机上还找到被焚烧过的芒果箱，一个残留的芒果核中含有过量的钾，另一个芒果皮上含有不应有的锌和氯。专家认为，破坏者有可能使用毒气弹。20箱芒果是当地知名人士送给总统的，在总统座机起飞前最后一刻搬上飞机的。专家认为这种毒气炸弹可能藏在芒果箱中。报告说，这种化学制剂，可以自行释放或通过遥控办法释放出足以让驾驶员丧失工作能力的毒气，从而使飞机失去控制坠落地面。

1989年6月17日，英国《泰晤士报》透露了记者采访“空中二号”机组人员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情节，证实了这种推测。当“空中一号”与地面失去联系后，地面指挥部立即派“空中二号”起飞，与“空中一号”在空中取得联系。“空中二号”不停地呼叫，三四分钟后，突然听到“空中一号”传出的呼喊“迈斯胡德……迈斯胡德……”的微弱声音。他们认为，这声音是

齐亚·哈克的军事秘书纳吉布·艾哈迈德准将发出的，从声音微弱的程度来推断，声音显然出自驾驶舱后面的“气密小座舱”。这也意味着当时无线电换话器是开着的。按以前的经验判断，他们认为，驾驶员长时间的沉默只能作出一种解释：迈斯胡德和机组其他人员要么死了，要么失去了知觉。坠毁地点目击者说：“当时看到飞机像是滑行在铁道上那样上下摇动。”根据 C—130 飞机专家们的说法，在没有驾驶员操纵的情况下，这种飞机即进入自动操纵方式：首先是机头朝上，然后机尾机械装置自动地矫在过正，造成机头暂时朝下，过一会，由于无人操纵，它又朝上。每次上下摇动都比前一次更为明显剧烈，直到飞机坠毁为止。

既然是人为造成的，那谁是凶手呢？一位分析家说：“齐亚总统树立了许多敌人，现在有几个反对他的组织，其中的任何组织都可能这么干。”事实上，在齐亚·哈克总统执政的 11 年里，有的暗杀者已动了真格，但都失败了，1982 年曾有一枚导弹射向飞行在拉瓦尔品弟上空的总统座机，但没有击中。

是巴勒斯坦游击队？阿布·尼达尔领导的巴勒斯坦恐怖组织是哈克总统最为担心的，因为巴基斯坦曾指控他的 5 名枪手参与了 1981 年卡拉奇劫持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事件，并缺席判处了他们的死刑。因此，他们曾发誓要杀死齐亚·哈克总统。

是苏联支持的阿富汗政权？为了制止哈克总统继续将世界各国支援的物资和武器装备供给阿富汗游击队，仅在 1987 年，苏联和阿富汗的情报机关就在巴基斯坦境内策划了 127 起恐怖活动，其中有的是直接针对总统本人的，结果已有 34 名平民死亡，1200 人受伤，就在哈克遇难前两个月，内阁秘书卡塔克还提醒总统，来自阿富汗的情报说，一个受命于苏联克格勃的特种暗杀组织已把他列入暗杀黑名单，名单上还有阿科塔将军，苏联人当然不大可能让美大使一同受害。而美国人在坦克表演前...天确实计划乘美国武官的喷气式飞机返回伊斯兰堡的，所以苏联人不会想到飞机上有美国人。

难道是国内反对派？哈克总统政变成功后加紧了对国内反对派的镇压。为了防止布托领导的人民党东山再起，他以首席军事执政官的权力，逮捕了布托夫人及女儿，接着绞死了布托，宣布人民党为非法，人民党和布托家人当然不甘心。贝·布托的弟弟米尔·穆尔塔扎不久后组织了一个旨在杀死哈克总统的游击小组，1981 年该小组劫持一架巴航波音 727 飞机，迫使总统用 5 个政治犯交换人质。哈克座机坠毁后，该小组声称是他们所为。后来得知同机遇难的还有美国大使，又否认了自己的说法。

最危险的是穆斯林中亲伊朗的什叶派。他们占巴 1 亿穆斯林中的 20%，对哈克总统的亲美政府和把逊尼派树为正统穆斯林十分不满，尤其是他们认为属于逊尼派的哈克总统是 8 月 5 日行刺什叶派著名宗教和政党领袖胡申尼的幕后策划者，并发誓要对哈克报复。

军人也属于怀疑之列，齐亚·哈克上台后，一直抓住军权不放，1980 年后，哈克通过全国公民投票方式当选总统，恢复议会和民选政府，这时哈克作为陆军参谋长，当选总统后应当脱下军装，然而尽管国民议会。反对党，军队内部有人多次呼吁哈克辞去军中之职，但哈克一直拒绝，并声称死也要穿着军装死。哈克还不断在军中主要位置安插自己的亲信，调整不可靠的军官，这种做法也引起了不少军官的不满。

尽管保安措施是严密的，但有人认为出现了一些漏洞。本来总统专机和

民用专机应在木尔但机场着陆，可那天总统座机却停在巴哈瓦尔普尔军用机场。因该机场大小，容不下两架大型飞机。另一架只得停在查克拉拉基地。这样，总统返回时坐哪架飞机再清楚不过了。按规定，总统座机停放的机场有三股不同武装力量保护，空军警察和军事警察已在各进出口处；随从部队在专机周围四百码警戒；地方安全警察守卫机场。但这种分工没有统一性。那天一位地方警官看到两个人不经任何检查走进飞机，似乎在维修飞机。但因分工不明没有查问。另外在失事后没有对机组人员的尸体进行解剖，尸体在巴哈瓦尔普尔军事医院放了两天。原准备由美国和巴基斯坦病理学家组成的小组解剖，但当小组成员即将到达医院前，医院却接到命令，尸体被拖出去埋掉了。

美国派出的调查组成员没有一名是刑事专家，而且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报复的强烈要求，没有作出任何要找出暗杀者的真正努力。

齐亚·哈克去世的那天恰好是星期三，有意思的是他以前作出的最重大决定大多是星期三。

在 1979 年 4 月 4 日（星期三），哈克批准把布托处以绞刑。在哈克的统治下，举行的第一次大选是在 1985 年 2 月 27 日（星期三）；

哈克同意签署关于苏军撤出阿富汗的日内瓦协议是在 1988 年 4 月 6 日（星期三）；

他在解散政府和议会最后确定他的看守政府的时间是 1988 年 6 月 8 日（星期三）；

哈克在 7 月 20 日（星期三）宣布盼望已久的大选的日子是 1988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三）。

齐亚的死是一个谜，他的一生和星期三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是一个谜。

他的死也结束了一个时代。

当齐亚·哈克死亡的消息传来时，克利夫顿 70 号的紧张气氛顿时烟消云散，爆发出激动人心的欢呼声。但房间的女主人布托小姐并没有附和，她显得相当镇静自如。她只是说了一句：“这家伙真的死了，我的真主啊！”但从她那一头长发匆匆地飘动起来仍可看到她非常激动。

为了这个日子，她已等了九年，她一直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等待齐亚·哈克不复存在的日子，她在这九年时间里发誓要与他拼到底。然而最终判给她的是另一种命运，这是她没有预料到的。对她来说，齐亚·哈克的死来得太突然了，而且也太早了。人民党还一盘散沙，她自己也将分娩。整个国家的民情虽然已经激愤起来，但还没有达到足够的程度。在通向权力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但她有信心去克服它们。

人们都在这黑暗的房子里来回踱步，家里所有的椅子都搬到这里来了。贝娜齐尔一个人坐在唯一的沙发上，电风扇无精打采地转动着。巴基斯坦通讯社来了，贝娜齐尔抓住机会向这个一直是不可接近的男人俱乐部的国家发出了她的第一个政治家声明。她当然不会去扮演一个二等角色，她心中非常清楚她现在该讲什么。“生和死掌握在上帝的手里，我们感到惋惜不已，那么多的人在这次悲剧中丧了生，我们准备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以便能和平地完成过渡时期。”

贝娜齐尔的谈话传向四面八方，各国通讯社的记者纷纷乘飞机前来。有从北京来的，有从欧洲、美洲来的。新闻记者已顾不上巴基斯坦的规定，提着旅行包、带着照相机、闪光灯疲惫而匆忙地涌出机场。齐亚·哈克还未安



葬，他们已向贝娜齐尔欢呼了。

房间里的电话铃声再也停不下来了，“谁，是哪家报纸，您能拼读一下吗？是哪家新闻社？”“您们真的不知道吗？”都是报社记者打来的。

电视乡采访络绎不绝，穷于奔命的 BBC 一下子排在第一位，英国的 ITV 却不慌不忙地被列为第二，美国也许会提出抗议，下面便是 NBC、ABC 以及各家电台和新闻社。贝娜齐尔·布托不愧为这块亚洲次大陆上的女儿。对这块大陆上的精英来说，伦敦仍然是世界的中心，BBC 获得了第一个 45 分钟，ITV 得到的是以后半个小时。对于世界上剩下的电台和新闻社所用的时间自然不多了。布托小姐只好婉拒其它的电台采访。她需要时间同她的朋友共商政治决战的战略和策略。

齐亚·哈克遇难后，按照宪法，巴基斯坦参议院主席，73 岁的乌拉姆·伊沙克·汗于 8 月 17 日出任代总统，并迅速组成了由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法律和议会事务部长以及陆海空三军参谋长等组成的紧急委员会负责国家安全问题。

当天晚上，伊沙克·汗向全国发表电视广播讲话，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呼吁人们保持克制和冷静，同时声明将在宪法的范围内如期举行大选。

各方对伊沙克·汗的讲话普遍表示欢迎。贝娜齐尔认为，伊沙克·汗继任总统是局势的积极发展。人民党在按宪法秩序实行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将与当局合作。前总理居内久也对伊沙克·汗继任总统持赞同态度，称这使国家避免了一场危机，作为穆斯林联盟主席，他呼吁全民族谨慎从事。军方也支持政府的政策，陆军参谋长贝格将军声称，“军队无意夺取国家政权，保卫国家的安全与领土完整是唯一目的。”

各方的慎重克制态度使巴基斯坦的政治局势比较平静，没有像以往那样出现重大危机和流血事件，这就为权力的和平交接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历史给贝娜齐尔提供了天赐良机。

## 十五、登上宝座

齐亚·哈克命丧黄泉后，巴基斯坦顿时陷入一个变幻莫测的非常时期，表面上局势没有大的风浪，实际上很不平静，各派正在加紧积蓄力量制定方略，以求在填补权力真空的较量中赢得最后的胜利。

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政党林立，但最有力量在国民议会中取得多数的主要是两大政党，一个是由贝娜齐尔领导的人民党，另一力量是穆斯林联盟。

人民党是全国性政党，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十多年来，在反对齐亚的统治中，赢得了人民广泛支持和拥护。贝娜齐尔在斗争中所表现出来们坚强意志，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非凡魅力征服了成千上万的人民，人民党在国内掀起的民主浪潮展示了它是一支能够领导国家的政党。

穆斯林联盟也是一支颇有影响的政党，该联盟原为执政党，许多政府官员和议员均加盟此党，他们的政治经验丰富，活动能量相当大，但在齐亚·哈克解散议会，罢免了居内久的职务后，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前总理居内久为首，他在人民中有一定的影响；另一派是纳瓦兹·谢里夫。此人是穆斯林联盟旁遮普省主席，1949年12月生于拉合尔，曾就读于拉合尔行政学院、旁遮普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81年，他出任旁遮普省财政部长、体育部长等职，1985年2月，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和旁遮普省议会议员。1985年4月，谢里夫执掌经济实力和人口都占巴基斯坦60%的旁遮普省首席部长，成为一颗政治新星。

尽管居内久和谢里夫在穆斯林联盟的权力争夺中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但在贝娜齐尔领导的人民党的挑战面前，两人也有可能坐下来讲和，联手对付贝娜齐尔，如果军方为他们助一臂之力，其实力不可低估。

当然总统和军方的力量也不能小觑，伊沙克·汗是多朝元老，他性情温和，头脑精明，处事谨慎，从政经验非常丰富。他和军方的关系也比较融洽，从未惹过那些威风凛凛的将军们，他的态度对政局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在巴基斯坦的历史上，谁也不能忽视军队的力量。军队对政治留下过深深的烙印，曾三度接管政权。第一次是1958年10月，陆军总司令阿尤布·汗接管政权取代伊斯坎德尔·米尔托自任总统，并对全国实行军管；第二次是1969年3月，阿尤布在各种压力下，把权力交给了陆军总司令叶海亚·汗。他接管总统后，再次实行军法管制；第三次是1977年7月，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推翻布托政府，在全国实行了长达8年的军事统治。

这次军队没有立即接管政权，主要是因为军队中缺少一个铁腕人物。57岁的新任陆军参谋长贝格将军资历较浅，1985年担任军长，齐亚死后才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地位还不稳固。另外，长期的军管已让人们们对军人政治感到厌倦，人民渴望民主和自由，军队不敢忤逆人民轻举妄动，再说齐亚死后的局势比较平静，军队接管政权的理由尚不充分。尽管如此，军队的动向仍然事关大局。

不过，总统和军方均作出了有利于大选的承诺。伊沙克·汗在8月26日发表的讲话中重申：“大选将按期于11月16日举行，并呼吁人民忘掉彼此间微不足道的矛盾，埋葬相互间的偏见和敌意。”贝格将军在8月25日召开的一次全军军官会议上发表演说，强调军队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的安全统一和团结，军队不干预政治，不干预将要举行的大选，除非应政府之召处理社会治安问题，否则不介入政府事务。

总统和军方的态度为大选搭起了一个环境宽松的政治大舞台。不过要实现公正自由的选择还需扫除横亘在大选道路上的一些障碍。最大的障碍是大选以什么方式和什么时间举行，哈克猝死留下了一系列问题。

1988年5月29日，哈克总统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和联邦政府。7月下旬，哈克总统宣布，全国大选将于11月16日举行，选举以非政党为基础，这一宣布引起了一些反对党派的争议。大多数政党强烈要求未来的大选应以政党为基础，巴基斯坦人民党领导人贝娜齐尔·布托为此曾向最高法院提出起诉。

根据宪法程序，参议院主席伊沙克·汗继任总统后明确宣布政府将严格按照宪法规定行使行政权力，至于大选的日期和方式将由最高法院作出裁决。

9月20日开始，拉合尔高等法院开始审理部分前议员申诉案件，经过一周的法庭辩论，9月27日，全体法官一致同意作出裁决为，齐亚·哈克解散国民议会的理由是“如此模糊，笼统而不成立，因而其命令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宪法未规定可以随意解散议会”。判决书后半部指出，“鉴于总统已宣布不久即将举行大选产生新的议会，被解散的议会也不得恢复”。

这一宣判公布后，舆论界和许多政党人士表示赞同和拥护，但联邦政府不同意判决的前半部分，认为已故总统采取5·29行动的理由是充足的，不能称之为违宪行为，因而针对拉合尔高等法院的判决，向最高法院上诉，与此同时，部分前国民议会议员反对拉合尔高院判决的后半部分，认为既然判定5·29行动是违宪行为，那么，恢复原国民议会才符合逻辑，拉合尔高院的判词是前后矛盾的。因此，他们也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恢复被解散的国民议会。9月30日，100多名前议员签名，要求恢复议会，国民议会议长已宣布于10月2日在原议会大厦召开议员大会。如果这次议会得以召开并决定恢复被解散的前政府，那么，巴基斯坦就会出现两个政府并存的政治危机。

在这危机之际，巴基斯坦最高法院于9月30日发布紧急命令，中止执行拉合尔高级法院的判决并禁止被解散的议会于10月2日或其它时间在伍斯里堡或其它地点聚会，议长和前议员接受了这一命令。最高法院同时宣布，将于10月2日开始审理人民党领导人贝娜齐尔·布托就大选方式提出的起诉案和有关方面不照拉合尔高级法院判决的上诉案。一时间，全国人民的眼睛都关注着国家的最高司法机构如何解决已故总统和反对党派关于选举方式之争以及国家的行政机构和前立法机构关于拉合尔高院判决之争。10月2日上午9时，最高法院首先审理关于选举方式的案件，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法庭辩论，全体法官进行了合议并起草了判决书，其中援引了多款宪法条文，决定各政党有资格参加大选竞争国民议会和各省议会的所有席位。全国各政党有权使用竞选标志，并规定选举委员会有权向一个或二个以及二个以上联合竞选的政党分配一个竞选标志。

当天，伊沙克·汗总统接到最高法院判决书后，立即召开全体内阁会议，决定执行最高法院的判决，如期举行以政党为基础的选举，紧接着，最高法院开始审理关于不服拉合尔高院判决的上诉案，经过4天的激烈法庭辩论，10月5日下午，由12名最高法官一致同意作出如下判决：根据宪法精神，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必须以巴最高利益为出发点，国家利益必须高于团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最高法院维护拉合尔高级法院的原判，并重申让人民在即将开始的选举中自由、公正地选出自己的代表，由新的议会产生新的政府。最高

法院的判决排除了横亘在大选道路上的两大障碍，为大选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

按照法律规定，竞选候选人有一个月的竞选活动。

10月16日，大选的序幕刚刚拉开。布托小姐就出现在竞选的集会上。她在9月21日生下了一个白胖胖的小子，脸上还有点浮肿，身体还较虚弱。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贝娜齐尔以雄辩的口才，超凡的个人魅力和必胜的信念如一尊巨大的磁石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人们仿佛又看到了她父亲布托总理的身影，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在她的周围。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为人的海洋，就响起冲天的欢呼声。

“贝娜齐尔来了，贝娜齐尔来了！”

“贝娜齐尔，初升的太阳！”

“贝娜齐尔，我们的信心！”

“贝娜齐尔，国家的希望！”

为了接近选民，贝娜齐尔不乘飞机，而是坐着普通的火车到各地发表演说。在拉瓦尔品弟、拉合尔、卡拉奇等大城市，狂热的支持者们使火车难以出站。人们挤到站台上，爬到信号杆上，扑在车厢顶上，一睹他们心目中英雄的美貌和风采。

在短短的十多天里，贝娜齐尔以其惊人的勇气和毅力，乘火车完成了3.1万英里的竞选，足迹遍及巴基斯坦的城市农村、中心边陲。人民党的竞选宣言“我们的信仰是伊斯兰，经济是社会主义，政治是民主，一切权力归人民。”深深地打动了人民的心弦。

她的母亲努斯特拉·布托夫人也在9月份从英国回来，帮助女儿领导人民党竞选，竞选开始后，她不顾疾病缠身，乘飞机穿梭于各大城市发表演说，宣传人民党的主张，所到之处也受到了人民的欢呼。

当竞选进入到白热化，母女俩满怀信心地最后冲刺时，11月12日，最高法院突然作出一项判决。规定选民在投票时须出示身份证，理由是防止出现欺诈事件，影响选举，因为在过去的选举中，发生过舞弊现象。

这项规定显然对贝娜齐尔的人民党不利，贝娜齐尔在竞选中对妇女权利的许诺和她的独特魅力对绝大多数女性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其中女性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成千上万的女性则没有身份证，现在法院在大选前的关键时刻作此限制，给贝娜齐尔的竞选蒙上了一层阴影。人民党立即对这项违反宪法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向最高法院上诉。最高法院没有收回它的决定，但选民可在剩下的时间里领取身份证。从11月13日起，许多选民从早到晚排起了长队，申领身份证，他们要参加人生中一次划时代的选举。

大选前夕，伊沙克·汗代总统再次强调他将保证大选在自由、公正的气氛中进行，军方首脑贝格将军也表示军队将尊重人民的选择。

11月16日，是巴基斯坦大选的日子，人民为了这一天的到来等了11年。

这天天气晴朗，阳光普照着大地，是一个吉祥如意的好兆头。巴基斯坦30来个政党和许多无党派人士11年来第一次自由公正以和平的方式在政坛上一决胜负。4400万巴基斯坦合格选民在全国3300个投票箱投票。由美国、英国、日本等许多国家的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前去察看巴基斯坦的民主进程，数以百计的外国记者们风尘仆仆赶到巴基斯坦报道这一引人注目的事件。

那天一清早，身穿民族服装的选民手持身份证纷纷来到附近的投票站，一个个投票箱装饰一新，门前插满了花花绿绿的各政党的旗帜，花样繁多的

标语琳琅满目，还挂着许多横幅标语，各政党领导人特别是贝·布托的画像比比皆是，有人说“这不像是投票，倒像是展览会。”

在投票站有大批的军人维持秩序，在街上还有装甲车巡逻，气氛看上去很严肃，但选民的脸上却显得相当轻松，秩序井然有序。

在巴基斯坦的穆斯林中，70%是文盲，因此各政党选择了能吸引选民的各种标记作代表，从“闹钟”到“拖拉机”……共有80多种。范围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其中以“箭”和“自行车”的标记影响最大，最为选民所熟悉。前者代表最大的政党，以贝·布托为首的人民党，后者代表由穆斯林联盟，伊斯兰促进会，伊斯兰神学者协会等9个政党联合而成的穆斯林联盟，这场竞争实际上也是“箭”与“自行车”之战。

投票者按照顺序在仔细辨认了候选人名单上的标记后，郑重其事地把选票投进了投票箱。在历史上，选民们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像这样对待选举。

在经过紧张的点票和意料中的等待后，17日晚，巴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布以贝娜齐尔·布托为首的人民党在昨天的选举中以较大的优势获胜。人民党在国民议会207个穆斯林议席中获92席，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伊斯兰民主联盟仅获54席。

当人民党获胜的消息传到信德省的拉卡纳时，乡亲们为这样一位巾帼英雄而欢欣鼓舞，贝·布托兴奋不已，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当她冲出家门来到父亲的墓地告慰九泉之下的亲人时，数以千计的支持者围上来纷纷向她抛撒花瓣，“布托万岁”的欢呼声不绝于耳，贝·布托激动得热泪盈眶，她哽咽着对父老乡亲说：“感谢你们，我的父老乡亲，我将承担起神圣的使命。”随后，在拉卡纳自己的别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她说，尽管在旁遮普的投票中出现了一些不利于人民党候选人的作弊现象，但她承认选举结果，并期待着受命组成下一届政府。

11月19日，四个省议会进行了选举，人民党再次获得多数，在四个省议会总共460个议席中，人民党获得184席，伊斯兰民主联盟获得了145席。

尽管在国民议会和省议会选举中，人民党占据优势，但也有美中不足，人民党没有在国民议会中获得半数席位，人民党要组阁必须得到其它小党和独立人士的支持。在省议会选举中，人民党在总数上领先，但分布不均，它只在信德省获得多数，在100个议席中占有93席，而在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伊斯兰民主联盟和伊斯兰神学者协会拥有强大的势力，分别以30席和16席对人民党的20席和3席。在全国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政治上最有影响的旁遮普省议会，伊斯兰民主联盟以108席对人民党94席，执掌该省大权。

在巴基斯坦政治舞台上的力量格局中没有一党占绝对优势地位，每一个政党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其它力量的制约，在大选刚结束时，伊斯兰民主联盟的领导人谢里夫也对外界说，他将联合其它党派击败贝·布托组建新政府。

贝·布托现在离总理的宝座只有一步之遥，在道路上还有一些障碍。

不过整个形势对贝·布托是有利的。伊沙克·汗代总统在选举揭晓时，针对贝·布托反对者的竞选声明，说女人是不能领导伊斯兰国家时表示，宪法中没有任何阻止反对党领导人贝·布托出任总理的规定，如果她的党在竞选中获得多数票，我们将按照宪法行事。军队的表现也令人民党满意。陆军参谋长贝格将军多次打电话给多数党的领袖们，包括贝娜齐尔的母亲，有影响力的人民党终身主席努斯拉特·布托表示祝贺，并保证军队支持有广泛基

础的政府。

贝·布托与谢里夫一方面为争取小党的支持，频繁活动，都声称要吸引独立人士和小党派加入自己的联盟，组成自己的政府；另一方面也积极同伊沙克·汗代总统和军方进行磋商，寻找合作。

11月22日下午6时30分，贝娜齐尔从卡拉奇飞抵首都伊斯兰堡机场，直接驱车总统府，按预定的时间会见了伊沙克·汗总统。伊沙克·汗明确表示，他将按照宪法的方式授权继任政府，两人在权力移交等方面达成了一些共识，但贝·布托在未来的总统人选上还有一些保留。

一个小时后，贝·布托又赶到陆军总部与军队首脑、陆军参谋长贝格将军共进晚餐，两人的会晤持续到深夜，彼此在作了一些让步后，达成了默契。贝·布托在组阁后，继续坚持巴基斯坦前政府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政策不变，为保证巴外交政策的连续性，继续让前内阁外交部长穆斯林联盟的雅各布·汗担任新内阁的外交部长，人民党放弃提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而是支持代总统穆斯林联盟的乌拉姆·伊沙克·汗，并选他为下届总统。贝·布托的新内阁将保证不削减军费，支持军队的各项建设，新政府成立以后，将以国防委员会的名义继续保留超宪法的原紧急委员会。该委员会对国家的重大事务拥有最后的决定权。

贝·布托前脚刚出总统府，谢里夫后脚就进了总统的会客厅，谢里夫和伊沙克·汗都是穆盟成员，并在一起共事，两人关系也比较好，谢里夫在会谈时要求代总统暂时推迟任命总理的时间，并力图说服伊沙克·汗让其组阁，并许诺在新国民议会选举中支持伊沙克·汗任总统。

贝娜齐尔和人民党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作出了反应。表示要支持现任总统留任，改变了以前人民党在总统人选上的保留态度，也解除了伊沙克·汗对自己权力地位的顾虑。从而为贝·布托提名组阁扫清了一道障碍。

11月23日、24日，伊沙克·汗总统又会见了在大选中赢得席位的小政党领袖，就组阁问题和总理人选同他们磋商。

11月30日，在伊斯兰堡举行了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议会议员宣誓就职仪式，之后，国民议会举行了选举后的第一次会议，按照宪法规定推举20个保留给妇女的国民议会议席。人民党在国民议会20个妇女席位中又赢得了12席。这样，人民党在国民议会的议员总数达到105人，离组阁的多数票越来越小。

随后国民议会中的第三大党，拥有13个议席的全国移民民族运动，表示要与人民党合作，一些独立人士和小党派也明确支持人民党组阁。

眼见大势已去，谢里夫宣布自动放弃组阁的竞争，潜心经营他的根据地和大本营旁遮普，等待时机，蓄势而起。这样，贝·布托通向总理宝座的道路畅通无阻了。尽管还没有坐在位置上，但她的私宅开始布署了警卫。一些国家的大使如中国、美国、印度和土耳其等登门向她表示祝贺。

1988年12月1日晚7时，成千上万的人坐在电视机前，围在收音机旁，他们等待着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焦急等待后，他们听到了巴基斯坦代总统乌拉姆·伊沙克·汗的声音，他庄严宣布：任命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现年35岁的贝娜齐尔·布托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总理，由她组织下届内阁。

他高度赞扬贝·布托是“一位年轻有为，受过良好教育，和气能干的妇女，具有担任领导工作的伟大素质和政治家的远见。”“贝·布托富有对祖

国的爱和为群众服务的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她是巴基斯坦人民的选择。”“在巴基斯坦这样一个穆斯林国家选出一位女总理将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伊沙克·汗同时宣布，“自8月17日齐亚·哈克前总统空难后，由将军等六人组成的紧急委员会已经解散，紧急状态宣告结束，颁布的戒严令解除。他相信贝·布托能在完全民主的环境中肩负起她的重任。”

当伊沙克·汗的话音一落，刹那间全国各地到处是贝·布托的画像，到处是人民党旗帜的海洋，到处是人民欢呼的人流。在卡拉奇街道两旁的建筑场上和树上突然彩灯齐放。顷刻之间整个伊斯兰堡笼罩在五光十色的灯光中，成千上万的男人涌上街头，“贝娜齐尔万岁！布托万岁！”的口号声震耳欲聋，人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许多青年男女打着巴基斯坦人民党的红、绿、黑三色旗骑着摩托车穿来穿去……

这个晚上，巴基斯坦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一位老妇人动情他说“感谢真主，贝娜齐尔·布托被任命，她已受尽了磨难。”

是啊！贝·布托经受了太多太多的磨难。在反对齐亚的斗争中，她失去了两位亲人——她的父亲和弟弟，她饱尝了铁窗之苦，八次被投进监狱，在狱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时光。为了事业，她不得不在家庭生活中付出代价，然而磨难并没有摧毁她，在威胁利诱面前，她没有屈膝过，在死神面前，她更是无所畏惧，曾有人多次劝她放弃政治生活避免重蹈她父亲和弟弟的下场，她却铮铮有力地说：“我宁愿走上荆棘丛生之路和进入死亡之谷。”

磨难使她从幼稚走向成熟，也锻就了她一生的政治智慧和能力。在各个时期她都能够敏锐地把握住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在刚刚失去父亲的悲痛中，她没有以感情代替理智，而是摒弃了与穆斯林联盟的恩怨，建立“恢复民主运动”，共同对付最主要的敌人齐亚。在齐亚死后，她提出了适应形势的人民党新纲领，不像她父亲那样走得太远，从而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心。在大选后的关键时刻，主动向军队伸出了和解之手，达成了默契。

贝娜齐尔以她的智慧、才能、磨难赢得了人民的心，成为人民心目中的偶像。正如许多成功者一样，她

在走向事业顶峰的脚印中也留下了一串串汗水和一番番艰辛。确实，要取得超人的成功必须付出超人的代价。

1988年12月2日，在总统府接见外国使节的豪华接见厅的中央搭建起了一座宣誓台，两边高悬着巴基斯坦国旗，背景是国父真纳的巨幅画像，两名宫廷装束的卫兵威严地站在两旁，仪式开始前两小时，得到了特别许可证的记者纷纷进入会场，特别是一些摄影记者都在设法抢占最佳位置，3时许，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和各国外交使节陆续就座，他们的特别席位安排在宣誓台的两旁，正对宣誓台的是数十架电视摄影机，贝·布托的母亲和丈夫作为当选议员坐在议员席的第一排。3时30分，厅内的聚光灯和宫灯大放光明，伊沙克·汗总统和新任命的总理贝·布托并排走进大厅并登上了宣誓台，大厅内外发出热烈的掌声，贝·布托容光焕发，脸上浮现出胜利的微笑，她身穿翠绿色的民族服装，头戴纯白的纱丽，登上宣誓台后，她环视了一下周围，并向两旁的来宾点头致意。

大厅内奏起庄严的巴基斯坦国歌，全体来宾肃立致敬，国歌声刚落，一位阿訇开始诵唱《古兰经》，悠扬的经声结束后，3点40分，伊沙克·汗总统和新总理手捧誓词同时起立，在总统的带领下，贝·布托逐句宣读誓词，

年逾古稀的总统虽已满头银发，但声音洪亮而深沉，年轻的总理语调高而清晰，又略带兴奋，这时的大厅中除了两人的声音外，只有摄影机的沙沙声，读完誓词后，总统和总理都在誓词上签了字。人们清楚地看到在宣读誓词前后，贝·布托都微笑地向坐在来宾席上的母亲和丈夫致意。

宣读仪式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贝·布托这位年仅 35 岁的女性成为巴基斯坦及穆斯林国家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总理，近代史上通过民选而产生的最年轻的女政府首脑。在东南亚女性执政的篇章上又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贝·布托出任巴基斯坦总理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外国领导给她的贺电像雪片一样飞来。

中国国务院总理 12 月 2 日打电报给贝·布托女士，对她出任巴基斯坦新总理表示祝贺。李鹏总理在电文中说：“在阁下荣任巴基斯坦共和国总理之际，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表示热烈的祝贺。我相信，在阁下任职期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巴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和人民的传统友谊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祝巴基斯坦繁荣昌盛，人民幸福，祝阁下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美国总统里根 12 月 1 日致函贝·布托，祝贺她被任命为新一届政府总理，并称赞巴基斯坦不久前举行的大选使这个国家进入一个民主治国的新时代。希望美巴两国的关系能继续发展。

巴基斯坦的邻邦，印度的拉吉夫·甘地总理在长长的贺电中盛赞贝·布托为巴基斯坦的民主事业所作的丰功伟绩，并希望两国领导人能密切合作，共同努力改善两国关系，消除过去毒化两国关系的那些刺激物。

当时亚洲的另一位女政府首脑，曾经是贝·布托的榜样的科·阿基诺也向贝·布托发了贺电，对自己的“同伴”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头戴白色头巾，身穿橄榄色军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也从突尼斯打来电话。祝贺贝·布托在大选中获胜。他是伊斯兰世界第一个祝贺贝·布托当选为总理的领导人。

苏联外交部发言人称，贝·布托当选总理证明巴基斯坦正在发生民主变化，重申苏联愿意本着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的精神发展两国关系。

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领导人也向贝·布托表示祝贺。

贝·布托成为新闻界的热点和风云人物。一些世界上著名的报刊对她给予了高度评价。

美国著名的《华尔街日报》，1988 年 11 月 18 日，在头版刊登了题为《能够领导巴基斯坦的贝娜齐尔·布托》的人物报道。文章称贝·布托的当选，使得巴基斯坦在“加强民主方面迈出了巨大的一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英国的《泰晤士报》就巴大选发表了一篇社论说：“民主制度无疑是巴基斯坦的最大获胜者，这是专制独裁政治自身和平地转为民主政治的少有的几个转折点之一。这次选举可以与 1983 年阿根廷的选举，1987 年韩国的选举以及 1988 年 10 月智利的公民投票相媲美。”

《印度时报》赞扬说“贝·布托一举成为穆斯林教徒占大多数的国家的一名女总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

世界最具影响的美国《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均把贝·布托作为 1988 年 12 月 28 日出版的刊物的封面人物，并把她作为 1988 年世界十大风云人物之一。



中国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也对贝·布托作了充分的介绍和报道，中国的新闻界把贝·布托当选为总理列为 1988 年世界十大新闻之一。

12 月 3 日，新组成的国民议会举行全体会议，选举议长。人民党候选人哈立德以 134 票对 72 票战胜了伊斯兰民主联盟候选人艾哈迈德。这次选举确立了人民党在议会中的优势地位，是人民党的又一重大胜利。

12 月 4 日，贝·布托总理组成了共有 23 名成员的新内阁，这些成员包括 10 名联邦部长，2 名国家部长，3 名联邦部长级顾问，1 名联邦部长级总理特别助理，1 名国务部长级内阁事务特别值勤官以及 1 名检查总长。

从年龄结构上看，这个内阁主要以年轻人组成，是当时南亚政坛上最年轻的内阁。但内阁中一些重要部门由顾问负责，是内阁的核心。担任财政经济事务、计划和发展顾问的 U. A. 贾弗里，曾任巴基斯坦国家银行行长和伊沙克·汗的首席秘书，在财政和经济事务上经验丰富；担任全国协调和安全顾问的伊克巴勃·阿洪德是一位退休的高级外交官，曾任巴基斯坦驻联合国代表，具有丰富的外交和国际事务阅历；负责政府官员任免事宜的建制顾问拉希德·汗曾是一位高级警官，在老布托执政期间曾担任国家情报局局长，是一位安全问题专家；总理特别助理巴巴尔是一位退役的少将，曾任西北边境省省长，对军队事务非常熟悉。

在内阁成员的地域分布上，也比较平衡。在 23 名内阁成员中，有 1 名来自旁遮普省，4 名来自信德省，2 名来自俾路支，3 名来自西北边境，还有 4 名出自印巴分治时从印度涌入的代表穆斯林利益的全国移民运动。

同时，内阁中还保留了伊斯兰联盟成员前外交部长雅各布·汗的职位，既是贝·布托曾对军方作出的承诺，也是为了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

12 月 12 日，贝·布托在国民议会对她进行信任表决时，以 148 票对 55 票获得议会的 2/3 的多数信任。在同一天，也进行了总统选举。穆斯林联盟成员代总统乌拉姆·伊沙克·汗在秘密投票中获得 448 张选票的 348 张，以绝对的优势成为巴基斯坦第七位总统，任期五年。

在第二天举行的总统就职仪式上，这位戴着圆边眼镜，身着白色民族服装、脸色像法官一样严肃的新总统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他相信贝·布托有能力治理好巴基斯坦。

陆军参谋长贝格将军在仪式结束后回答记者提问时明确表示，军队内部对贝·布托掌管权力不存在任何分歧。

1988 年 12 月 26 日，在参议院举行的全体会议上，伊斯兰联盟提名的候选人萨贾德当选为参议院议长。

这样，一个新的巴基斯坦的权力机构正式建立并开始运转，巴基斯坦在向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而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 十六、初显身手

人民把贝·布托送上了权力的宝座，同时也把振兴国家的神圣的重任放在了她的肩上。贝·布托十分清楚自己所处的地位，她在12月2日就任总理后的首次电视讲话中说：“你们把崇高的荣誉赠与你们的一个姐妹，也把沉重的责任搁在她的肩头。我们此刻站在灾难的边缘，然而整整一代正准备尽最大力量拯救我们的祖国，我们要结束饥饿、腐败的现象，我们要让无家可归的人重返家园！”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并非易事。摆在贝·布托面前的形势非常严峻。当时的经济发展速度大幅度滑坡。1977—1988年齐亚·哈克总统当政的11年，前期巴基斯坦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6%，从1986—1987年开始，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降，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只比上一年增长5.7%，1987—1988年度为5.8%，贝·布托执政初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又降为5.1%。

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加剧。近十年巴基斯坦中央政府预算赤字从1981—1982年度的171.74亿卢比增至1987—1988年度的577.18亿卢比，增长了2.3倍，同期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5.3%上升到8.6%。物价从1988年6月10日开始大幅度上涨，批发价格指数上升了10.34%，消费品价格指数上升10.50%，46种敏感商品价格上升了近16%。

外债负担日益沉重。巴基斯坦从建国初期就开始接受外援。1952—1953年度欠外债100万美元，1954—1955年为3.3亿美元，布托执政后期达到72亿美元，齐亚·哈克当政后，1981年为90亿，到1988年6月为126亿美元，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0.9%，这对巴基斯坦这样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是难以承受的。

人口问题更像一枚达摩克利斯剑悬挂在政府头上。巴基斯坦人口1988年时是1.04亿，是世界上第9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增长率为3.1%，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最快的国家之一。由于经济发展对人日的吸纳能力有限，1987—1988年失业人口达400万。

严峻的经济形势对贝·布托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她没有回避挑战，她已习惯过挑战的生活。她高举变革的旗帜，大刀阔斧地对经济结构实行调整，把稳定和发展经济作为工作的重心。

第一，采取“适当增税，紧缩开支”的政策克服政府面临的财政结构失衡问题。1988—1989年贝·布托政府原定新增税额为210亿卢比，后来减至100亿卢比，在考虑了各种因素后，又降至70亿卢比。这样既可保证国民收入的增长，也不影响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另外，为了动员更多的国内资金投入经济建设，贝·布托政府对“黑钱”积极加以控制和引导。据估计，当时巴基斯坦地下经济或未经注册的资金或黑钱几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相当于巴的外债总额。如果巨额的“黑钱”能够转为“白钱”，对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来说是有益的。因此，贝·布托政府明确规定：凡黑钱投入工业生产者，只需缴纳少量所得即成白钱，政府有关部门将不追究其逃税责任。这样，很多“黑钱”“弃暗投明”，被引入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轨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金融困难。同时，政府大力倡导节俭之风，贝·布托要求各省政府削减非发展费用，要勒紧裤带过日子而不能向穷人征收更多的钱来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她本人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将总理府按规定应付

的修缮费用削减一大半，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了国民经济发展之中。

第二，大力鼓励私营企业发展，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在阿·布托当政期间，曾对企业大力推行国有化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其效率低下的弊端愈来愈明显，经济渐渐失去活力。贝·布托吸取她父亲的过于激进政策的教训，在大选中宣布“人民党将鼓励私营部门积极承担国家工业发展的责任并在其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上台后，她把自己的言论变为实际的行动，采取了多种措施刺激私营企业发展。

首先，政府放宽投资设厂的限制，政府规定，凡投资在10亿卢比以下的中小企业，不需政府批准，对于在穷困落后地区投资办厂的，政府提供优惠政策，鼓励私营部门积极参与电力、交通等国民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

其次，对公营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加强同私营部门的经济联系。这是贝·布托政府在鼓励私营部门发展方面的一项重大举措，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拓宽企业的经营规模与资本。贝·布托总理还批准在首都伊斯兰堡设立股票交易所。

最后，加强私营银行在货币金融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积极引进外资。为了筹措更多的国内资金，促进经济发展，贝·布托政府允许有实力的私营公司成立投资金融银行，以缓解私营工业发展资金不足的困难。同时政府还积极创造环境，吸引外国公司对巴的投资。

第三，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农业是巴基斯坦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1987—1988年农业产值占巴国民生产总值的1/4，70%的人生活在农村，农民是人民党的重要支持力量，因此，贝·布托的人民党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

一是政府向小农无偿分配土地。在阿·布托时期，曾对农村实行过土地改革，但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农村的土地关系，在齐亚·哈克时期土地又集中在大地主手中，广大的中小农民在政治经济上都依附于大地主，因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高，为了刺激农民生产，贝·布托执掌权力后，决定向小农无偿分配近40万英亩耕地。

二是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对农产品实行价格补贴。自60年代中后期巴基斯坦实行绿色革命以来，历届政府都增加了对化肥、水利、高产品种等的投入。贝·布托上台后，继续加大对农业的资产、设备的投入，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对农产品价格实行补贴，使农业投入和农产品价格保持较好的平衡。这样既可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不致损害城乡消费者的利益。

三是制定和开展“人民发展计划”，改善劳苦农民的生活。这项计划主要是动员农村基层组织的力量，组织贫苦农民参加为满足本地需要的农村经济建设，为贫苦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利于逐步消除农村中的贫困现象。人民党对这一计划十分重视，在当时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中拨款20亿卢布用于开展“人民发展计划”，贝·布托总理多次参加和支持了一些地方的“人民发展计划”。

四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扩大社会福利设施。

贝·布托曾在竞选中许诺要让人们有饭吃，有衣穿，但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当时巴基斯坦的失业人口相当多，失业问题不解决，经济发展就是一句空话。为此，贝·布托政府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

首先将工业投资同增加就业联系起来，大力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鼓励在农村的中小城镇发展以农产品为基础的加工工业以吸收更多的劳动

力。

其次是鼓励自我就业。政府金融部门向受过一定教育的失业人员提供开业贷款，鼓励他们自我就业，如自办诊所、学校、律师事务所等。

另外，积极利用巴基斯坦与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及两伊战争平息之机，向中东地区输出劳工，开拓就业渠道。

在社会发展方面，政府还增加对医疗卫生、住房等社会福利事业的投资。

五是重视教育科学技术，增强国家的经济发展后劲。贝·布托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长大后又接受过西方大学教育。家族的传统和国外的所见所闻使她深刻地认识到科技教育的重要性和科技革命对国家力量的深刻影响。贝·布托和伊沙克·汗都特别强调要发展科技事业。伊沙克·汗总统说：“在当今世界上，如果不掌握科学技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发展，甚至不可能维护其主权独立和国家完整。”“对科学技术持冷漠、忽视或无所谓态度，将必然造成长久地依赖于他人，其结果是损害国家的主权、荣誉和尊严。”贝·布托总理也多次强调，人民党政府要最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并把发展基础教育作为国家最根本的一项任务，从资产上予以保证。同时，对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也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成立以她父亲名字命名的科学和技术研究所，对科技进行攻关。

贝·布托总理在对国内经济进行强有力改造的同时，在外交舞台纵横驰骋重塑巴基斯坦的形象，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巴外交政策中，对印政府关系一直是巴的重点和难点。

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南亚两个最大的国家，两国的总面积占南亚地区总面积的90%，两国的人口之和占世界的1/5，它们的关系对南亚局势的走向影响甚大，不论是好是坏。这两个邻国常常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彼此把对方看成是对自己的最大威胁，曾多次发生流血冲突，因而结下了世仇。

1947年6月3日，英国统治者公布了“蒙巴顿方案”，把英属印度按宗教信仰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

自治领。1947年8月14日和15日，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自治领正式宣布独立。在印巴分治过程中，宗教矛盾，民族矛盾总爆发，导致了大规模的罕见的种族冲突，在冲突最厉害的信德和旁遮普省，几个月之内就有50多万人被杀，血流成河，尸横遍野，1000多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英国殖民者在印巴之间留下的克什米尔归属问题更像一根敏感的神经常常触动着两国的中枢组织。迄今为止，两国已三次在克什米尔地区兵戎相见，积怨日深。

在第三次印巴战争结束后，形势有所缓和，1972年6月28日—7月2日，印度总理英·甘地和巴基斯坦总统阿·布托在西姆拉举行了会谈，当时年仅19岁的布托小姐也随父参加了那次历史性会晤。7月3日，印巴两国签署了《印度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双边关系协定》即著名的《西姆拉协定》，协定申明两国决心用和平方法通过双边协商或使用其他相互同意的和平手段解决它们的争端，任何一方都不应该谋求改变这条控制线。此后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两国未再发生战争，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一有风吹草动，形势就会骤然紧张。

进入80年代，两国围绕星峡冰川地区问题发生了冲突，出现了军事对抗。印巴关系陷入冰点。

星峡冰川（又称锡亚琴冰川）位于克什米尔印巴实际控制线北端，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三国交界地区，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海拔高度在4000—

6000 米，周围全是比冰川更高的雪山冰峰。从经济角度来看，价值不大，但它们在这块不毛之地你争我夺，主要是看重了这个地区的战略地位。双方剑拔弩张，不断出现零星的交火事件，使这一地区一直处在高度紧张状态。

除了领土争端外，教派冲突也是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变数。印度的教派冲突以“锡克人问题”最为突出。印度境内的锡克人集中居住在旁遮普，信奉锡克教，他们强烈要求成立锡克人的国家——卡利斯坦国。1984 年 6 月，印度总理英·甘地调动军队攻占了锡克人的圣地——阿姆利则金庙，酿成了严重的流血冲突，伤害了锡克人的宗教感情。英·甘地也吞下了自己埋下的苦果，10 月 3 日，被她的锡克族卫兵刺杀。其子拉吉夫·甘地上台后，采取措施，暂时平息了锡克人的旁遮普叛乱。但锡克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印度怀疑巴基斯坦插手旁遮普事务，并经常指责它试图从中渔利。而巴基斯坦也指责印度在其西部的拉贾斯坦地区训练骚乱分子，并派他们到巴基斯坦信德省制造动乱。

在怀疑和猜忌的气氛中，印巴两国都以对方为假想敌人，不断进行军备竞赛。印度以对付来自巴基斯坦的军事威胁为借口，从 60 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建设军事强国，到 80 年代末，印度的陆军总兵力居世界第四位，海军和空军兵力也位居世界前茅。军备竞赛的重点已经转移到了核武器竞赛领域。核武器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是一种强大的威慑力，谁掌握了核武器，谁就多了一分说话的分量。印巴两国为了限制对手成为南亚的头号军事强国，积极研制核武器。印度在此方面开了先河，它在 1974 年爆炸了一个核武器装置后，于 1988 年 2 月成功地发射一枚射程为 240 公里的中程核导弹，并声称印度已具备 15~30 枚原子弹的能力。在印巴三次战争中处于下风的巴基斯坦当然不甘落后，因为落后就要挨打，它也不惜花费巨资研制核武器，但在核能力上，巴基斯坦处于下风。可印度却指责巴发展核武器并威胁印度安全。因而巴基斯坦多次向印度呼吁两国停止核竞赛，宣布南亚为无核区，但遭到印度拒绝。

80 年代末期，世界风云剧变，整个国际气候朝着缓和的方面发展，东西方冷战进入尾声。南亚的两极也出现了松动迹象，尤其是贝·布托当选为巴总理后，两国关系的坚冰开始打破。

贝·布托深知，在国内经济面临严重困难时，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对本国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她本人也需要实绩取信于民，而对印度这样一个经济政治力量比自己强大的近邻，对话比对抗更有利于自己的国家。

再说巴印两国的领导人都比较年轻，都是独立以后成长起来的，没有经历过 1947 年分治后的流血冲突，因此心灵的创伤不像上一辈那样深，历史的包袱不像上一辈那样沉，它们能够比较超脱地处理两国间的分歧。

对于印度来说，拉·甘地与贝·布托一样也想包装自己，在南亚地区树立起新一代领袖人物的形象。

拉吉夫·甘地在 1989 年即将面临大选，对巴政策是国大党与反对党争论的一个焦点。在印度国内存在着大量的穆斯林选民，他们的选票对拉·甘地的国大党能否掌握权力至关重要。占全国人口 1/8 的穆斯林迫切希望印度与巴基斯坦和好，印度政府不能不考虑这种影响。

南亚的政治局势也发生了不利于印度的变化。印度的幕后支持者和靠山苏联此时全力收缩，专注解决国内问题，没有更多的力量去支持印度与美国在南亚地区进行争夺。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大大缓和了巴基斯坦的北部安全压力，使巴基斯坦对印度的抗衡能力有所增强。南亚力量结构显露出不利于印

度的微妙变化。

另外，一些小国与印度的摩擦也不断加剧。尼泊尔与印度在续签贸易条约和过境条约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对抗，斯里兰卡在印度维持和平部队撤军方面也与印度反目成仇，不丹与孟加拉国也拉开与印度关系的距离。这些小国不满意印度对本国事务指手划脚，颐指气使。印度政府想通过改善印巴关系来缓和其它小国的对立情绪，保持自己在南亚的“大哥大”地位。

国际政治风云的变化和国内政治的走势使印巴两国领导人向对方伸出了橄榄枝。贝·布托当选为巴总理之后，拉·甘地迅速向她发出贺电，希望改善两国关系，并主动取消了每年在印巴边境地区举行的例行军事演习，在印度新闻媒体上，攻击巴的调子大大降低了，口气也缓和多了。贝·布托也不失时机地作出反应，她向新闻界表示巴基斯坦愿为改善巴印关系做出最大的努力。一来一往，“秋波”频传，两国和解的帷幕缓缓拉开。

1988年12月28日，一架银灰色波音757在灯光的照耀下，徐徐降落在伊斯兰堡国际机场，机舱门缓缓启开，出现在舷梯上的是神采奕奕的印度年轻总理拉吉夫·甘地，他面带微笑，健步走下舷梯。早已等候在机场，穿着一身素装，头戴白纱丽的贝·布托迎上前去，与拉吉夫总理互致问候。这是印度总理28年来第一次踏上巴基斯坦国土。他是应贝·布托的邀请来出席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的。拉吉夫的到来标志着印巴两国关系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1988年12月29日，贝·布托总理作为东道主在伊斯兰堡主持召开了第四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斯里兰卡总统爱亚瓦德纳，不丹国王旺楚克和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等七国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外交部长。各国驻巴的外交使节三百余人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在大会上，贝·布托总理被选为该届首脑会议主席。

贝·布托总理在致开幕词时，回顾了自1985年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立以来，各国在区域合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前瞻了南亚区域合作的未来，她说，将要结束的1988年是世界形势缓和的一年，地区动荡和冲突出现了和平的曙光。南亚地区也不例外。这对南亚国家的合作提供了较好的机遇和条件。作为南亚国家的领导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我们的政策和目标，我们应该致力于消灭我们这一地区共同的敌人：贫困、疾病、落后和文盲，而不应该把有限的资金花费在扩充军事力量上。这声音预示着南亚政治气候的一个新变化，缓和成为南亚80年代末期的主调。

贝·布托还呼吁制定一个直至2000年的南亚区域合作计划。

会议决定，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11个合作领域中，将首先在农业、卫生保健、气象学等重要领域进行合作。

这次会议最引人注目之处莫过于印巴两国领导人会议期间频频会晤，气氛热烈友好，人们仿佛看到了16年前相似的一幕。

16年前，印巴战争结束后，巴基斯坦总理阿·布托带着19岁的女儿，哈佛大学的高材生贝娜齐尔飞赴印度的西姆拉与英迪拉·甘地会谈签订了《西姆拉协定》。

岁月沧桑，物换星移，在南亚的两颗政治巨星相继陨落之后，阿·布托1979年死于绞刑架，英·甘地1984年亡于枪口，如今，印巴两国最著名的家族——尼赫鲁家族和布托家族新生的一代以更加夺目的光辉出现在政治舞

台上，拉吉夫·甘地继承了母亲的事业，贝·布托实现了父亲的愿望，这两颗双子座在南亚次大陆的政治天空交相辉映，他们为了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又走到了一起。

历史是多么的巧合啊！

12月31日下午，印巴两国在友好的气氛中签订了《互不攻击对方核设施》、《避免两国贸易中的双重征税》和《加强双边文化交流》三个协定。这是两国领导人送给两国人民和南亚地区人民的一份新年厚礼。

两国领导人没有回避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障碍，表示先从解决小的和不太敏感的问题入手，逐步解决那些大的和较为敏感的问题。贝·布托认为，三个协定的签订象征着“和平的进程已经开始”，拉·甘地对此表示赞同。

两位领导人对双边关系在1989年取得更大的进展充满信心。

拉·甘他说，巴基斯坦民主制度的恢复和民选政府的产生“给次大陆和印巴两国带来了友好合作的曙光”。

贝·布托说：“排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建立起一代人的和平是两国新领导人的真诚愿望。”

经过磋商，印巴两国决定两国总理在1989年互访，两国的内政、外交、国防、经贸等部门的部长级官员也将就双边关系中的具体问题进行更加频繁的接触，以谋求合理地解决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与此同时，两国领导人称他们已注意到发展双边经

贸关系的潜力很大，表示愿为促进和扩大经贸关系做出积极的努力。

国际舆论对这次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次会议成为解决争端、缓和气氛、发展该地区富有成果的多边合作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贝·布托和拉·甘地成为新闻界瞩目的焦点。这是贝·布托刚上台不久主持召开的一次国际首脑会议，并获得了成功。有的报道称“巴基斯坦总理贝娜齐尔·布托今天（12月29日）晚上满怀信心地进入了国际舞台”。有的新闻分析说，“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位年轻的领导人充满高度乐观的言词和16年前两国达成的协议宣告巴印两国已迅速开始改善两国关系的新时代。”

新年伊始，两国的新闻媒介都在重要栏目中接连不断地以赞赏的口吻报道和评论了印巴首脑会晤，以往经常见诸报端的那些连篇累牍的彼此攻击几乎看不到了，印巴关系出现了缓和势头。

在1989年上半年，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外交舞台上，和风吹拂，两国外交，内政和国防等部门的初级会谈磋商不断，在星峡冰川争端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在反毒品走私，反恐怖活动方面已开始合作，文化科技和贸易往来也有增加。这为高层接触创造了和谐的气氛。

1989年7月16日—17日，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正式访问巴基斯坦。这是30年来印度总理对巴基斯坦的首次正式访问，显示出印度为改善印巴关系所采取的积极姿态，从而把印巴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在访问期间，拉·甘地分别与巴基斯坦贝·布托总理和伊沙克·汗总统举行了会谈。拉·甘地此行虽然匆匆，但通过两国的接触，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众所周知，边界争端一直是印巴两国关系的核心，是一敏感、棘手的问题。在拉·甘地访问巴基斯坦前已举行国防秘书和军事代表团会谈，双方同

意成立联合军事委员会，按照 1972 年西姆拉协定，调整双方在星峡冰川地区的军队，避免武装冲突。虽然在此问题上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双方显示出了解决问题的诚意。双方强调将在“后撤军队以避免军事冲突的前提下”，努力实现全面解决星峡争端问题。

在双边关系的其它领域，双方也表示了积极态度，就在总理会谈结束的当天，两国外长级联合委员会就建立了四个小组、分别就经贸、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和领事等各个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探讨。

在阿富汗问题上，两国持有相似或相近的立场，都强调了政治解决的必要性，希望在阿富汗尽快建立一个为全民所接受的、基础广泛的政权。

在南亚区域合作问题上，由于斯里兰卡要求印度撤出驻斯军队未得到响应，使印斯关系陷入僵局。拉·甘地向贝·布托通报了有关情况，并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从中调停，贝·布托答应了他的要求。

这次首脑会谈，对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南亚地区局势的缓和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两国关系的坚冰，需要耐心、克制和勇气。两国年轻的领导人以他们的远见和智慧牵引着两国关系的航船缓缓地走出风暴区，渐渐地驶向和平的航道。当然，这艘航船不会一帆风顺，有时还会偏离航道，或者撞上暗礁，但掉转头来回到以前是不可能的。“和为贵”，战争对双方来说是无益的，他们深深地懂得。

1989 年 2 月 21 日，一架豪华的飞机从伊斯兰堡国际机场腾空而起，向东北方向飞去。机上的主人是年轻的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目的地是中国北京。这是贝·布托上台后第一个正式出访的国家，在她上台时，她在接见中国大使时就明确表示中国将是她出任总理后第一个正式访问的国家，今天是来践诺的。

飞机在空中平稳地飞行着，贝·布托靠在座椅上微闭着双眼，脑海里清晰地显现出一幕幕往事，回忆之门缓缓打开。

那是 1964 年 2 月，中国总理和副总理陈毅访问巴基斯坦，当时贝·布托的父亲阿·布托担任外交部长。在周恩来访问期间，作为外交部长的佐·阿·布托一路陪同，并专门设家宴款待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及夫人。当时年仅 11 岁的布托小姐第一次亲眼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周恩来，童年时她的父亲就给她讲过周恩来的传奇经历。她至今还保存着一张全家人与周恩来及陈毅夫妇的合影。贝娜齐尔就站在周恩来总理及陈毅副总理之间，陈毅副总理还亲切地用两只手环抱着她与她的大弟弟米尔。

70 年代初，布托成为巴基斯坦政府首脑后，巴中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布托一家与中国人民的友情也与日俱增。

1972 年 7 月，布托特地把四个小孩送到中国，让他们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增长他们的见识，在中国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周恩来总理与夫人邓颖超亲切会见了贝·布托姐弟四人，这是他们第二次见到中国这位伟人。周恩来总理关切地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还与贝·布托这位哈佛大学高材生趣谈美国政治。当时美国总统的竞选正在进行，周恩来问布托小姐是尼克松还是麦戈文将任美国总统，布托小姐非常肯定地回答是麦戈文，周恩来说是尼克松，最后事实证明布托小姐是错的。布托小姐跟随她父亲见过世界上许多著名的政治家，但周恩来在她的心目中是最敬仰的人，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贝·布托姐弟四个游览了中国的名胜古迹，长城自然是他们最向往的地方。登长城时，布托小姐跑得飞快，警卫人员在后面追得气喘吁吁。她站在高高的峰顶，挥舞着双手，高声喊着：“我登上长城了！”抚摸着 2000 多年前的城墙，眺望着逶迤的群山，布托小姐心中油然升起了对中国人民的敬佩和赞叹，长城不愧为人类的奇迹。

他们还到无锡、上海等地参观，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欢迎。尽管布托姐弟四人在中国只生活了 20 天，时

间很短，但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和勤劳善良的人民使他们难以忘怀，他们多么希望能够再来中国，故地重游。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机舱里传来“现已到达北京 上空”的声音，贝·布托总理收回了奔腾的思绪，心情显得很激动，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她终于又来到了中国。

飞机平稳地停在首都机场的停机坪上，舱门缓缓打开，年轻的女总理走下舷梯，脸上挂着恬淡的微笑，风采照人。二月的北京寒气逼人，但机场上欢迎的人群使贝·布托感到暖烘烘的。她又来到了北京，又踏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丽国土。

弹指一挥间，17 年过去了。贝·布托上次来的时候还只是一个涉世未深、天真活泼的大学生。而今，她已是一国总理、政府首脑，代表着一个国家。她深感此行责任重大，但相信自己一定会不虚此行。

1989 年 2 月 11 日晚 6 时，北京，人民大会堂。

贝·布托刚刚走下汽车，就置身在一个欢乐的世界、花的海洋中。欢迎的人们不断向她挥手致意。早已等候的李鹏总理含笑向她走来，两人互致问候。

在东门外广场，李鹏总理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在李鹏总理陪同下，贝·布托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鸣礼炮 21 响。李鹏总理随后向她介绍了出席欢迎仪式的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外交部长钱其琛，中国政府陪同团团团长、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等，贝·布托也向李鹏总理介绍了自己的丈夫阿西夫·阿里·扎尔达利先生及外交部长雅各布·汗等巴方随访人员。

欢迎仪式结束后，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欢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巴基斯坦第一位女总理贝娜齐尔·布托。

李鹏总理在宴会上致欢迎词说：“阁下就任总理后不久即首先访问中国，这充分体现了阁下、贵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巴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意。李鹏指出，多年来，巴基斯坦坚决支持阿富汗人民的正义斗争；为 300 万阿富汗难民提供了慷慨的人道主义援助，并为寻找阿富汗问题的全面政治解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重要贡献。对此，中国政府表示高度的赞赏，中巴两国和世界上其它国家一样，希望阿富汗各种政治力量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通过和平政治协商决定自己的未来，尽早建立起一个基础广泛，能为各方接受的联合政府，使阿富汗的独立、和平、中立和不结盟地位早日得到恢复。”

李鹏总理重申，在巴基斯坦维护国家独立主权、争取国家发展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正义事业中，中国政府和人民将永远是巴基斯坦人民可以信赖的朋

友。

贝·布托总理在答谢词中说。这次访问使自己夙愿得偿，同中国朋友重聚一堂，这对于她来说，犹如回到

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令人为之动情。她回顾了巴中两国的传统友谊和1972年她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对她的热情款待。

贝·布托说，巴基斯坦坚持认为，印度洋不应成为不加控制的军事化的舞台，大国及沿岸和内陆国家必须制定一种制度来限制本地区军事化的规模，均势和适度行为是防备一场耗资巨大的军备竞赛的唯一出路。

贝·布托指出：中苏两个邻邦缓和紧张状态解决彼此间悬而未解的问题有助于我们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贝·布托最后说，巴基斯坦支持中国关于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主张，并保证将竭尽全力促进和发展巴中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宴会自始至终洋溢着热烈友好的气氛。

2月12日上午，李鹏总理与贝·布托总理举行了正式会谈，双方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并彼此介绍了各自的对外政策，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经贸技术合作交换了看法。

贝·布托总理深情地说道，巴中关系已有近40年的历史，两国关系已经成熟，巴中友谊是巴基斯坦对外关系的基石，这是基于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关系，它的特点是多方面发展，多方面合作。

她希望巴中在教育、旅游、商业方面的交流有进一步的发展，应在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两国间贸易的潜力。她表示支持中国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主张。

李鹏总理对贝·布托的看法表示赞赏，他说，当前国际形势出现了缓和，热点问题已逐步解决，世界的和平力量在增长，但战争的阴影仍然存在，对此应保持警惕。

现在中巴关系很好，援助是相互的，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帮助了巴基斯坦，但限于中国的财力物力，这种帮助是很有限的，我们同时也得到了巴基斯坦的帮助。

会谈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宾主双方一直沉浸在兴奋友好的气氛中。

会谈结束时，贝·布托总理热情邀请李鹏总理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巴基斯坦，李鹏总理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表示在年内访问巴基斯坦。

12日下午3点30分，身着白色披单，头带蓝色头巾的贝·布托总理特地到中南海西花厅拜访中国老一辈政治家邓颖超。17年前，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曾在西花厅热情接待过他们一家。如今，85岁高龄的邓颖超带着慈祥和蔼的微笑，又在西花厅欢迎已成为巴基斯坦总理的贝娜齐尔·布托。邓颖超握住贝·布托的双手说：“你来了，就像回到家里一样，我把你当老朋友，今天，我在家里同你见面，倍感亲切。”

贝·布托心情非常激动，她的思绪又回到了1972年的夏天。她愉快地对邓颖超说：“那年我们去了长城，我们没爬多高就累了，周总理知道后对我们说，不要紧，这是第一次，以后再来时，我送你们到中国红军走过的地方，体味一下中国老一辈革命家所经历的艰难困苦。”

听到这里，邓颖超会意地笑了，贝·布托也笑了。

她接着说，“对我来说，中国是熟悉的，周恩来的名字在巴基斯坦各地都是为人所熟悉的，在我们每次的政治讨论中，都会谈起中巴友谊。今天能

有机会不仅结

识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也会见了您这位受尊敬的老人并重叙友情，真是太高兴了！”

邓颖超接过话说，“我一直都想念着你们全家，今天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恩来同你们全家合影的照片后，我感到很亲切，希望你能第二次、第三次到中国来访问。”说着，邓颖超将她亲笔签名的周总理与阿·布托合影的照片送给贝·布托。

贝·布托总理双手接过照片，仔细端详着，虽然尊敬的亲人和伟人都已离去，但两位伟人培育的中巴友谊之花越开越艳。她感谢邓颖超赠送给她一份珍贵的礼物。分手时，贝·布托总理衷心地祝愿邓颖超健康长寿。邓颖超把贝·布托送到门口，希望她能够再来中国，第二次，第三次……

两人依依惜别……

2月13日，贝·布托总理一行乘专机飞抵上海。

17年后的上海已今非昔比，改革开放给它增添了

巨大的活力。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它已成为中国腾飞的龙头，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黄浦江畔。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这里会见了贝·布托一行。

两位政治家相见，分外高兴，邓小平笑容满面，精神矍铄，爽朗地对贝·布托说：“我见到最年轻的女总理，很高兴！”

贝·布托说：“我们荣幸地见到伟大中国的领导邓小平主席。您的改革给全世界带来了变化。”

邓小平接着说：“巴基斯坦各党派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我希望他们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发展巴基斯坦。而不再计较过去的恩恩怨怨，这是我作为巴基斯坦的朋友的希望，或者说是我的建议。我们最关心的是巴基斯坦的稳定。”

邓小平又把话题转到中巴关系上，他说：“中巴关系是不寻常的。中巴关系真正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国之间相互尊重，平等对待，无任何疙瘩，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能相互理解。中巴友谊是永恒不变的。就中国来说，巴基斯坦是特殊的朋友，就你家庭来说，同中国有几十年的关系。你父亲同毛主席是朋友，你父母同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夫人建立了特殊关系。我个人同你家也有较长时间接触。”

贝·布托说：“我代表全家感谢您，巴基斯坦政府和我个人感谢您支持巴基斯坦的正义事业。”

她说：“巴中友谊的火炬已经交给了下一代人的手中，他们一定会高举这个火炬一代一代传下去。”

会谈时间虽然不长，但双方都感到两国的友谊又加深了一步。

2月13日晚，贝·布托总理圆满地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满载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启程回国。在飞机起飞前，她站在舱门前，深情地向欢送的人们挥手致意，向这个美丽的城市，向这个伟大的国家挥手告别。欢送的人们也不断地向她致意，目送着飞机腾空而起，汇入繁星点点的苍穹。

第二天凌晨，贝·布托总理的专机返回伊斯兰堡，贝·布托在下飞机后，立即在机场贵宾室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她说她的中国之行获得了圆满成功。她和中国总理李鹏举行了正式会谈，在国际形势和地区安全问题上都有一致的看法。她兴奋地告诉记者，“我的加强巴中传统友谊的使命已圆满完成。”

贝·布托对她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见给予高度评价，特别提到了与邓小平的会见。她称赞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者和哲学家”，“布托家族的朋友”。

贝·布托在回答中国记者的提问时说，她这次访问虽然时间短暂，但收获巨大。其中最大的成果是继承和发展了巴中两国前辈领导人之间建立的传统友谊，而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之间又建立了深刻的理解和信任，这为继续发展两国关系奠定了基础。她说，同她 1972 年访华相比，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并祝愿中国人民在建设自己国家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1989 年 11 月 14 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应贝·布托总理的邀请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对巴基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李鹏总理在贝·布托总理的陪同下，含笑步入灯火辉煌的会见大厅，大厅里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300 多名巴基斯坦各界人士迎接李鹏总理的到来。

亲切的握手，热情的话语，新朋旧友喜相逢，大厅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李鹏总理盛赞中巴友谊深入人心，“它不受国际风云变幻和两国国内情况变化的影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贝·布托总理说，巴中友谊是两个大小不同、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各异的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巴中友谊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同时对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欢迎仪式结束后，贝·布托总理与李鹏总理出席了中巴两国政府四个文件的签字仪式。这四个文件分别是：《中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中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经济技术合作的协定》、《中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政府向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提供筑路机械的议定书》、《中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政府向在巴基斯坦境内的阿富汗难民无偿提供物资的换文》。

随后，贝·布托总理举行盛大宴会，热情款待了李鹏总理一行。

贝·布托总理首先致词：“我同李鹏总理的简短会谈和四个文件的签署表明，巴基斯坦和中国对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持有相似或一致的看法，更重要的是我们都认为两国的友谊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有利于和平与稳定。”

贝·布托总理回顾了 2 月份对中国的访问，她说：“那次访问使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有机会重叙旧谊，结识新友，进一步加强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贝·布托还赞扬了 40 年来取得的成就，“我们认为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将作为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堡垒，继续发挥必不可少的作用。”

李鹏总理在讲话中说：“巴基斯坦是我此次访问南亚的第一个国家。巴基斯坦人民勤劳勇敢，富于进取精神，在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兢兢业业，辛勤劳动，取得了很大成就。巴基斯坦政府奉行独立和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原则，伸张正义，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和南亚国家毗邻，又都是发展中国家，历史上有过相似的遭遇，今天又都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共同任务，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发展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还要靠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我们将继续为发展同南亚各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做出自己的努力。我们也真诚希望南亚各国能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处理相互关系，发展区域合作，为南亚地区

的和平、繁荣、稳定作出贡献。”“中巴两国建交40年来，两国关系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巩固，已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友好相处的典范。中国政府和人民决心进一步增进同巴基斯坦的友好合作，为中巴友谊大厦不断添砖加瓦，我要借此机会重申，在贵国维护民族独立、主权和建设国家的事业中，中国政府和人民将永远是你们可以信赖的朋友！”话音刚落，整个大厅掌声四起，人人脸上露出了欢笑，宾主举杯共祝中巴友谊万古长青。贝·布托总理和李鹏总理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11月15日上午，李鹏总理和贝·布托总理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在更大范围进行，历时2个多小时。这次会谈也取得了圆满成功。李鹏在接受巴基斯坦电视台记者专访时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中巴友好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是经受了历史考验的，这种友谊是建立在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我第一次对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受到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这使我很感动。我和贝·布托总理进行了两轮会谈，都很成功。这表明我们两国新一代领导人是有决心把中巴友谊的火炬一代一代传下去的，不久前，贵国外交部访华是在中国处于困难期间进行的。这次访问带来了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这种在困难期间的友谊显得更重要更有力量。

李鹏总理作为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在结识新朋的同时，也不忘旧友。贝·布托的母亲努斯拉特·布托是一位为中巴友谊做出贡献的中国人民熟悉的巴基斯坦政治家。现任巴基斯坦人民党终身主席，国民议会议员，她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并怀有深厚的感情。曾多次来中国访问，除1965年、1972年、1979年、1976年随丈夫佐·阿·布托访问中国外，1973年2月17日，她还作为总统夫人应邀率巴基斯坦政府代表团来我国进行过正式访问，并出席了北京庆祝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开航的招待会，周恩来总理、邓颖超亲切地会见了她。她在访华结束谈到访华观感时说：“我带着巴基斯坦人民、总统和政府对中国人民和领导人的问候和良好祝愿访问中国，在中国访问期间，我们处处受到了极好的和热诚的招待。中国人民用各种方式来欢迎我们。我们对中国的访问是非常愉快和有收益的。”

1988年9月30日，努斯拉特·布托夫人抱病参加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举行的中国国庆招待会。第二天又赶往伊斯兰堡参加中国驻巴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

1989年11月15日，李鹏总理和夫人朱琳会见了中国人民的这位老朋友。朱琳特意穿上巴基斯坦裁缝为她赶做的一身巴基斯坦民族服装。李鹏总理笑着问布托夫人：“您看她像不像巴基斯坦人？”布托夫人笑着说：“像极了。”布托夫人接着说：“25年前，她率领巴航空代表团去北京，庆祝巴中通航，当时巴基斯坦是第一个同中国通航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座的人都笑了，笑声里充满真挚的情谊。

伊沙克·汗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65年3月，伊沙克·汗随总统阿尤布·汗首次访问中国。随后在1977年、1980年、1982年、1984年、1986年多次访问中国，为巴中友谊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11月15日晚，李鹏总理来到总统官邸拜会了伊沙克·汗。李鹏总理首先转达了邓小平、杨尚昆等中国领导人对伊沙克·汗的问候和良好祝愿，并高度赞扬了伊沙克·汗几十年来为发展巴中友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伊沙克·汗总统对此表示感谢，他说，巴中两国的关系是国家关系的楷模。中国是可信赖的朋友，即使巴基斯坦在极困难的时刻，中国也坚定地站在一起。他高度赞扬了中国人民在发展经济和高科技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要学习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并相信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关系能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中巴两国领导人谈得十分融洽愉快，会见厅里欢声笑语不断。

李鹏总理的访问时间短暂，但收获颇丰，它把中巴友好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巴友谊的大厦更加挺拔雄伟，中巴友谊的接力火炬在两国新的领导人手中更加辉煌。

## 贝·布托大事年表

1953年6月21日	生于巴基斯坦信德省卡拉奇市。
1958年	入耶稣和玛丽亚女修道院学习。
1964年2月	第一次见到来访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和陈毅副总理，并合影留念。
1967年12月	加入其父创建的巴基斯坦人民党。
1969年8月	到美国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留学，学习比较政治学。
1971年12月	印巴第三次战争爆发后，其父到联合国进行外交活动，临时担任他的秘书。
1972年6月28日——7月2日	陪同父亲前往印度西姆拉参加两国首脑会议。
1973年6月	哈佛寒窗四载，学成回国。1973年8月从父亲之命，负艾英伦人牛津大学学习政治学和国际关系。
1976年6月	从牛津大学毕业回国，入巴基斯坦外交部研究国际战略问题。
1976年12月	在牛津大学修研究生课程，当选为大学辩论社主席。1977年7月
从牛津回来不久，亲眼目睹齐亚	发动军事政变。
1979年9月	第一次遭到齐亚政府的拘禁。
1978年3月	父亲被判死刑后，积极为父亲上诉奔走。
1979年4月3日	与母亲一起从西哈拉警察训练营出来最后一次探望牢房中的父亲。
1980年4月	被释放后回穆尔塔扎村，料理布托家族事务。
1981年2月	人民党和穆斯林联盟等九个政党组成了“恢复民主运动”。
1981年12月	被软禁在穆尔塔扎。
1982年11月	出任人民党代理主席。
1984年1月	到英国治疗耳疾。
1984年3月	应卡内基基金会邀请赴美国访问。
1985年7月	前往戛纳和家人团聚小弟沙阿·纳瓦兹神秘身亡。
1985年8月	返回巴基斯坦，为弟弟举行葬礼。
1986年4月	结束国外的治疗，回到国内，掀起了“贝娜齐尔旋风”。
1987年7月	在伦敦与阿希夫·扎尔达利订婚。
1987年12月	在卡拉奇与阿希夫·扎尔达利喜结

1988年11月  
1988年12月

良缘。

领导人民党在大选中获胜  
被总统伊沙克·汗任命为总理，成  
为巴基斯坦和伊斯兰世界第一位  
女总理，世界上最年轻的女总理。  
就任总理后，首次出访中国把巴  
中关系的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

1989年2月



## 主要参考书目

1. 《东方女儿》，贝·布托，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版。
2. 《真纳传：一个民族的经历》，G.阿拉纳，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3. 《巴基斯坦简史》（第四卷），拉希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4. 《南亚战略态势》，时事出版社编，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
5. 《英迪拉·甘地传》，因德尔·马尔豪特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6. 《战后世界重大军事事件始末 1945—1990年》，谢朝晖、罗庆旺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7. 《贝·布托传》，刘文山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